◎● 本书收集的突发事件几乎每一个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共和国史上的“第一”：共和国史上第一次农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1956-1957年农村闹社事件；共和国史上死人最多的矿难——山西大同老白洞矿难；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副总理被处分的生产安全事故——“渤海二号”石油沉船事故；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部长被撤职的生产安全事故——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历史经验



透视 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 1949-2005

程美东◎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 1949-2005

本书注重史论结合。史实叙述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学者点评则汪洋恣肆、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该书让人在愤激满怀、怒火中烧的同时，也能充分享受到剪除罪恶、伸张正义的快感。

该书既可以使人在感情的无境世界里充分地展翅飞翔，也可以使人在理性的浩瀚宇宙中漫步徜徉。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学术著述，也是一本浓醪醪的通俗史话。



ISBN 978-7-80199-861-3

9 787801 998613

定价：68.00元（全两册）



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 1949-2005



主编：程美东

副主编：胡尚元 黄锦春

撰稿人：程美东 张北根 胡尚元 侯松涛 黄锦春
虞花荣 柳 飒 吴 倩 杨 旸

中共党史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录 Contents

第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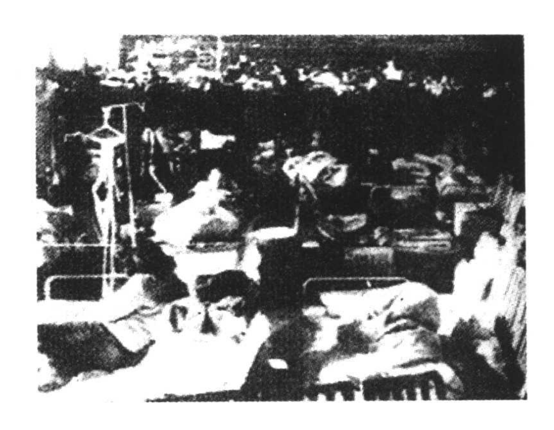
1988 年上海甲肝大爆发

1988 年 1 月至 3 月，上海爆发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甲型肝炎流行事件。从 1 月 19 日开始，上海市民中突然发生不明原因的发热、呕吐、厌食、乏力和黄疸等症状的病例，数日内成倍增长，截至 3 月 18 日，共发生 292301 例，死亡 11 人。从 1 月 30 日至 2 月 14 日，每天发病人数均超过 1 万例。至 3 月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4 月以后发病率逐日下降。当年 3 月 21 日卫生部公布，截至 3 月 18 日因甲肝而死亡的人数为 11 人。

一、30 万人感染甲肝

1988 年元旦，从上午到下午，拉肚子现象不断发生。医院肠道病人急剧增加，马路旁，公共汽车上，留下了一摊又一摊的呕吐物。黄浦区中心医院肠道急诊一天就有一百多位病人。

普陀区中心医院病房里收住二百多位肠道急诊病人。



1988 年上海甲肝流行时医院里的病人

杨浦区中心医院肠道门诊病人太多，需要医生支援。

许多地段医院肠道急诊病人猛增，比平时增加三至四倍！

1988 年 1 月 18 日，在上海唐家湾医院，来就诊最多的就是上吐下泻的病人，而仅仅在一天后，人数剧增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

前来看病的人太多了，为了挂上号，有的半夜就守在医院门口，一定要住院，他们甚至自己带床，带被褥。

上海滩上的各家医院有大量病员涌进，他们都伴有身体发热、呕吐、厌食、乏力、脸色发黄等典型的症状。在以后的几天里，整个上海患病人数仍在迅速攀升：

1 月 18 日 43 人；

1 月 19 日 134 人；

1 月 21 日 380 人；

1 月 22 日 808 人；

1 月 23 日 1447 人；

1 月 24 日 2230 人；

1 月 27 日 5467 人；

1 月 31 日 12399 人……

静安区地段医院里，有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没有力气排队，医生们看到有人晕过去就把他抬进来，其场面非常可怕，犹如排山倒海。医

院里乱糟糟的，到处都是人，病房里和走廊里都挤满了人。时任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巫善明回忆说，在持续半年多的甲肝风波中，全城直接查出有31万人感染，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四倍，这意味着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甲肝病毒。150万人！1988年的时候，上海人口不过1200万。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停车棚里、浴室里，都睡满了病人，老百姓拎着钢丝床挤在病房的外面。①

传染病医院的290张肝炎病床全部住满。

那么，再来甲肝重病人往哪里放？

“加床，凡是能加床的地方都加床！”连商量的时间都没有，院长巫善明像战场上的指挥员，果断地下达着命令。

一时间这个现代化、有着正规医疗秩序的传染病院，很快就变得像一座野战医院。病房里加了病床，走廊内加了病床，汽车库变成了病房，停放自行车的车棚，也成了临时病房。

医院里已经无法再加病床了，新的甲肝病人还像潮水似的向这里涌来。一位年轻的病人，父母用帆布床把他抬到这里。他那发黄的皮肤，发黄的眼珠，都黄得泛着青光。在三天的时间里，他跑了四家医院，都没能住上。开始奔波医院时，他还能行走，现在连行走的力气都没有了，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微弱起来。病人带着一线生的希望一进门诊室，他的父亲就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我儿子死也死在这里了！”

病人的父母双双跪下：“医生，我们给你磕个响头！”医院无法再增加病床了。巫善明就到医院外面找到两座新盖的、还没有投入使用的楼房，在那里开设病房。这样，原来只有290张肝炎病床的传染病院，肝炎病床一下子增加到1518张，医生护士还是那么些人。

从1月19日开始，每天发病人数都在1万例以上，这样的数字持续了16天之久。

全上海市都在呼喊病床。

---

① 刘建平、朱强、谢春雷、马凌、徐漩：《“特别”的新市长》，载《南方周末》2003年3月6日。

病床成为上帝的方舟，甲肝病人只要登上这个方舟，就能消灾化凶。

然而，院长们不是上帝，没有能力给甲肝病人制造那样多的方舟。

一个不知姓名的市民给市政府打电话：我们全家五口，有四人得了甲型肝炎，希望作为人民公仆的市政府采取措施，给肝炎患者一张病床，让他们早日住院治疗，不让疫情继续扩散，再传染更多的人。

二、防治甲肝药价格飞涨

如此大量人群感染甲肝，使得治疗、预防甲肝的药品成为最紧俏的商品，有病的、没病的都争相抢购，一时间此类药品的价格飞涨！

最吃香的，是有权批条子的。

最紧张的，是有亲属生甲肝的。

最得意的，是那些怀里揣着药品而趁机“进分”（赚钱）的。

这几句话是在甲肝大流行中出现的上海民谣，简练、形象、生动而又准确地反映了上海市民对待药品的心态。

医院的取药窗口，大街小巷的药店药房，医药公司的销售部，药材公司的业务科，还有那些批发部、营业所、经理室以及药厂传达室的警卫、医药仓库的保管员，所有与药有关的地方都拥挤着人群，所有与药店沾边的人的手上都被塞满了一张张求援的条子。

一时间，手上捧的、包里兜的、自行车上驮的、各式车辆上装载的，都不是过春节的年货，而是各种各样的药。满街上走着的、跑着的、哭丧着脸的、急得满头大汗的、眼里含着泪水的、或是暗自欣慰的，还是为了药。

就连那不是药的人参蜂王浆、中国花粉、雀巢奶粉、强化麦乳精、小儿吃的杏仁露等等的浆、精、露、粉，也都变成了药。这些药不要自己掏腰包去买，各单位的领导都在保护劳动力的口号下，从商店买来发给职工，要职工营养身体，增强抵御的能力。

一个家庭如果有四个成员在工作，就会不约而同地领来四份营养佳品，四盒蜂王浆，四盒青春宝，四盒……全市的药店都挂出了缺药的牌子。

在一家药店的门口，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也是祖母，排在购药的长龙之中。她一家四口，有三人患了甲肝，儿子、媳妇、孙子全躺在家中。药店挂出牌子，说是无货供应，排队购药的人散去不少，这位母亲、祖母还是在那里充满希望地等待。她老泪横流，硬咽着说："医院住不进，药又配不到，病怎么会好呢？他们发高烧，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她等来的是一个黄昏，没有希望。第二天清晨，药店还没有开门，老人又抖抖索索地排在最前面。

这位母亲、祖母无法知道，这时有一支6万人的药物采购大军在迎接甲肝的挑战。在药材公司，在医药公司，所有的电话都在挂长途，数以万次计的电话把药品的原料、生产、供应紧紧相连。电传机从早到晚在不停地工作，电报在飞向全国。催调药品的人马分兵十路，开拔去安徽、江西、两湖、两广和东北。

被视为第一流治疗甲肝的药物丙种球蛋白、茵栀黄、板蓝根冲剂、肝泰乐，像玩魔术一样，一夜之间就出现在医药奇缺的上海。

华侨商店门口的黄牛市场里，有药在握的人，把药捧在手里，公开地吆喝着：治疗甲肝的良药，有烟换烟，无烟钱买；手里捧着外烟的人，似乎也不甘示弱地喊着：剑牌，万宝路，555牌，一手交烟，一手交药，公平交易。

一位30岁的青年人急匆匆地走进人群，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水。目光很快地扫了一圈，掏出一叠钞票，买了三包外烟，然后又用那外烟换了一盒十包装的板蓝根冲剂，急匆匆地离去。

那些既没有外烟又需要药品的人，一下子从发呆中清醒过来，纷纷去买外烟调换他们最急需的药品。一位中年汉子掏出80元钱买了一条剑牌香烟，换了两支丙种球蛋白，那丙种球蛋白只要7元5角一支啊。又一个花了16元钱买了两包"剑牌"，换走了一盒十小包的板蓝根冲剂。这种冲剂只要两元钱就可以买一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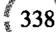
第一个用钱买三包外烟去换板蓝根冲剂的青年，这时又变成卖药者，他手里捧着维生素C和肝泰乐。那药价要涨都涨，要跌都跌，而且涨跌都在药品原价的8倍到10倍之间，变化之快之统一，像经过商量一样。

卫生防疫部门也做起黑市买卖来了。

他们涨价有术：2月3日，每50公斤过氧丙酸价格为10.70元；2月4日提价为12元；5日提价为14元；6日提价为15.70元。价格一日一变。市民们对他们的提价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却回答："消毒剂要随行就市，价格必须适应消费的需要！"①

人们把"板蓝根"当作医治"甲肝"的灵丹妙药。南京某大军工企业，派出50人的庞大采购队伍，开着四辆大货车，奔赴安徽、河南等地搜罗板蓝根药品；南京某药品采购站不惜血本，从青海省会西宁折腾来数10吨板蓝根冲剂。莫愁湖畔一个仅有30余人的街道小厂，也派出一条精干的汉子去江西九江开后门，弄回来几大箱板蓝根。

在看不见的市场上，板蓝根可以换老母鸡，手表、外烟、彩电票、西服、粮票和各种有价或无价的证券。来自苏北盐城的一位板蓝根贩子告诉记者，他用100盒板蓝根冲剂，换到了价值800多元的实物。他说："这回，城里人的钱可太好赚了！"而一位曾用皮鞋换过板蓝根的三个孩子的母亲说"吃点小亏，讨个好身体，划得来的！"②



三、上海＝不祥之地？

上海，这个一直令国人羡慕向往的国际大都市，陡然间成了国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不祥之地！上海人、上海货，甚至上海话都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代名词——

济南的一家旅馆明晃晃地挂出一则通告："本店不接待上海人就餐，餐具消毒五遍以上，绝无甲肝隐患"，以招徕顾客。

"我说什么也不明白，就像我身上出产甲肝病毒似的"——这是一位上海籍大学生回到青岛某大学被隔离，不准其上课时愤愤然讲出的话。③

某单位新上任的一位年富力强的党委副书记，对上海发生了"帕布尔

---

① 楷体字部分引自郑重、叶又红、蒋树芝：《黄色龙卷风——上海甲肝大流行采访纪实》，载《中国作家》1988年第5期。

② 引自许涯文、吴元栋：《真相和流言的辩证法——从甲肝事件谈新闻传播的客观真实性》，载《新闻记者》1988年第6期。

③ 崔均鸣、栗倩云：《甲肝余波》，载《中国水产》1989年第6期。

事件”深信不疑，不但坚决果断地倒掉了自家许多新买的上海糖果、点心、腌腊制品和其他各种食品，还在邻里亲友之间奔走呼号，痛陈利弊。于是，又有一批上海产食品成为粪土和垃圾。

某国营大厂贴出一张通知：“鉴于上海流行肝炎，经厂部研究决定，任何人不得回上海探亲休假。若有违令并造成严重后果者，将严格追究行政、经济、道德责任。”布告栏下，人头攒动，人们在窃窃私语或大声嚷嚷……该厂有近一半的职工是上海人。一纸命令，他们只得乖乖地待在石头城过年啦。

在著名的J饭店的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某公司K总经理正与美国某跨国公司中国总代理X先生就一笔大宗交易进行最后的技术性谈判。59岁的K先生为争取这项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投资，苦斗了两年，如今成功在即，如释重负。当最后一个议题在X先生的“OK”声中结束时，K先生神采飞扬地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迎着正张着手扑过来的激动的美国人，侍者恰到好处地托上两杯威士忌。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了。然而，K先生脸上的笑容在瞬间凝住了，扭曲了：X来自上海！K先生哆嗦着端过杯子，既不握手也不碰杯，尴尬地自己呷一口。X先生勃然大怒，拂袖而去。K先生终于功亏一篑。

江苏省某工业厅驻上海办事处常驻代表小吴年前从上海发回本单位一封挂号信，办公室诸位同仁视若定时炸弹，谁也不敢去碰，更不要说拆看了。最后还是老李用手帕隔着把这封信放到厕所的便纸桶里，而两月有余还放在那里，没人敢动。[①]

著名作家叶永烈这样回忆当年自己的遭遇：1988年3月上旬，当我踏上21次特快列车从京回沪时，从未遇见的现象令我震惊：卧铺车厢空荡荡的，中铺、上铺几乎全空，连下铺也有空位！在北京，买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向来不易，总要提前多日预订。可是，这一回我来到售票处，那售票牌上的上海各种车票栏内，全挂着绿色的“有”字，而不再是往日的那个鲜红色的“满”字。随时都可以买到开往上海的火车票，买哪一次，买卧铺还是硬座，随你挑选。当我买票时，旁边一位小青年用一口纯正的京腔揶

---

① 楷体字部分引自许涯文、吴元栋：《真相和流言的辩证法——从甲肝事件谈新闻传播的客观真实性》，载《新闻记者》1988年第6期。

揄道:“现在只有勇士才敢去上海!”他的话,使我不由得记起,当我抵京时,出站口的剪票员只用眼睛看票,却不像往日那样接过票子剪一下……

“你是从上海来的?”我刚刚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递上工作证,负责旅客登记的赵师傅立即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问道:“你有没有化验单?”

“化验单?”住招待所要带化验单,我平生头一回听说。

“北京市统一规定,上海旅客一定要验血。确证没有患‘甲肝’,才可以住宿。要不,只能住到医院隔离起来。”赵师傅向我解释道。

我一想,他说得在理,也就遵命照办。当我步入同仁医院验血,护士一见到我,便嚷嚷道:“又来了一个上海人!”原来,许许多多上海人一到北京,头一桩事情便是验血。所以,护士们一听说“上海人”,马上“条件反射”——准是来验血。为了防止“甲肝”传入首都,北京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凡是寒假中回沪探亲的师生,回京后马上要验血;家中住了上海客人,要向防疫部门报告;来自上海的食品,人们已不敢问津;我去北京医院探望友人,见大门口贴着通知,来自沪、江、浙的人,未经验血,不许入内探视……

在北京,遇见朋友,差不多第一句话便问:“上海‘闹’得怎么样啦?”……我离沪前,收到韩素音女士的信,告知她已来北京。我们在京晤面了……本来,她要来上海的。外事部门为了她的安全,未能同意让她来沪。她说,她原本是医生,整天跟病人打交道,她才不怕“甲肝”。可是,许多外国旅游者取消了上海旅游计划。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服务员在拖地板的水里加了漂白粉,用“二锅头”擦洗电话,在洗床单的水里倒进消毒液,连拖鞋、脸盆都用消毒水细细擦洗。我很敬佩她们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在北京街头巷尾,常见到关于预防“甲肝”的黑板报、挂图。食堂、饭店,在加强食具消毒。

上海人上馆子吃饭,服务员连连摇头,上海的食品被封存,上海带来的蔬菜被扣留。

四、政府勇敢地面对

1988 年上海的这次甲肝来势凶猛,发病急,病人症状明显,大多数患者

SGPT在1000单位以上，90%以上的病人出现黄疸，85%以上的病人抗HA试验阳性；发病主要集中在市区，人群分布以青壮年为主，20岁至39岁的占83.5%，给正常的工作生活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在甲肝的袭击下，纺织厂的许多机器停止了转动，商店里人员减少，缩短了营业时间，生产一线减员十分之一；仅上海市柴油机厂就有500多个职工受到感染。

上海市委市政府如临大敌，各级领导认真关注事态的发展，积极寻找对策，力图尽快化解危机。

第一步，要找到这场甲肝流行的元凶，以阻断传染源。早在1988年1月3日的午后，当急诊肠道传染病人急剧增加的报告送到副市长谢丽娟的办公桌上，这位内科医生出身的女市长就意识到这个现象不正常。

而医生们已经发现，大多数甲肝病人都在病发前曾食用过毛蚶。根据当时的流行病学调查，曾在1983年发生在上海的甲肝流行，是因为生食毛蚶引起的。那一次她参加了治疗，当时她还是一位普通的内科医生。

谢丽娟拿着那份情况报告，走进副市长叶公琦的办公室，和这位分管商业的副市长商量：市政府要下达命令，在全市禁售毛蚶！



毛蚶——甲肝事件的罪魁祸首



当晚，谢丽娟又和卫生局局长王道民来到几家医院，了解急诊肠道病人的情况，直到深夜，他们的汽车才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1月4日上午，医院再次告急：全市已有35家医院，收治食用毛蚶中毒者10245例。全市11个区，区区有患者，普陀区居于全市之首，共收治4000余人。

1月4日下午，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想毛蚶是怎样受污染的，污染了的毛蚶又是怎样出现在上海街头的，卫生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就联合发出通知：禁止销售毛蚶！

交通、港监、公安、市场管理……各路禁售禁运毛蚶的人马一齐出动，在通往市区的所有陆路、水路设卡检查，向入侵上海的“白黄色病魔”打一场狙击战。

1月6日上午，初战告捷：封堵了正在运往上海的毛蚶300多吨，市场没收销毁的毛蚶60多吨。

时任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俞顺章，为了证实毛蚶的致病性，带领科研人员到江苏启东毛蚶的原产地，直接进行深海打捞，很快就在毛蚶身上找到了甲肝病毒，以直接证据有力地证实了毛蚶就是甲肝的罪魁祸首。

上海市民究竟有多少人食过毛蚶？在甲肝高潮退潮之后，毛蚶产地的人声称：从1987年11月下旬到1988年1月，共捕捞毛蚶4000吨，其中一半左右运往上海。卫生部门的抽样调查，上海市民食用毛蚶的人数在160万到220万之间，以每人食用半公斤计算，上海约销售毛蚶800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流行病学家估算，市区如20%的人吃过毛蚶，市场销售量在500吨左右；如40%的人吃过毛蚶，市场最高销售数为880吨左右。[①]

如果当时不采取禁销毛蚶的措施，也不知还有多少人要感染上甲肝！

第二步，集中所有相关医务人员，想方设法增加病房，收治病人。

1月25日，甲肝病人的数字达到了真正的高峰时，市政府的常务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这次会议专题讨论和布署甲肝的防治工作，提出要把

① 楷体字部分引自郑重、叶又红、蒋树芝：《黄色龙卷风——上海甲肝大流行采访纪实》，载《中国作家》1988年第5期。

这件事情当作全市的头等大事来抓。随之一系列措施付诸实施，短短几天，10万多张临时病床，也就是说10万多条方舟造出来了。

许多临时甲肝病床都开设在新楼内，没有接通煤气，就用液化气罐。有了火就能消毒，就能治疗，就有水喝，就有饭吃。在24小时内建立起来的临时甲肝病房，在全市就有许多。像第二军医大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设了有600张床位的临时病房。

超渡甲肝病人的方舟是建在工厂礼堂会议室、体育招待所、文化馆和一些刚刚落成还没有使用的大楼里，甚至有4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室也变成了甲肝病房。

市政府又采取紧急措施，提出：

要保护发电厂的劳动力；

要保护公交公司的劳动力；

要保护煤气厂的劳动力。

经过大批药材经销人员的紧急联络，全国有85个单位支援上海58万公斤药材，但各地药价普遍高于国家规定的牌价，高于上海的牌价。如果制成成药按上海的价格出售，全部要赔本倒挂。但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市药材公司决定把这些药材一律低价出售。这样高进低出的头10天，就赔了130多万元。[1]

但这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确实无法用130万元的金钱来衡量。尤其是它凝聚了多少民心，增强了多大的政治凝聚力，更是无法用130万元的金钱来衡量的了。

第三步，告诉民众事件起因真相，普及防治甲肝的知识。在甲肝横行的一段时间里，谣言四起，使人惊恐不已。南京居民中出现对上海“甲肝”事件的种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上海流行的不是甲型肝炎，而是霍乱病菌。上海已开始成批死人，对尸体解剖后发现，所有的[illegible]肝脏均完好无损而其他脏器均腐烂成泥，肠子尤甚，臭不堪闻。[illegible]法：[illegible]海疫情已惊动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派遣专家来沪[illegible]中外专

---

① 楷体字部分引自郑重、叶又红、蒋树芝：《黄色龙卷风——上海甲肝[illegible]实[illegible]

家深入研究，已断定时下流行的既不是甲肝，也不是霍乱而是介于这两种疫病之间的一种尚未为科学命名的新的瘟疫。第三种说法：龙年向来是凶年。1952 年、1964 年两个龙年，国家迭遭天灾人祸的 1976 年是龙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国元勋先后去世，现在又是“甲肝”又是瘟疫的，只怕更大的灾祸还在后头。[①]

为此，上海市组织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发表文章、发表讲话，反复强调这次事件的元凶是毛蚶，只要在饮食中远离毛蚶、在流行期注意卫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已经感染上甲肝的病人是可以治愈康复的。2 月 19 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甲肝是由于部分市民食用不洁毛蚶引起的。3 月 5 日，新华社上海发出专电：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已检测出江苏启东的毛蚶存在甲型肝炎病毒。巫善明当时得到的指示就是，频频在电视台和电台中亮相，告诉公众甲肝病毒传播的真实情况以及相关的预防知识，稳定情绪。这些举措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决策，对平息公众的恐慌情绪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上海甲肝流行横行了近五个月，到 5 月 31 日，30 多万甲肝患者绝大多数已经康复。在全国的支援下，在上海市党政领导和 1200 万市民的共同努力下，这场令人恐惧的危机终于消除了!

但这场危机给上海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有关资料推算，上海这次甲肝爆发流行间接经济损失中的社会经济损失，仅 1988 年第一季度的甲肝病人对南市区造成的经济损失，以人均日创净产值计算，就高达 7635 万元，以人均日上缴税利计算为 3206 万余元，推算同期上海市区因甲肝流行所致社会经济损失，以人均日创净产值计算，高达 5.57 亿元，以人均日上缴税利计算达 2.34 亿余元。[②] 至于受这个时间的牵连而给其他地区所造成的损失，则无法细化了。仅据宁波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由于受甲肝影响，宁波市毛蚶养殖户总损失达 915.6 万元，浙江省损失估计超过

---

① [illegible]自许涯文、吴元栋：《真相和流言的辩证法——从甲肝事件谈新闻传播的客[illegible]》，载《新闻记者》1988 年第 6 期。

② [illegible]元、冯学山、陆泳：《1988 年春季上海市甲肝爆发流行间接经济损失分[illegible]国公共卫生管理》1990 年第 6 卷第 4 期。

2000万元。[①]

点评：

一、制定法规制度，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上海1988年甲肝爆发后，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无法可依，只能以日常的行政管理方式来应对。在疫情的公布、病人的救治、病原体的割断、社会舆论的导向等方面没有做到有条不紊，很多时候是求于应付。虽然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一般工作人员大都恪尽职守，但由于缺乏宏观全面的又能具体操作的法规，难免有一些失误的地方。比如，大量的病人由于无法就医，任其自然流动，大量的疑似病人也没有给以足够的道义、法律上的关心、指导，这与一段时间里疫情的猛烈扩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有鉴于此，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使得此后我国终于有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依据。

二、舆论公开，取信于民，破除谣言。在上海甲肝疫情初期，有关部门处于保持稳定的考虑，不允许媒体报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曾文恭的述评是上海新闻媒介较早提出要求查明“毛蚶事件”的原因和责任的新闻作品之一，有的部门对此表示反感，匆匆发出公文进行反驳。1月20日，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一篇报道说：本市近20天的甲肝发病率并无异常！2月5日，上海发现了第一例甲肝死亡病人，新闻媒介没有告诉市民，但谣言很快就在市民中传开了。鼠疫、乙型脑炎大流行、霍乱……更传奇的是说这次上海的甲肝病人在10年后即要死亡。其实，媒体越不公开，传言越厉害，人们对政府越不信任。

三、要相信科学，尊重专家的意见。1983年，上海人食用毛蚶引起甲肝大流行，使两万多人得了甲肝病，事后，经250名专业人员作流行病学调查，肯定了甲肝与食用有毒毛蚶有关。19位最具权威性专家签名的调查报告明确写着：“毛蚶等贝类水生物除应注意运输、销售过程中的污染外，

---

① 崔均鸣、栗倩云：《甲肝余波》。载《中国水产》1989年第6期。

尤其要注意捕捞或养殖区水体污染……因此，捕捞地区要重视水质卫生管理，在采购货源时要掌握当地疫情，要做好毛蚶等贝类的卫生监督。本次调查还提示，在今后肝炎防治工作中，要注意抓第四季度工作，因这段时间是毛蚶等销售旺季。”但代表金钱的一方则坚决否定这个科学的结论。新闻界在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甲肝与食用毛蚶无关。时为上海卫生局的副局长王希孟组织专家写了反驳文章，发表在《中华传染病学杂志》上。可惜这个杂志的发行量太少了，登出的文章如泥牛入海，没有反馈的消息。上海市民给蒙在鼓里。

1985 年，上海市卫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主任胡孟冬趁着到慕尼黑大学进修的机会，带去她在 1983 年甲肝大流行中积累的资料，对在实验条件下模拟性感染的贝类组织进行甲肝病毒分离，结果表明毛蚶在污染的海水中生活一定时期，可摄入和浓缩甲肝病毒的颗粒。1986 年，上海市据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办法，防止 1983 年历史事件的重演。

但当 1988 年甲肝流行初期时，官方的有关报告中还这样写着：“对启东毛蚶是否肯定带有甲肝病毒，究竟有多少人食用毛蚶，食用这批毛蚶是否肯定会引起甲肝爆发流行，还没有根据可以判断。”① 如果政府部门及早接受了医学人员的意见，这个损失惨重的甲肝事件不就可以避免了吗？

（程美东　执笔）

---

① 该节引自郑重、叶又红、蒋树芝：《黄色龙卷风——上海甲肝大流行采访纪实》，载《中国作家》1988 年第 5 期。

克拉玛依“12·8”大火

一、汇报演出起火灾

克拉玛依市位于新疆西北部，距乌鲁木齐320余公里。50年代开发石油，在戈壁滩上建成了新兴油城。

1958年6月23日，为纪念苏联对新疆石油工业的巨大援助，在克拉玛依市中心开始修建中苏友谊馆。该馆是一个以影剧院、舞厅为主的俄式建筑，长56.15米，宽31米，建筑面积为3556.13平方米。1991年12月8日晚，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座无虚席。七所中学八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在这里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的领导作汇报演出。领导们是来克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

馆内有学生、教师、工作人员、验收团成员及当地领导796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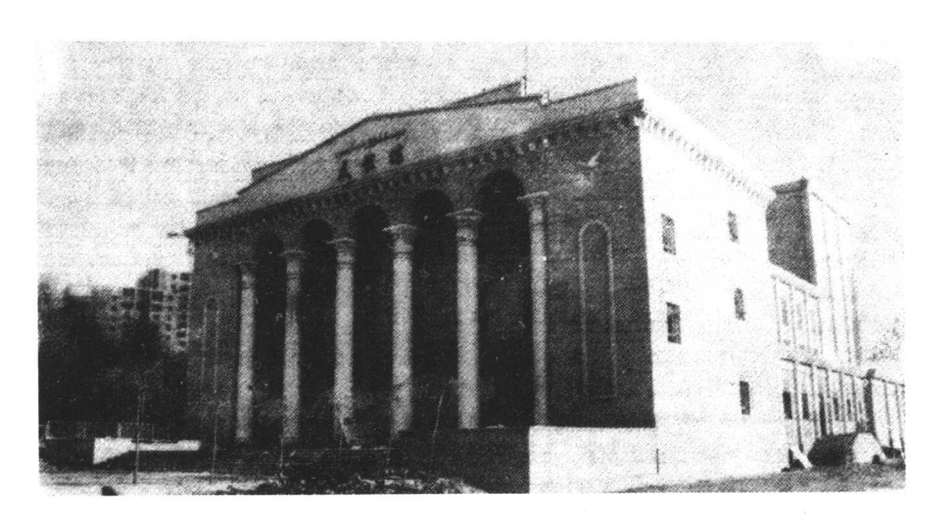
6时20分左右，观众席第二排中间的验收团成员阎辉民对前排克市教委普教科科长朱明龙说：“老朱，你闻到什么煳味没有?”此时，第二个文艺节目正在上演。

紧接着，舞台上方掉下一块块着火的碎布片。

原来，舞台的第七号光柱灯与幕布太近，灯的高温烤燃了幕布。

但是，很多人认为是演出效果需要，是控制的点火，没人离席。

舞台上的工作人员慌了。一老师连忙跑去抓住幕布往下拉，想扯掉那道幕布。有一次，友谊馆举行气功报告会，舞台上的灯烤着一道侧幕，电



大火前的中苏友谊馆

工就启动升降幕布的机关，把幕降下来，将火灭了。这天，该馆仅有的两名电工被派到乌鲁木齐去了。

谁也不知怎样降下幕布。那老师费了好大的劲，仍未将幕布拉掉，火却蔓延开来。

大幕被关上，意欲灭火后开幕再演。学生们一阵骚动，交头议论。

“保持安静，坐着别动。”有人高声喊道。

这15个班各代表一所学校。孩子们都想为母校争得“纪律秩序好”的好名声，听到喊话后，全都安静下来，坐等幕开。殊不知，狰狞的死神正逼向这群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幕布是化纤品，没经过阻燃处理，燃烧极为迅速。大火很快烧着电线，“扑”地一声，电线短路，全场一片黑暗。

刹时，惊叫声，奔跑声，呼喊声响成一片。

坐在观众席后部，紧邻两个出口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急忙向门口疏散。来到前厅，通向外部的三个出口仅一门洞开，学生们挤在一起。后面往前推，左右向中间挤，一些学生倒在地上，身后的学生被来自背后的力量推着，从倒地同学的身上踩过。

孩子们哭爹叫妈，东撞西碰，就是找不到出口。

悬吊在舞台上空的13道幕布，影幕和其他塑料制品迅速形成立体燃

烧，释放出大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以及氯化氢等有毒气体，这些幕布都是被一根根直径为50毫米的钢管吊着，当吊绳烧断时，钢管落地，在舞台上形成巨大的响声，馆外数百米均能听见。

当吊绳被烧，幕布向下坠落时，巨大的火球对整个空间形成压力差，“轰”地一声，形成瞬间爆燃。强大的冲击力，把台上的人员冲倒在地，正在奔跑的孩子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叠一个倒在地上。烟气中众多少年儿童中毒昏迷。有几个孩子摇晃着站起来，没挪动步子，又栽倒在地。舞台大门两根两个拇指粗的铁心插销也被冲弯。

事后测算，当时的压力接近60个大气压。

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友谊馆内形成空气循环。热空气夹带火焰蹿上20多米高的天花板，将天花板上的五合板、石膏板等引燃，天花板上不断掉下火团，落在椅子上。

友谊馆810把椅子都是木椅上加海绵外罩布套，一遇火团，立即成灾。

友谊馆成了焚烧炉！没多久，有毒的烟气充满友谊馆。孩子们呛得直咳嗽。

烟雾中，除坐在后部紧邻出口的部分学生逃出外，其他人只能估计方位，涌向太平门，左侧的两个太平门紧邻厕所，开着。但门外有回廊，两个安全门都锁着。孩子们打烂玻璃窗，却奈何不了铁栅栏，挥舞着小手朝窗外喊：“叔叔，求你们救救我！”浓烟不断涌来，一个又一个孩子软着身瘫了下去。右侧的两个太平门都关着，一个门边还横了一架梯子，孩子们拍打着门，呼天叫地。后面的学生不断从前面学生背上爬过去打门，人叠一层又一层。事后，抢险人员看到，这两个门口，叠了1.5米高的少年儿童的尸体。

一阵冷风刮来，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越来越大，浓烟越来越浓。门仍没有人去开。

二、出口多被封死

“嘭”，一声巨响，惊动了正在办公的油田设计院的职工。

二所的张虹敏朝窗户一看，许多学生正跑出友谊馆。馆的侧门红光闪

闪。他和同事们连忙跑下来，直奔友谊馆。

此时，友谊馆正面的三个门，仅开一门，学生不断挤出门来。另两个卷帘门仍紧锁着，一些市民正用肩头去撞铝合金门。

设计院的职工跑到友谊馆左侧。两安全门仍锁着，他们把木门拽掉，指望救学生出来，可木门后面有防盗铁门。他们抬起门板撞击防盗门。防盗门的下部被撞弯了，他们把一根根钢条扳起，让在回廊和厕所的人钻出来。

一些救援人员跑到友谊馆右侧。此时，靠舞台的一个太平门已被学生们冲开，一些学生来到回廊，通往前厅的门设了一道防盗拉门，过不去。通往馆外的两道门与左侧一样，木门和防盗门，孩子们无计可施，只好爬在窗上挥手，叫喊。窗户太高，救援人员心急如焚，一部分人抬着门板，另一部分人站在上面，用榔头砸，用钢条撬，砸开铁栅栏，将孩子拉出来。

6 时 25 分，新疆石油管理局消防支队接到报警后，市区唯一的消防中队一中队迅速出动了三部消防车，直扑友谊馆。

支队长吴龙德、副支队长宋建成等也乘车前去指挥。

远远地，淡黄色的烟雾直冲云霄。吴支队长通过电台又调动二、三、四中队增援。

大火已呈猛烈燃烧之势。所有窗户都能看到烈火，有毒的烟雾从窗口向外翻滚。先期到达的三台消防车分别从正面和左、右侧展开进攻。

一中队二班战斗员从正面唯一开着的门进入友谊馆。他们将倒在前厅的学生传递出来。

前厅有两道门进入观众厅。但门后的几米长的斜坡，很多孩子逃出来，摔倒在巷口，奄奄一息。消防人员与先期到达的群众一道，将他们一一拖出。

左侧的门已被群众打开，消防人员直接进入观众厅、舞台灭火。地上躺着一片少年儿童，要么被烧死，要么被窒息，一些人用水枪压住火势，其余人员摸着学生就往外抱。一些学生被烧后，一摸，整块皮就掉下来。

从右面进攻的消防人员用消防斧破拆安全门，在副支队长袁辉生的带领下冲进去救人。毒气太重，抱一个小孩出来，就得先在外喘一口气。支队战

训科维吾尔族干部热西提钻进观众厅后，抱起被困学生就往外递，浓烟令他几欲昏倒。他抓起一条湿毛巾捂住口鼻又继续救人，他明明知道他11岁的儿子也在友谊馆，但忍着悲痛，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一人救出16名学生，直到灭火战斗结束，他才哭着去找寻自己的儿子，事后在医院的太平间找到，尸体已经冰凉。一中队队长孙长江在救人时被毒烟熏昏在地，被送往医院，清醒后，他不顾液体输了一半，拔掉针头又跑回火场，参加战斗。

6时35分，克市公安局接到消防支队的报告后，孙爱民局长立即调动局机关、市区分局、交警、武警赶往现场，维持秩序，救人灭火。市区分局保卫干警曾咏梅，不顾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往身上连冲两盆冷水，同男干警一起冲进火海，连续抬出四名学生。

馆外，聚集了成千上万群众，他们不断将一个个学生送往医院，抱出一个送走一个。

三轮车、摩托车、中巴车、出租车、救护车、警车主动开来运送伤员。一辆辆汽车呼啸着冲向医院。

危急时刻，一大批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感天地，动鬼神。

克拉玛依市一中校长倪正性起火时坐在最后一排，跨一步就能逃生，但他冲进恐慌的学生中，指挥疏散，在他倒下时，手还伸向一位为演出献花的学生。

八小校长张莉被浓烟呛得眼泪直流，将两个学生搂在怀里，不幸遇难。

六小刚满20岁的青年教师唐文洁与教师杨波牵着孩子跌跌撞撞来到前厅。唯一的大门挤满了人，她让杨波在外去拉，自己在里推，最后一个孩子刚推出去，卷帘门落下，她被烟熏倒、窒息而亡。

一小辅导员李平带着孩子刚走到门外，一股气浪冲来，把她和学生们冲倒在地。她一边用身体护着两名学生，一边拼命喊：“快救我的孩子们。”一双大手把他们拉出门外，她焦急地一一喊着学生的名字，还好都在。她突然冲向馆内，“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在里面”。

克市七中政教主任周健已领结婚证，婚礼定于元旦举行。火灾发生后，他用肩抬着要往下掉的唯一出口的卷帘门，让学生往外逃，后来，他又三次跑进

去救学生。灾后找到他时，他已面目全非，唯一能辨认的标记是领带夹。

克市市府办公室副主任毕建国坐在第三排，紧靠舞台。起火时，他完全可以一步跨上舞台，救出正在幕旁的八岁女儿，也可以一把拉出就在他身边的姨姐。领导让他去报火警时，他只喊了一句："大姐，娃娃!"转身就冲出去，他的女儿、姨姐都被大火变成了焦尸。

消防部门没有专门的排烟机，馆内大量的有毒气体浓度仍很大。直到几扇门全都被打开后，浓烟才有所缓解，但仍有部分学生发出微弱的呼救声。克市英勇的干部职工又一次冲进去抢救。

6时45分，数公里外的消防二中队增援力量到达火场，紧接着，四中队、三中队的消防车也相继赶来助战。7时10分，全面控制火势，15分钟后，消灭余火。

火熄灭后，公安干警、武警官兵，驻克市解放军指战员又进入馆内清查三遍，直至救出最后一人，彻底消灭余火后，才撤离现场。

武警部队立即封闭现场，等待专家前来调查。

大火中，326人不幸遇难，134人受伤。死难者中，天真烂漫的孩子达289人。自治区教委验收团成员17人，学校领导、教师和职工19人及一名家属，也在这次灾祸中告别了人世。

三、可怜的孩子们

克市一中初二（一）班14岁的女生张歆媛被救出后呈昏迷状态。几分钟后，她苏醒过来，见教师也被救出，多处受伤，她强忍着巨痛，求助一摩托车司机送她和教师上医院。

这司机是邮电局职工，名叫刘震新。此时，他的女儿也在友谊馆，他带着师生俩一边跑一边流着泪喊："洁洁，洁洁，爸爸马上就来救你。"等他返回时，浓烟烈火使他只能在大门外哭喊。

来到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医院，小张断断续续地向烧伤科主任张树林——他的爸爸简单报告了火灾情况，并说自己的头很痛。

张主任顾不上检查甚至多看自己的女儿一眼，立即就向院里报告情况，通告急救中心派救护车，同时做好抢救准备。

不久，一辆辆各式汽车冲进医院，源源不断地送来大批伤亡人员。烧伤科床位告急，走廊、空地都摆满了伤员。内一、内二、五官、中医、小儿科、急诊、外科、职业病科、妇产科都送来了伤员。

住院的轻病号主动让出床位。

输液、裹伤。医护人员穿梭忙碌。

“妈妈，痛啊……”

孩子们痛得直打滚，凄惨的哭叫此起彼伏。

医护人员边流泪边抢救。

“护士长，又抬进来几十个人，过道满了，怎么办?”“再腾出两间治疗室!”普外科护士长马晓晋紧张而镇定地指挥救护。此时，她比谁都清楚，她的儿子也在友谊馆。直到深夜时，把最后一个病人送到病区后，才去找儿子。六个多小时后，她才在殡仪馆找到自己的骨肉。将儿子掩埋后，她又回到医院：“我的儿子没了，我们不能再失掉这些活着的孩子们。”

眼科大夫糜佐华、儿科副主任阿丽娅等得知自己的孩子已不在人世时，一边流泪，一边救护别人的孩子。

市人民医院得到消息，院副书记张守梅立即带领20多名救护人员赶到友谊馆，进行现场抢救。

该院没有烧伤科，由副院长、医务处、护理部组成的抢救小组腾出外科病房，进行隔离消毒。

各个部门的医护人员主动赶回医院参加抢救。电工王新年的父亲12月8日这天去世。晚上，他含泪回到岗位，搬运药品、搬运遗体、维护电路。

有孩子在友谊馆的家长都跑到医院来找寻。亲戚、朋友、同事也来了。数千人在医院落泪。两家医院一片哭声。

怕受伤的孩子们感染，医院不能让家属进入病房。很多家长都不知自己的孩子是死是活。哭声、喊声，以及孩子们痛苦的叫声汇在一起，令人黯然泪下。

一具具遗体被送往殡仪馆。大厅满了，过道满了，院坝也满了。孩子们的遗体惨不忍睹，大多数身形完好，但脸被熏黑，瞪着一双大眼，死不

瞑目，鼻内吸满了黑灰，医生说他们系窒息而亡。被烧的孩子，皮肤成了黑块，露出红一块黑一块的肌肉……

找到自己孩子遗体的家长哭天喊地，死去活来，几个家长当即昏倒。

没找到的，寄希望于病房。他们在两家医院来回跑，屏心静气，听那声声叫唤可有熟悉的声音。

一部分参与灭火的干警奉命到两家医院维持秩序。

总医院当时有一万多名群众围观，人民医院也有数百人。干警们耐心做好群众的工作。在总医院执勤的胜利路派出所干警吐尔逊、卡哈尔、彭洪、刘尔忠先后五次被哀伤的群众扭打。他们冷静克制，没和群众发生冲突。夜晚，气温下降，许多干警穿着湿淋淋的裤子、浸透水的鞋袜在零下十几摄氏度执勤。女干警古丽的女儿从火场脱险，头部砸伤，干警李剑、加额尔、阿里都有家属遇难，但他们没有吭一声，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灾情牵动各地医护人员的心。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心医院、总公司卫生医疗队、自治区卫生厅医疗救援队、新疆医学院、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疆军区总医院、石河子医学院等18支救援队近200名医护人员前去协助抢救。我国著名烧伤专家孙家华教授从北京专程赶来主持救护。

克市兴华商场、准噶尔商场、三八商场送来了救治伤员所需的浴巾和医疗器械。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自治区、新疆各地及克拉玛依市的30多个单位为医院送去了援助的医疗器械、药品等。他们和医护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从死神手中抢出更多的生命。

一个伤员配了四个医护人员进行特级护理。

据估计，100余伤员的医疗费将达数千万元。新疆石油管理局表示，对烧伤者，将全力抢救与治疗，并负责整形。对他们以后的上学、生活、就业将长期安排，负责到底。

四、中央领导的关心

这场灾难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分别作出指示，要求认真处理好这次事件。

9日上午，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主持紧急会议研讨处理方案。会上决定，

派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同志率国家教委、公安部、劳动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等部门领导组成的工作组乘专机赶往现场。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得到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当即指示，请工作组转达他对死难人员家属的慰问。10日上午，在工作组赶到克拉玛依后，他又打电话到该市，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死者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对参加抢救的有关人员表示感谢，希望当地党委、政府做好善后工作。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得到消息后，马上向工作组打电话询问情况。此时，国务院工作组已到机场。邹副总理仔细地询问了国务院的处理意见，指出，要从重从快查处责任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看了“12·8”特大火灾的情况通报后，批示：“教训惨重！致电慰问，要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9日，国务院工作组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克拉玛依机场。

在这之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书记王乐泉、自治区主席阿不来提·阿不热都热西提、副主席术吉提·纳斯尔等领导同志已赶到克市察看现场，慰问遇难者的家属，看望伤员和各级职工。

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谢宏在国外得到消息后，昼夜兼程，于12日赶到克市。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到克市后，心情极为沉重，引起心脏病复发，仍坚持到各条战线慰问干部职工。

各族人民也极为悲痛，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

克拉玛依市是一个20万人口的城市，市区10万人口，通信不发达。火灾发生后，进出电话通信极为困难。通信部门连夜加班24小时，提前开通二级通信设备。

当地舞厅、卡拉OK厅、电子游戏厅全部停业示哀。

克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小车队每天24小时值班，全部小车为遇难者家属无偿服务。

菲林影像中心为遇难儿童免费制作遗像。

新疆石油管理局太湖疗养院的全体职工、家属、学生31人将本月工资共计25303.25元全部捐献出来救护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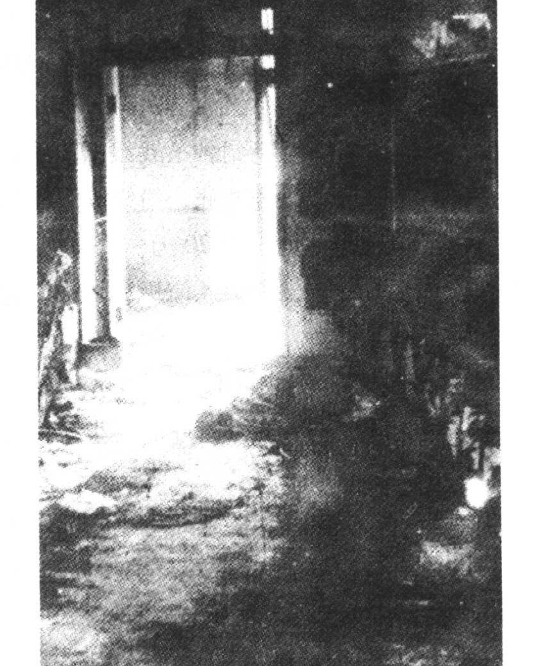
全国各地也都寄去了捐款，发了悼念电，收到捐款近1000万元。各级党政领导，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以浓浓的情意安慰伤亡人员家属的心。

五、迟到的反思

大火后的友谊馆，四面墙上的窗子全部都打破了，玻璃碎片上，被困人员求生的血迹依稀可辨。正前方，三道馆门，都被打开，其中，两道卷帘门被弄得七拱八翘。前厅，满地都是烧得面目全非的中小学生用的皮鞋、衣服、书包，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将它们和灭火时的水冻在一起，踩在上面嚓嚓作响。

通过标有单、双号的两个长长小过道，就是观众厅，厅内，漆黑一片。抬头一望，顶上的轻钢龙骨烧得残缺不全，玻纤石棉东一块西一块吊着，层板烧掉在椅子上，一起焚烧。810 张椅子没有一张完好，前六排的大部分座位只剩铁框。

此门当时未开，灾后挤有 **1.5** 米高的孩子尸体



厅内左右各设有两个出口，右面两个门被关。这两个门附近的椅子布套烧掉，木椅破损不严重。但是，这两个门口有100余名死难者，如果当时门开着，那又会怎样。右面回廊堆有一些旧沙发、冰柜等物。

左面回廊，地上到处是破衣物、破鞋袜，窗上的玻璃全碎了。门已被砸开，木门被拆掉，防盗门被撞坏，一根根铁条被撬起。

舞台上空空荡荡的，只有一排排烧得漆黑的灯吊着，几条只剩铜蕊的电线交叉斜挂，地上黑灰盈寸，连巴掌大的一块幕布都找不到。笔者在舞台上发现一推车灭火器，开关已开，显然，舞台上的人员曾想办法灭火，但没奏效。

火灾发生后，自治区公安、消防、法院、检查、劳动、工会等部门组织七个调查组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经过调查组夜以继日的工作，查明，这次特大火灾是一起特大恶性安全事故，造成火灾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克拉玛依友谊馆人员，及其主管部门负责人严重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玩忽职守，汇报演出活动的组织者严重失职、渎职造成的。

该馆1990年进行重新装饰时，设计和施工都没能让消防部门参与审核，擅自使用大量的泡沫、化纤、五合板等可燃物，降低了该馆的耐火性能。新疆石油管理局消防支队的防火人员先后于1992年7月31日、1994年1月22日和1994年9月28日，对该馆进行了三次防火检查，指出该馆没有照明应急装置和疏散指示标志，舞台第三、五、六道灯光距幕布太近等问题，并限定了整改时间。该馆副馆长阿不力提·卡德尔三次签字同意整改，但一直未付诸实施，造成了这场震惊中外的灾难。尽管他本人在这次大火中受伤，呼吸道受损，喉管割开治疗，仍被撤销行政职务，开除党籍，依法逮捕，并受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尽管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常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副书记谢宏发生火灾时正在国外考察，但他是石油管理局安全委员会主任，对此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其他17名责任人受到了严肃查处。一批责任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这场灾难的后果是一张处理意见所不能消除的。

发生如此严重的惨案，绝不是偶然的。查出隐患，却不予整改，在发生过小火的情况下，仍未引起重视，最终酿成了大祸。而时至今日，就全国来看，消防机关查出的隐患，是不是都整改消除了呢！

友谊馆八个安全出口，仅开一个是造成死伤众多最直接的原因。

点评：

1994 年“12・8”克拉玛依友谊馆大火，是共和国史上有着非同一般影响的大火灾。第一，这场火灾的起因是克拉玛依市有关部门为迎接上级教育部门的检查而举行汇报会引起的，火灾的地点是当地条件不错、经常举行重要庆祝活动的友谊馆；第二，在大火中遇难的人数竟然占到总数的近 40%，最痛心的是 326 名死者中竟有 289 名是中小学生，年龄仅为 8 岁至 14 岁；第三，在死难的成人中，绝大多数是普通教师和工作人员，主要领导干部都安全脱险，尤其是在火情出现后会场的主持人叫喊“同学们别动，让领导先走”的行为在事后被广泛流传，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负面影响极大。

总之，这个事件暴露了一些政府部门在管理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好大喜功，官本位思想严重，责任意识淡薄。具体来说，这个事故使我们认识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我们的国家公务员和一般民众平常消防意识淡薄，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新疆石油管理局消防支队的防火人员先后于 1992 年 7 月 31 日、1994 年 1 月 22 日和 1994 年 9 月 28 日，对该馆进行了三次防火检查，指出该馆没有照明应急装置和疏散指示标志，舞台第三、五、六道灯光距幕布太近等问题，并限定了整改时间。该馆副馆长阿不力提・卡德尔三次签字同意整改，但一直未付诸实施，在演出过程中，管理部门违反规定，将七个安全出口都阻死了，正面两门、左右两侧的四个“太平门”均用防盗铁网或铝合金、木板封死，只留下一个出口，近 800 人都需从这出口逃出，既无法及时疏散，又极易发生踩踏事故。在此次演出时，两名电工竟被派出差，让一名不懂电的人员负责电线，致使电路起火后无法及时处理，而迅速蔓延至剧厅。还有，消防部门在接到火警报告后，虽迅速赶到

现场，但他们携带的工具根本打不开紧封的大门，又返回去取工具，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这说明消防部门平时的应急训练不充分。在上述的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能在平时引起高度的重视，就可能阻止事故的发生或大大减轻事故的后果。

二、我们的不少官员人民公仆意识淡薄，处理危机事件能力不强。大火发生后，在场的有关负责人没有及时有效地安排救火、疏散会场人员，在火势严重时，竟然有人（据说是克拉玛依市教育部门的领导）说“同学们别动，让领导先走”。这句话的真实性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有一个铁的事实却是不可抵赖的：现场的20多个副处级以上的官员都逃出来了，死难的成人中有30多位都是教师（包括校领导），这是典型的遇难而退、临阵脱逃的可耻行径。

方天录，时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相当于克拉玛依市长），在场的最高长官，在火灾发生时没有及时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命。在烧焦了几绺头发后，仓皇钻进小轿车直奔医院“检查身体”，在路过消防队大门口时忘记下车报案，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赵兰秀，克拉玛依市副市长，在火灾发生时仅叫该市办公室主任报警，但没有及时安排人员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后来只顾自己逃命。

唐健，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主任，没有要求有关人员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也只顾自己逃命。

况丽，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当时她不但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却一头钻进了厕所，把原本可塞30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也不开门；事后在厕所门外地上发现100多具学生尸体。

朱明龙，市教委普教科科长、这次演出的具体组织人，无论是事先还是火灾发生后都没有有效地组织安排防火救火、安派人员疏散，而是自己成功逃生。

这些现象的发生难道是偶然的吗？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必须严惩有关的责任人，挽回党和政府由于这些人的渎职而被损害的政治影响，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在事后对死难者、救难者安抚、评奖的恶劣做法。这次大火发生后，大批学生的死亡，震惊了家长，也震惊了广大的民众。人们的心情由哀怨转而愤怒，而官员们的幸存更使他们找到了发泄的途径，社会上的风言风语不断："啊！伤天害理呀！挨千刀的呀！学生大都烧死了。当官的都活了！到底是老师好呀，40多个死了36个！当官的为什么不死呀？克市教委的人都跑了呀！把老师和官员比比看吧……老天没眼呀。"所以，惩治责任人在当时已不仅仅是是个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了。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这起事件的有关责任人依照党纪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撤销谢宏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兼安全委员会主任、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副书记等职务，并建议自治区人大撤销其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给予克拉玛依市委书记兼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唐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司法部门又依照法律程序，对他们做出了惩处：

方天录、唐健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赵兰秀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况丽、朱明龙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蔡兆锋（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工会文化艺术中心友谊馆主任兼指导员）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孙勇（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工会文化艺术中心主任）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赵忠铮（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工会文化艺术中心教导员）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岳霖（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工会副主席）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其余几名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员也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刑。

四、政府部门对克拉玛依大火事件所采取的若干善后措施也是具有标志意义的。比如，严惩所有的责任者，尤其是那些没有直接责任的高级官员，在一定的意义上表明中国政府从此结束了在应对公共安全方面的事故时，往往只重视消灭事故或最多处理几个无关紧要的直接责任人而已，而是一查到底，直至高层负责人；另外在对受害者的赔偿、安抚上也做的比

较好。新疆石油管理局表示，对烧伤者，将全力抢救与治疗，并负责整形。对他们以后的上学、生活、就业将长期安排，负责到底。从1995年开始，大多数受伤者都在北京西山附近的某个大型整形医院进行治疗。这样做就可以避免过去只是在事故发生时对受害者给以慰问，而在事后基本不管的做法。而以前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受害者及其亲属的感情，疏离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须知，这些事故的发生，很多是我们的政府或者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的结果，我们的政府如果不勇于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从法律上来说是不守法，从政治上来说是不明智。

（正文由程美东主要根据雷进德：《克拉玛依大火难》（载《湖南消防》1995年第3期）一文改编。点评：程美东　执笔）

山西假酒事件

一、用甲醇勾兑出的毒酒害死27人

1998年1月23日，朔州市平鲁区医院接收一名危重病人，症状是呕吐、头痛、瞳孔扩大、呼吸困难，这名病人还没来得及进入抢救室就死了。当时值班的医生万万没有想到，一起震惊全国的假酒中毒案就此发生了。

1月26日下午，平鲁区医院又接收三名病人，症状也是呕吐、头痛、瞳孔扩大、呼吸困难，同样来不及抢救，病人进医院后不久就先后死亡。当时值班的内科室主任荣占恒感到了异常：症状一样的病人集中出现，以往并不多见。经详细询问死者家属，得知他们都在发病前饮过酒，荣占恒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死亡与饮酒有关！医院马上安排有关人员会诊，排除了脑血管病和传染病的可能性，并初步确定为酒精中毒。但由于设备的局限，他们还不知道酒中含有大量甲醇。马上就要过年了，过年正是饮酒高峰期，如果是假酒中毒，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医务人员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尽管医院当时还不能确定死因就是假酒中毒，但绝不能延误救人的宝贵时间。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于1月26日下午5时向区政府进行了汇报。事态还在进一步扩大，就在他们汇报的同时，又有三名同样症状的病人因来不及抢救而死亡。

平鲁区委、区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上报朔州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和省市有关部门。紧急部署之后，工商、公安、技术监督等部门立

即行动。几小时后，技术监督局从省城太原及大同市拿回鉴定报告：死者所饮酒中所含甲醇超国家标准数百倍。

已经放假回家的各级干部接到通知后，迅速到岗，连夜出发，前往乡村街道通知群众。1月27日早晨，朔州市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滚动播放一个节目：关于不要饮用散装白酒的紧急通知。终于赶在1月27日除夕中午11点之前，将不准饮用散装白酒的通知传达到了朔州的千家万户。下午2时，山西省组织的医疗组也从300公里外的大原赶到朔州。出售假酒的源头初步查清：平鲁区贩卖假酒的是糖酒公司职工朱永福、个体户田贵业和田贵俊兄弟等人，而这几个人又从朔州城区南关杨万财处进的酒。当晚11时，涉案人员就被抓获，并查获尚未卖出的假酒6吨。但不幸的是，尽管只有短短几天时间，就有27人死于非命，200余人被送进了医院。

同时，工商局连夜查封了100多个散酒销售点，公安局抓获了从山西省文水县贩回掺有大量甲醇的假酒的涉案人员。截至2月1日，朔州市共查封118个散装白酒销售点，查封白酒5万公斤，收回白酒2万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①]

二、假酒生产、销售流程

造成这场特大假酒伤亡事故的假酒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这得从甲醇和乙醇这两个化学名词谈起。乙醇是酒中的主要成分，各种酒中乙醇最高含量可达67% （即67°白酒）。乙醇又称酒精，一般是由含淀粉的原料，通过发酵制成，也可以用乙烯水化法合成。乙醇是一种无色、透明的易燃液体，具有特殊的香气和辣味，毒性远低于甲醇。

甲醇，别名木醇、木精、木酒精，是化工生产的基本有机原料，有毒、易燃、易挥发。甲醇是一种强烈的神经和血管毒物。甲醇进入人体后，先氧化为甲醛。甲醛对视网膜细胞有特殊的毒性作用，能使视网膜细胞发生恶性变化，甚至发展成视神经萎缩，导致视力丧失。同时，甲醛也

① 该节1至4段引自文心：《警钟为谁而鸣：山西假酒案的前前后后》，载《经贸导刊》1998年第3期。

能使神经系统功能发生障碍，导致酒后行为越轨。甲醛还会对肝脏产生毒副作用，削弱肝脏功能。甲醇进入人体后，一般较难排出。

由于甲醇无色透明，并与乙醇有相似的酒香，可与水、乙醇、醚等任意混合，所以容易为一般人所混同。更重要的是，甲醇的市场价格远远低于乙醇，所以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其来制造假酒。

1992 年，大原南郊全盛乡退休职工陈广义，在南堆村办了一个宇誉溶剂厂，主要生产除臭剂等溶剂产品。由于设备简陋、工艺落后，根本不能正常生产，于是，就做起了倒卖化工原料的生意。作为甲醇生产厂家的大原化肥厂，无视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加强甲醇及非食用酒精产品管理的通知，在不了解宇誉溶剂厂的生产情况下，与其签订销售合同，于 1997 年 10 月 6 日卖给陈广义甲醇 2.51 吨，1998 年 1 月 19 日又卖给 2.39 吨。当时，购买甲醇的理由是为了生产除臭剂，防范措施只字未提。成交后，大原化肥厂没有跟踪其用途，有关部门也没有进行监督，结果这两批甲醇成了制售假酒的帮凶。

文水县冠家垫村村民王青华，在 1989 年曾因制造假酒而被判刑。近年来又负债累累，声称要趁新春佳节之际“翻翻身”，并把主意打在制作假酒上。经本地农民王瑞介绍，从陈广义处购得甲醇 35.2 吨，与其妻武燕萍用其中的 34 吨甲醇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 57.5 吨，出售给个体户王晓东等人。王晓东明知该酒甲醇严重超标，仍将其加进自制的酒中，转手批发给从事个体经营的朔州市杨万才和灵丘县刘世春等人。杨万才曾在当地的一家酒厂工作 30 年，退休后又从事卖酒的个体生意，按理说，他应该能分辨出用甲醇和乙醇勾兑的酒的区别。如其所言，当初他从王晓东处进酒后，发现此酒不起酒花，他曾产生疑虑并问过王晓东，是否在酒里兑了甲醇，但王一口否认，于是杨万才也没再多问。没几天，他就听说有人因喝酒死了，他没有及时举报和停止销售，反而继续向个体户朱水福出售剩余的有毒假酒。

山西省汾阳市中杏酒厂的造假行为也在此次事件中被暴露出来。自 1997 年 11 月以来，不作任何检验，多次从文水县个体户手中购进甲醇严重超标的散装白酒，勾兑后包装成礼品盒装酒进行销售。厂长高世发在得知该厂生产的白酒因甲醇含量严重超标，对人体有严重危害，被有关部门

查封销毁后，仍继续组织生产、销售；主管收购散装白酒的贾建有，在朔州、灵丘等地假酒中毒事件发生，有关部门开始清查来自文水县的散装白酒后，仍继续组织销售甲醇超标白酒两吨多，以致造成一人中毒死亡，两人重伤致残的严重后果。

从1998年1月23日到2月7日，山西假酒案中，共有222人饮酒中毒，其中27人死亡。假酒事件震动了全国！

三、有了总书记的严查指示

1998年1月31日，关于山西省朔州市发现有数百群众因饮用含有过量甲醇的散装白酒而中毒、其中已死亡20余人的紧急材料送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面前。在看过材料后，他马上拿起电话，要通中央有关负责同志：春节期间，因饮用假酒造成这么多人中毒和死亡，我很是不安。请转告山西省和朔州市，务必全力以赴抢救中毒群众，尽可能减少伤亡；要千方百计将不法犯罪分子已经售出的和还没有售出的假酒迅速收回和封存起来，防止再有人饮用中毒；对制造和贩卖假酒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

就在当天，又一份关于这起事件的材料送到总书记的案头。材料披露：是山西文水县一不法犯罪分子用甲醇大量勾兑散装的白酒后，批发给朔州市的个体户！江泽民总书记提起笔，作出了重要批示：对制造、贩卖假酒的不法犯罪分子，必须依照有关法律从速从严惩处。

正是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一场打击假酒的战斗在全国打响。

2月7日，北京市技术监督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500余人，检查商业门店、集贸市场摊点千余个，发现大兴、昌平等六个区县正在销售“贡酒王”、“红双喜”等七种假酒共743瓶。8日，全系统再次出动500余人，检查各类门店、摊点1330个，在石景山等地查获销售山西假酒的区县增至10个。两日共查缴1346瓶。9日，又查到中杏假酒20余瓶，市、区县两级接到举报电话近300个。截至11日，技监部门已查出中杏假酒1744瓶，假冒北京名优白酒数万瓶，发现中杏酒厂假酒品牌10个，涉及销售13个区县。经化验112个批次，有23个批次的样品甲醇含量超过国家标准

(0.04 克/100 毫升) 2 倍至 100 倍不等，在通州区八里桥市场查扣的 1997 年 12 月 20 日生产的汾竹酒甲醇含量竟达 8.07 克/10 毫升，超过国家标准 201.7 倍!

天津市技术监督系统积极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紧急行动，先后共出动执法人员近 1600 人次，对全市流通领域的白酒经销单位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检查。特别对国家技术监督局通报的标识为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中杏酒厂的“福寿酒”等 19 种可疑白酒进行了重点监控。先后共查获各类假酒 5000 余瓶，端掉制售假酒黑窝点 8 个。

重庆由市技术监督局牵头，几家单位联手，对市区的白酒销售市场和甲醇销售企业进行检查，查封无标志甲醇 10 吨，工业用酒精 6 吨。重庆市巴南区技术监督局在该区的白酒市场查出了山西汾阳市杏花村中杏酒厂生产的“福临门”牌假酒 10 瓶。

福建省福州市高度重视，他们展开拉网式的清查。查获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的 19 种禁销酒中“红粮液”5 瓶，“恭喜发财”酒 5 瓶，“贡酒王”1 瓶。

黑龙江省技术监督部门与工商部门紧密配合，在长春市南关区干鲜果品经销处查获 1380 箱中杏酒厂的白酒。经检验，13 个品牌中有 12 个品牌出现不同程度的甲醇超标，其中最高超标 887.25 倍。另外，在延吉市、敦化市、舒兰市等地也查获不少假酒。

流入河北的假酒主要在霸州市。执法人员封存了某批发点的 2257 箱中杏酒厂生产的白酒。

内蒙古 12 个旗区县同时行动，在 19 家经销单位查获 400 多箱可疑白酒，对其中一瓶“贡酒王”取样检测，甲醇超标 560 倍。

四川全省技术监督部门全面出击，掀起了打击制售假酒违法行为的高潮。截至 2 月 9 日，出动执法人员 5897 人次，查封产品品种 233 种，查封产品 24117 瓶，其中山西假酒 8989 瓶。

武汉市从 2 月 9 日至 2 月 13 日对 14 个区县抽送的 64 个白酒样品进行抽检。经检验，瓶酒有剑南春、郎酒、五粮液等 18 个样品，合格 9 个，不合格 9 个，合格率 50%。不合格样品有 7 个是假冒的，2 个是内在质量不合格。其中武昌酒厂的“双喜临门”白酒甲醇达 1.76 克/升，超标 4 倍

多。散装白酒46个样品，主要检验了甲醇、杂醇油等限量指标，其中合格39个，不合格7个，合格率80%。不合格品中甲醇超标的4个，最高的达0.81克/升，超标2倍。[①]

山西省吕梁地区、朔州市、大同市三个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于3月9日对这起假酒案的涉案人员作出了严厉的判决：王青华、王晓东、武保全、高世发、王瑞、杨万才等6人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武燕萍、贾建有、刘世春、朱水福等4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上各被告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其他9名被告分别被判处5至15年有期徒刑。

点评：

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在处理此次朔州假酒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反应是迅速的，采取的措施是得力的，对犯罪分子的惩处是严厉的，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打击假酒战斗，从而及时地遏制了有可能扩大的事态发展，保证了社会的安定有序，在全党全国全世界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从总体效果来看，这场事件的应对是成功的。就微观的层面来看，通过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和吸取：

一、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重视问题，努力采取对策，认真加以解决，任何突发事件都是可以有效地得到解决的，任何事件的危害与后果都是可以减小到民众可理解的程度的。此次假酒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山西省委、朔州市委、文水县委都认真对待，严肃处理，使得所有涉案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抓获，表现出很高的办事效率，及时地遏制了事故的蔓延。这种做法，在任何突发危机爆发时都应该效仿。

二、该事故发生后，党和政府没有将之遮遮盖盖，而是向新闻媒体较全面地开放，使得社会对之没有产生各种臆测，有效地避免了公众把矛头对准政府。这种将突发事件公开、透明地面向媒体、面向公众的做法，很

---

① 该节主要引自：《迅速贯彻江总书记指示，各地围追堵截山西假酒》，载《城市质量监督》1998年第3期。

值得称道。如果没有公众舆论的监督，即使有上面的三令五申，下面的具体办事部门和人员也会变着法子与上级周旋。公众舆论和上级的指示，两者之间互为呼应，形成内外并存的两种力量，有效地监督着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和胡作为的状况。当然，媒体在这次事件中的监督也并非彻底，典型的例子就是《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在事发后要求采访犯罪嫌疑人时就因层层推诿而未成。

三、该事件的处理上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对受害者的抚恤，没有长效的措施。虽然在当时，政府和社会也给了受害者一定的安置，但在事件平息之后，政府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来帮助他们，很多人生活无着落。受害者张枝于1998年5月得到政府一万元的补助，几天时间这笔钱就用来还债花光了，此后他再也没有钱治病；受害者王化忠一家，事后只有靠朋友救助过日子，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时，王化忠不得不去找这些老领导；死难者的爱人张生梅和孩子长期只能靠捡破烂为生。这些问题多少都与政府没有长效措施或实施的政策考虑不周全有关，对于因突发事件而受害的人们，政府不能不给予制度性的帮助。

四、此次事件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打击假酒问题上，因地方保护主义的限制，无论是在事前还是事后，没有采取根本有效的措施。事件发生时，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气愤地说：村里有人造假酒，乡党委书记、乡长、村支书、村长居然不知道！我不相信！事件平息之后，据一些记者的暗中调查，在山西文水县，假酒又死灰复燃。2003年9月，有记者到该县高车村采访时发现，在这个村里，遍布着大小几十个制酒的个体作坊，有工商执照的有25户，其中只有7户有国家强制实行的酒类生产许可证。在这里，300多元一瓶的五粮液只需45元，18元一瓶的汾酒只需6元。杏花村、五粮液，到茅台酒，他们都敢制造。[①] 这种猖狂地进行假冒伪劣的活动，难道与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惩治不力无关？事实上，这样的保护、纵容假冒伪劣行为，却是真正地在破坏地方经济的发展。在朔州假酒事件查处过程中，山西汾阳杏花镇中杏酒厂生产的19个品牌的白酒均为

① 范本吉、宁柯：《高车村又造假酒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总第3409期。

假酒，而在国内白酒行业享有盛名的汾酒集团山西杏花村汾酒厂由于与汾阳市杏花镇中杏酒厂同在一个镇上，一些地方在查处假酒过程中，将汾酒厂的汾酒等产品一并封存。该集团原董事长高玉文当时就悲叹：汾酒至少三年翻不过身。文水县在该事件发生后，全县78户酒厂全部停产整顿，库存白酒全部封存，共查封散装白酒4166吨，瓶装白酒7694箱，还封存了1000多万公斤已经装窑准备烧酒的高粱。由此而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实在难以说清。所以，保护假冒伪劣，实际上就是在挖自己的经济墙角。

五、乡村地区政权如何管理当地酒业制造部门。朔州假酒案的犯罪分子之一杨万才在事后对采访的记者说，在他经营酒类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卫生防疫、质量检测等政府职能部门从未去检查过。朔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翟伟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按有关规定对散白酒经销企业应作定期检查。但由于人员编制不到位，现在还难以做到。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酒厂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1998年全国登记在册的白酒生产厂家就有46000家，且有不计其数的未登记的“家庭小厂”。江苏一个小镇就有酒厂百余家。大厂周围的小厂星罗棋布。与此同时，流通秩序相当混乱。当时的全国打假办副主任叶柏林说，在山西调查假酒案时发现，有些经销商连账本都没有，只有何人欠了钱的记载，酒的去向，一概不明。可以说，山西这一恶性事件是某些地方长期以来搞地方保护、打假不力的一次大暴露。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属必然。① 目前，中国乡村正处于新一轮体制转换的过程，乡村政府的管制职能正在逐渐地弱化，尤其是农业费的废除，更疏远了农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联系，政府想要对农村的经济活动通过简单高压来实现有效的治理是不可能的。简单地罚款，更是变相地使其合法化。2002年，文水县高车村因为造酒不规范被罚款28万元，可造假行为依然故我。这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程美东　执笔）

---

① 《谁为生命设防——山西假酒中毒事件暴露的诸多问题》，载《文摘报》1998年2月12日。

合江沉船事件

一、130 人遇难——都是超载惹的祸

2000 年 6 月 22 日，长江洪水暴涨。这天恰逢合江县榕山镇赶场，长江两岸站满了急需过河的人。早上 6 时许，短途客船“榕建一号”驶离李子坝北岸码头，逆流而上前往三公里外的榕山镇。客船上不少乘客是前往榕山镇赶场的当地村民。中途停靠后，船上的人越来越多，乘客挤满了客船的上下两层。负重的客船吃水较深。6 时 30 分，客船驶入榕山剑口水域。江面上浓雾越来越大，能见度不足 10 米。这趟客船上下两层满满地载了 200 多人（枯水期准载客量 101 人，汛期载客量为 70 人）。

面对滚滚江水，船主梁如彬告诉船员，靠江边行驶。在浓雾遮蔽下，“榕建一号”已经偏离了航向，朝剑口处的浅滩驶去。客船行至剑口江水拐角处，驾驶舱内的舵手突然惊呼起来：正前方数米发现几块暗礁从江浪中凸现出来。情况十分危险，舵手连扳舵盘希望及时改变航向，加大马力向上游斜冲，船身剧烈摇晃，惊恐万分的乘客们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船身一斜，数十吨重的铁壳驳船竟整个底朝天倾翻入汹涌的江中，迅速下沉。

“榕建一号”触礁了。连呛几口江水之后，38 岁的叶胜友奋力从倒扣的船舱中挣脱，浮出水面，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浊浪滔天的江面上人头攒动，呼叫声四起。所有的人都在浑浊的江水中挣扎着，蔬菜、衣物等堆放在船舱内的物品四溢漂流。不该发生的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展开营救

惨祸发生后，第一个听到呼救声的，是停泊在出事现场附近的云南省金沙江船运公司的“云拖403号”货船，当时，它拖着三艘驳船因雾大在此停泊。6时30分左右，船长康义金听到呼救声，立即指挥船向倾覆的船只赶去，即刻从水中救起6人。在他们的呼救下，另一艘运木头的船也闻声赶来，救起11人。6时40分左右，一位幸存者游上岸，急速跑去附近的羊石镇拨打110电话求救。当地派出所所长很快向当地党委、政府、企业呼救。接到报警后，施救工作很快展开。天华股份有限公司的水陆运输有限公司立即出动停泊在榕山码头的六只船，公司副经理赖华生担任救助指挥，高声指挥所有船只追赶往下游漂去的倾覆船只，营救落水者。8时左右，天华派出的两支船追上了船肚朝天的覆船，并将其夹住，拖向岸边。此时，“榕建一号”覆船已被滚滚江水冲到15公里外的羊石盘。天华施救船将其在羊石盘固定下来，救出倒扣在船中的群众，救活四人。正在江边捕鱼的五六艘小渔船，也冲破惊涛骇浪，赶往出事地，救助落水人员。当地居民、村民闻讯而来，伸出援助之手，背的背，抬的抬，许多人直接操起竹竿，在岸边探寻、打捞。

合江县副县长罗德荣接到110电话后，7时30分左右即赶到出事地点，组织救助。上午9时左右，泸州市市长先开金、常务副市长蔡炳中先后赶到，成立了临时抢救指挥部，组织各级机关干部、公安干警、武警战士、居民村民、企业职工近千人参加救助，共出动大小船只19只，在10多公里长的江面上不停地搜寻，救助生还者，打捞尸体。

下午4时左右，副省长王金祥带领四川省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赶到现场，加大了施救力度，合江县委书记唐德旗担任施救组组长，指挥施救打捞、治安、善后处理、人员核实、后勤五个小组紧急施救。数百名干部、群众、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日夜坚守在长江干道四川省合江至重庆市江津段100多公里的两岸，并驻点分段搜寻。

“6·22”合江沉船事件发生后，泸州市合江县的1200多名公安干警、机干民兵和村社干部组成打捞队，在重庆市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经过10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将130名遇难者的尸体全部找到。

亲历沉船

遇难生还者家住合江县榕山镇符阳村十三社的农妇高碧珍眼噙泪水说："那天，我起得特别早，6点从码头上的船，准备到榕山镇去卖鸭子，我坐在船底舱。大约半小时后，我感到船身在剧烈晃动，有水浪扑进船舱，我听见船身"咔咔"直响，同时听见有人尖叫。一会儿，船突然侧向一边，我双手一抓，顺势死死地抱住船舷，然后眼前一黑，发现除了头部外，全身都泡在冰冷的江水里。这时我才晓得船已经翻了，我被扣在了船下。"一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她就忍不住周身颤抖："我虽然被扣在船下，但船底与江面之间还有一尺多高的空间，我还可以呼吸，就这样，我随着船一起在江中漂呀漂呀。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的全身都快僵了，突然感到船在向上翻，慢慢地光线透了进来，我激动地大叫起来。可谁知道紧接着传来"嘣"的一声闷响，我一下子又被摔了出去（事后才知道是拉船的缆绳断了）。后来我被渔船救了上来，但双臂已被挂得稀烂。"

何树森则是被一扇停止转动的螺旋桨救了命。他也是符阳村十三社的村民。当日6时许，他从码头上船后，放眼一看，船头、船舱都挤满了人。他灵机一动，像条泥鳅一样在人缝中灵活地钻来钻去。转眼就钻到船尾，又费劲地钻进驾驶舱的底部，满头大汗的他做梦也没想到灾难会骤然降临。回想起死里逃生的经历，何树森依旧心有余悸。他说："船开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奇怪为何迟迟没靠岸，便爬上来站在船的左舷上，这时才看到江面上雾很大，水中到处是湍急的大旋涡。我还没站稳，船突然被江水冲得横了过来，紧接着便翻了，我被甩在江中。""我知道出事了。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往左一冲，头重重地撞在钢板上，痛得我直甩脑壳，便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慌，要冷静。我又往右冲，吞了两回江水后，却摸到右舷铁板。这下全明白了，只有往上冲才有一条活路，于是憋住气猛地往上冲，双手乱抓，突然抓住了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全是滑溜溜的感觉，双手用力便将头探出了水面，妈呀、这才看清自己是抓住了螺旋桨。真幸运，这是两台螺旋桨中的一台，另一台还在使劲地转着，这台却不知何故停了。我扎扎实实吸了几口气，看见江面上全是人脑壳。啧啧，那惨景我今生难忘。"

躺在合江县人民医院7号病床上35岁的青年农民王帮良，说起翻船时的惨景，眼泪滚了出来。他说："22日一早，我与大哥、二哥、六嫂及妻子一同去榕山镇赶场。船行至剑口时，我从船中间位置出来屙尿，在过道上看见江面浓雾中离船头不远处有一大石包，还未回过神来，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客船触礁翻了，江面上男男女女、大人、小孩，时隐时现，喊爹叫娘。"这位在长江边长大，很会游泳的青年，拼命往外冲时，不知有多少双手死死抓住他不放。至今，他的手臂上还有一道道被抓破的伤痕。他说他力气大，拼命从人群中冲开一个缺口，才求得一条生路。在短暂的恐惧中摆脱了死神的气息，从江中迅速爬上朝天的船背，还未坐定，突然看见江面上晃动着一束头发，他顺手一把抓住那束头发，竟是一名落水小女孩，他抱起女孩用力推上船背。

8岁起就在长江中冲波浴浪的王帮良憋足气，侧身用力拉在江里扑腾的手，一抓就提上一个人，救了六个人后，闻讯来救人的"云拖403号"赶到了沉船边，王帮良和另外三个脱险男人七手八脚地把救起的女人小孩送上江岸。忽然，翻沉轮船身一斜，竟被滚滚江水冲离了礁石，顺着滔滔江水越漂越远。"天哪，船下面还扣着100多人呀、我的媳妇也在船舱里。"双眼赤红的王帮良哭着对"云拖403号"的船长说："我一定要去救人。""云拖403号"轮全速追赶着在浊浪中时沉时浮的"榕建一号"，一直追到15公里外的望龙镇沙嘴江段，反扣的"榕建一号"终于搁浅。王帮良嗷嗷大叫着第一个跳进水中救人，他用钢缆系住沉船的主舷，"云拖403号"轮刚一拉动，沉船下"哗"的水花乱溅，冒出一个女人的头，王帮良连忙把这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救上岸。这时，全速赶来的施救船越来越多，大伙儿把沉船完全拉了出来，王帮良又一次跳进江水，拼命把反扣在船底的幸存者托上救援船只。事后，王帮良说他至少救了15人，全身都被沉船挂得皮开肉绽，但当时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精疲力竭的王帮良扶着船帮喘气时，只见对面救生船上的人又从沉船下拉出最后一位幸存者。熟悉的衣裳令他心头大喜："天哪，我媳妇还没死。"

正在接受医生检查的蒋华秀说，她上船后，一直站在船舱中部左侧。船翻后，她被顺"扣"在船下。船舱里乱作一团，她手摸到之处，全是人

脑壳。不会游泳的她屏住呼吸，闭着眼任凭江水冲向下游。惊恐未定的她，断断续续地向记者讲述了死里逃生的过程："当时，我正与几位朋友摆龙门阵，一阵剧烈的抖动，不知什么原因，四周突然一头漆黑，伸手一摸，才知客船翻了，我使出全身力气吊着栏杆，随船顺江而下，漂流了一阵，突见一线光亮，船沿边出现一道一米左右的口子，我从亮口处刚一爬出，就被一名小伙子救起，我周身软得如一摊稀泥，被送往医院治疗。我能活着出来，全靠好心人相救。"

幸存者做服装生意的王宏烈说，当时他坐在船的最上层，看见长江滚滚东流，船和人在上面颠簸、飘摇。在翻船的那一瞬间，惊得不知所措的他跳进水里，幸亏他会游泳。在人头晃来晃去的江面上，恰好飘浮着一个筒式灭火器，他发疯似的奋力游过去，紧紧抓住它。不一会儿，另一小伙子也抓住了这个灭火器，当他们齐心协力往岸边游时，又有两个男同志游了过来，他们四人紧紧抓住灭火器，在旋涡里沉下去又浮起来，被洪水冲了几百米远，大约10分钟后，百米乡三只打渔船将他们救上岸。救助者未留姓名就走了。

在合江县医院的走廊里，坐着一个目光呆滞的农民王家贵。据说他的妻子和儿子在"榕建一号"船上，沉船事件发生后，他就匆匆赶到医院，坐在这里等呀等，他希望妻儿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哪怕是受了伤，然而他这愿望却未能实现。

合江县望龙村幸存者李华清，提起"6·22"沉船事件，就泪水涟涟，他哽咽着说："事发当时，我站在船头看见一个卖豇豆的农民'扑通'一声跳进江里，紧接着，我也跟着跳，但晚了，船翻转过来把我扣在里面，咕噜咕噜接连喝了好几口水，我拼命扳着船舷往外钻，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刚钻出水面喘了两口气，又被一个落水女人紧紧抱住脖子，使我气都出不来，我劝她不要死死抱住我，我不会甩下她。正说着，上游漂来一块浮木，那女人忽然将我扔了，抓到木板，我也顺势游过去抓住木板，后来又有一个落水妇女浮出水面，我们三人死死抱住木板不放，一会儿被旋涡吞了，过一会又浮出江面，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来把我们三人救起。当时，我周身一丝不挂躺在船上，软得翻一下身都困难，浑浊的江水胀得我

人事不醒，啥时候被送进了医院我也不知道。”①

责任人被刑拘

不良的船主梁如彬在事故后，保持了“特别”的清醒。他制造了一个骗局，妄图减轻自己因为图钱财轻视人命的罪责。这是对生者的欺骗，对死者的亵渎，对法律的践踏。23日，梁如彬等三人已被刑事拘留。

二、政府积极处理善后事宜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注，四川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省政府事故现场调查处理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人员施救、尸体打捞和善后处理工作，保证了事故发生后当地人心的稳定。省纪委、省监察厅也迅速介入，对善后处理工作进行了全程监督，着手对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进行调查。

组织调查组，开展营救和善后工作

险情发生后，泸州市、合江县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沿线群众参与抢险救援行动。

得知事故报告后，各级领导表示极大关注。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22日下午专门作了重要批示，指示四川省、重庆市全力组织抢救落水人员，并做好善后工作。

24日凌晨零时30分，由交通部海事局副局长刘德洪等一行四人组成的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赶到了榕山镇。

省委书记周永康当天中午获悉消息后，立即指示事故发生地点的市县及沿江地区全力组织抢救落水人员，并要求省分管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抢救工作，查明事故原因，做好善后工作。随后，又多次打电话询问现场情况。

副省长王金祥带领省政府副秘书长辜仲江及省安办、公安、监察、交通等部门负责人于22日下午赶到事故现场，研究事故施救及善后的紧急措

① 《四川合江沉船事件全景追踪》，载《天津法制报》2000年7月7日第1版。

施，并担任此次事故省政府调查领导小组组长。

省长张中伟于23日晚11时30分，在开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后，立即驱车赶到现场。张中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及周永康书记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并对参加施救工作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24日上午，张中伟、王金祥与国务院调查组的同志一道看望了获救的伤员。

省交通厅副厅长刘晓峰受厅长翁蔚祥的委派于22日下午赶赴现场，并担任此次事故技术调查组组长。随后，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于唯多也赶到了事故现场。省交通厅还在事发地召开了部分港监处长参加的现场会。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示下，经过全体参战人员的艰苦努力，221名落水者中，90人获救生还，经过10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将130名遇难者的尸体全部找到。

开展安全检查，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

6月24日，四川省交通厅在合江县召开港监现场会，要求港监部门切实杜绝水上重、特大事故的再次发生。并推动开展水上交通百日安全大检查。

该厅副厅长刘晓峰向来自乐山、宜宾、广安、南充航务港监处的负责人通报了合江县“6·22”特大事故的情况后，要求各级政府加大管理力度，加强船员安全教育，特别是汛期，一定要严防死守，从第一班船开出后到最后一班船都必须有港监人员在场，实行港监员对全省2042个渡口，2400只船进行直接现场监管，并作原始记录。严禁超载，严禁“三无”船只。

四川省交通厅要求，从6月23日到9月30日，在全省开展水上交通百日安全大检查，主要内容是推动落实乡镇船舶安全管理责任制，加强对客船、客渡船和高速客船的监督检查。依法取缔“三无”船舶和非法造船窝点，整顿餐饮娱乐船，强化现场监控，严格船舶的监督管理，对查出的隐患，要及时整改，确保万无一失。厅航务局要组织人员，赴各地检查指导。旨在强化全民安全意识。

安慰治疗生还者，赔偿遇难者家属

据了解，从滔滔长江中被救起的人，带着心理的恐惧和身体的创伤，分别住进了合江县人民医院和榕山镇中心卫生院，为使他们的创伤能得到很好的医治，由一名副县长挂帅，组织医疗卫生抢救组，在治疗他们身体创伤的同时，给他们以安慰和治疗他们的心理创伤，使住在医院的31人从心理和身体上得到很好治疗。

6月27日，开始先期对每位遇难者家属预付4000元赔偿金（赔偿金来源主要是船主被依法冻结的现金、存款和事故船只投保获得的赔款），待法院对遇难者应享受的各项赔偿项目及赔偿金额作出正式判决后，再将剩余部分予以赔付。同时，泸州市、合江县两级政府还分别对每位遇难者的家属发放了1000元补助金。

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纪进行了严厉的查处

“6·22”事件调查结果表明，榕山建筑公司应对此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合江县、榕山镇两级港监、航务管理部门应负直接监督管理责任；泸州市航务局、四川省航务局应负监督管理责任；合江县交通局、泸州市交通局应负领导和管理责任；合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泸州市人民政府应负领导责任。

依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四川省纪委、监察厅对在这起特大事故中负有领导和管理监督责任的有关人员作出党纪政纪处理。具体被处分人员涉及省级部门2人，泸州市7人，合江县17人；地厅级干部5人，县处级干部7人，一般干部14人。其中党纪处分15人，政纪处分22人，重处分17人。给予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刘晓锋，四川省航务局局长刘龙铸、泸州市市长先开金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泸州市副市长陈善强、蔡炳中行政记过处分；给予泸州市交通局局长李元一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泸州市交通局副局长杨天权行政撤职处分；给予泸州市航务局局长、党总支书记徐卫平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处分；给予泸州市航务局副局长余向烈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合江县委书记唐德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泸州市委委员、县委书记职务，依照法定程序罢免其市人大

常委会委员、县人大主任职务，并调离合江县；给予合江县委副书记、县长陈维国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县长职务；给予合江县委副书记龚百川撤职处分；给予合江县副县长罗德荣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合江县交通局局长、党委书记喻明哲撤销党内和行政职务处分；给予合江县交通局副局长陈帮贵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对其他11名负有责任的人员相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另外，司法机关对此次特大水上交通事故中触犯刑律的四名直接责任人依法逮捕。四人为：船主梁应金、驾驶员周守金、船只经营负责人梁如彬和当班轮机员石萍。2000年10月7日，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这个县“6·22”特大沉船事故的四名直接责任人作出一审判决，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梁应金、周守金、梁如彬有期徒刑7年，石萍有期徒刑5年。

点评：

在今天造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且在轮船经常运行、只有三公里航程的长江航道里发生130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实在让人觉得丢脸，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实在没有把它视为重大突发事件而予以研究的必要，因为它的起因很简单——超载。然而，仅仅两年后，即2002年8月2日，在距前年“6·22”四川合江特大翻船事故现场不足两公里处，又有一艘渡船不幸翻覆，造成4人死亡，21人失踪。看来，当地运输部门对此次船难的教训的吸取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认真地总结其中的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一、对超载问题的管理为什么不能有效到位？众所周知，超载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的大忌，此次合江沉船事故的发生，与超载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但为什么屡禁不绝呢？据交通部官员介绍，我国70%的交通事故是因为超载、疲劳驾驶而引起的。既然原因如此明朗，为什么就不能找出合适有效的药方来呢？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总的来说，以下几个方面是主要的：1.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交通法规在一些人的眼里只是吓唬胆小鬼的文字而已，只要没有被管理部门发现，只要不出事，就万事大吉。执法部门常规性的检查不够，搞集中突击性的检查居多，而且即使在平时的

工作中发现了问题，碍于金钱、人情等因素，也缺乏认认真真地执法的决心，尤其是在不发达的地区。2. 没有考虑市场的需求因素，只是一味地阻塞，从如何增加满足需求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够。超载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业主要多赚钱，另一方面是市场有需求，如果不想办法扩大供应渠道的话，就会有人铤而走险，管理部门就会防不胜防；像此次合江沉船事故中肇事船为什么能超载150人？因为大家都忙着早一点去赶集！这是当地常见的现象，每到此时乘船的人数都比较多，有关部门应该预知这样的事实，采取在客流高峰时间段增加运输船的办法来缓解交通压力，防止超载现象的发生，这样就不会发生130人遇难的特大事故了。3. 执法中单纯从经济上加以惩罚的因素居多，而从其他方面因素考虑的较少。有些地方的管理部门，对于超载现象，一经发现，大多简单地一罚了之，更有甚者，为了增加本单位、本行业的收入，事先硬性规定罚款任务，这无异于是在人为地助长违规现象的蔓延。

二、这个事件也引起了我们对私营企业在我国生产领域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反思。2002年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说，73%的重大交通事故是由于运输企业实行单车承包——承包者和个体运输户违规引起的。这个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什么这么多事故都是私营企业引起的？所说的反思，当然不是主张取消私营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权利，而是要想办法进一步规范这些企业的行为，使之能更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对于繁荣市场、活跃经济、激发活力、扩大就业渠道，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我国私营经济单位由于其从业人员的文化氛围、自身素质等的局限，再加上我国现有市场经济管理制度的缺陷，其散漫性、盲目性、私利性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表现得比较突出，法纪观念有时就不那么强，道德底线往往难于守住。合江沉船中船主为了赚钱，不顾旅客的生命安全大量超载，在事后，为了逃避责任，又制造谎言，就是典型的私利性的表现。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中频频曝光的假酒、假药、毒大米等事件更是集中暴露了一些私营企业唯利是图的恶迹。我们因此而取消私营企业当然是荒谬的，但对其姑息则也是大不可取。政府和社会应当了解

这个实际存在着的事实，以从根本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顾客不要过分贪图价格便宜、政府不要征收过多的税收，免得私营企业由于无力降低成本而制假售假。

三、关于一些地方管理部门平时不肯花小钱买药，结果却要花大钱买棺材的工作方式的思考。合江沉船事件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相关领导部门都极为重视，在救治伤员、安抚死难者家属、调查事故原因、惩治责任人等方面所做的工作都非常积极有效，这些当然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亲民、为民之举。但这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属于事后的救济行为，而不是积极的建树行为。反思这起事故的过程，如果有关部门在事前有积极的建树行为的话，就会有效地阻止事故的发生。该事故的两大重要原因，一是超载，二是冒雾航行，这都是航务管理部门很容易发现和制止的行为，为什么他们没有做？是人手不够还是怕麻烦？人手不够而不增加人手，是怕花钱？可是一旦出事，为了保住位子，安定人心，花多少钱也只能在所不惜。这其实依然是过去“在政治问题上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思维方式的延续，而其教训则已被历史证明是太深刻了。

据统计，1997年，长江沿线发生海损事件413起，死亡224人，损失2亿元；1998年，长江沿线发生海损事件327起，死亡272人，损失7390万元；1999年，长江沿线发生海损事件331起，死亡245人，损失1119亿元。

我们在总结原因时动不动就说是船员素质差，操作技术水平低下，安全责任制不落实等造成的。但深层次的问题，还是与一些地方管理部门平时不肯花小钱买药，结果却要花大钱买棺材的工作方式有密切的联系。

（正文：虞花荣　执笔　　点评：程美东　执笔）

南昌幼儿园大火

一、一盘蚊香"烧"死了14名幼儿

2001年6月4日晚9时左右，江西广播电视艺术幼儿园小（六）班的班主任杨慧珍在宿舍内的过道点了三盘蚊香。临走时，杨慧珍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晚值班的保育员吴枝英。保教主任倪惠琛和值班医生在巡查中发现蚊香，但未做任何处理便离开了。晚11时30分，吴枝英离开宿舍后约45分钟内未到宿舍巡视。5日凌晨零时15分，由于床上棉被掉落在床边过道上点燃的蚊香上，引发大火，发生火灾。有13名三至四岁的幼儿在火灾中丧生，其中男孩七人，女孩六人，大部分为窒息死亡。四名逃脱的孩子中一人因伤势过重于第二天晚死亡，这场大火共夺去14名花朵般年纪的孩子的生命。

江西广播电视艺术幼儿园于1999年9月开始招生投入使用，为地上三层建筑，总面积7000平方米。幼儿园有大、中、小、托儿（三岁以下）四个年级，共有17个班。出事的小班共有六个班，只有一个班为日托，其余五个班为全托。全托班每班有三个老师，两个保育员。从硬件来看，广电幼儿园是非常出色的，城堡式建筑在南昌市绝无仅有，其内部设施也堪称一流。当然，其收费也是不菲的，就全托班来说，每年3000元赞助费，加上每月各种费用，一名小孩一年的学杂费要花上万元。家长们之所以花这么高的费用送小孩来幼儿园，是图这儿"漂亮"、"高级"，指望小孩们在这里学好钢琴、舞蹈什么的，将来有前途，

事发时留宿在园的，包括30名老师、厨师、实习生以及幼儿，共有304人。发生火灾的是位于幼儿园二楼南侧有里外两间屋的小（六）班宿舍，当晚这个班级在学校住宿的有17名幼儿。

二、火灾发生时保育老师不在现场

幸运逃生者中，四岁半的沈如宏算是最为机灵的孩子。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胖乎乎的脸蛋，脑门亮堂堂，皮肤较黑，比较壮实。火灾发生后，由于房间内太热，小如宏被烫醒了，醒来后，他发现有大火，并冒着浓烟，出于求生的本能，便从床上爬起来，顾不上找衣服，光着脚丫往外跑，一个人跑到门口，遇到赶来救援的老师，于是被牵着逃了出去。

四岁的龚俊杰也是幸存者。小俊杰的床是在房间的正中间，离门口有两张床的距离，他是被烟熏醒之后，半梦半醒之间，被人拖出了门外。他的裤兜上被烧有一个小窟窿，脚也被火烤伤了。

三岁的刘昕是自己在闻到烟火的呛味后，忍受不住而跑出宿舍的。

从这几个幸存的孩子的逃难经历来看，当时幼儿园对于灾难的救援是非常不得力的，反应迟，救援慢。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本来很小的火源怎么能发展成那么严重的大火呢？当晚陪睡的老师到哪儿去了？须知幼儿园的承诺是24小时都有人值班，决不让孩子离开大人看护。事实是，当火灾发生时，老师都不在现场，否则，从蚊香点燃被褥到整个房间的大火至少需半个小时时间，只要有成人在场采取简单的灭火措施，一场灾难就可以避免。但事实是，最早发现火灾的不是该幼儿园的老师，而是紧靠幼儿园的广电局17栋宿舍员工。当时这些人正在打麻将，发现了火灾并报了警，其中有些人还冲到现场救火。

那么，这些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到哪儿去了呢？事后，有人说他们去打麻将了。主管方人员说是洗衣服去了，值班的保育员在被捕后也一直坚持这个说法。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凌晨一点左右还去洗衣服，这难道是幼儿园的特殊工作对象决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晚上在每个宿舍里值班的就不应

该是一个保育员，至少是两个。

据事故现场的目击者称，当时的场景极为恐怖。13 个当场死亡的小孩，有几个已经被烧得变了形，认都认不出来了，抬出来的都是些黑黑的一堆。

受难的家属们悲痛难遏，他们聚集在一起手捧着遇难孩子们的遗照到南昌市中心八一广场抗议。他们表示，有关单位并未给予一个合理的交代，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作出适当的赔偿。

事故发生后，江西省省长黄智权、省委副书记钟起煌等省市有关领导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抢救工作，成立了以副省长王君为组长、省长助理凌成兴为副组长的事故调查处理领导小组，立即开展工作，检察机关已提前介入。

第二天，三名直接责任人——幼儿园值班负责人倪愿琛、小（六）班值班保育员吴枝英、小（六）班班主任杨慧珍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火灾善后处理工作也已全面展开。

8 月6 日，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江西省广播电视发展中心艺术幼儿园园长、法人代表刘越南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002 年 5 月，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失火罪分别判处保育员吴枝英、班主任杨慧珍有期徒刑五年和三年，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失职罪判处保教主任倪愿琛、园长刘越南有期徒刑三年。

点评：

这场幼儿园大火案的起因非常简单，其过程也不曲折，大火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死亡的人数也不是特别的多，造成的财产损失也不大，在全国每年发生的无数突发事件中南昌幼儿园大火事件显得并不特别。然而，这场大火所蕴涵的警示意义，所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却不可小视：

一、这场大火中的死难者都是三至四岁的幼儿，该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非常恶劣。不仅是死难的孩子们的家属，甚至是普通的民众，在极度的愤怒之余，都容易把无法排泄的怒火迁延到政府身上，把这个事件跟腐败联系起来，跟党风、民风的好坏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不非常妥当地处理好这个事件，极有可能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利用来损害政治资

源。事后一些死难者家属到政府门前示威游行，媒体上有些人借此大肆挞伐有关责任人，于情于理都可以理解，但如果无限追究下去，极容易导致非理智的社会动荡。

二、这场大火反映了我们的一些部门，尤其是服务部门的安全生产和生活的管理制度及意识极其的薄弱，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幼儿园管理和服务的对象是没有自理能力的群体，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无防范风险能力的群体，竟然没有想到火灾的危险性程度，更没有预设其他的危险情况的应对措施。让这些孩子们单独睡在房间里，这是典型的不讲科学、不按规章制度办事的作风，而这样的粗放式管理方式在我们的生产和服务部门绝对不是个别的现象。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工作作风，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那么我们是不可能保证以后不再出类似的事故。

三、这场大火事故的处理既遵从了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的。这场事故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从2001年6月5日被捕一直到2002年5月法院才宣判，之所以这样，恐怕也是因为对这些人的判刑不能仅仅考虑法律因素，还必须要考虑政治因素。这是现阶段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是保持社会稳定、赢得民心的需要。

（黄锦春　执笔）

参考文献：

[1]《南昌幼儿园大火吞噬13名幼儿，3名责任人被捕》，http：//news.china.com，2001年6月6日，10:30:34。

[2]《南昌幼儿园火灾幸存者沈如宏：我光脚跑出来》，http：//www.sina.com.cn，2001年6月7日。

洛阳东都商厦“12·25”大火

一、火灾：309 人死亡

2000 年 12 月 25 日夜，洛阳老城区中州路。西方的圣诞节在洛阳这个千年古都里日益流行起来，街道上、宾馆、饭店、商场、歌舞厅里均是灯火灿烂、彩旗招展，熠熠生辉的圣诞树，和蔼可亲的圣诞老人，“圣诞快乐”的祝福，无一不渲染着节日的气氛。

位于中州路最繁华地带的六层的东都商厦，更是一片欢乐繁忙的景象。该大厦地下有二层，地上有四层。地下附层为专门经营家具的木制家具城，地上一层和地下一层被东都商厦管理者租给了丹尼斯量贩东都店（丹尼斯系台资企业，河南总店设于郑州，在洛阳市南昌路另设有一分店），地上二、三层则是个体经营的服装、鞋帽店和五金交电商铺，四层为私人承包的歌舞厅，1800 平方米的空间除了有一个大舞厅和一家音乐茶座外，还有几个舞厅包房。

丹尼斯量贩东都店 28 号准备正式开业，为了能一炮打红，在洛阳商界站住脚，东都商厦和丹尼斯对第二天 26 号的试营业都非常看重，当晚组织了大批员工、商户加班加点上货，二层、三层的商户也为了迎接元旦佳节在忙碌，所以从地下一层到地上三层，丹尼斯商场的员工和一些东都商厦的商户们都正在紧张地往各自的摊位上摆放货物、打扫卫生。在东都商厦二层、三层、地下一层，还有民工在忙碌着连夜装修施工。与此同时，在商场的四层，一块“女士免费”的牌子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楼梯口。颇有商

业头脑的歌舞厅老板张建国在圣诞节前就向外散发了许多免费舞票，并且许诺圣诞夜女士免入场券，这更激起了身处节日气氛中的人们的兴致。

从下午6时开始，歌舞厅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客人，女性顾客很快超过了一半，这些女性大多数居住在商厦附近，很多人都是一天的工作忙完了，晚上去热闹热闹。一对家住洛阳西工区的小夫妻，手拉手到歌舞厅去唱歌，妻子在歌舞厅门口看到牌示后高兴地说："今天运气不错。"人越来越多，不到7时歌舞厅已是人头攒动，平时每人30元的包间费这天涨到了每人50元仍然很快卖空。在8时20分之后依然有一些人结伴来到歌舞厅，甚至有三位女孩因人太多进不去而吵闹着要退票。当夜的门票大概售出了400多张，舞厅里疯狂的"蹦迪"音乐马上就要开始了。[①]

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祥和和快乐。就在四层歌舞厅狂歌劲舞的时候，一层大厅，晚上8时20分左右，丹尼斯量贩有限公司东都分店养护科员工王成太按照分工像往常一样在悠闲地巡查电器线路，碰到装修负责人、经理王子亮时，王说："你把楼梯口钢板上那两个洞焊一下。"

原来在东都商厦的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的营业大厅间，有一个连接上下的步行梯。在装修期间，为经营方便，丹尼斯便用一大块钢板将地下一层的楼梯口给盖上了，但钢板上原有的两个方洞却一直没遮没拦地留着。几天前东都分店店长赵宇就责令要焊一下，但一直没落实。

"我一个人不行，再说电焊机也不在我这儿啊！"

于是，正在现场干活的生鲜处的几名员工也被王子亮叫来，与王成太一起抬着电焊机到楼梯口钢板旁。接线，试打火，8时40分，略懂电焊的王成太"操刀"，几个人像模像样地干了起来。悲剧的隐患总是隐藏在不经意间，飞溅的火花从钢板中间的方孔不断地漏了下去。21时左右一民工路过见几个人在忙碌，随口问道："这下面是啥东西，能不能在上面焊啊？"

王成太于是借着电焊火花通过相邻的洞口向下看，黑暗中好像有一捆方木条，而且其中一块已经烧得像红炭，方大惊失色："不好啦！赶快救火！"

几个人此时立刻报警，可能所有的结果都会完全改变。但似乎没有人意

---

① 以上文字引自林凌峰：《小焊渣酿出惊世大祸》，载《甘肃消防》2001年第4期。

识到火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惊慌失措的几个人只是按照想当然的方法，用水龙头从洞口向下浇水。细小的水流并没有使火势减小，反而电焊熔渣在点燃海绵床垫后，迅速地引燃了地下二层堆积达3000多平方米的家具等其他易燃物，从洞口传出的浓烟越来越大，而宝贵的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了。

火从大楼的地下室迅速蔓延开来，但受到了地上一层、二层和三层这几个营业大厅防火门的阻隔，没有烧及二楼以上的房间。大量高温有毒烟气以每分钟240米左右的速度从楼道口急速上升，并在极短时间就充满了所有的通道及整个四层。

21时20分左右，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王磊检查开业情况时进入一层南边发现一层乱作一团，在得知火情后手机通知东都商厦总经理李志坚后，拨打报警电话，并要求除了安保人员继续浇水外，丹尼斯所有员工撤出。接到电话的李志坚此时正在二层，等他出门看时，黑烟已经从东北角的楼梯口冒上来，他急忙让人将东北角楼梯间的门关上，打开西南、东南角楼梯的门，并让配电房切掉电源，大呼所有人员撤出，整座大楼一片黑暗。

此时，四层歌舞厅大厅里正在狂欢的人群突然被浓烟包围，旋即灯光突然全部关闭，“着火了，着火了！”整个舞厅突然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恐怖和黑暗。惊慌失措的人们开始一起涌向出口电梯，然而电梯此时已停止运行。一些人急忙从舞厅的窗口跳出，夺路逃生，但更多的人还是被困在舞厅当中，摸黑在歌舞厅里乱转，尖叫声、哭泣声、咳嗽声夹杂着凄惨而徒劳的呼救声，响成一片。不一会儿，即归于无声无息，东都商厦于是变成一座死寂的坟茔。

22时50分大火被控制住，26日零时45分方被全部扑灭，此时，309条鲜活的生命，最大的为40岁，最小的为14岁，大部分都是有老有小的人，亦如烟样消逝在悲情的古都上空。

二、事故原因的综合反思

从发现火情到309人遇难，从歌舞升平到人间炼狱，短短的一个小时，造成了309人死亡、7人受伤和280万财产损失。为什么火灾会蔓延这么

迅速，为什么会造成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生命何以如此“脆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火灾现场——东都商厦。

东都商厦地下两层、地上四层，人员最为集中的舞厅和办公室设置在顶层四楼。舞厅居中，其东侧、南侧为办公区，西侧为KTV包房，整座商厦内部，除没有通至楼顶平台的东南门、西南角楼梯外，两角楼梯和位于各角的电梯上下贯通，同层以周边环形通道相连，内部各层以防火门关闭形成相对封闭的立体空间。商厦外墙和以玻璃幕墙封闭的东北、西北角楼梯间、各电梯间、各层环形通道，使整座大厦构成以中部相对封闭立体空间为填充体的立方体烟囱。当最低部地下二层发生火灾后，大火在封闭的地下二层熊熊地燃烧，在东北和西北两个被铁栅栏封锁的楼梯出口形成两个烟火出口。浓烟借着火势迅猛向上扩散，在东南和西南两个楼梯道形成了烟道效应，迅速向楼项冲击。整座商厦好像底部整体连接一个烟雾发生灶的大烟囱，燃烧所产生的烟雾受烟囱效应的作用迅速通过楼梯、电梯间先向上集于顶层歌舞厅。[①]

在楼顶气流有两个入口处，主要入口处位于楼顶的西北角。这一入口为铁栅门，相当于大门敞开，更重要的是，铁栅门坐西朝东且仅挨出口南侧有一米多高的墙体遮挡，使东北风从该梯口处直接灌入楼梯间。另一个入口为楼顶的东北角，但这一入口坐东朝西，不仅背风，而且有木门阻挡，门上部仅有两个无玻璃的小窗口，不可能成为东北风入口。以上两个入口以下，均为与各自相对应、贯通大厦上下的外封闭楼梯间。大厦地下二层还有两个出口楼梯，但是，东南角楼梯已封闭，且东南角、西南角楼梯均未通至楼顶平台，因此空气流通不畅。另外，地下一层以上地上四层以下，内部基本为封闭状态。因此火灾前，空气主要流通的路线为：东北风从大厦西北角楼顶门灌入，顺楼梯直下流入地下二层，部分进入地下二层大厅内，后又沿东北角楼梯向上，从大厦东北角楼顶门窗口流出。

火灾发生初期阶段，空气和有毒烟雾的流动方向基本上与火灾前一致。火灾发生中、后期，即烟雾猛烈向四周扩散，其最容易扩散的路线为

---

① 该段引自林凌峰：《古都烈焰震中州》，载《云南消防》2001年第1期。

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个楼梯通道。原因是楼顶有两个出口，且这两个楼梯口距着火点较近。烟雾的流动方向和当事人的口述也是一致的，由于东北角楼顶通气不畅，烟雾顺顶层四楼顶棚直奔舞厅入口。根据初期风向分析，东北风可从屋顶平台西北角直接灌入，使火灾由起火蔓延到全面燃烧的时间大大缩短，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有大量的有毒炽热气体涌入楼梯间，直上四层，使舞厅人员窒息。

遇难人员最为集中的区域是四层东都歌舞厅。当晚四层能够通往下层的步梯和通向楼顶的通道全部被上锁的铁栅门封死，只有电梯可供上下。据从四层舞厅包间逃生的人员说，几乎在大厦拉闸断电时，舞厅的人员才发觉楼下起火。然而此时整个顶层实际上已经变为悬在空中的“牢笼”。

洛阳东都歌舞厅四周有回廊，回廊四角有出入口，可用作非常通道。然而，圣诞之夜却有三个通道被铁索紧锁，致使意识尚清醒的被困者找到出口时却无路逃生，活活被呛死在走廊里。在回廊外层是隔间 KTV 小包间，本来在每一件小包间有一个一米高的小门，可以用作逃生至包间外阳台上，可是谁都不知道有这个如同动物窝门的小门。当他们冲出包间进入回廊时，便随着烟雾下了地狱。309 名遇难者，几乎全是在未伤一根毫毛的状态下，被毒烟杀死的。

而位于四层中部的歌舞厅，仅有东北角唯一的出入口。这一疏散口同时又是烟雾进入的最主要进口。舞厅虽在西南角吧台东侧有一不足 80 厘米宽的小门，但其又通向右边杂物间，对于不熟悉舞厅情况的顾客来讲，突然断电后，这个小门根本不具备疏散条件，难怪舞厅业主也葬身其中。在清理火灾现场时，这杂物间内挤满了遇难人员，也证实了这一点。

1. 严重违章违规操作。

直接引发大火的责任人王成太并不具有焊工作业证，在进行电焊作业时，他甚至没有常识性地去主动了解洞口下是什么物品，也未采取任何合理保护措施。丹尼斯量贩东都分店在装修时未向洛阳市消防支队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分店管理层明知王成太没有合法证件，依然安排王成太进行焊接操作，并且对地下二层是大量易燃物的情况并不了解，也没有想到主动了解或者提示王成太作业时注意，整个安全防火管理异常混乱。

王成太等人发现火情后，用消防水龙头通过方口向地下二层浇水灭火，在没有能够控制住火势时，几个人很快撤离现场，却没有一个想到及时报警。

2. 消防意识淡漠，严重违反消防法。

21时35分，洛阳市火警调度指挥中心接到火警，21时38分，消防支队三中队20余名官兵到达现场。短短三分钟，消防车来得很快，但就是无法靠近东都商厦，进口处都让临时建筑堵住了，在商厦正门入口有一个地下商城的入口临时建筑，左侧则是一长排做小商品生意的铁皮房子，属于典型的违章建筑。因为这排房子，牵扯到部门经济利益，它像生了根一样在那里，延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不仅在商厦外部，在商厦内部，火灾隐患更是随处可见。

东都商厦在将地下一层、二层租给丹尼斯量贩时，同时顺势将地上二层、三层全部租赁出去，不再由自己职工经营，为了尽可能地出租经商面积，允许二层、三层的新商户自己在商厦内部装修各自的店铺，搞店中店，也听任各商户将所分摊到的商厦窗户封死，为了吸引顾客，商户大多都花较多的钱搞装修，给消防安全带来了大量隐患。经营主体杂乱无章，互不往来，并且相互提防，防盗甚于防火，于是各层之间的通道大门紧锁。本来商厦内除有一部电梯外，还有四个可直达四层的通道。但最终通道只剩下两个，而通到四层的只有一个。同时东都商厦为了扩大出租面积，多收租金，竟允许商户将窗户堵死改作货柜，将商厦全然封闭，使烟雾无处散发，仅存的通道也变成了助燃的烟囱。

洛阳市消防支队灭火科副科长姚国红出示的材料显示，经公安消防部门认定，在东都商厦“发现防火间距被占用，消防通道被堵塞，自动报警系统损坏，自动喷淋喷头数量少，大楼内没有防火分区。虽装有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但由于年久失修，报警系统失灵，灭火系统水泵不能启动”。①

---

① 该段引自赖文斋：《悲情牡丹——洛阳12·25特大火难纪实》，载《山东消防》2001年第1期。

而东都商厦里人员密度最大的娱乐场所四层歌舞厅，早在1997年就被河南省消防总队列入40家存在重大消防隐患的单位和场所的名单中，而且排在第一位。从1997年至今，四年时间里，洛阳市消防支队共对东都歌舞厅检查15次，提出整改要求60条，下发《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三份，《重大火灾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三份，《复查意见书》三份，行政处罚两次。单是2000年，洛阳市消防部门就对东都歌舞厅作了四次检查、两次处罚，并于12月1日将停业整顿的处理意见上报市政府，请求市政府批准。但就在市政府的批复还没下来时，事故发生了。①

3. 少数部门渎职行为。

少数部门失职、渎职也是酿成这次惨祸的重要原因。他们在事故发生前，得过且过、麻木不仁；事故发生后，弄虚作假，企图掩盖罪行，草率了事。原洛阳市文化局文化市场管理科科长桂延州，负责审定颁发文化市场经营审核证。由于没有严格按照河南省有关文件精神主动配合消防部门对东都商厦娱乐城进行安全检查，因此对东都商厦当时是全省通报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竟毫不知情，使东都商厦娱乐城通过了安全检查。②

三、事故的披露和处理

火灾发生当夜，河南省公安消防总队队长雷成德立即率领副队长张增慧、程敬忠，防火部部长杨书生等赶赴火场。火刚扑灭，雷成德即率领有关火灾事故调查技术人员与洛阳市公安消防支队防火处的同志组成火场勘察小组，会同公安刑侦部门及时展开了火灾原因调查工作。受公安部指派的火灾事故调查专家也先后迅速赶赴洛阳。

2000年12月26日凌晨，河南省省委书记陈奎元就主持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研究事故处理工作，决定成立以省长李克强为组长的处理火灾事故工作领导小组。省、市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省公安厅厅长张程峰直接指挥，各级公安机关参与专案民警110余人，抽调专家和技术骨干

---

① 该段引自宇浪、林凌峰：《瞩目洛阳：世纪末的火劫》，载《时代消防》2001年第1期。

② 该段引自赖文斋：《洛阳大审判》，载《山东消防》2001年第9期。

130余名，迅速展开了调查工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石万鹏26日下午赶赴洛阳，查看现场，听取情况汇报，召开国家有关部门及河南省有关领导参加的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善后处置工作。决定由公安部牵头，会同河南省及监察部、全国总工会等对火灾事故进行全面调查处理。

26日下午，公安部火灾原因鉴定中心副主任鲁志宝和公安部电器火灾原因技术鉴定中心刘振刚助理研究员分别赶到洛阳，26日深夜零时许，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专家组成员三人赶赴洛阳，在确认起火部位、由电焊熔渣引起火灾后，公布了火灾原因：大火直接原因系丹尼斯员工王成太违章电焊作业引燃地下二层中部楼梯可燃物所致。

27日下午，在洛阳"12·25"特大火灾事故新闻通气会上，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刘国庆通报了该案侦破进展情况，王成太等10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28日下午，洛阳市副市长朱广平在与"12·25"特大火灾遇难者部分家属见面时，就一些工作人员在善后工作中出现的漏洞和偏差，公开向遇难者亲属致歉。不少遇难者亲属对朱广平的谈话表示满意，并表示愿意积极配合政府做好善后工作。

1月4日，丹尼斯总店副总经理王磊等15人涉嫌包庇罪被依法逮捕，商厦党委书记苗毅然、总经理李志坚和保卫科长杜克军等13人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洛阳警方在火灾发生后组织了200多名侦查技术人员投入查证工作，累计形成书面询问、访问笔录380份、50多万字，被逮捕和刑拘的28名犯罪嫌疑人对有关事实皆供认不讳。

2000年12月29日专电，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向媒体通报，河南省委、省政府已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了检查。

洛阳东都商厦大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洛阳采访的记者有300多名，其中仅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等境外传媒的记者就有近百名。

2001年8月14日，洛阳市中级法院及洛阳涧西区法院公开审理"12·25"特大火灾案。在洛阳中院审理的两案14人中，原洛阳丹尼斯量贩有限公司东都分店养护工王成太（违章电焊引发大火）因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和过失



受审的洛阳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为刑期最长的一个。法院还判处原洛阳丹尼斯量贩有限公司东都装修负责人王子亮有期徒刑9年，原郑州丹尼斯量贩百货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王磊有期徒刑9年，原东都商厦总经理、法人代表李志坚有期徒刑7年，原东都商厦保卫科科长杜克军有期徒刑7年，原洛阳丹尼斯有限公司东都店养护科负责人来登阁有期徒刑3年；在涧西区法院审理的五案9人（均是对造成事故负有责任的当地公安、消防、文化、工商、建设等部门的负责人）全部被判有期徒刑7年。①

点评：

这个事故非常典型的反映了当今商业及生产领域所普遍存在的只讲经济效益，忽视经营安全，片面追求“挣钱”，地方政府在以追求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同时，未能“以人为本”，将人的生命与安全置于比较次要地位的现象。从这起事件的发生过程来看，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以下几点经验教训：

一、应坚持“以人为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从而构建和谐社会。东都商厦总经理李志坚曾一直抱怨说，东都商厦连年亏损，这些火灾隐患管理层也很明白，但

① 该节引自《庭审——揭开洛阳“12·25”火灾黑纱》，载《时代消防》2001年第9期。

一直没有资金进行整改。洛阳市消防科负责人姚国红抱怨说，消防监督要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要为当地政府服务，人手有限且经费有限，全市104家重点防火单位，根本不可能做到严格的跟踪动态监控，每个季度检查一次就不错了。洛阳市工商局抱怨说……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之间，在当今中国似乎一直是个冲突的问题。从小煤矿的频频事故，到各种不合格的产品充斥市场，“要钱不要命”、漠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现象屡屡上演。短期暂时来看，生产经营的安全需要投入一部分资金，似乎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我们是饮鸩止渴、杀鸡取卵，还是致力于长期有效有质的增长呢？东都商厦拒绝停业的一个理由是许多职工家境贫困，如果整顿会导致许多员工生活得不到保障，但这些员工肯定想不到会葬身火海吧，并且抛开人的生命价值和造成的家庭、社会影响不算，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和弥补的资金往往要远远超出保证经济安全的少量资金。

二、加强突发灾难事件处理训练和教育，培养危机处理能力。火灾发生后，直至丹尼斯和东都商场负责人组织自己的商户和员工撤离，直至拉闸断电时，唯独没有人想到四层办公室、歌舞厅还有400多人，没有人想到该通知他们一声，没有人想到该把上锁的楼梯打开。我们认为这源于平时安全教育太少。同时，在发生突发灾难性事件时，从上级管理机关到具体的管理者，到普通的百姓大众，除了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外，就是各自逃命，不知如何更有效地规避和减少人员财产重大损失。

“世界是公平的”，改革开放20余年后的中国不再像以往一样偏隅于世界的一角，各种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的频率也会大大增加。这对我们人民尤其国家工作人员来说，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从“非典”到“反恐”，处理不当、惊慌失措与建立一套完备的应急措施、从容应对，其造成的损害大小可能是天壤之别。应该承认，洛阳大火突发生后，国家中央机关和河南省党政机关反应迅速，挽救措施得力，但是这种迅速是通过行政约束来迅速传导的，并且这条传导链条到了普通民众就大大丧失了效力。如东都商场作为一家国企就很少了解和接触到这些内容。

如何领导和指导人民群众应对灾难性事件，提高安全经营意识，在灾

难来临时自救和他救，这可能是我们国家工作人员需要面临的长期工作之一。

三、安全生产和事故处理制约机制应逐渐地透明需要化，通过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对国家公务人员形成压力、动力。在洛阳大火事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传统政治体制下的经常性行为。比如大火前东都大厦在“都市频道”曝光后，洛阳市消防单位领导要求姚国红对媒体下封口令，从而丧失了火灾隐患曝光、将其扼杀于摇篮的机会；大火后老城工商分局正副局长郭友军、王新伟和青年宫工商所所长杨红军订“攻守同盟”，对调查组隐瞒火灾前工商所已对歌舞厅检查过；丹尼斯王磊、分店长赵宇等人订“攻守同盟”，等等。

洛阳大火发生后，洛阳市的民众纷纷赶到现场，众多国内外媒体纷纷赶到现场，消息很快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这些对洛阳市、河南省国家公务人员有非常大的压力，也给他们迅速行动挽救损失提供了很大动力。

要解决政府工作人员沆瀣一气谋取私利、堵塞政府监管漏洞、领导旨意大于法律制度的现象，除了上级机关的行政约束外，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让人民群众知情，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依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自觉公示披露信息，政务公开，更多的要依靠媒体这个重要的中介将消息传播出去。

四、适当地淡化领导权威，强化人们在社会管理中的法律意识。洛阳市东都商厦早在1999年就被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曝光过消防设施不合格，但洛阳市有官员还专门写过条子，要求消防部门不要让歌舞厅停业。

政府权力的异化以及法律制度的尊严受到首长权威的侵犯是洛阳大火事件带给我们的思索之一。一个部门的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中而缺乏约束。有些部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家权力，行使管理职能时首先想到的也是最愿意做的，是怎样才能多收费，怎样才能尽可能多地牟取部门利益，而不是如何有效地管理。另外，公职人员不是去维护法律和制度的尊严，

而是首先要维护首长的尊严，没有把法律制度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准则，而是把领导的旨意当作至高无上的信条去执行，对于他们而言，领导的一句话、一张字条往往要比法律制度还重要。

（黄锦春　执笔）

参考文献：

本文引用文献除已经标出者之外，还参考、引用了《洛阳特大大火：惨剧是如何酿成的》一文，www. eastday. com. cn，2001 年 1 月 6 日。

"非典"（SARS）事件

一、一种新传染病恐怖地降临在中国广东

佛山：2002年11月16日晚，广东佛山市阐城区张搓镇弼唐乡的一位45岁、一向身体健康的庞先生出现发热、头疼等症状，起初以为是一般感冒，在自己服用了一些感冒药后，病情非但未见减轻，体温却上升到39℃以上，周身出现不适，高烧持续不退。11月20日，他住进当地医院治疗，当时医生把他当作伤寒病和肠胃炎来治疗，给病人服用了一些感冒药和抗生素，但是病人一两天后病情持续恶化，25日由当地医院转到佛山第一人民医院治疗。该院大夫开始怀疑病人是由消化道感染的恙虫病、流行性出血热等当地较常见的类似症状的疾病，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治疗。但病人转院后仍持续高烧，并出现咳嗽不止等现象，28日进一步发展为面色发紫、呼吸困难、肺部发现严重病灶，而且精神极差，并出现黄疸、肝功能受损等症状，最终被医院紧急从一般病房转到重症监护病区（ICU）进行抢救。

当时，医生和护士并不知道这是传染病，自然在治疗过程中没有采取特别防护措施，连口罩都没有戴！医生根据庞先生的病情，采用插管手术，用呼吸机抢救病人生命。在进行了第一起插管手术后，虽然庞的病情暂时得到缓解，但是情况仍然很差。

主治大夫吴敏和他的同事们查了很多医学资料，翻了很多医学著作，都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已有病例和庞先生是一样的，而病人急待救治，因此，12月11日，佛山第一人民医院邀请广州专家前来会诊。12月中旬，

中山三院的专家到佛山第一人民医院会诊时，与吴敏等当地医生详细解读了足足有两寸高的病历。

在广州专家到来之前，病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庞先生住进佛山第一人民医院一星期左右，在医院看护庞先生的舅妈也开始发烧，出现与他同样的症状，不久也被转入重症监护病区，接受了插管手术，并使用了呼吸机。可是庞先生的舅舅、舅舅的女儿、庞先生的妻子也紧接着都被传染了，都住进佛山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庞先生的表妹和舅妈因病情严重被送到重症监护病区救治。

经过同广州专家们的会诊和庞家最新出现的复杂情况，医院得出几个结论：这个病人及其家属先后发病，证实这种病传染性强；佛山医院已使用了多种抗生素，但效果都不明显；病人白细胞没有明显增多，病情引发原因很可能为某种病毒。医生建议用抗病毒药物对病人进行进一步诊治。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抢救，1 月 8 日，庞先生终于病愈出院，前后历时 44 天，此后，庞先生的亲属们也先后病愈出院，无一人死亡。

当时医院并不清楚庞先生的病因，在 SARS 病毒被正式检测出以后，有关方面对病人致病的病毒样本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与 SARS 病毒完全一致。至于庞先生如何患上 SARS，却是一个谜。刚开始医生怀疑是因为他在病前吃过名为“龙虎凤”（即蛇猫鸡）的一种广东“大菜”，但是其他和庞先生一起吃这道菜的人并没有出现相似症状。①

河源：2002 年 12 月 5 日，在深圳一家餐馆做厨师的 36 岁的河源人黄杏初感到自己全身发热、畏寒、无力，他以为自己只是得了小感冒，而当他把这一消息从深圳捎给在河源紫金县农村的父母时，他们则认为他也许撞了邪。后来，他的病情不断恶化，黄杏初回到老家，先是求助于村医，然后于 2002 年 12 月 15 日入住河源市人民医院。其症状是咳嗽、发烧、肺部有阴影，大夫怀疑感染不明细菌。12 月 17 日，病情加重，由河源市人民医院转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抢救。②

---

① 此处关于佛山的文字见唐贵江：《中国首例 SARS 病人还是在广东佛山》，载《新闻周刊》2003 年第 19 期，总第 133 期。

② 王海燕：《黄杏初，“非典”危机》，载《新京报》2004 年 1 月 4 日。

黄杏初被送到广州治疗后，河源医院曾为黄治疗过的9位医护人员先后有了“非典”症状，因此怀疑黄杏初的病具有传染性。2003年元旦刚过，从河源传来消息，曾经接触过黄杏初和另一名患者的多名医务人员出现同样的症状：持续高热、干咳、肺部大面积阴影。

12月15日，另一名与黄杏初的病情相似的病人郭杜程住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郭与黄的病征相似，都是畏寒、发热、咳嗽，他于17日转入深圳福田医院。

中山：2003年1月20日，中山市接到报告，当地三家医院先后收治15例病因不明但病征相同的病人，三家医院一共有13个医务人员被感染发病，中山市发现了20多例类似病例。第二天上午，省卫生厅派出了以广州医学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肖正伦为组长的专家组，以及先前收治过类似病例的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河源市人民医院的专家赶到中山市。1月21日由中国疾控中心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副主任王茂武带队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到广东现场指导。赴中山市的医学调查专家组得出明确诊断结论，认为不明肺炎就是“非典”型肺炎。

到2月上旬，广东进入发病高峰期。截至2月9日，广东省报告共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死亡5例。

二、广州：谣言恐怖，人心动荡[①]

12月27日，黄杏初病情好转。2003年1月10日康复出院。

但就在他转院后，曾经接诊过他的五名医务人员先后出现与患者相同的症状。于是，“谣言”随之诞生。谣言版本最早是这样的：河源受一种不明病毒袭击，已有一人死于此症，医护人员亦同时患上此病。谣言在迅速传播的同时，事件的表述还不断被夸大：给病人治病的医生和护士三人都已经死亡。

河源人恐慌了。当时河源遇上从来没有过的寒冷天气，可能正是这样

① 二、三节均主要引自王雷、刘有才：《广东肺炎谣言始末调查——从谣言发源到政府辟谣》，南方网—南方都市报，2003年2月12日。

才使一些人有了咳嗽、发烧等类似症状。这无疑更加重了市民的恐惧感。人们在河源各大药店门口排起长队。当时的人们虽然都涌到了药店，但是根本不清楚应该买什么药，只是跟风抢购一些抗病毒药品。有人一下子竟然买10多盒。不久，全城药店此类药品脱销，买不到药的人更加恐慌，直到晚上9时多药店关门还有人在排队。更有的家长赶着去学校将孩子接回家避“祸”。

从1月2日起，该市出现抢购罗红霉素的风潮，甚至有人专门跑到附近的城市甚至广州去买药。河源市市长黄煜祯在4日凌晨2时召集卫生、疾病控制等多个部门人员在自家的客厅紧急开会，几小时后，在市创优大会上专门辟谣，请市民不要听信传言。

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在当地的《河源报》上刊载声明，指出河源并没有发生流行病毒，希望市民不要恐慌，不要乱服药。

从1月16日开始，中山市“肺炎流行”的谣言蔓延开来，市民纷纷到药房购药用以防备，一些人一买就是几十盒。一盒普通的罗红霉素10多元一盒，好一点的则要28元一盒，大多数市民一买就是好几百元。中山市最大的药品连锁店“中继大药房”负责人说，16日开始，前来药店购买罗红霉素的市民便开始增多，17日达到高峰，其下属的八个连锁店有一半出现罗红霉素脱销的局面。

2月8日，一条手机短信在广州迅速流传：春节期间，从中山等地传入广州一种怪病，该病潜伏期极短，一天发病，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当天死亡。该病现在并无药物医治，已经造成多名病人死亡。最令人可怕的则是这种病的传播途径，只需和病人打个照面，或者是同乘了一辆公交车都可能被传染。更恐怖的说法是某医院的十几名接触过该病人的医护人员全被传染，上午得病，下午透视显示肺部全是白点，晚上抢救无效死亡。禽流感、鼠疫、炭疽等猜测，说得有板有眼，成为人们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的内容。

据广州移动通信的统计，仅8日一天，短信流量就达到了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谣言很快在社会上形成了市场。节后上班后，广州市场防感冒、抗病毒类药物异常走俏，各大小药店、医院、医

药公司和药厂的板蓝根制品和其他抗病毒类药品大都接近脱销。

与此同时，谣言的内容越来越多，传播的形式也各种各样，最通常的方式是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通知。

9日开始，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怪病的传言兴起，市面上已现抢购端倪。10日，抢购风达到高潮。平时一大包10元以下的板蓝根一下子飙升到三四十元，白醋价格也节节攀升，从10元至80元、100元。就在当日，有摄影记者竟拍摄到白醋1000元一瓶的照片。2月11日，广东官方正式面见媒体公布真相，承认广东当时已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并有5例死亡。

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网络这些现代化通信工具，并有好事者盗用卫生局、公安局名义发送短信，"郑重宣布"广州市发现不明病毒，无药可治。谣言从广州市向深圳、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其他地区蔓延，随后又向海南、福建、江西、广西、香港等邻近地方传播，其他省市也有传闻。

2月9日，卫生部派专家飞抵广州协助调查病因。前日，谣言达到顶峰。与广东省隔海相望的海南省首先作出反应。据媒体报道，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潘先海郑重表示，目前在海南省许多市县中传言有某种病毒从广东省传入，并在海南省许多市县引起抢购醋精或板蓝根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传言只不过是危言耸听，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密切监测有关情况，一旦有新的情况将及时公布。但谣言仍从海口一直蔓延到五指山、定安、屯昌、澄迈、三亚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引起了板蓝根、醋精及其他可以预防感冒的药品的抢购潮。在海口多家大药店，板蓝根已脱销，本来只有五元左右一包的板蓝根，价格竟可涨到100多元一包。甚至在东北的哈尔滨也有人打电话询问广州亲友的平安，并有商人要用飞机贩运药品到广州抢占市场。

社会上人心惶惶，到处打听消息的真实性。"南方都市报"共接到有关"非典"型肺炎病情的咨询来电2700多个，比日常增长10倍，综合这些电话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向"南方都市报"提供的病情信息有800多个；反映市民抢购有关药品的500多个；咨询、核实病情传染情况的有300多个；指责、抱怨"南方都市报"未及时报道的有1000多个。

很多读者认为，关于传染病的各种小道消息通过各个途径传播，报纸应该及早报道权威、真实的信息。还有读者说，香港报纸自从2月以来，在显著位置作出连续报道，10日《星岛日报》在头版以《珠三角爆夺命肺炎》为题，报道已有29人死于传染病，11日《东方日报》也在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了“夺命肺炎恐慌袭港”。

三、广东省公开辟谣

著名呼吸病专家、广东“非典”型肺炎医学专家指导小组副组长、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博士，应特邀到“南方都市报”做客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黄博士称，所谓“患上“非典”型肺炎8小时内就会死亡，现在已有好几百人死于该病”纯属谣传，市民不必惊慌，也完全没有必要花高价抢购白醋、板蓝根等药物和卫生口罩。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正式发布了疫情的有关消息。

2月11日上午10时，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对广州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情况向传媒作了通报。广州市副市长陈传誉、市政府副秘书长张火营则对近期社会上的一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代表市政府郑重地承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指导下，全市人民团结一心，广州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疾病的挑战。昨日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再次召开通报会，针对各种谣传进行澄清，请市民不要听信社会上的各种谣言，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苦恼和不便。佛山、珠海等地也先后召开了类似的情况通报会。

来自政府和权威医学专家的信息在社会上公布后，广州市民情绪开始安定，各药店秩序已经不像前天那么混乱。

一些看了“南方都市报”昨日报道的读者打来电话表示“看了省政府副秘书长和专家的说法，心里放心多了”。一名读者称，现在想自己这几天四处购买板蓝根真的很盲目。一些读者则说，此前传说广州及珠三角地区病情很严重，以至人心惶惶，昨日看了报纸和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后，才知道情况并不恐怖，经过一个多月的担惊受怕终于放心了。

广州市内的药店，药品价格已经不像前日那么混乱。高峰期100多元

一瓶的白醋价格正在回落。《南方都市报》的热线电话由2000多个锐减到500多个，很多还是感谢政府公布信息的电话。

谣言渐渐被抛弃，人们紧张的情绪开始渐渐稳定。

四、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疫区

1. “非典”从广东蔓延至港台、北京。

台湾：3月14日，台湾发现首例“非典”疑似病例。5月21日，台北市SARS通报病例今天再创新高，达64例。5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原来对台北市的旅游警告，扩大至全台湾。5月28日，台湾公布岛内SARS疫情最新数字，累计610例，已突破600大关；死亡病例新增5例，累计81例。6月4日，新增病例数首次出现零增长。

香港：2月12日，九龙京华国际酒店9层住进了一位64岁的客人刘剑伦——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这次来香港是为了参加亲戚婚礼，他在广州曾接触过200个以上的“非典”患者。13日，他出现呼吸道感染、发热等症状被送入当地医院。2月12日—3月2日期间曾入住或探访九龙京华酒店同一楼层的7个人先后被感染，这7个人中，3人来自新加坡，2人为加拿大人，1人来自内地，1人是本港居民。

其中一人入住了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病症特殊，被选做三年级医科生临床考试的题目，于是，多名监考老师及10多名医科生感染。3月10日，香港最大的两家电视机构——无线和亚视，同时播报一条消息：位于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透露，在过去的几天内，有10多名医护人员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并发现该病具有传染性。

至3月13日，全港患“非典”的医务人员增至115人。3月20日，“非典”传入社区，有5名年龄在2到15岁的少年儿童被证实染病。此后，“非典”迅速闯入办公楼、学校、公共场所，最高峰日增病例60例以上。香港医管局局长何兆炜也被感染。

据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结果，2002年3月上旬“非典”于威尔斯亲王医院爆发时，最少已有三个病毒源头同时存在本港，刘剑伦并不是“非典”在香港爆发的唯一源头，但香港疫情确实首先是在威尔斯亲

王医院集中爆发的。

3 月 11 日，卫生署公告，十分关注威尔斯亲王医院有员工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病征的事件，并着手调查。卫生署于次日称，50 名医务人员接受检查，其中 23 人出现发烧症状。

更大规模的感染出现在九龙湾淘大花园 E 座。起因是威尔斯亲王医院的一位患肾病的病人兄弟居住在淘大花园 E 座，该病人曾去过淘大花园四次。3 月 23—26 日香港“非典”感染增加人数达到最高峰，其中有 321 名病人来自淘大花园。3 月 17 日，香港感染“非典”型肺炎的人数增加至 83 人，包括多名医护人员。29 日，香港“非典”型肺炎病人的人数上升至 470 例，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香港当局采取了断然措施。3 月 27 日清晨 6 时，E 座被港府实行了隔离，任何人均不得离开或进入。3 月 29 日，香港当局决定各中小学及幼儿园自 3 月 29 日起停课，3 月 31 日宣布将淘大花园 E 座整座楼宇隔离 10 天。

澳门：5 月 10 日，当地政府宣布发现首例“非典”病例。

4 月 16 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正式命名为 SARS 病毒。该组织说，上述结论是来自全球 13 个实验室的科学家当天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之后得出的。

北京：3 月 5 日上午，中国军方最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 医院，突然接到 301 医院的紧急电话，称此前一天来该院急诊室观察的山西三患者病情怪异，怀疑是“非典”，需要转到 302 医院医治。山西患者即年仅 27 岁的山西女商人于某、于某父亲和母亲。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2 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发烧胸闷。当时于某没有在意自己的病情，回太原后感染了家人。3 月 8 日，于某的弟弟、弟媳妇、丈夫等另外五人发病住进了 302 医院。

大批医护人员被感染。最先倒下的是 302 医院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3 月 11 日，刚从抢救病房出来的传染病一科主任赵敏，出现高热，伴头痛和全身酸痛，拍片、血象检查：白细胞不高，胸片异常，证实已感染了“非典”。据调查，在收治北京第一例 SARS 病人期间，302 医院前后包括丁幼红、李林青、谢小健、张瑞新、李媛和许红新等护士在内共 15 名工作人员

被感染。

此后一个月之内，302 医院传染病病区的 40 余名医护人员中，有 30 多位感染或疑似感染。301 医院在最先收治山西于某时，有数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只是出现症状时间稍晚。

301 医院肝外科不久又无意中收治了 SARS 患者，导致肝胆病房两名医生、三名护士被传染。

3 月 15 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一名年过 70 岁、从香港探亲回家的李姓患者。后来，李姓患者被称为北京毒王。由于最初医院不知情，没有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结果造成该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其他 SARS 患者还在不断涌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至 4 月 23 日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达到 80 名。

3 月 17 日，李某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结果在该院又造成大面积污染。一周之内，东直门医院包括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在内的 11 名参与过救治的医护人员，全部感染 SARS，其中急诊科医生段力军和一名护士不幸殉职。李某因年事已高，病情过于严重，也在 3 月 20 日不治身亡。

3 月下旬，东直门医院和北大附属人民医院部分受感染的医护人员，转到北京地坛医院治疗，造成那里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截至 5 月 12 日，北京地坛医院，有 5 名医护人员感染。

北京佑安医院医护人员的感染，则与北京的第一例 SARS 患者相关。

3 月 12 日，于某的一位 50 多岁亲戚发病后，被北京急救中心派车送到北京佑安医院，导致佑安医院至少有 12 名医护人员感染。

4 月上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病时感染“非典”，回家不久便出现发热症状。4 月 8 日，家人将他送到北大第三医院急救，10 个小时之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但遗憾的是，北医三院向北京市有关部门请示，患者最终未被确诊为“非典”。死亡诊断书上写着：呼吸衰竭、肺炎。“非典”瘟神如飓风狂扫，所经之处，一扫而光。曹教授的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六人先后发烧入院；在曹教授儿子工作的中财后勤集团，六名员工相继病倒；而曹家所住的中财西

塔楼住户中十几人也纷纷病倒。到4月28日为止，仅包括曹教授在内的中财教工有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其中两人死亡。

病毒蔓延到北方交通大学（现名北京交通大学）。交大计算机系2002级的孙某4月1日在军训时得了感冒，之后多次到医院治疗。4月17日，他被确诊为“非典”。到4月18日，其隔壁宿舍又有八人发烧。到4月19日，该楼12层一个宿舍出现发烧症状。到4月20日，人数骤增至20多人。到4月25日为止，一共出现了65例发烧者，确诊10例，疑似9例，分布在不同的楼层，可能是电梯感染。

2. “非典”成了全球的恐怖，中国俨然成为生存的禁区。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像“非典”这样高传染性的疾病很快就传播开来。

越南河内：到2003年6月底为止，总计出现63名“非典”患者或疑似“非典”患者，共有58人治愈出院，其余5人死亡。

新加坡：到6月底，总计出现206例“非典”患者或疑似“非典”患者，共有170人治愈出院，31人死亡。

3月17日，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斯洛文尼亚、以色列、德国相继报告发现怀疑感染个案。

6月11日，多伦多“非典”病毒感染者已达73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日内瓦时间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6月9日下午2时，席卷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SARS疫情，已经导致全球累计临床报告病例8421例，其中中国内地5328例，占63%；全球死亡病例784例，其中中国内地340例，占44%。

中国已然成了“非典”的发源地，一向在世界上具有神奇魅力的东方古国瞬间成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国家！

2003年3月2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社论呼吁“全球隔离中国”，以逼迫北京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华尔街日报》说，“非典”型肺炎（又称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不是北京第一次把问题“扫到地毯底下”，佯装没事的传染疾病，它处理民众输血感染艾滋病已有往例。《华尔街日报》说，隔离中国这个大的国家，当然会对个人与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可是，不这样做的代价是不是更高，这是大家必须衡量的问题。《纽约时报》报

道，从中国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持续扩散，同时也从香港到全球各地产生经济冲击，打乱了复杂的供应链，并迫使航空、金融等行业紧急调整作业方式。报道说，瑞士的UBS银行下令从亚洲回到欧洲的员工，先在家里休息10天，再到公司报到；晶片巨擘英特尔公司取消了通常在亚洲举行的重要会议；荷兰皇家航空KLM说，这个高度传染性的神秘疾病对全球航空业的损伤力，比伊拉克战争还大。它说，世界卫生组织有史以来首次因某一地区的传染病发布旅行劝阻警告，预料将进一步对全球工商服务业造成阻扰效果。2003年4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由于担心目前在亚洲多个城市肆虐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扩散，美国政府决定将香港及中国广东省的“自愿撤离计划”扩展至中国全国的四个使领馆。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政府将支付一切所需费用，容许美国驻中国的所有非必要外交人员及家眷自愿离开中国的岗位返国。

3月中下旬，广东和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疫区。事态发展得太严重了！可惜中国有关部门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3.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初期的失误。

由于“非典”是一种在当时的临床医学上还没有发现的新传染病，因此在它发病的初期没有引起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足够的重视，因而一度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也给后来的防治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当时中国的各级政府在“非典”问题上的认识过程吧。

2003年1月5日，广州《新快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吴一龙教授。吴一龙教授表示，“非典”型性肺炎根本不是什么大病，只要对症治疗，患者连住院都不用就可以痊愈。

从2月18日开始，广东地区所有关于疫情的报道基本消失，这无疑也是为在北京召开两会制造良好的氛围。19日，广东省雷于蓝副省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和本报记者采访时，充满信心地说：“现在“非典”型肺炎病情已基本被控制，广东省委、省政府有能力迎接各种突发事件的挑战，并取得最终的胜利。”3月14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没有证据显示香港目前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是由广东传入的。

3 月24 日，世界卫生组织透露，从今年2 月1 日至3 月22 日，除中国内地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病例累计达386 例，其中11 人已死亡。

2003 年3 月25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称，“非典”型性肺炎自去年11 月以来已得到有效控制。针对某记者关于香港卫生署证实一个香港旅行团到北京旅行而感染上“非典”的提问，他表示一个旅游团到北京之后就感染了“非典”型性肺炎，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如果发生类似状况的话，中央政府一定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疾病蔓延。

3 月26 日，北京市卫生局介绍，今年3 月以来，北京市接收转院来京治疗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共8 人，其中3 人救治无效死亡，其余已基本痊愈。有2 名医护人员也发现有类似症状，已及时隔离治疗，病源没有向社会扩散，本地没有发现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病例。

4 月1 日，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刘建超指称，SARS 疫情在中国大陆“已获有效控制”，大部分感染的病人都康复出院，目前除了在广东，只有北京市与山西省传出病例，其他省份都没有。他并说，SARS 目前并未列为中国大陆国家级传染病，因此相关疫情报告是由地方负责，目前各地方政府正在整理，近期内会公布。但各国记者对刘建超的答复并不满意，质疑中国大陆“隐匿疫情”，提出“何时公布疫情”的要求。

4 月3 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3 月31 日，共报告“非典”型肺炎1190 例。张文康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张文康说，世界卫生组织已取消了北京作为疫区的通报，其原因是眼见为实。

4 月4 日，鉴于一些国家政府就中国“非典”型肺炎发出旅游劝诫，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在外国（地区）驻京旅游及民航企业代表处人员参加的吹风会上说，截至目前，中国国家旅游局没有接到一例旅游者感染上“非典”型肺炎的报告。

与此同时，广州的解放路、越华路、东风路、人民公园等公共场所，

被政府部门安排在这里的公安与治安人员不断拦截戴口罩的市民，说中国政府已经对“非典”型肺炎采取了可靠的控制措辞，市民只要注意洗手和饮食卫生，及时发现治疗不会死人，甚至要求戴口罩的市民脱去，丢进现场设置的塑胶袋里。

4月6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作为北京市的卫生局长，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北京不存在“非典”型肺炎流行问题。”该会上还宣布国际劳工组织官员派克·阿罗患“非典”在北京去世。阿罗3月23日搭乘泰航班机抵京的，3月28日出现发热、干咳，即去诊治。4月2日由国际救援中心以怀疑“非典”型肺炎转入北京地坛医院。4月3日病情加重，确诊为重症“非典”型肺炎。

4月8日，卫生部公布疫情，截至4月6日，北京发病19人，死亡4人。

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通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报告是可信的，他还强调了一个概念，北京公布的22例“是现在能够确诊的病人”。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也解释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把“非典”型肺炎诊断分为诊断病例、疑似病例和医学观察的对象。”当日，在另外一个公开会议上，北京市官员说，北京市完全没有学生确诊为SARS病例。

4月10日，北京市长孟学农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时说：“对于1300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12日，孟学农在会见北京国际公路接力赛部分参赛国代表时说，北京第一例SARS发生在3月1日，这与张文康所说第一例发生在3月18日相距太远，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更加重了国内外人士的极大猜疑，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府的疫情报告。

于是，关于北京已经发生严重疫情的消息以流言的方式到处传播，清华大学BBS上出现了两篇文章，一则称北京联大商务学院一名学生和三里屯某小学一名学生患病，随后所在班停课，一时间，社会上各种传言沸沸

扬扬，甚至说好多医院的病床已经住满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陡然下降，这是对刚刚诞生的新一届政府的严峻挑战！

五、中国政府勇敢面对、积极抗击

个别部门隐瞒病情的可怕后果，被301医院72岁的蒋彦永医生深深洞悉了，4月4日晚，他给CCTV和凤凰卫视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子邮件，就张文康“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的公开报告，表示了直截了当的否定，首次公开披露了301、302、309医院收治“非典”病人的大致情况，告诉了令人震惊的数目字：302医院在对该病人诊治过程中就有近10名医生和护士被传染了，301医院肝胆病房有2名医生、3名护士被传染上此病，309医院已经收治近40例SARS病人，到昨天已有6人死亡。蒋彦永的信很快在网络上公开，国内外媒体纷纷对之采访。蒋的身份和公开的方式，以及内容的有根有据使得国内外对北京疫情的严重性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当然也给中国政府的最高层以相当的震动。

国际上开始对中国予以新的关注，采取新的措施。

4月8日开始，马来西亚加强了对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越南、中国台湾及加拿大游客的旅游限制。泰国则宣布对自中国归来的人隔离两周。

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报告说：“其他卫生体系不够完善的省份，无法像广东那样迅速和有效地面对SARS的挑战。比如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病例，接触跟踪体系存在问题，无法系统执行。这将导致疾病的扩散。”

两天后，世卫组织再次将北京列入疫区。

看来，面对“非典”这个传染性极强的病魔，某些部门企图通过静悄悄的方式来歼灭它只能加剧形势的恶化。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心打一场科学的人民战争，来消灭这个恶魔！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紧急出台：

1. 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抗非前线，认真布置抗击“非典”工作。4月13日下午，国务院在京首次就“非典”型肺炎召开专门会议。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预防、治疗和控制“非典”型肺炎，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他承认，“非典”型肺炎对我国旅游、交通、商贸和对外交往等活动造成的暂时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要正确对待，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

4 月1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考察广东省疾病预防中心时指出：“当前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好。”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来到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上，有关方面未来得及任何清场行动。他言辞殷切地对在场人员说：“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回到北京后，他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不得缓报、瞒报”疫情。同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卫生部关于建设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问题的汇报，确定了当前要抓紧的几项工作是：制定相关行政法规，从法律上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运行；建立应急指挥系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行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等。

4 月26 日中午，温家宝一行在北京大学农园食堂里与北大学子共进午餐。“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温家宝三次郑重提到了这八个字。从4 月12 日到5 月6 日，温家宝先后五次视察北京防治“非典”的工作，他的身影出现在医院、工地、商场、街头和幼儿园、中学和大学校园。在短短10 多天的时间里，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相继出现在重点地区，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使全国上下能够齐心协力，共同抗击“非典”。

2. 惩治失职官员。4 月20 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党内职务。4 月22 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接受孟学农辞去市长的请求，由王岐山代北京市长。4 月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长职务，由吴仪副总理兼任卫生部长。市纪委、监察局发出《关于严明纪律，确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规定，凡擅离职守、临危退缩的共产党员，一

律开除党籍。5 月3 日，北京中医院对因害怕“非典”传染而擅自离开岗位的一名共产党员护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同时与其解除聘用合同。截至5 月8 日，全国15 个省市已有120 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为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惩处。

3. 建立每日疫情报告制度。2003 年4 月20 日，在卫生部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新任常务部长高强对卫生部和北京市进行了批评。他说：“卫生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不足，防疫体系比较薄弱，当“非典”型肺炎疫情出现后，没有及时对全国的疫情制定统一的收集、汇总、报告制度，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得力。”而北京市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的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因此，决定自4 月21 日起将疫情由过去的五日一报改为一日一报。

这次会上还透露，截至4 月18 日，北京已经确诊“非典”患者339 例，而4 月14 日有关部门宣布的数字为37 例。此后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不断飙升，21 日，确诊病例143 例，疑似病例610 例；22 日，确诊病例106 例，疑似病例666 例；23 日，确诊病例105 例，疑似病例782 例；24 日，确诊病例89 例，疑似病例863 例；25 日，确诊病例103 例，疑似病例954 例。

虽然飙升的数字令人担忧，但是，老百姓心里有底了，他们相信一个敢讲真话的政府是一定有能力战胜一切困难的；国际上虽然视中国为旅游禁区，但中国政府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使他们对中国所持的态度是同情的、友好的，积极协助中国战胜“非典”。截至6 月5 日，国际机构和外国政府给中国的各类无偿援助金额（含承诺金额）约3802 万美元。

4. 设立定点医院，建立严格的防治制度。4 月19 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召开全市医院院长会议，他要求：北京各医院对具有“非典”症状的患者必须实行首诊负责制，决不能以任何理由拒收患者，否则将坚决追究责任。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定点医院。4 月21 日，北京确定首批六家“非典”定点医院，并不断地增加其数量，到后来连宣武、中日友好等三级甲等医院都列入定点医院。4 月28 日，中央军委批准，从全军各大单位紧急

抽调1200名医护人员支援北京组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5月1日，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正式竣工启用，首批156名患者顺利入住。该医院是全国最大的“非典”定点医院，占地122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1000张病床。天津在海河设立“非典”定点医院，浙江设立13家，江苏达到82家，而湖南则设立了25家。

4月27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北京全面建立“非典”患者的社会救助机制。北京暂停娱乐场所经营，并开始公布各区县疫情和隔离区信息。4月28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非典”患者密切接触人员医学观察的通告》和《关于加强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力图隔绝传染源。5月7日，北京所有确诊“非典”病人全部转移到16家定点医院，实现了确诊患者随诊随收，集中治疗。

5. 加强药物研究。战胜“非典”病魔，要有勇气、有胆识，但更重要的是靠科学，靠对症的药物来治疗、预防。在这方面，中国政府舍得投入，科技人员敢于拼搏，在短时间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抗“非典”科技成果。4月14日，卫生部、科技部紧急筹措1000万元实施“非典型肺炎防治紧急科技行动”。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成立了专家组，陈为宪教授挺身而出，大胆提出ABC设想，将病人分为三组分别实施三种不同的治疗方案，然后将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后再行确定。其中一组在用药第二天、第三天后症状明显减轻，肺部病灶开始消散。新的治疗方案诞生了。随后，一个又一个治疗规范、管理制度相继出台。4月12日，广州市“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病原学及临床诊治课题组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极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病因。

16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成功完成对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17日，卫生部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广州市疾病控制中心成功建立荧光定量PCR快速检测冠状病毒新技术。

19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研制出一小时就可确诊“非典”

的快速检测试剂盒。

5 月 26 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已成功过滤出“灭活的“非典”型肺炎冠状病毒分子”，并将以此作为疫苗试剂，在动物身上进行测试。28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非典”型肺炎疫苗研制工作进展顺利。专家认为，如不出意外，今年 10 月底前国家有望批准其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6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和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正在研制的 SARS 基因疫苗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将新研制的四种 SARS 基因疫苗注入实验小鼠体内后，研究人员成功地在实验小鼠体内检测到了“非典”抗体。

6 月 12 日，山西省卫生厅防治 SARS 指挥部确定了山西省中医药治疗 SARS 的三个研究课题：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牵头的中药治疗 SARS 临床治愈后肺纤维化的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山西省人民医院牵头的益气清热中药对 SARS 预防及早期治疗的临床观察；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牵头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SARS 患者生存质量与生存时间的序惯实验。

6 月 13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中西医结合治疗 SARS 临床研究特别专项”课题进展汇报会，两批 13 个课题进展顺利，中西医结合治疗 SARS 患者效果明显。

6 月 14 日，一种能够在“非典”病区代替医护人员部分工作，且百毒不侵的抗“非典”助手机器人研制成功。17 日，总投资达 15.2 亿元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建在昌平百善镇。18 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国家中药二类新药“痰热清”注射液在上海投产上市，这种中成药注射液同时也被上海市防范“非典”重要物资协调办公室列入上海市抗“非典”新产品试用项目。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举行的抗 SARS 攻关新闻通气会上透露，该院药物研究所和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左建平、杨以阜研究员等发现单一化合物 ZZ-1 和民间复方中药“解毒丸”具有明显的细胞水平对抗 SARS 病毒。

6 月 20 日，我国在 SARS 病原诊断方面获重要进展。解放军 302 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副主任王海滨带领课题组经过日夜攻关，近日研制出灵敏性较高的冠状病毒 RNA 荧光定量 PCR 诊断方法。经反复测试，SARS 病人发

病当日即可从血浆和淋巴细胞中检测出冠状病毒 RNA，发病一周内的检测阳性率为80.9%。

6月29日，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彭景楩研究员主持的"SARSDNA疫苗的构建与免疫预防和治疗SARS效果研究"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率先构建并表达成功8个抗SARSDNA疫苗。6月30日，我国第一个用于治疗肺纤维化的中药复方鳖甲软肝片日前获准进入Ⅱ期临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这一重点研究课题证实，该中药治疗SARS疫毒未清、气阴两伤、瘀血阻络所致的肺间质纤维化，具有肯定的效果。中日友好医院借鉴国外用一氧化氮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经验，将一氧化氮用于治疗四名"非典"重症患者，使病人的呼吸窘迫综合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7月25日，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近期内，由政府资助的"非典"科技攻关研究确定了三个重点：一是查清病源和认识传播规律，为切断传播途径、控制疫情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二是加紧特异性强、灵敏、快速、准确的早期诊断技术和试剂的研究开发，为病毒检测和临床诊断提供可靠的技术手段；三是加速疫苗和有效药物的研制开发，为实现"非典"型肺炎的有效预防和治疗提供保障。

正是靠广大医学科技工作者的艰苦探索，正是靠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将绝大部分"非典"患者治愈，将来势汹汹的传染病流行消除了。截至2003年6月底，中国大陆总计出现5326例"非典"患者或疑似"非典"患者，共有4895人治愈出院，347人死亡。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型传染病，能取得如此的成绩，实属来之不易！

6. 充分保障物资供应。抗击"非典"，必须有充足的防治药品，还必须有足够的食品。4月中旬之后，由于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群众的大量购买防治"非典"相关的商品，也有一些生产经营者趁机抬高价格，导致这些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尽管各地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上涨的势头仍未得到控制，并呈进一步蔓延趋势。一些重点城市出现了防治"非典"物资紧缺的情况，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有人为了阻止"非典"传播擅自进行封锁，拦截过道车辆，甚至把道路也给挖断了。

4月23日，北京出现了局部的抢购风潮，很多超市的货架上米面油被一抢而光，连方便面都断货了，消毒液、消毒纸巾告急。

政府紧急调集资源，采取对策。4月21日，发改委会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务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药材集团公司等部门和单位，组成防治“非典”医药用品协调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发改委经济运行局，负责“非典”医药用品的生产组织、物资供应、运输协调、市场监测、指挥调度、调剂余缺、信息汇总和解决其他有关问题。

在北京发生抢购风的第二天，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出现在北京崇文门菜市场。他说，商务部已经采取五项措施，确保基本生活物资和防治“非典”型肺炎重要物资的市场供应。其中就包括成立防治“非典”重要商品、药品供应调控指挥部，商务部部长吕福源亲自挂帅，副部长张志刚担任副组长，以加强对相关工作的领导和统一指挥。全国重要物资“购、销、存、价”信息及监测调控系统也相应建立。张志刚表示，政府有充足的预备库存，用来调控市场。这些基本生活物资包括米、面、油、肉、盐、糖、蛋、菜和口罩、药皂、消毒液共11大类商品。同时，老百姓通过媒体报道得知，大批生活物资和防治“非典”物资正从各地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北京抢购风停止了。

自4月21日到5月初，国家发改委在全国组织开展了防治“非典”药品和相关商品市场价格专项检查。据不完全统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查处哄抬价格等违法案件2.62万起，实行经济制裁金额3220万元。到5月7日，全国大部分地区防治“非典”药品和相关商品价格已经出现回落，市场价格趋于平稳。随后，发改委宣布调整国债资金投向，追加8.126亿元专项资金，用来加强抗击“非典”等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并在年内建成省、地、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自抗击“非典”以来，国家发改委已安排专项投资15.5亿元用于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网络的建设。

7. 实施及时隔离措施。面对流行病，阻止其蔓延的重要措施是隔离病原体。因此，中国政府决定，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是什么人，只要发

现有疑似症状，或者与“非典”患者有过接触，就立即强制隔离，故意传播者要负刑事责任。政府的这一决定可以说是果断、彻底，雷厉风行。

4月24日，西城区决定于此日零时起对人民医院实行整体隔离。这是全市第一家实行整体隔离措施的单位，同时宣布北京市中小学开始停课两周。4月25日，对涉及集体感染的北方交大、中财大学家属楼、宿舍楼实行隔离控制措施。北京科技研修学院两座公寓楼和东城区京港101号工地也被隔离。

其他各省市也是如此，农村对于从疫区回乡的村民都实行严格的隔离，有的连村庄都不让进。各种公共运输工具——汽车、轮船、飞机、火车，各种公共场所——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港口，都实行严格的消毒，对乘客进行体温检查，凡发现可疑者，立即隔离。

这种严格杜绝传染源的做法，虽然有时也做得有点过分，但的确非常有效，最大程度地杜绝了传染源。

在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民众齐心协力的战斗，“非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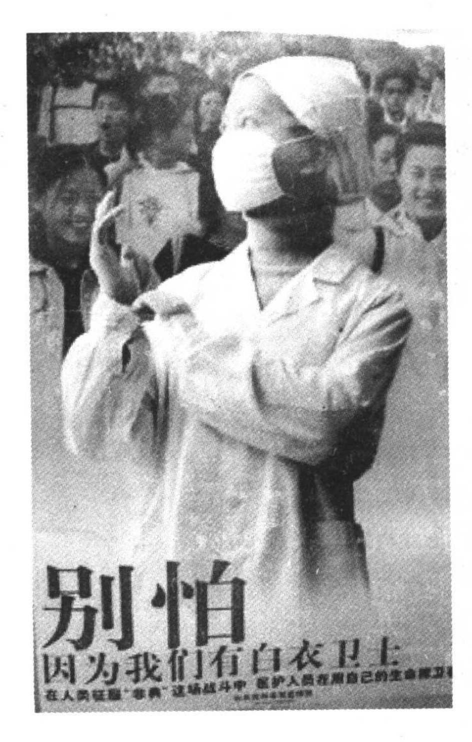
被隔离的楼房

终于屈服了。

5 月23 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取消因“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的香港和广东采取的旅行警告。5 月29 日，北京新收治“非典”确诊病例首次为零。5 月30 日，北京市宣布：北京防治“非典”“五月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5 月31 日，北京定点医院数量从16 家减少到7 家。6 月8 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记录。6 月9 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新向社会开放。6 月13 日，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从13 日起解除对中国天津、山西、河北和内蒙古四省区市的旅游限制建议，并将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北、广东、陕西从其“近期有当地传播”的名单中删除。6 月19 日，北京绝大多数医院恢复正常医疗秩序。

6 月20 日，北京小汤山医院送走了最后18 名治愈患者。小汤山医院共收治680 名“非典”患者，672 名痊愈出院，8 人死亡，治愈率超过98.8%。1383 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6 月23 日，北京住院“非典”确诊病例仅剩46 人，已经达到世界卫



抗『非典』宣传画『我们不怕』

生组织对一个地区撤销旅行警告所需条件之一“住院‘非典’病人少于60人”的标准，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为了战胜“非典”，北京市、区两级财政共投入10.0654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海内外捐助的钱和物资，而全国各级财政共耗去资金100多亿元人民币。

但中国毕竟胜利了，而且花的时间还这么短！实践证明了中国政府是合格的，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是崇高的，中国民众是伟大的！

点评：

盛行于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流行病，造成了建国以来罕见的举国恐慌，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导致了建国以来唯一一次对一种急性传染病进行全民大动员、举国大围歼、全社会大隔离的重大行动。这场“非典”疫情，使得中国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国民众思考更多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转换问题。

一、“非典”事件的处理经过，充分地反映出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应急能力，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2003年4月中下旬，当中央政府决定对“非典”采取严厉行动之时，内地“非典”感染者总数已超过1800人。在有效治疗药物不清、致病病毒来源不清等背景下，面对“非典”这样传染渠道极其便捷、传染速度极其迅速的疾病，无论是一般的中国民众，还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于在13亿人口的大国里能否迅速、彻底地控制疫情，都没有多大的把握。在“非典”疫情已经彻底消除之后的当年9月，我国一个中央机关的一些人员到国外访问时，外国朋友很惊讶地表示中国怎么这么快就消除了疫情，甚至对其真实性都表示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应对“非典”的功绩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这个判断的正确性可以充分体现在“非典”事件的处理上。第一，集中统一的领导制度，使得抗非时，全国一盘棋，上下

齐动手，有限的资源集中使用；第二，严明的纪律能够迅速、认真地得到贯彻；第三，享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使全国的民众面对困境时能够凝聚成同一种力量，奔向同一个方向。在抗非的实践中，中国政府工作作风的雷厉风行，措施手段的有效得当，方法步骤的有条不紊，充分体现出中国政府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有很强的应急能力；同时，在抗非过程中全国民众对各种纪律的认真遵守，对于政府号召的积极响应，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二、“非典”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也告诉人们，知情权对于广大民众是多么的重要，政府满足民众知情权的程度如何对于体现其执政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当“非典”在河源开始发生时，由于医务人员的感染，使得该病的恐怖性开始流传，但官方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惯性思维出发，虽然作了一点解释，但更多的是辟谣。如果医务部门能悄无声息地将此疫病消灭了，当然是万事大吉了，问题恰恰是疫情越来越扩散，很快波及到广州、香港、北京，甚至国外。而在此时，我们的媒体缺乏、甚至一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相关的客观报道。须知，对于事关每个人生命安全的烈性传染病，只要有一点风声，就会很快地传播开来，更何况现代的信息传播是如此的迅速、多元、便捷。地方政府一开始承认有，但危险性很小，随后是长时间的全国性的公开沉默，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有关部门承认北京有疫情，但对感染者数字一直刻意隐瞒，且前后不一致。那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国际方面，还是国内方面，对于北京“非典”疫情了解的渴望都达到了无法排解的程度。当时在政府部门召开的公开会议上，“非典”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以致我们的政府官员到了疲于应付的状态。政府的这种闪闪烁烁、前后反复的做法，使民众感觉到其中大有问题，政府不可信。求生的本能使他们只寄希望求助于自身的力量，于是谣言四起，混乱开始发生。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采取了公开信息的做法，其后果的严重性真是难以预料。其实，只要公开事实，满足公众合理的知情权，民众反而安静下来了，积极地配合政府的布置安排。在中央处分了对隐瞒疫情有直接责任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每天公布疫情后，国内外对中国政府的反映越来越好。

当然，政府有关部门和负责人采取隐瞒疫情的做法也并非是恶意，甚至可以说是善意。他们担心公布真相，会影响外国人到华旅游、投资、学习，影响到国内的生产生活，希望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来说，是对民众的思想觉悟水平、应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等估计不足，认为民众一旦知道了真相，就会出乱子。中国的政治传统是政府习惯于为民做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普通民众实现了政治上的翻身，但由于总体的文化素质不高，所以一些地方的领导人还是有意无意地习惯于替民做主，总觉得只要我的用心好就可以了。事实上，一方面中国民众的总体文化水平比解放前有了不知多少倍的提高，另一方面现代政府管理的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实需要也吸引着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更何况“非典”是跟每个人的生命安全直接相关，每个公民要求知情是很自然的。政府如果硬是要剥夺民众合理的知情权，那么就不得人心。作为一个现代民主政府，其执政能力的高低不是体现在如何向公众隐瞒知情权以为自己所用上，而是体现在如何最大化地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而获得民众的支持上。很明显，没有哪个文明国家的民众希望自己的政府总是向自己隐瞒知情权。相反，他们最希望的、最欢迎的是自己的政府能向他们讲真话，获得合理的知情权。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加强当然不是简单地加强国家的专政职能，而是在全球化、民主化浪潮不可阻挡的背景下，如何转换执政方式，以继续获得民众的拥护、爱戴，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扩大民众的知情权无疑是我们党转换执政方式的重要内容，有了知情权的民众才有可能真心地与政府合作，才有可能架构真正的和谐社会。

三、“非典”事件也向中国提出了如何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非典”初期，由于中国医学界对于病理、病源不清楚，而导致病情扩展到国外，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世界各国也都能够理解。到了2003年3月份，国外“非典”已然出现多起、中国香港每天以几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之时，我国不仅政府有关部门不积极主动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甚至媒体也少有报道，更遑论真实的报道了。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对中国个别地区采取了疫区警告的3月中下旬，依然没有引起一些部门足够的重视，而是采取了近似智斗的

策略，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解除疫区警告的成就。如果不是蒋彦永大夫的公开信的揭露，如果不是外国人因“非典”致死，如果不是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宣布北京为疫区，我们的一些部门可能还不会很快地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防治“非典”。幸亏中央政府发现了问题，开始高度地重视，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中国一向是个讲信用、负责任的国家，凡我国承认的国际公约内容，我们都严格地遵守。但此次“非典”由于疾病的起因难查，由于个别部门的疏忽大意、信息收集不畅，导致我们的所作所为不积极，在国际上留下很不好的印象，似乎是中国最高当局刻意隐瞒疫情，给世人一种不负责任的印象。这一教训很值得吸取。外交无小事，一个国家形象是一件一件小事积累而树立起来的。凡是容易引起国际关注的问题，无论大小，我们都要认真谨慎地处理，免得无谓地损坏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

四、“非典”事件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从“非典”的起因来看。虽然目前医学界对“非典”起因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生产力，过度地开发、利用自然界是肯定有关联的。我国有科学家从果子狸身体内发现了“非典”病毒，而广东一些地方以其为美味佳肴，这至少说明果子狸具有“非典”元凶的嫌疑。人类大量捕食野生动物就是在破坏人与自然界的平衡，就是过度重视人类自身发展、与工业化时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行为；第二，从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在“非典”流行初期的所作所为来看，为什么那些部门不敢公开报道？主要是怕影响经济发展。结果呢，养痈成患，使我们受到了更大的损失。通过“非典”事件，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必须统一起来，甚至有时为了社会发展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暂时减缓或停止经济发展。

五、“非典”事件的处理过程，也说明应对重大的具有全局性的突发事件时应依法治理。为了战胜“非典”，中国仅用一个月时间制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并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将SARS

（非典）正式列入传染病管理，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还紧急出台了一些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保证抗非期间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于组织各种必需的资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说明，依靠法律来应对突发事件是很有效的，因为它的权威性高、透明度高，操作方便，时效性长。

正是有鉴于"非典"的经验教训，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它标志着我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形成，对于我国科学应对类似"非典"这样的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程美东　执笔）

安徽阜阳假奶粉事件

一、假奶粉喂出“大头娃娃”

自2003年5月以来，安徽阜阳农村陆续有100多名婴儿因为食用了劣质奶粉而患上怪病。这些本来健康出生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变得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婴儿的脑袋显得偏大。当地人称这些孩子为“大头娃娃”。截至2004年4月，仅阜阳市人民医院就已经有10名婴儿，因为这种怪病而夭折。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揭开这个黑幕的重要人物是一个叫高正的青年人。

2003年10月，高正刚满九个月的外甥由开始发烧、拉肚子，突然发展成腹部肿胀。送到阜阳市人民医院时，孩子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脸色如灰，脸肿如球，随时有生命危险。经过检查，专家最后确诊婴儿患的是营养不良综合并发症。而在此之前医院已经收治了几十个类似的婴儿，全是喝劣质奶粉引起的，有的已经死亡。经过治疗，高正外甥的病情有所好转，然而因为劣质奶粉长期侵害，给孩子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身心发育受到很大影响。四万多元的治疗费用，高正已经无法负担，当他听说有十几个婴儿因为发现不及时和没钱治疗过早夭折时，高正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恨，走上了维权之路。高正在认真研究了《中国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后，自己写投诉书，他最先来到太和县12315投诉站。2003年11月，高正又向太和县消费者协会投诉，提出49.14万元的赔偿要求。然而经销商承认卖了假货却坚决不赔偿婴儿的治疗费用。2004



假奶粉“喂出”的大头娃娃

年春节后，消费者协会终止调解。从2003年11月份到2004年3月份，历时几个月，高正找了好几个部门，投诉都不顺利。无奈之下，他开始向当地媒体反映。3月上旬，当地报纸、电视台先后报道了这一事件，引起轰动，但许多人对赔偿数目议论纷纷，认为索赔过高。此后，又有省内外几十家媒体前来采访，在全国引起关注，更多的假奶粉被曝光，更多的大头娃娃被发现。[①] 阜阳等地劣质婴儿奶粉事件曝光后，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2004年4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温家宝总理随后再次对此事作出重要批示。22日上午，国务院召开会议，部署了有关工作，很快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组成的专项调查组先后奔赴阜阳。经对阜阳当地2003年3月1日以后出生、以奶粉喂养为主的婴儿进行的营养状况普查和免费体检显示，因食用空壳奶粉造成营养不良的婴儿229人，其中轻中度营养不良的189人，与此同时，其他出现毒奶粉的地方也展开了类似调查行动。经国务院调查组核实，阜阳市因食用

---

① 唐哲：《揭开假奶粉黑幕第一人》，人民网，2004年10月18日。

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共计12人。其中，阜阳市政府先前公布的13人中，3人分别死于其他疾病，本次又新核查出两名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导致营养不良而死亡。导致这一严重后果的直接原因就是食用劣质奶粉出现营养不良，从而继发疾病。而且，阜阳市两位工商所副所长在接到一起投诉后，明知经销商销售劣质奶粉导致一位婴儿死亡，却因接受了吃请、贿赂而违法调解、罚款了事，不调查、不上报、不移交司法机关，且在即将案发时伪造材料，隐瞒事实真相，造成了严重后果。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徇私舞弊将其刑拘。[①]

二、如花的婴儿枯萎了

根据国务院调查组通报阜阳劣质奶粉初步调查结果，在阜阳市场上销售的205个奶粉品种中，当地政府共检测出46个不合格生产厂家的55种奶粉。除两家没有生产单位以外，其他生产厂家分布在八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合格原因大部分是蛋白质含量不达标，其中蛋白质含量低于5%的有31种，最少的含量仅为0.37%。劣质奶粉是用淀粉、蔗糖等价格低廉的食品原料全部或部分替代乳粉，再用奶香精等添加剂进行调香调味制造出来的，婴儿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远低于国家相关标准，但没有发现铅、砷等有毒有害物质超标，也没有检出激素成分，基本排除受害婴儿受到毒性物质侵害的可能。食用这样的奶粉，对于一个新生的孩子来说，每天就像在喝一点放了糖的白水，长期食用这种劣质奶粉会导致婴幼儿营养不良、生长停滞、免疫力下降，进而并发多种疾病甚至死亡。经初步调查，阜阳市查获的55种不合格奶粉共涉及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家企业，既有无厂名、厂址的黑窝点，也有盗用其他厂名的作坊，还有证照齐全的企业。这些劣质奶粉主要通过郑州万客来市场、合肥长江批发市场、蚌埠市太平街新市场、阜阳元丰市场等批发市场和生产厂家批量购进并批发到各县（市）、区的奶粉经销商、超市、百货商店、日杂店和行政村的小卖部，销售范围主要是阜阳

① 《国务院查清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新华网，2004年5月17日。

市各区县的乡镇和农村市场。

2003年8月7日，出生仅123天的荣荣被送进阜阳市人民医院，由于严重的营养匮乏，肝肾功能已经呈现重度衰竭，并发肠源性皮炎，身体出现局部溃烂，她的父亲回忆说："当时去医院，血管找不到挂不了吊针，头皮里边全都是水，越挂吊针，头皮越大。"2003年8月13日，荣荣不幸夭折。

4月11日，阜阳市人民医院。出生刚满百日的女婴徐汉菁躺在奶奶的怀里双目紧闭，嘴巴和鼻子凹陷于过于肿大的脸庞中。

小汉菁不知道，在出生后的100天里，她实际上每天都在向死亡线飞奔。就在即将撞线的瞬间，人们拉住了她，千方百计捡回了这条命。

这一番生与死的搏斗已经持续了10天。4月初，小汉菁的父亲徐同然抛下等着拾掇的庄稼，带着全家赶到阜阳。此时，徐汉菁已是岌岌可危。

一家人的生活从医院开始，在医院结束。每天，他们心急如焚地守候在病床前，看着一滴滴的营养液从细如红线的静脉流入小汉菁体内。

对于阜阳市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来说，这样的场景已司空见惯。大半年来，他们已经接治了症状类似的70个婴儿，诊断都是：营养不良综合症。根据阜阳市人民医院的儿科住院记录，因食用劣质奶粉导致营养不良的婴儿多达70例。而如今阜阳市辖三区（颍州、颍东、颍泉）、四县（太和、临泉、阜南、颍上）、一市，人民医院有近10家，各家人民医院都接治过类似病例。

让我们看看劣质奶粉"杀手"对这些小生命的摧残：

韩奥强，太和县三堂镇人。食用标注"内蒙古永欣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伊鹿牌"婴幼儿奶粉，两个月后，小奥强高热不退，经常腹泻，脸胖腿细，肚子肿，医生诊断为"重度营养不良综合症"。经过全力救治才侥幸存活，但至今还有肝肿大的后遗症。医药费开支高达四万余元，韩家从此背上沉重债务。

张阿雪，利辛县（原属阜阳市辖县）张村镇人。一出生就食用标注"雪丰"牌婴儿奶粉，两个多月后，小阿雪脸庞肿大，呕吐不止，喉管开始堵塞，清水也难以下咽。医生诊断为"重度营养不良综合症"，紧急抢

救后方才转危为安。

张文强，临泉县吕寨镇人。出生后七八天，家人从阜南一小卖部购买了某“名牌奶粉”，一个多月后，小文强头大身子小，并伴有发烧、呕吐等症状，经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综合症”。为抢救儿子，张家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打工收入。

他们是不幸的，刚刚出生就遭遇横祸；他们又是幸运的，毕竟大难不死，捡回了生命。然而，还有一个个婴儿甚至没来得及学会叫一声“妈妈”，就被残忍地杀害了。在阜阳市人民医院的住院登记簿上，刺目的红字记下了一个个死于“重度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

林乐，4个月；李强，3个月；马长远，2个月10天；吴毛毛，4个月；李城市，8个月13天；刘欢，40天；周龙翔，4个月；刘阳，4个月24天。

他们刚刚来到摇篮，就懵懵懂懂地被送进墓地。他们如此幼小，还不懂得什么是怨愤，却在短暂的人生之旅中尝尽了苦痛。[①]

然而，受假奶粉危害的婴儿绝不仅仅限于阜阳！

2004年4月28日，记者来到河南南阳中心医院，见到大头娃娃范志愉。她刚出生时3.2公斤。因为母乳不够，便到数公里外向东机械厂内的向东商场购买内蒙古海拉尔市三星乳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阳光贝贝新配方奶粉。因为担心换食其他奶粉孩子肠胃不适，故一直吃“阳光贝贝”，到现在至少吃了30袋。“阳光贝贝奶粉”特别香，不用放糖也很甜，孩子很爱喝。令家人感到奇怪的是，孩子的头越来越大，脸越来越胖，但手、胳膊等却不见长，浑身一度不敢触摸，屁股也不敢拍，严重时躺着、抱着她都不能入睡，没办法最后就打止疼针了。

父亲范永宽说，几天前范志愉喝奶粉的热情突然减退，两个多月时吃到80毫升，后降到70、60、50毫升，越吃越少。孩子一直精神不好，爱哭闹。家人最初都以为孩子得了消化不良症，到红阳厂医院检查未查出病

---

① 该节主要引自吴学军：《安徽阜阳假奶粉调查：谁谋杀了这些婴儿》，http://news.163.com，2004年4月17日。

因。4月22日，在南阳市中心医院经诊断，孩子的病与所食用的奶粉有关。化验血液显示，范志愉贫血、缺蛋白。医生要求马上住院治疗，当时他们夫妻俩只带了300元，根本不够用，只好抱着孩子含泪回家。随后先在向红阳医院住了三天院，输蛋白、输水，27日返回南阳。

“住院几天，孩子还没消肿，医生说需要慢慢治。”庄芳华满脸愁容，范永宽一脸憔悴，给孩子治病已花了2000多元。夫妻俩都是农村人，家境不好，为了救孩子一条命，他们不得不东奔西走向亲戚朋友借钱。范永宽告诉记者：“我明天还得回村借钱，如果要给孩子输血，一袋血就是900元，输多少袋还要根据情况再定。”说话时，范永宽眼睛里满是焦灼和无助。

一个叫陈勇尔的婴儿此前已经死在该医院同一张病床上。抚养陈勇尔的姨父黄清军夫妇告诉记者，陈勇尔是妻妹的孩子，因两口在外打工，陈勇尔出生后，就由他们照顾。孩子从去年农历10月26开始一直食用奶粉，尤其以在向东商场李长春处购买12元一袋的“阳光贝贝”奶粉为主。陈勇尔出生15天开始屁股红肿，后来身上也肿，头大脸大。别的孩子抹点药就行，她却不行，类似皮炎平等药都不管用，最后出现身体溃烂。先在红阳厂医院住院，输液五天。3月1日转到南阳中心医院，经查缺血缺蛋白，一到南阳就开始输血，最后还是不起作用，死时年龄差5天4个月。与范志愉不同的是，医院一直查不出陈勇尔的病因，奶粉一直没停过。那时候还没有公布安徽假奶粉事件，医生也没有考虑到是奶粉问题。

南阳中心医院儿科重症监护室的值班护士回忆，陈勇尔送来时，全身浮肿，头部很大，屁股、大腿和脚都已经腐烂。医生对陈勇尔进行诊断，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病因。给陈勇尔输蛋白质，用各种抗菌素均效果不好。陈勇尔抵抗力越来越差，身上烂得惨不忍睹。护士们都不敢给她擦洗伤口。3月11日，陈勇尔含恨离开人间，她的母亲和姨妈几次哭得昏死过去。黄清军告诉记者，为给孩子看病，总共花了近两万元。孩子的死，给他们打击很大，妻子从医院回来就跟神经病一样，一瞅见与孩子有关的东西就哭。最后没办法，他把孩子的所有东西，包括奶粉都烧了。

还有一个女婴周豆豆，脸部同样有些虚肿，小手和小脚同样惨白如

纸，医院诊断说属于营养不良，脸、脚踝处摸着跟有泡一样。周豆豆的奶奶说，他们来自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周湾村，离这里有30多里地。孩子出生一至两个月时很正常。生下来就一直吃黑龙江产的一种叫“牛初乳”的奶粉，因进食很少，吃药吃的都是健胃药。两三个月来，药没有断过，也不见好，到哪里看病都说是营养不良。周豆豆两个月时九斤半，现在还是九斤半。两三个月中一点没长。他们来中心医院是想化验一下，查查到底是什么病。听说劣质奶粉害人事件后，他们不敢再吃“牛初乳”，改吃9.8元一袋的力多精。

5月18日，继南召陈勇尔、范志愉、周豆豆之后，南阳市卧龙区、内乡、镇平等地又发现大头娃……阜阳、南阳大头娃仅仅是冰山一角，随着全国整治空壳奶粉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大头娃娃浮出水面。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出现“大头娃娃”，重庆奉节县发生毒奶粉事件，一名婴儿死亡……大头娃娃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有多少？类似范志愉这种被发现并得到救治的有多少？类似陈勇尔这种无辜死难者有多少？尚未发现的大头娃娃还有多少？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①

在国务院调查组的统一组织下，阜阳市对制售劣质奶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进行了严厉打击。截至目前，共抽检各类奶粉586组，扣留、封存、暂停销售奶粉10多万袋；立案查处涉嫌销售不合格奶粉案件39起，打掉生产及分装窝点4个，刑事拘留47人，留置审查59人，宣布正式逮捕31人，依法传讯203人。

三、中央严肃处理，地方半遮半掩

3月29日，新华社报道了泛滥安徽省阜阳农村市场的“无营养”劣质婴儿奶粉残害婴儿六七十名，至少已造成八名婴儿死亡的消息，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4月18日晚，安徽省省长王金山在有关阜阳“毒奶粉”的材料上作出

---

① 此节关于南阳中心医院的受害婴儿资料引自唐哲：《目击大头娃娃：悲剧产生的前前后后》，福建之窗 www.66163.com，2004年6月2日。

批示："阜阳出现'大头娃'现象，目前已有数名婴儿死亡，原因是吃了伪劣奶粉。"

从18日至21日，经连续四天的专项检查，阜阳市共检查奶粉产品经营户3783户，抽检109组，扣留涉嫌不合格奶粉6110袋，没收过期奶粉382袋，立案查处了23起涉嫌销售不合格奶粉的案件，并对五名涉嫌经销伪劣奶粉的批发商进行拘留。

21日晚，一份最新的抽检不合格奶粉名单，被紧急送到了阜阳市伪劣奶粉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在这份名单上，比此前阜阳方面通过媒体公布的32种不合格奶粉又新增了13种。经安徽省政府调查组和阜阳市政府初步普查，阜阳市场上销售的奶粉涉及141个厂家、149个品牌、205个品种。阜阳市工商、质监、卫生等部门通过抽查送检，共发现45种不合格产品。其中标注为黑龙江生产的17种、内蒙古生产的7种、浙江生产的5种、上海生产的4种，北京、山东、河北、湖北、江西等地生产的共10种，无生产厂家2种。

在温家宝总理的亲自关心下，国务院联合调查组三次前往调查，并对相关企业及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安徽省省委、省政府按规定程序，给予阜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庆强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分管工商工作的副市长马明业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给予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杜长平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给予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树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并移送检察机关对其徇私枉法问题作进一步调查；给予市卫生局局长曹化之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

阜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何涛、副局长朱兰英，阜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颍州分局局长蒋仁，阜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颍州分局分管执法打假工作的副局长汝坤，阜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颍州分局分管质量监督工作的副局长，分别受到行政警告、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并责令辞职、行政撤

职、行政记过的处分。

阜阳市颍泉区周棚工商所原两名副所长白启祥和李亭君，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案，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二年。

截至2004年6月，阜阳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16名大小官员相继被追究责任。到2004年8月，54家劣质奶粉企业被勒令停产，全国数以百计的官员受到各种处分乃至撤职查办。因生产不符合卫生标准奶粉的被告人池长板，被阜阳市颍东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同案四名销售商李纯霞、张学杰、黄丙印、韩东风分别被判四至八年有期徒刑。

但是，这些处理并不表明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是要真心地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一定的程度上是迫于中央调查组的压力，其证据最典型的就是太和县工商局对于向上级报批过的受到处理的有关责任人依然如故地留用。4月24日，国务院调查组在阜阳市太和县现场查获一批劣质奶粉，当晚，太和县工商局决定撤销劣质奶粉发现地城东工商所所长纪登攀、副所长武海的职务，对城东工商所市管员陈春生、宋影予以辞退。4月25日，这一处理决定上报给国务院调查组。4月26日，中央电视台、《阜阳日报》等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但6月4日，有关记者到太和县工商部门采访时发现，这些人仍在原来的岗位上上班，而且县工商局长徐学顺明确表示，经县工商局党组集体研究对上述四人作出的处理决定是迫于形势、迫于县里的压力，是不公正的，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更正的”。这是典型的应付上级检查而搞的阳奉阴违、不愿承担责任的行为!

其实，在此次奶粉事件被媒体公开而受到中央的调查后，地方政府的查处在相当程度上是消极的。明显的例子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二次去阜阳的时候，想住进第一次曾经和调查组及其他媒体记者共同居住的国际大酒店时，遭到门卫和值班警察的拒绝。他们出示了记者证，并说明也是报道此事的记者后，也没有得到同意，对方告知他们这是市里的要求。

还有，在上上下下一片打击假奶粉的声浪中，记者们竟然还能在距离

阜阳市区仅有30公里远的地方轻松地购买到已被阜阳市工商局明确列入33种不合格奶粉黑名单中的商品！

点评：

此次假奶粉事件是整个中国市场经济渐趋完善过程中的非常普遍的制假售假现象，只不过因此次受害对象的特殊性而更加骇人听闻，更加令人深思罢了。试想，为了赚钱，连娃娃们的生命都敢侵害，其他方面产品的安全性就更可想而知了。

一、行政不作为的恶果。2003年，阜阳居民张林伟的女儿食用从张俊田经营的超市购买的“绿元牌”奶粉，出现营养不良症状并于当年8月13日死亡后，张林伟多次向颍泉区工商分局周棚工商所投诉未果。9月15日，张林伟把所剩奶粉送到当地卫生部门鉴定，检测结果显示：该奶粉蛋白质含量为2.56%，属不合格产品。张林伟把检测结果交到周棚工商所再次投诉。12月28日上午，白启祥和李亭君明知张俊田销售劣质奶粉造成张某死亡的情况，既不调查不移交，也不向上级汇报，而是以工商所的名义对事件进行调解，仅以张俊田无证经营为由，对其处以1000元罚款。张俊田为感谢白、李两人的调解，在一家宾馆宴请两人，后张俊田又向白启祥行贿1000元。2004年3月，白、李两人商量后，伙同张俊田等人伪造了《询问笔录》、《调查终结报告》等文书，以掩盖事实真相。[①] 这种对举报者的意见弃置一旁的做法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至于后来的联合造假更是职务犯罪行为。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工作中杜绝或者少些行政不作为的做法，如果他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各自职权范围内的事情，那么像假奶粉这样带来大批受害者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大大减小其后果。

遗憾的是，如果不是媒体的关注，该事件很可能就不了了之了。温家宝总理是通过互联网了解到此事的。如果少了媒体的关注，那么此事能否被世人所知则是一个疑问，能否被严肃处理更是一个疑问。该事件引起人

① 《“阜阳奶粉”首起涉嫌渎职犯罪者批捕》，news.dayoo.com，2004年5月26日。

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今天中国政府的某些行政不作为可能是比腐败更严重的问题。

二、关于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中生产、销售管理无序的思考。被阜阳市工商局列入黑名单的33种不合格奶粉，来自黑龙江、内蒙古、浙江沿海等地。但是当记者按照地址开始寻找两家自称是北京的乳制品企业，结果一家子虚乌有，另一家仍然在生产不合格产品！在他们后来的调查中才得知其中一家制假企业根本不在北京，而是在山东的一个县里，造假者往往采取这种虚标地址的方法欺骗消费者，也让监管部门的查处困难重重。市场经济的确活跃了市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像这样的无序生产销售，使得假冒伪劣产品四处横行却又常常无法查证，这种状况告诉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秩序。比如，制假售假成本过低是食品安全制假的一个重要原因，能否采取措施对制假售假者处以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将赔偿金支付给消费者个人；要提高不法厂商制假售假坑害消费者的成本，用高额赔偿处罚到让他们不敢再犯为止。

三、地方利益主义的因素在作怪。这些假奶粉的生产何以能畅通无阻？与地方政府为了多收点税收、多安排点就业人口不无关系，说穿了就是为了地方利益。尤其是在查处假奶粉的过程中，各地都把罪过推到外地的生产厂家头上，对于本地的奶粉则是一片赞歌。《黑龙江晨报》5月8日的报道称："安徽省阜阳市劣质婴幼儿奶粉事件曝光后，近日，黑龙江省质监部门全力核查了全省奶粉企业及其产品质量。初步核查、检验检测结果表明，目前尚未确认黑龙江省有生产劣质奶粉的企业，黑名单上涉及的黑龙江省企业及品牌基本上是外省假冒或黑加工点生产的。"

5月9日，天津《每日新报》报道，"市质监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奶粉产品质量专项监督督检查和执法打假集中行动。截至目前，质监系统对18个区、县160余家生产和销售的95批次婴幼儿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配方奶粉和疑似有问题的奶粉）进行了监督检查，从已完成的55批次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检验结果看：合格49批次不合格6批次，批次合格率为89%。不合格的产品均为外埠企业生产。"

《湖南日报》5月10日报道称，"阜阳劣质婴幼儿奶粉坑人事件发生

后，我省质监部门立即组织力量，对奶粉市场进行了全面检查，截至目前，共收缴劣质奶粉8650余件，货值达80余万元。为配合这次奶粉专项打假行动，质监部门还在全省重点地区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了奶粉市场强制监督抽查，共抽取奶粉样品124批次，经检验合格率为75.8%。其中，本省产品抽检10批次，合格率为100%；外省产品抽检114批次，合格率为73.7%。”

《成都晚报》：“在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共挡获涉嫌假冒伪劣奶粉4169件，共计3000余袋（桶、听），重量4万余公斤，货值90余万元。当日，省工商部门将查获的48个奶粉品种的抽样送到了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成都站进行检验。昨日，该检验站的检验结果出来了：送检的48个品种的奶粉全部不合格。”而这些不合格奶粉全部都是外地厂家生产的。

对合格奶粉的报道还有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的媒体，地域虽不同，但报道却有极其相似的一点，那就是本地企业生产的奶粉都是合格的。正应了一首老歌所唱的：“人人都说家乡好。”①

四、关于跟风搞运动式工作方式的反思。在阜阳假奶粉事件的热点期间，各地都纷纷出动：武汉查出2万袋；河南也查出2万袋；浙江省查出6000公斤；河北就查出了20吨；陕西查出了30吨；四川又查出40吨；广州刚截获了18吨；成都又查封了50吨。有关部门平常都干什么去了！怎么中央一发怒，他们立刻就义愤填膺，纷纷出动，而且成就就斐然了呢？这是最典型、最传统的运动式方法，是十足的应付上级的变相官僚主义！

（程美东　执笔）

① 该节有关资料引自齐远：《是谁将劣质奶粉妖魔化》，载《今传媒》2004年第3期。

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一、剧毒爆炸物泄漏流入松花江

2005年11月13日下午1时40分左右，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下称吉化）双苯厂（101厂）的苯胺车间发生剧烈爆炸，很多居民楼的玻璃被震碎，有的人家墙皮都被震了下来，共造成5人死亡，1人失踪，近30人受伤。爆炸厂区位于松花江上游最主要的支流第二松花江江北，距离江面仅数百米之遥。事故发生后，吉林省副省长兼吉林市委书记矫正中，省长助理兼吉林市长徐建一等迅速赶到现场，组织抢险。吉林石化公司迅速启动消防应急预案，切断各装置间物料供应，市消防支队官兵赶到现场实施扑救，化工区附近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警察有序地疏散到吉林市区内。吉林市各大医院做好了接受苯中毒者的准备。吉林市消防支队特勤一中队承担了火场主攻和冷却任务。消防队员连续奋战了三个多小时，冒着可能发生爆炸的危险寸步不离水枪阵地，保证了冷却降温，在两名“敢死队员”六次冲进火海关阀断料后，终将大火扑灭，使事故基本得到了控制。

在灭火过程中，吉林市消防部门共调动了消防车90余台，大量的水被不间断地喷向火点，扑救现场地面的有毒污水“没膝深”。灭火用的灭火剂（含硝基苯）和冷却水以及被水冲刷出来的苯在没有进行任何处理的情况下被直接排入了松花江，污染由此产生。苯是剧毒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很大，会麻痹人的中枢神经。轻度中毒者表现为兴奋，步态不稳，头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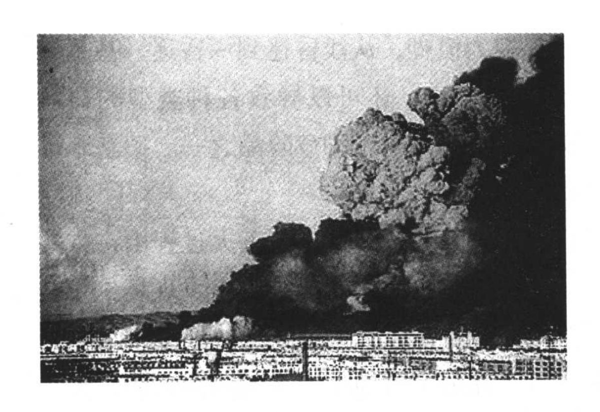
头痛、恶心和呕吐，重症患者出现视力模糊，从浅昏迷到深昏迷，甚至导致心跳、呼吸停止。苯可以导致慢性中毒，还可以导致各种类型的白血病。苯还是一种致癌物质，在美国它被列入一百种危险品之一。硝基苯可导致中毒性肝炎或各种肝脏疾病。

面对可能的危险，各级部门都是清楚的。因此，在灭火过程中，有关部门就开始了污染的检测工作。15 时左右，监测人员赶到事发现场，开展现场采样和分析化验工作。因为爆炸制造出巨大的蘑菇云，滚滚浓烟随风飘散，所以初期的监测重点是大气。在最大落地浓度点的测验表明，大气中的有毒物质根本不超标，检测人员当时就把防毒面具摘下来了，这名工程师说。后来，他们把监测重点转移到了水体，一开始，先测了东 10 号线，这是石化厂区的一条排雨管线，果然发现了苯，还有别的物质，苯的浓度挺高，水的颜色发黄。接着，环保工作人员立即奔赴松花江下游。他们在离东 10 号线排放口八公里处的九站（地名）设立了三个监测点，当时未发现此处受污染，松花江吉林段流速约为每秒一米。四个小时后，该处检测到污染物。获知水体污染后，市政府通知上游的丰满水电站开闸放水，以稀释江水中的有毒物质。

14 日 10 时，吉化公司东 10 号线入江口水样有强烈的苦杏仁气味，苯、苯胺、硝基苯、二甲苯等主要污染物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松花江九站断面苯类指标全部检出，以苯、硝基苯为主，从三次监测结果分析，污染逐渐减轻，但右岸仍超标 100 倍，左岸超标 10 倍以上。松花江白旗断面只检出苯和硝基苯，其中苯超标 108 倍，硝基苯未超标。随着水体流动，污染带向下转移。11 月 20 日 16 时到达黑龙江和吉林交界的肇源段，硝基苯开始超标，最大超标倍数为 29.1 倍，污染带长约 80 公里，持续时间约 40 小时。

污染带流出吉林地区前，有关部门已经将污染情况通报给长春市环保局，后来，长春又通知了哈尔滨。吉林省政府于 11 月 18 日向黑龙江省进行了通报。对此，得到了黑龙江环保局的认同。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吉林方面还是黑龙江方面，都没有将这个已经造成的污染及时地向生活在本地区的人民公开，而是尽量的遮遮掩掩。



吉化双苯厂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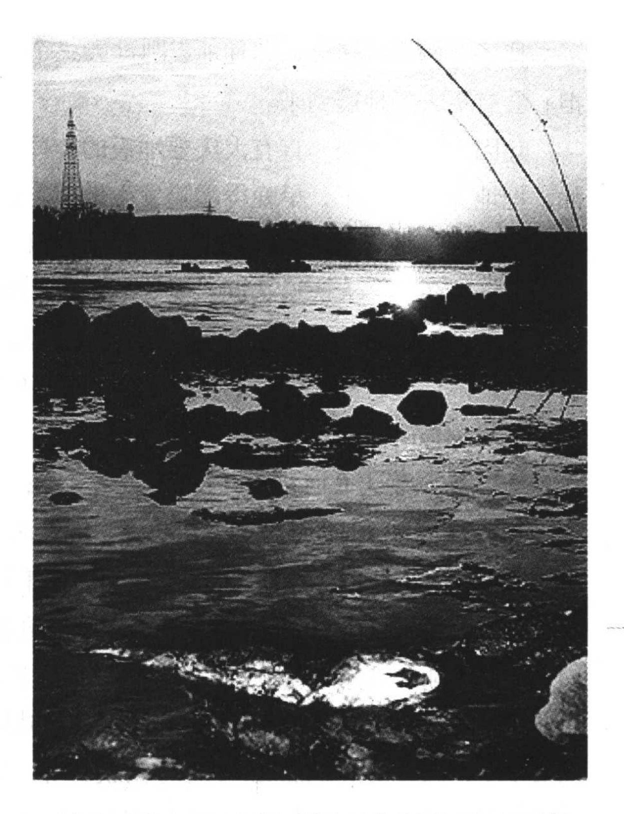
14日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吉林市一名副市长向媒体介绍，根据专家检测分析的结果，爆炸不会产生大规模污染，整个现场及周边空气质量合格，没有有毒气体，水体也未发生变化。

吉林市环保局在11月14日，派出工作人员通知两岸沿江居民，不要取用松花江水，下游的松源市已停用取自江水的自来水。但他们没有向媒体公开，更没有及时地向下游的黑龙江有关部门及时通告。直到11月18日中午，黑龙江省环保局李维祥局长才接到了古林省环保局的电话，说是受该省政府委托，通报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后，苯类污染物流入了松花江，让严密监控污染带的信息。此时距离污染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天！

而黑龙江省政府面对如此严重、危及到几百万人生命的重大事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掩盖真实消息！

21日14时，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临时停水的公告》，提出：自2005年11月22日中午12时起，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检修并停止供水，检修并停水的时间约为四天（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请市区内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体业户和居民以及供水经营单位做好生产、生活用水储备，保证正常生产、生活需要。

一次检修供水管网竟然需要全市范围内停水四天，这是世界史上的奇迹，老百姓能相信吗？流言四起，人们都在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来猜测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灾难，一场大规模的危机骤然降临！



2005 年 11 月 22 日，吉林市松花江边出现大量死鱼（孙鑫摄）

但有关部门还在想尽办法掩盖真相。直到 22 日，吉化一位负责人强调，爆炸产生的是二氧化碳和水，绝对不会污染水源；吉化有自己的污水处理厂，不合格的污水是不会排放到松花江的。

二、谣言恐慌中的抢水、逃亡风潮

地震传言

11 月 20 日，不知又从哪里传来了哈尔滨近期要发生大地震的谣言，乱猜疑的市民更加相信“可能发生大地震”。

起因一：2005 年 7 月 25 日 23 时，大庆市林甸县花园乡齐心村的七屯八屯发生了里氏 5.1 级地震，余震八九次，房屋倒塌了 1340 多间。地震时，哈尔滨有明显的震感，好多人夜里被震醒了，有些人家的器物还晃

了、掉了、倒了。迄今，林甸地震刚过去三个多月，人们记忆犹新，因此担心会有更大的地震到来。

起因二：几年来一直有大庆要地震的传闻，老百姓都说，大庆开采石油，把地下都抽空了，早晚得塌陷发生地震。在市民的想象当中，大庆随时发生地震都是可能的、应该的、正常的。不发生地震总觉得不是回事，不托底。哈尔滨离大庆这么近，受其影响发生地震也是早晚的事儿。

因此，地震的谣言传播得更迅速、更神秘，让人更惊恐、更慌乱。尤其是居住高层建筑的人家，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谣传的地震消息有三个版本：

一、22 日晚上 8 时到 10 时，地震 5.3 级；

二、22 日晚上 10 时到 11 时 30 分，地震 5.7 级；

三、22 日深夜 12 时至 23 日凌晨 3 时将有 7 级地震。

一位先生 21 日晚上把妻子和儿子送到城边老岳父家的平房去住了。他回来守家，睡到半夜就听楼下有人拼命喊：地震了！地震了！他慌忙跑到楼下，很多人都披着毯子、抱着被子跑下楼来。喊口号的是楼下小食杂店守夜的愣小子，门旁装空啤酒瓶子的箱子没放稳当，半夜“噼哩哗啦”倒了，小伙子睡毛愣了，以为地震了，就喊叫起来。一场虚惊，但这位先生也没了睡意，他索性沿街溜达起来。在宽阔的街道上和各商场边上，到处可见停泊的私家车，还有支起的旅行帐篷，帐篷里亮着应急灯。夜里很冷，寒气袭人，室外的气温在零下四五摄氏度，路边汪着的水都结了冰。好多私家车闪着灯，车内开着暖风，一家三口或几个朋友躲在车内，似睡非睡地眯着等地震。还有些人穿着厚厚的棉衣或羽绒服，从车里钻出来，伸腿摇胳膊、晃腰转脖子的，显然是在车里坐闷了或坐酸了腰、坐麻了腿、坐乏了身子，出来舒展舒展、活动活动。出车放风的人还三个一堆儿两个一伙儿的在议论或争辩着地震谣言的准确程度和可能发生的时间，真让人啼笑皆非。在开发区景观商场附近，这位朋友遇到了生意上的伙伴刘先生。刘先生悄悄地坦诚相告：他把家中带不走的贵重物品摄像机、照相机、DVD、音响、电视等都用棉被包好了，锁在一个实木柜子里。能带的都装上了车，还备了吃喝。躲过今晚，明早就开车去大连，朋友都帮他定好了宾馆。他的好多朋

友都为躲避地震开车去了大连。正说着一个大块头的警察溜达了过来，碰巧都认识。警察说，今晚他们都出动了，一是维护治安；二是劝说市民不要轻信地震谣言；三是加强保卫。他指着这些私家车笑着说：这些款爷的车上都装着金银珠宝和贵重物品，肯定还带有大量现金。若让不法之徒盯上，肯定惹麻烦、出乱子，甚至酿成命案。这时，不知是谁碰了身边的红色轿车，车上的报警器“嘟——嘟——”地响起来。尖利的声音刺耳、惊心、疼人。在车外活动的人都转身朝这边张望，似乎都有点惊恐不安，警察忙走了过去。

外出躲避

“苯毒水祸”的传闻伴随“地震灾难”的谣言，使原本就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人，开始了自以为理智的选择——外出躲避，逃离哈尔滨市区，有亲投亲，没亲没友，就到旅馆找宿。尤其是一些惜命惜财的款爷、富婆们，撇家舍业，倾巢出动，驾着私车，带着细软，揣上现金，拉着老小，一溜烟逃离了哈尔滨。有记者打出租车往家拉桶装水时，司机老师傅坦率地说，街道上，很多私家豪华车都不见影儿了。其实，都逃出了哈尔滨，逃离、躲避到其他省市去了。的确，以往大车小辆拥挤堵塞的街道，现在畅通无阻了。老师傅还说，他在大连开出租车的小舅子（内弟）来电话询问地震情况时讲，大连各旅店宾馆住满了逃避“水难和震灾”的哈尔滨人，停车场上挤满了哈尔滨的各种车辆。可见，别的一些城市及本省的许多市县乡镇，肯定也会有一些“逃灾躲难”的哈尔滨人。

售票厅里挤满了排队买票的人。不管是到沈阳、大连，还是天津、北京，只要是出哈尔滨就行，高价也认可。离哈飞往南方各城市的机票已经涨到了全价。而且，三天内飞往沈阳、大连、北京的机票已全部告罄。乘飞机来哈尔滨的客人骤然大幅度减少，有架从上海飞来哈尔滨的班机，机舱里仅有50名乘客。空姐解释，听说哈尔滨大停水，又有地震的谣传，来哈尔滨的人突然减少，有好多人买了机票又紧忙退掉了，致使这趟班机大大减员。一对抱着婴儿的夫妻正拖着几个大行李箱匆匆赶来。询问得知，夫妻俩是温州人，在哈尔滨了开一家皮草公司。现在，哈尔滨要大停水，又说有大地震，就在这几天。夫妻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虽然眼下是皮草销售旺

季，两人撇业舍财，也要先带着孩子回老家躲避些日子，看看情况再说。

温州人在哈尔滨经商的太多了，经营了很多大公司、大商场，成立了温州商会。类似这对夫妇如此逃离哈尔滨、躲避水难震灾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据有关部门统计，在21日停水公告发布前的四天里，市民出行逃离哈尔滨的人员远远超过了黄金周出行的人数。

大抢水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恐慌的哈尔滨市民在苦苦煎熬着，因为信息焦渴——官方仍没有明确的说法，致使一贯依赖、依靠政府的市民们六神无主，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到了11月21日，恐慌的哈尔滨市民一边是继续递增的外出躲避——“大逃离”，一边是变本加厉的购物狂潮——“大抢水”。

虽然这天哈尔滨市政府公布了“停水公告”，但理由是“供水管道维修”。市民们如临大敌，全员出动，掀起了“大抢水”的购物狂潮。超市、商场一上班，市民们就蜂拥而至，争相购水。车流、人流几乎都在涌向商场、超市。大街上、小区内到处都是搬运饮用水的身影。很多正在上班的市民也纷纷赶回家或打电话给家人、亲友，催促赶快储备、购买生活用水；一些出租车司机甚至停下生意，匆忙加入买水队伍。一时间，全市区闹起了前所未有的“水恐慌”。

在某大医院住院处，病人及陪护亲友们纷纷出动，上下楼的电梯更加拥挤，电梯旁等着一堆人，有些病人等不及干脆从楼梯走下去，争先恐后地奔向批发点，力争尽快赶到，能够抢先买到平价水。

在中山路的“沃尔玛”超市，人多得连购物车都不够用了。从超市里推出来的每辆购物车都装着两三箱纯净水，晃晃悠悠拥挤着。一位中年女职员感叹道：“哪里是买东西，简直是抢！”有人等了十几分钟抢到了一辆购物车，好不容易挤到卖水的地方，一看货架上已空空如也，旁边有不少人正推着空车等着商场续货。工作人员忙着从仓库往店里调货，拖货车刚刚拉进店堂，等候的人群就蜂拥而上，整箱整箱地搬走。凡是与水有关的货架旁都挤满了人，人们不光抢购水，还抢购鲜奶、饮料、啤酒，甚至面包、方便面、速冻食品等，一买就是满满一车。有不少商品已经断货了。

有的商场，从卖场推出来的购物车上多是装着成箱的矿泉水、饮料、鲜奶，还有大袋水果、方便面等，把一辆辆购物车堆得摇摇欲坠。商场里，凡是和水有关的购物区都挤满了人，十分拥挤，老弱者根本靠不上边。

“家乐福”哈尔滨店的一位负责人说，该超市当日备用的500多箱矿泉水，在11月21日13时至14时的一个小时内便被抢购一空。当时，由于每人都购买了大量的整箱饮品，在超市附近，想乘出租车都成了难题。

在位于市中心的“远大”超市，矿泉水从20日销售1560瓶，上升到21日销售了14600多瓶，增销将近10倍；哈一百超市，20日大瓶可口可乐和冰露仅销售了27瓶，21日却销售了850多瓶，猛增了30多倍。有的超市，为保障更多的顾客都能购买到饮用水，实行了限量供应，每位顾客可购买一小箱（12瓶）矿泉水。

在道里区“麦德龙”超市，原来摆放矿泉水的货架也是空无一物，服务员说：有的顾客甚至一次买了5000元的矿泉水。在香坊区一家社区食杂店里，市民袁女士非常气愤：刚才还12元一箱的矿泉水，转眼就涨到了20元，最后竟然给多少钱也不卖了。

一些街巷、居民区里的食杂店、小仓买，瓶装水、饮料等早已告罄。少数一些地方，原本一箱12元的纯净水被抬高到36元；原本一桶7元的桶装水卖到60元的天价。

11月21日，短短半天市民把1.6万吨的纯净水存货抢购一空，相当于平时100天的供应量。孰不知，在一些商店里，诸如塑料桶、大盆、铁桶、水壶，甚至水杯等，凡能装水的容器也都被抢购一空。[①]

三、政府终于说出了真相

11月21日市民“大抢水”的购物狂潮，使政府部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看来必须得把真相实情告诉老百姓。21日夜里，根据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市科技局紧急组织了哈工大、哈工程、哈理工、哈师大、哈供排水集团、市疾病防控中心、市化工所和市环保局等八个部门和

① 二、三、四节均引自何苍劲、陈春山：《苯毒流入松花江：哈尔滨大停水揭秘》。

单位的专家学者召开了“应对松花江污染研讨会”，提出了解决污染和供水的科学方案，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当日午夜，理智了的市政府决定向媒体公布真相，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干部向记者透露，市长石忠信在紧急会议上决定发布公告时说：“这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考验，是对百姓素质的考验。”22日凌晨2时，发布了公告，明确地告诉市民：此次停水是因为“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可能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决定11月23日零时起停水（比第一个公告的停水日期后延了24小时）。为了方便居民储水，市政府在同日又发出了一个公告。与此同时，省地震局新闻发言人刘丹公开答记者问，对“地震传言”进行辟谣，表明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可能性不大。

市政府纠正了错误，明智地实话实说，给市民“吃了定心丸”。

由于松花江中“苯污染带”尚未到达，市供水部们又宣布，从23日上午9时左右开始，临时恢复向市区供水。为了节省一切水源保证市民接水储水，有关部门紧急部署部分工厂停产，对停业的洗浴、洗涤行业加大了督察力度。

面对15个小时后就要停水的现实，市民们又开始了求生存的第一个战役：“全员出动”大储水。这里所说的“全员出动”，涵盖为家庭成员以及锅碗瓢盆桶壶瓶罐等所有能够盛水的器皿家什。因为是上午9时临时恢复供水，在岗的双职工有很多人请假在家里接水、储水。有些单位干脆全体放假，让职工回家接水、储水。还有些单位作为“福利”购买了一些大塑料桶发给职工回家储水。

全城区里，家家户户都是男女老少总动员——接水；锅碗瓢盆全出动——储水。一位老人，听说又给水了，赶紧打车跑回家，和病病歪歪的老伴俩，紧忙搜出饭盆、脸盆、水壶、闷罐、高压锅、装过白酒的塑料桶等家什一一接水，把凡是能装水的器皿全接满了，连十几年没用了的锈迹斑斑的铁皮水桶都从仓房里翻出来装满了水。儿子和媳妇分别打来电话关照储水情况，老人又让他俩买了几个装水家什回来储水。老两口储的水基本够全家四口人四天用的。她把卫生间的大浴缸储满了水，家里盆盆罐罐都装满了水，连空饮料瓶子、空啤酒瓶子都装上了水，还把超市装食品的塑料袋挑出十来个结实的，装水扎上口，一袋袋摆在凉台冻上。她还兴致勃勃地介绍说，在互联网上，哈尔滨市民发布了一张张自制储水器具的

照片——有纸壳箱子包塑料布的储水箱、农膜扎上口的大水袋、食品袋装上水一袋袋挂在晾衣架上的“水葫芦”串儿等。

为了消除市民的顾虑，充分尊重百姓的知情权和参与意识，市政府决定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停水后的信息，让市民在第一时间了解实情。省环保局也以每天两次的频率，通过媒体通报污染变化的情况。针对很多群众拿不准家里仍在流出的自来水能不能饮用的疑虑，市供排水集团负责人在电视上通俗地表明：自来水管里只要能流出水来，就可以饮用，就是安全的。市长石忠信当众表态：“政府绝不食言，四天后保证供水。”省长张左己也公开表态、庄严承诺：“恢复供水后，第一口水我先喝。”

有些干部原来想象：政府公布的送水电话一定是应接不暇的，其实没有，百姓实实在在地讲了心里话：虽然打一个电话就有人送水上门，但我们一次没打。这时候政府也不容易，我们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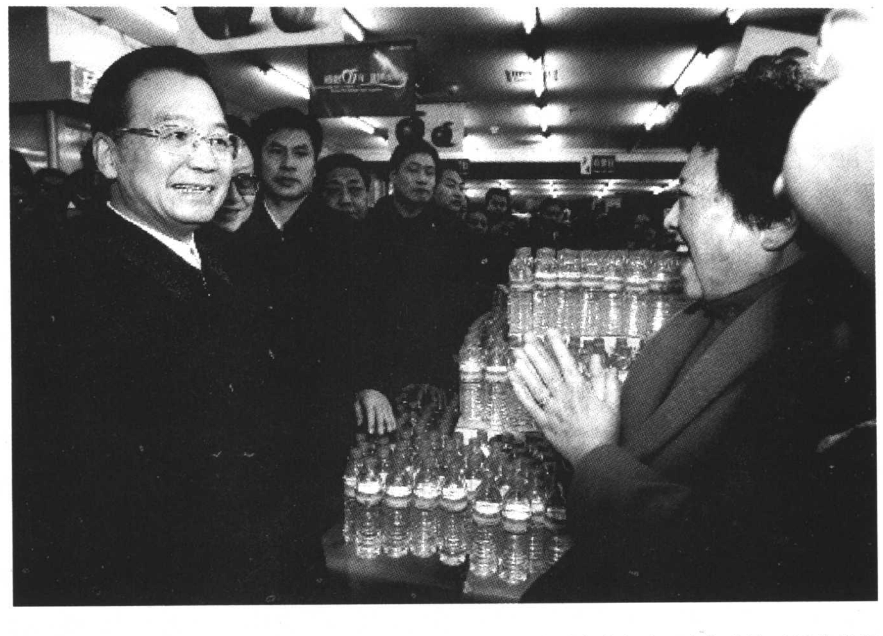
全市正式关闸停水后，政府提醒市民不要窃取供热管线中的水，以免造成城市供热瘫痪。市民非常理解，仅24日一天之内，供热管网的补水较平时少150多吨。

群众知情了，有底了，就理解了，信任了；继而就心平气和，坦然面对；继而就配合支持，秩序井然。正像哈报网讯采访报道的：原打算带领全家飞往海南躲避的小老板王亮，退了一家三口的机票，他说：政府处理水污染事件的力度让我心里不慌了，有了主心骨。一位叫陈莫的老师退了儿子排了一整夜买来的火车票，他很踏实地说：“政府说了，停水只有四天，这些日子我哪儿也不去了。”

讲真话的停水公告起到了安民告示的作用，前三天内涨到全价的机票，很快就恢复到了以往的折扣，仅11月26日一天，航空公司就为20多位意欲离哈出外躲避的人办理了退票手续；火车站售票口也冷清了，退票口却排起了长队。

四、安然渡过危机

1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哈尔滨察看松花江水体污染情况，了解群众生活用水供应情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胡锦涛总书记看望广大干部群众。在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后，他指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



2005 年 11 月 26 日，温家宝在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的中央商城超市与市民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的政府，必须对人民高度负责，对人民的健康、安全负责。沿江地方各级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对松花江水体污染事件一定要高度重视，周密细致地做好工作。他提出七点要求：第一，严密监测水污染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第二，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群众饮水需要和水质安全，决不能让一个人喝不上水，也决不能让一个人饮用污水。第三，切实做好水污染的善后工作。对污水流过的地方要进行环境质量评估，采取措施彻底清除污染物，不留隐患。要及早研究解决水体污染可能对江水造成的影响，研究治污的根本之策。第四，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易燃、易爆和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第五，要认真调查事故原因，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六，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以友好、负责的态度及时通报监测信息，加强合作。第七，加强宣传引导。要向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和政府采取的措施，做好思想工作。要加强对饮用水及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监管，防止哄抬物价，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黑龙江省长张左己喝下了松花江恢复供水后的第一口水（新华社记者李勇摄）

温家宝的讲话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真正关心民生、勇于承担责任的。

从26日晚上8时起，松花江哈尔滨四方台水源地的水质已达到中国国家标准。哈尔滨市政供水厂在观察了将近24小时后，于27日下午6时开始陆续恢复供水。就在此时，省长张左己来到哈尔滨道里区新阳路289号居民庞玉成、马志新老夫妇家中，喝下松花江恢复供水后的第一口水。

12月19日20时，同江监测断面硝基苯浓度值首次达标，这标志着自11月20日7时在黑龙江省第一个监测断面——肇源断面检出苯超标开始的松花江污染带在历时30天后已从黑龙江省消除。为了应对这次污染事件，黑龙江省和沿江各地市环保局在肇源至同江874公里的江段上共设置17个监测断面，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测，出动水质监测采样车5000多台次、技术人员2000多人次，行程10万多公里，取得监测数据4000多个，有效地保障了沿江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污染带已进入俄罗斯境内。

五、坦然负起国际责任

松花江在与黑龙江会合后，流经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以及共青城，最后归于大海。因此，松花江的污染已经涉及到国际纠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必须及时地通知俄罗斯，共同应对这场不幸的事故。22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就松花江苯污染事件照会俄罗斯。23日，俄罗斯自然资源部在哈巴罗夫斯克建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应对这一事件。同一天，其部长特鲁特涅夫在接受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俄罗斯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这一污染事件。24日上午，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会见俄驻华大使，并将这次污染事故的全部情况详细地作了通报。污染水团通过哈尔滨市以后，中方将随时向俄方通报监测情况，双方就黑龙江省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犹太自治州建立热线联系作出具体安排。俄罗斯驻华使馆希望两国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防范此次污染事件。使馆将与中国有关部门保持接触，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外交部长李肇星11月26日下午约见俄驻华大使拉佐夫，奉命向俄方通报了松花江水质污染的情况，并代表中国政府对此次重大环境污染表示道歉。

11月24日，俄罗斯多家媒体的头条都聚焦在受污染的江水流经俄罗斯时，是否会给当地带来危害。与此同时，俄方也在采取措施。俄塔社24日报道称，离哈尔滨700多公里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将于25日进入“紧急状态”。俄边疆区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并出台了针对这次环境污染的应对措施。边疆区政府发言人24日表示，在中国哈尔滨采集到的水样表明，水中的苯和硝基苯已经超标，苯和硝基苯是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有机物。政府将在污水流经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时进行严密监控，每两小时检测一次水质。该发言人同时表示，不排除到时候关闭阿穆尔河（黑龙江）饮用水源的可能。

此外，俄罗斯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已于24日抵达哈巴罗夫斯克，帮助应对这次污染事件。紧急情况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专家承诺，可以对付特殊情况。自然资源部部长也称，会采取一切办法保护哈巴罗夫斯克的居民。

有些俄罗斯媒体对此次事件作了渲染性报道。《俄罗斯日报》24日头版用《哈巴罗夫斯克准备应对“中国威胁”》的标题，宣称“一场生态灾

难正在威胁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为了表明中国负责任的态度，中方积极主动地向俄罗斯提供各种应对污染的设备，11 月29 日通知俄方，将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犹太自治州提供免费赠送的6 台色谱仪和150 吨活性炭（中方的色谱仪十分钟内就能快速检测出苯类污染物的分析结果，而俄方的水质监测设备需一天多才能检测出结果），这些设备和物资于12 月5 日运抵哈巴罗夫斯克。中方还决定尽力将污染带堵截在国门之内。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2 月4 日就松花江水污染事致信俄罗斯总理弗拉德科夫，表示愿与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消除灾害后果。这个举动表明了中国政府诚心诚意地承担起在这个事件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12 月29 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宣布，松花江污染带尾部残余当天已全部移出哈巴罗夫斯克市区阿穆尔河（黑龙江）水域，哈巴罗夫斯克市已恢复自来水供应。至此，这次历时46 天的严重的污染危机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而告胜利化解。

点评：

一场本来属于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河流污染事件，由于地方政府处置的失误，导致了一度谣言满天飞、居民四处逃的社会混乱，其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损失实在无法用数字来计算。虽然两年前中国刚刚经历过“非典”，但哈尔滨水污染事件在应对思路上如出一辙，这更突出地显现了信息化时代的我国地方政府处理涉及公共安全问题时能力的不足，因此深入研究分析这个问题，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有关地方政府剥夺公众的知情权是导致哈尔滨水污染危机的根本原因。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决策的公开性、民主性，为了保证这种公开性、民主性，民众必须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尤其是在重大的问题上。吉林化工厂爆炸引起的苯等剧毒物质流入松花江后，吉林省有关部门通过检查就已经发现河流被污染，但省政府领导人却在次日公开声明没有任何污染，18 日才通知下游河段所在地的黑龙江省有关部门，而黑龙江省竟然又向民众隐瞒了三天！也许政府部门认为这

是善意的隐瞒，怕公开事情而影响社会波动。但这种欺骗的后果是什么？会使那些不知情的人们继续饮用松花江水，继续用之灌溉土地、清洗机器。政府可能会说，我可以暗中打招呼，提醒松花江两岸的居民、工矿企业不用江水。但绵延上千公里的河流是否会有人没听到招呼而误用江水呢？因此这种做法绝不同于医生治疗绝症的病人时隐瞒其真实病情的情况，而是如同一个医生明明确诊一个人得了很快即要致命的急病，却说你没病，回家躺两天就好了的不负责任的做法。

更何况，这种隐瞒是无效的。河里被毒死的鱼虾会告诉河边的人们这里面有毒，那些被暗地里打了招呼的单位也会有人向他的亲戚、朋友透露里面有毒。在现代信息交流如此发达的社会，用不着口耳相传，手机、短信、电话、网络很快就会把大家关心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这样的后果只能损害政府威信，引发社会混乱。

更重要的是，这种涉及到千家万户生命的水污染事件，有关政府部门的领导人竟然敢于剥夺大家的知情权！从后来国务院解除环保总局局长解正华的职务这个事实来看，国家环保总局对于剥夺大家的知情权负重要责任，同时也反映了中央对于公众知情权的态度。两年前传染性极重的“非典”被有关部门隐瞒了几个月，事后中央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的处理，但仅仅过了两年半，松花江污染这么大的跨省、跨国的事件，竟然也被一些人隐瞒了八天之久，且是在无奈之中才不得不向社会公开。这两件事件最终公开了真相，如果不是因为它们涉及的面太广、潜在的危害太大，能否有这样的结果确实很值得人深思。

二、关于谣言的政治思考。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一个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现象，那就是在哈尔滨地震的谣言四起，传得有鼻子有眼儿，闹得人心惶惶，四处逃亡。乍看起来，似乎是某些人的过度敏感、神经脆弱、从众心理引起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既为谣言，就谈不上真实性。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去相信？如果没有人相信，或者相信的人很少，我们自当荒谬，不去管它。但对于那些有很大的受众市场的谣言我们却不得不认真对待，因为它在一定的程度上能真实地反映特定群体的社会心理，表达着相应的社会诉求。1750 法

国巴黎发生过一次暴乱，起因就是一则谣言：那就是巴黎人相信有许多儿童失踪是因为法国国王有麻风病，要用年轻新鲜的血来洗澡，为此暗中绑架、拐走了许多儿童及少年。为什么有这样怪诞的谣言？因为第三等级的一些人不满法王的统治，借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在此次水污染事件中，哈尔滨市民明显对政府关于因检修管道而停水四天的解释不相信。道听途说的松花江水污染信息被将要停水的公开消息所证实，而公开的理由既不合已有的定见，更不通情理，于是在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胡乱猜想。一个本来就有点依据的地震的谣言就这样轻易地在人们思想不定的情况下被接受、被认可。

当然，由于在现今信息传递很发达的情况下，制造谣言的方式要简便的多，由于我国现在社会仍不太发达、社会矛盾的存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各式各样的谣言是不足为奇的，但对那些主题明显、受众广泛的谣言必须认真关注，努力查找其中的根由，采取根本的对策，决不能视为儿戏，也不能简单地追究责任人、简单地辟谣。

三、关于重特大危险产品的生产厂址的选择问题。此次松花江污染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的苯胺车间爆炸事故引起的，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该厂肯定离松花江很近，如它位于距离松花江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爆炸物怎么可能不随消防水流入江中呢？选择离松花江较近的地方建厂，对该化工厂而言，的确方便了用水、方便了运输，大大减少了成本，但对于整个松花江的安全、对整个吉林市的安全都无异是个巨大的威胁。也许，在过去特殊的时代，限于既定的条件和认识，作出那样的选址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我们大讲科学发展观的时代，面对类似的公共安全定时炸弹工厂是不是要考虑重新选址或者重新转产的问题？

（程美东　执笔）

参考文献：

本文参考、引用了 http：//china.com.cn/网上的有关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第四篇

1954 年湖北特大水灾

1954 年夏秋之交，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此次水灾的雨期之久，洪峰来势之猛，洪水水位之高，汛期之长，灾区范围之广，均为历史记录上所罕见。而湖北省受洪水的影响又尤其严重，遭受的损失也更大。那么，面对这样一场自然灾害类型的突发事件，当时的政府是怎样组织应对的？这些应对措施在当时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对于今天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应对有何借鉴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

建国初期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54 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的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则是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

在气候上，我国属于东亚季风区，每年春、夏季节转换中，五月份主

雨带停留在华南，为华南雨季；六月份停留在长江流域，为长江中下游梅雨季。七月份则北抬到黄淮，为黄淮雨季。因此，按照正常情况，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季应该是从六月份开始。但1954年的气候很早就表现出异常现象。早在五月份，雨带就已经北移至长江、淮河流域一带，沿江地区迅即进入汛期警戒状态。此后，雨带长期徘徊于长江流域，暴雨接连不断。1954年6月中旬，长江中下游发生三次较大暴雨，历时九天。直至7月底，流域内每天均有暴雨出现，且暴雨强度大、面积广、持续时间长，在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形成拉锯局面。8月上半月，暴雨移至长江上游及汉江上中游。由于在上游洪水未到之前，中下游湖泊洼地均已满盈，以致上游洪水东下时，宣泄受阻，从而了形成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长江各支流及其附近湖泊轮番交涨，长江沿线自宜昌迄江阴之间各水文站如九江、汉口、岳阳、宜昌等水位直线上升，纷纷突破历史最高纪录，大多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一米以上。其中最典型的是汉口武汉关。据历史记载，武汉关水位从1868年（清同治七年）到1949年这80多年间，超过27公尺的共有七次，其中以1931年为最高，达28.28米。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武汉关水位到26.94米时，全市即溃口被淹。1954年的这一次更为严重。6月25日，洪水已突破武汉关26.30米的警戒水位。7月2日起武汉关水位就高达27米，以后不断上涨，7月18日下午8时突破1931年的最高水位，到8月18日下午3时，水位高涨至29.73米，比1931年高出1.45米。直至8月下旬，长江水位才开始全面转落。但由于底水甚高，一时宣泄不及，直至10月上旬，尚有部分地区仍在警戒线之上。据统计，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的时间，最少为69天，最多达139天。如其中武汉关水位从6月25日突破警戒线开始，到10月3日退至警戒线之下，持续了近100天；湖北黄石市则持续了134天。这种汛期开始早、结束迟，持续时间几近半年的现象，从长江历年水情来看，实属罕见。在此期间的洪峰来势之猛，洪水水位之高，也为历史记录所未有。

由此次洪水所引发的受灾范围之广，损失之严重，也是前所少见。其中湖北省的受灾情况又尤为严重。湖北“地连七部，襟带江汉”（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在历史上号称“泽国”，境内江河交

错，湖泊星罗棋布，沿江滨湖地区地势低洼，因此，在1954年的大洪灾中，湖北省受洪水的影响尤其严重。长江流域3000万灾民，湖北省就占了三分之一。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全省因灾死31762人，死耕畜16056头，倒塌房屋2205135间，浸湿和冲走粮食6935743斤。国营商业财产损失2134062万元，合作部门损失达1465468万元。9所中等学校房屋全部倒塌；14所部分倒塌。小学校舍遭毁的占灾区原有校舍总数的50%以上，仅倒塌者即有19321间。农田水利设施也受到极大破坏，大中型水库、剅闸及附属建筑物冲毁98处，小型塘堰、沟渠冲毁138021处，290余万亩农田丧失了灌溉和排水能力。武汉市内地势较低处渍水成灾，150万人口中，就有灾民376313人，死亡30人，伤42人，4388栋楼房倒塌；黄冈地区受灾人口2252334人，受灾田亩3627282亩，死伤3126人，倒塌房屋752268间；孝感地区受灾人口2237628人，受灾田亩4299935亩，死伤1780人，倒塌房屋650902间；荆州地区受灾人口3873355人，受灾田亩11700284亩，死伤25586人，倒塌房屋641525间；其他受灾区也是房倒屋塌，人畜伤亡。截至1954年8月19日止，据49个县、2个市、1个省属农场的统计：全省受灾田地占总田亩数的35%以上；受灾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9%以上。损失非常严重。由于武昌、汉口被洪水围困百日之久，京广铁路100天未能正常通车。

二、抗洪：可以有1931年的洪水，不许有1931年的武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的情况下，1954年的这场特大水灾破坏了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整体规划。但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是过去的旧中国，面对肆虐的洪水，湖北省党政军民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与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当时中央对长江流域的防汛工作非常重视，早在汛期到来之前的1954年4月，中央防汛指挥部、中央生产防旱办公室就联合发出了关于防汛防旱工作的指示，通知各地恢复或建立防汛防旱机构。此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防汛指挥部迅即成立。中央任命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为中央防汛总

指挥，负责湖北省的防汛工作。1954年5月3日至16日，湖北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水利会议，布置了防汛防旱任务。5月20日，湖北省防汛防旱联合指挥部成立，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张体学任指挥长。武汉市市长王任重任武汉市防汛指挥部总指挥长。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各地积极行动起来。5月底，各专、县、区都建立了防汛防旱机构，乡一级的相应机构也陆续设立。各级机构在群众中展开了深入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同时积极进行相关器材的准备工作，并于6月15日之前对各地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检查：查险情、查组织、查器材。省、地、县都派有专人负责情报工作，以利于正确掌握水情和互相联系。在水情日趋紧张的情况下，王任重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可以有1931年的洪水，不许有1931年的武汉"，要"竭尽全力，抢救危关"。中共武汉市委决定："把防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人在堤在，水涨堤高"。省指挥部召开了防汛救灾紧急会议，张体学作了《紧急动员起来，为胜利完成当前防汛救灾严重任务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号召"全体党员全体干部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以最大的勇气、百倍的信心，领导和团结江汉滨湖地区的人民克服困难，为战胜洪水，恢复灾区农业生产，保证灾区胜利渡过灾荒，确保国家经济建设的完全而斗争"，湖北省各灾区立即响应这一号召，投入了抗洪抢险的斗争。

作为当时中南地区和湖北省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又是我国内陆的一个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建设重地，武汉市的地位非常重要。由于武汉市周围湖泊环绕，堤防线全长138公里，防汛水位为24.80至26.30米，超过26.30米即进入紧张水位。6月26日上午，武汉关水位突破26.38米，市政府遵照中南行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指示，立即发布命令，动员全市所有人力物力投入抗洪抢险战斗。王任重亲自挂帅，担任市防汛指挥部总指挥，并按地区分别成立了五个防汛分部。为了应付险情，全市组建了抢险队，由英勇精悍的铁道兵和本市具有堤防建设经验的工人共千余人组成。抢险队拥有69辆汽车和20艘轮驳，车船上满载各种抢险工具和材料，接到抢险命令后，只需两分钟即能开出，迅速赶到出险堤段。

为了更好地掌握水情、雨情、风情和了解堤防情况，防汛指挥部特地

请来了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本地年老熟悉情况的居民进行座谈与访问；同时组织了专门机构分析化验主要地段的土壤，计算其安全系数。在掌握情况后，指挥部根据全面设防、重点防御、抢修险工的精神，提出以加高加固重点培修为方针的第一期工程计划，决定将堤防加高到 29 米以上，确保超过 28.28 米历史最高水位时全市的安全。非常值得庆幸的是，也就在工程完工的当天，7 月 12 日下午，武汉关长江水位突破 28 米。这说明一期工程的完成是非常及时的。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指挥部专门成立了检查团，市委书记张平化、担任副总指挥的市长宋侃夫和总工程师等领导分赴各分部所辖堤段进行严密细致的检查，并就地作了具体指示。此时武汉关水位持续上涨，7 月 18 日突破 28.28 米，出现了 28.31 米的洪峰，副总指挥阎钧、张雪涛、唐适宇等分别到重要堤段亲自指挥。经过十个昼夜的奋战，顺利完成了第二期加固工程。但是，工程完工后的连续几天，暴风雨又猛烈袭击武汉，风力达到七级，堤外水天相接，波翻浪涌，武汉关水位猛涨到 28.70 米。汉口第二防汛指挥部所辖堤段多处出险，经过顽强拼搏，30 日下午抢险工程完工。到 8 月初三期工程提前完成的时候，全市堤防线已有 29.5 米至 30 米的标高。8 月 4 日凌晨，武汉关水位突破 29 米，指挥部本着水涨堤高的精神，开始实施争取决战胜利的第四期工程计划，有重点地扩展了防浪排设备，汉口全线堤防险工地段的防浪排，连成了一座长达 20 余公里的防浪长城，几乎环绕了半个汉口。11 日前，长江中下游水位已呈现稳落趋势，但武汉关水位受汉水洪峰的影响，11 日晚 8 时，仍达 29.53 米。为了防止重大险情的发生，全市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到 8 月 15 日，沿江、沿河一带，到处停泊着插有指挥部轮驳通行证的铁驳、木驳、登陆艇和拖轮；在抢险队的驻地门前，停着一长排汽车。这些车船都满载各种抢险物资，一旦需要，就随抢险人员一同赶到险工地段备用。17 日，抢险队同总工程师室的工程师及有关干部等往沿江一带勘察防水墙情况，研究和策划了可能发生险情的地段的具体抢救措施。翌日，武汉市狂风暴雨交加，沿江堤外波涛汹涌。下午 6 时，武汉关水位涨至 29.73 米，指挥部严令各堤段加紧巡逻、严密监视。由于准备充分、戒备严密，全市堤防未发生大的险情。高水位

一直持续了10多个小时，至19日凌晨开始回落。最危险、最紧张的时刻终于过去。针对当时高水位仍在持续的状况，王任重提出今后的防汛工作应贯彻“坚韧顽强、再接再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方针，各分部据此方针，又进行了第五期加固工程，10月3日，长江水位退至警戒线之下。

除了武汉之外，湖北省其他许多地区的抗洪抢险战斗也非常激烈。黄石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是湖北省内一个重要的新兴工业城市。6月26日至8月16日，全市的防汛大军与历史上的五次最高峰进行顽强搏斗，终于确保了整个城市的安全。6月下旬，黄石市连降暴雨，沿江堤防受到威胁。当时的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市委书记杨锐任指挥长。指挥部根据地形，将50华里长的堤段分成六段，由市委委员和各厂矿负责干部担任工段指挥长。7月4日，黄石市长江水位超过1931年的水位24.78米，并在到达25米后不断上涨。指挥部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并加强抢险队，在险处充分储备人力物力，加紧进行堤身加高培厚工程，并实行分段负责巡逻制度。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到7月13日，全线工程一律加高到27米。由于巩固的堤防和防汛人员的顽强拼搏，黄石市连续战胜了7月4日24.92米、17日25.62米、30日26米、8月6日26.09米和12日26.19米的五次洪峰。

荆江大堤直接关系着武汉、黄石两市国家工业建设的安全，因此，湖北省委、省政府一再指示，必须确保大堤的安全无恙。根据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指示精神，荆州专署、长江水利委员会、荆州防汛指挥部、长江修防处和湖南常德专署等单位，联合组织荆江防汛分洪总指挥部，重点指挥荆堤和分洪区的防汛工作。各县也分层召开战地会议，组织三线民工轮换，并加强了巡堤工作，切实做到“四查”（查堤外、堤面、堤腰、堤脚）、“四到”（眼看到、耳听到、手摸到、脚踩到）、“两快”（发现险情快、请示报告快）。到7月中旬，长江上游、清江和三峡地区同时普降暴雨，雨水汇成巨流，威胁荆江大堤。17日，沙市水位从42.19米上涨，势头渐趋凶猛。21日下午8时后，水位以每小时6.7公分的速度上升，荆江大堤不断发生险情。指挥部在党中央指示下，决定采取分洪措施。22日凌

晨，沙市水位上升至44.39米时，太平口进洪闸被打开，洪水以每秒8100立方米的流量通过闸门。分洪后，沙市水位立即下降，武汉关、黄石港水位得到遏制。8月上中旬，防汛大军进行了两期加固工程，所有发生过的险工都得到修整，并防止了退水时期可能发生的溃堤决口情况。保证了荆江大堤的安全。

三、救灾：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力争迅速恢复生产

在抓紧进行抗洪抢险的同时，当时的湖北省委、省政府强调指示："防汛与救灾必须紧密结合，双管齐下，渗透进行，不能偏废，做好了防汛，就使灾情不至扩大，有力支援了救灾；做好了救灾，就能有力地动员群众防汛，减少了防汛困难。因此，二者必须同时并重，不能顾此失彼。"据此，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并贯彻了"在党和政府大力领导与扶植下，组织起来生产自救，节约渡荒；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力争迅速恢复生产"的方针。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生产救灾。

第一，积极组织灾民开展生产救灾，重建家园。1954年10月，湖北省委及时成立了灾区经济工作办公室，组织供应灾民粮食、建材和生产资料，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和恢复生产。各县还先后成立灾民返乡委员会，组织灾民分批返乡重建家园。省委、省政府还组织慰问团深入灾区对受灾群众进行慰问。早在9月初江河退落时，省委、省财委及各级党委就要求各地迅速恢复、建立粮食供应机构。部分地区还在灾民返乡途中，设立粮食临时供应站，以保证灾民返乡途中所需口粮。省粮食部门还从省内外调集大量粮食运往灾区。截至10月中旬，已调运大米15878万斤，稻谷3764万斤，杂粮1954万斤，小麦1260万斤，面粉125万斤，各种种子2739万斤。至10下旬末，省粮食厅准备了各类种子6700多万斤，以支援灾民恢复生产。各灾区的财经部门还积极恢复市场，开展供应和收购业务。到10月上旬止，孝感、新洲等县灾区的商业机构全部恢复营业。据9月下旬止的统计，省合作社联合社筹备会已采购到竹篾98万斤、芦席326000条、楠竹100万根。并于9月底止在省内非灾区调拨了58000多立方米枋木和板材。合作社系统还调往灾区140多万斤竹篾、苧麻等各种制造渔具的

材料。

在灾民分批返乡后，政府又积极帮助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并在资金方面给予了有力的支援。省政府及时下发了分洪补偿费、口粮救济费、房屋补助费等共47369750万元，帮助灾民克服生产和生活困难。至12月，国家已拨给湖北省水灾区10500亿元，以帮助灾民迅速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截至12月上旬，灾民已得到贷款1058.8亿元。各区县的人民银行也纷纷组织资金，以扶助灾民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

第二，组织帮助灾民战胜寒冬和春荒。洪灾过后不久，灾民们又面临如何战胜即将到来的寒冬和春荒的问题，这对于许多经历洪灾后已一无所有的灾民来说，确实又是一个难关。当时的湖北省委、省政府对于这一问题也非常重视，各地领导机关一般都于12月上旬发出了关于保护灾区人民过冬的指示。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灾区逐户检查救济款、补偿款、贷款、棉衣的发放和灾民的安置情况。鄂城县政府在入冬之前，又专门拨出72亿6000多万元，救济灾区的孤寡老弱。公安县委发现不能过冬的工地民工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就下令限在三天内重建或修整完毕；发现民工缺衣少絮，就立即送上堤。汉阳县由供销社将无法保养的耕牛收购并转移到非灾区寄养。因缺少饲料和气温骤降，武汉市郊耕牛发生了死亡现象。有关单位就迅速抽调干部20余人专门负责采购稻草，从湖南及黄陂购回稻草约60万斤。汉口铁路运输分局和省运输局专门抽调33个车皮和16部汽车到黄陂县运稻草。

鉴于不少灾区群众在遭受寒潮袭击后衣食紧张，灾区各级政府从11月起便普遍加强了灾区的物资供应工作。监利县四区供销社仅当月下旬就供应灾民芦柴3500余斤、棉絮1000多斤、芦席2600多张，并有大批盖房用的竹篙、子篾等。此外，国家花纱布公司和百货商店还组织灾区手工业和灾民加工御寒物资，许多地区还采用货郎担等流动供应方式，为群众送货上门。与此同时，武汉市还成立了支援湖北省灾区农民捐献寒衣委员会，号召全市人民踊跃捐献寒衣。至11月下旬，共征集寒衣达110.8万件，其中有41万件是省政府拨款为灾民赶制的。非灾区的粮食部门把分散的粮食汇集起来，并从外省统购粮食运到湖北。全省粮食系统仅11月由省内外调

运的粮食就达12369万斤。至12月底，又调入灾区粮食7亿3800多万斤。1955年元月中旬，省政府决定再拨给荆州、孝感、黄冈等三个专区和黄石市702亿元，以帮助灾区欢度春节。省委除同意各专县将1954年结余的救济款转入使用外，还先后下拨专款。据统计，全省可用于春荒期的救济款达34299287元。这对于帮助灾民战胜寒冬和春荒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第三，组织帮助灾民解决冬播和春耕问题。解决冬播和春耕问题是灾民最终战胜水灾的关键。为了争取及时冬播，当时的湖北省各专县加速泄洪排水。荆州地区各主要干支堤段溃口和分洪口组成部分堤口断流，到1954年11月5日止，各地区已排除农田积水465.8万亩以上。到11月中旬，全省已退出农田渍水100万亩以上，其中670多万亩已经冬播。10月份以后，各地政府领导群众及时开展冬播。到10月底，湖北省西部和西北部的播种已基本完成。11月2日，省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1954年冬播增产主要技术措施的指示，对于冬播生产的主要技术措施进行了具体研究，对农民冬播给予技术上的指导。至11月20日，武汉市郊区农民共种下各种作物58900余亩。至11月底，市郊播种面积扩大到89610亩，占全部郊区可耕面积的89.61%。至12月下旬，全省冬播工作基本胜利完成。

早在1954年11月份，湖北省大部分地区的基层合作社都抽出人力着手生产资料工作。至1955年元月上旬，全省已订购石膏189000万担，骨粉20000担。化学肥料的供应计划也比1954年增加3.6倍。同时，黄冈地区专区财经委员会和汉阳、嘉鱼、沔阳等成立了春耕生产资料供应办公室，专门领导组织和供应工作。1955年2月，省委颁布了《关于大力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以春耕生产工作作为农村春季的中心任务，并妥善安排好其他各项工作。省委又组织工作组分赴汉阳、监利、洪湖等七县工作。还派工作组到黄梅、广济等县检查救济款、优抚款的管理使用和发放情况。4月6日，省委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将耕牛、种子迅速、合理地分配到乡到户。4月10日，省委批示要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围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副业活动，做好扶持工作，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战胜春荒。另外，省农业厅及时到外省和非灾区调运大批良种，解决春耕种子问题。至1955年5月10日止，湖北全省灾区耕田整田达60%。各县还组织

大批干部连同兽医到采购区接收转运耕牛。至3月底，全省收购的耕牛占计划任务的92.4%，已运到县级的占收购数的60%。至5月中旬，湖北省灾区从省内外购运耕牛五万余头的转运、分配工作已全部完成。这就为湖北省灾区提前和适时完成春耕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四，组织群众进行“堵口复堤，重点加固”的工作，以标本兼治，彻底消除水灾隐患。鉴于往年堤防薄弱、水道不畅、易于淤积、漏洞过多的经验教训，湖北省委于1954年9月召开水利工作会议，明确了“堤口复堤重点加固”的方针。省水利工程总指挥也于10月召开各地、县水利工程指挥长会议，进一步贯彻省委的这一工作方针。这样，从10月下旬开始，灾区各地堵口复堤工程逐步展开。11月上旬监利上车湾、石首人民大垸、潜江姚家月和嘉鱼、武昌县境四邑公堤等十处大型堤口工程先后完工。各县其他重点工程也先后开工。从12月中旬开始，规模浩大的堤防抢修全面动工。到1955年元月止，各地153处大、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先后开工的有43处，其中13处已完工。到2月1日止，共完成2238万多立方堤防任务，占修堤总任务的31%以上。至3月末，全省干堤已完成90%以上。其中荆江大堤加固工程于4月底胜利完工。全部工程包括移还滩、填塘、翻筑、抽槽、加高培厚、护岸等项，共计完成土方5194756立方。国家为此先后共拨工程费685万元，动员民工达14万人。至1955年3月末，武汉市长江右岸的武青堤、汉口沿江防水墙、汉水北岸的长丰南垸堤和汉阳河堤下段，已经翻筑过和加高培厚。通过这些堤防建设，兴建了一些永久性堤防，达到了标本兼治的目的，为消除水灾隐患打下了基础。

点评：

中国在历史上向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而其中水灾的发生又更为频繁。据资料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起至1949年的2155年中，中国共发生水灾1029次，几乎是每两年就发生一次。自1949年以来的50多年间，洪涝灾害平均每年达5.85次。因此，如何应对水灾造成的突发事件是中国历代政府的重大任务。但在旧中国，尤

其是处于长期战争中的旧政府完全无力应对水灾类突发事件。如1931年长江水灾，当时武汉关水位最高达28.28米，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武汉关水位达到26.94米时，全市即溃口被淹，受灾民众达5311万人，死亡达42万余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54年水灾的洪峰来势之猛，洪水水位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受灾范围之广，都超过了1931年。但1954年水灾仅死亡三万多人，灾区的生产在政府的组织帮助下也很快得以恢复。因此，以全新的面貌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以人民利益为本的精神和对重大事件的处置能力是不可否认的。而处置这场特大水灾的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一、政府是特大型自然灾害处置中的主导，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水灾发生之后，新中国的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立即成为抗洪救灾组织者和领导者。如早在汛期到来之前，从中央到地方就成立了各级防汛指挥部，并赋予防汛指挥部以高度的权威性，以利于领导和负责防汛工作。在全国一盘棋式的集中统一模式下，全国各地对武汉进行了尽其所有，尽其所能的支持。各有关部门、群众团体、人民群众及专业救灾队伍，都服从政府的统一指挥，粮食、药品、救生物品、运输工具、通讯工具等统一调配。政府还从广东、四川、河南等省调运大批蔬菜、大米，以保证武汉市场的供应，稳定物价。

当时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还体现在荆江分洪上。根据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对于灾害严重的河流，为了防御更大的洪水，应有计划地缩小灾害，努力防止各大江河严重溃口改道”的指示精神，本着小利服从大利、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指定荆江大堤、汉北大堤以及武汉市、黄石市两大工业城市堤防为确保堤段。为了确保荆江大堤、汉北大堤以及武汉市、黄石市的安全，上至枝江下至鄂城的长江两岸、上自襄阳下至汉口东西湖的汉江两岸20多个分洪区、蓄洪区被淹。这些地区的人民为了整体利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另外，在对灾民的救济工作中，政府更是居于主导地位。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当时的湖北省政府号召全体干部全力以赴，不惜任何代价，以保证对灾民的救济。为了保证分洪转移灾民的生产与生活，政府发放了大量的救济款。在这次洪灾中，由于新政府的有力推

动和统一组织，改变了过去各自为政的局面。

因此，抵御这场特大水灾的，不单单是湖北人民，而是全国人民，抗洪救灾的物力、人力补给线是分布于全国的。1954 年水灾后武汉、荆江大堤和汉北大堤能成功保住，是调动全国力量的结果。当时的中国政府体现出了杰出的协调能力和指挥能力。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体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坚持生命第一的原则。1954 年水灾发生之后，各地都在“抗灾第一”、“生命第一”的原则指导下展开工作，尽最大努力抢救和维护灾民的生命安全。为了使灾民免于流离失所，维持灾区生产，当时的湖北省政府采取了大规模转移措施，政府有关部门也主动配合工作。如粮食部门提出“粮随人走”，保证粮食供应；商业、合作部门提出灾民到哪里，购销人员到哪里，保证物资及时供应与收购；卫生部门组织医疗所或流动医疗组，发现疾病即突击治疗。国家还向灾区发放大量农业贷款，提供必要的种子，供应适量的肥料。受灾地区根据不同灾情，采取适当措施尽力抢救，以争取最大的收成。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与灾害争粮食”、保证“不荒一亩地”的口号下，各地都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监利、荆江等县提出救灾如救火、“救一亩是一亩、救一分是一分”、“排渍如抢火，救秧如救命”、“边抢边耕边栽”等口号，帮助群众排水救苗，战胜灾害。

三、积极组织灾民生产自救，而不是进行单纯的政府救济。这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它与过去时代的单纯“赈济”有显著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当时的湖北省政府在抓紧抗洪工作、进行政府救济的基础上，积极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帮助灾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在渍水不能排除、田地全部或大部分被淹没的地区，组织灾民开展副业生产，以增加收入。如江陵、公安、武昌、孝感等几个县，开展了打鱼、打草鞋、打篾货、打石子、打芦席、挖药材、捉鳝鱼、捉乌龟、驾船、挑脚、砍柴、纺麻线等十多种副业生产项目。另一方面，在灾民思想不统一，自救门路各异，劳动力及资金

分散，因而自救能力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政府加强领导，组织灾民进行有效的生产自救。如当时的临时性互助组就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以互助组为核心的抢救和补种，大大减轻了灾情的程度，灾民的思想情绪也大为稳定，并将过去悲观失望、准备逃荒或等待政府救济的思想，转变为积极抢救补种、团结起来战胜灾荒的信心，从而增强了灾民在灾害条件下的自救与生存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旧中国的历届政府都曾经组织过对遭受自然灾害民众的赈济，但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措施。1954 年湖北水灾救济的经验证明，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救灾工作纳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总体性规划中，是应对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一个有效措施。

（侯松涛　执笔）

参考文献：

[1] 李勤：《1954 年湖北水灾与救济》，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9 期。

[2] 刘大禹：《试论 1954 年水灾和建国初期农村集体保障制度的关系》，载《船山学刊》2005 年第 4 期。

[3] 万华英、马俊林：《1954 年湖北特大水灾与救灾》，载《湖北文史资料》1998 年第 4 期。

[4] 张佑清：《我的经历的 1954 年抗大洪、大涝》，载《武汉文史资料》1998 年第 2 期。

[5] 殷月兰：《建国初期抗水灾》，载《纵横》2000 年第 4 期。

[6] 刘宁：《1954 年与 1998 年长江洪水比较》，载《中国保险》1998 年第 12 期。

1975年驻马店大洪水

1975年8月，在一场由台风引发的特大暴雨中，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间相继垮坝溃决。在这次被称为"75·8"大水的灾难中，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96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由一场特大暴雨而引发整整一个水库群的大规模溃决——无论是垮坝水库的数目，还是蒙难者的人数，都远在全球同类事件之上。

一、特大暴雨的降临

1975年8月4日，该年度中国内地第3号台风（"7503号"台风），穿越台湾岛后在福建晋江登陆。此时，恰遇澳大利亚附近南半球空气向北半球涌动，西太平洋热带幅合线发生北跃，致使这个登陆台风没有像通常那样在陆地上迅速消失，却以罕见的强力，越江西，穿湖南，在常德附近突然转向，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

8月5日，行径诡秘的"7503号"台风突然从北京中央气象台的雷达监视屏上消失——由于北半球西风带大形势的调整，"7503号"台风在北上途中不能转向东行，于是"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灾祸由此引发。"停滞少动"的具体区域是在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大弧形地带，这里有

大量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山谷和两山夹峙的峡谷。南来气流在这里发生剧烈的垂直运动，并在其他天气尺度系统的参与下，造成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这个最易产生特大暴雨的地区，又恰是兴建水库的最佳区域——上百个山区水库在这里星罗棋布。

这场特大暴雨，是水库设计者们未曾预计的。从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三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最强大的雨带，位于伏牛山脉的迎风面，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暴雨的降水强度，在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纪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纪录。

目击者称：暴雨到来的数日内，白天如同黑夜；雨水像从消防水龙中射出；从屋内端出脸盆，眨眼间水满；暴雨如矢，雨后山间遍地死雀。暴雨区形成特大洪水，量大、峰高、势猛。洪汝河在班台以上的产水量为57.3亿立方米，沙颍河在周口以上的产水量为49.4亿立方米。滚滚而至的洪水，对暴雨区内的水库群造成严重的威胁。

板桥水库设计最大库容为4.92亿立方米，设计最大泄量为1720立方米每秒。而它在这次洪水中承受的洪水总量为7.012亿立方米，洪峰流量每秒1.7万立方米。8月5日晨，板桥水库水位开始上涨，到8日1时涨至最高水位117.94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3米时，大坝在主河槽段溃决，6亿立方米库水骤然倾下，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9万立方米每秒，在六小时内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又以平均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至9米、水流宽为12到15公里的洪流。

石漫滩水库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至8日零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库内1.2亿立方米的水量以每秒2.5万到3万立方米的流量，在五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漫决。



板桥水库被洪水冲垮后的惨境（李德武摄）

洪河下游泥河洼、老王坡两座滞洪区，最大蓄水量为8.3亿立方米，此时超蓄4.04亿立方米，蓄洪堤多处漫溢决口，失去控制作用。

驻马店地区的主要河流全部溃堤漫溢。全区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60亿立方米洪水疯狂漫流，汪洋一片。因老王坡滞洪区干河河堤在8月8日漫决，约有10亿立方米洪水蹿入汾泉河流域。9日晚，洪水进入安徽阜阳地区境内，泉河多处溃堤，临泉县城被淹。

二、百万灾民浸泡在水中

“75·8”暴雨由三场降水构成。第一场暴雨出现在8月5日14时，持续了10个小时。当日，板桥雨量站测得日降雨量为448.1毫米，最大1小时降雨量142.8毫米。而按水库“千年一遇”校核标准，最大日降雨量才是306毫米。板桥水库水位迅速上升到107.9米，已接近最高蓄水位。

因灌渠阻碍泄水不畅，大坝外的洪水淹没了水库的坝基。板桥水库管理局院内，5日晚积水达一米多深，电话总机室被水泡塌，电话线路中断，管理局与水库上游各雨量站全部失去联系。公路交通中断，板桥镇街积水二尺，供销社、信用社被大水冲倒，大部分民房倒塌。板桥公社干部在慌

乱中组织力量转移老人和儿童，派出所干警则紧急抢救被水浸泡的档案。

8 月6 日早晨，刚从省里开会回来的驻马店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陈彬到机关上班，发现指挥部成员已分头到基层防汛。此时，遂平县已对汝河随时可能溃堤提出警告，要求地区速送防汛物资。

上午，板桥水库管理局报告灾情的人员赶到，他们汇报的主要内容是“板桥镇遭淹”、“群众生活发生困难”。

陈彬提出：1. 立即派出一个 10 余人的医疗队，抢救伤病员；2. 群众家被淹，粮食也被淹，粮食部门要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3. 商业部门负责解决煤等其他用品；4. 通知邮电局抢修线路。

地委副书记补充：以地委、地革委的名义慰问灾民和板桥水库的职工。

当天，陈彬赶到板桥，地革委生产指挥长刘培诚也到板桥察看情况。当晚，刘培诚返回驻马店，陈彬为了“搜集一些好人好事”，留住板桥。

这就是驻马店方面在 8 月6 日对板桥水库灾情作出的全部反应。

“75 · 8” 暴雨的第二场降水出现在 8 月6 日 12 时到7 日 4 时。

6 日 23 时，板桥水库主溢洪道闸门已经提出水面，紧接着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水位仍在上涨，库水位高达 112. 91 米，而设计规定的最高蓄水位只有 110. 88 米。

7 日中午，陈彬召集板桥驻军、板桥公社、水库有关负责人开会，紧急会商防汛事宜。会议中发现，水库及板桥镇完全没有防汛器材，没有木料、草袋、铅丝，也没有准备应付意外情况的炸药，驻军名义上是炮兵，但有炮无弹。这时，通信线路中断。

午后，天奇黑，雨势更猛。从 16 时起，“75 · 8” 暴雨的第三场降水，也是最大的一场降水出现，这场暴雨将持续 13 个小时！

陈彬不懂水利，只感到“雨下得这么暴，库水泄得这么慢，情况有些不妙”。他再次召集会议，除请驻军使用连队报话机试图对外作接力通信外，还紧急呼吁各级部门调集一切可以替代的物资参加防汛。

板桥水库位于泌阳县境内，该县县委书记朱永朝于 7 日傍晚赶到板桥镇。面对板桥水库的危急形势，他果断决定：立刻安排水库下游的板桥、

沙河店的群众撤离，并协助陈彬拟就一份告急电报，通过军队辗转上送。

这是8月7日晚7时许。

与此同时，驻马店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正召开紧急抗洪会议，会上讨论了宿鸭湖、宋家场、薄山等水库可能出现的险情，唯独没有谈到板桥。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回忆，板桥水库根本就没有报险。事实是，一方面因为板桥与驻马店的通讯完全中断，一位携带报话机进行接力通讯的驻军士兵在行至沙河店时被汹涌的洪水卷走；再则，板桥水库因其坚固而无法使人联想到“垮坝”。

与此同时，河南省水利厅在郑州召开紧急抗洪会议，会议的焦点是如何死守薄山水库、保住宿鸭湖水库及石漫滩水库是否要炸副泄洪道的问题；也有人担心板桥水库的情况，有人在会上建议：速炸板桥水库副泄洪道，以增大泄洪量！但这一建议已无法传到板桥。

截止7日21时，确山、泌阳已有七座小型水库垮坝，22时，中型水库竹沟水库垮坝。

此时，板桥水库大坝上一片混乱，暴雨柱儿砸得人睁不开眼，相隔几步说话就无法听清。大批水库职工、家属这时正被转移到附近的高地，飘荡着的哭声、喊声和惊恐的各种声响在暴雨中形成一种惨烈的氛围。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一寸寸地上涨，淹至自己的脚面、脚踝、小腿、膝盖……

上涨的库水迅速平坝，爬上防浪墙，将防浪墙上的沙壳一块块掏空……水库职工还在作着无谓的抵抗，有人甚至搬来办公室里笨重的书柜，试图挡住防浪墙上不断扩大的缺口……一位忠实的职工在暴雨中用斧子凿树，以记录洪水水位……

突然，一道闪电。紧接着是一串炸耳的惊雷。万籁俱寂。

暴雨骤然停止——夜幕中竟然出现闪闪烁烁的星斗。

这时，就听一声惊叫：“水落了！”

刚才还在一寸寸上涨的洪水，在涨至小腿、膝盖、腹部，甚至向人们的胸部漫淹去时，突然间就“哗”地回落下去，速度之迅疾使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洪水的确在眨眼间退去。

就在那些“老婆孩子”欢呼“水落了！水落了！”的时候，板桥水库管理局公安科长马天佑的脸色骤然间变白，刚才的那个劈雷，曾使他周身触电似的麻了一下；此刻，那座刚才还如同一只充足气的巨大气球的板桥水库突然间萎瘪，6亿立方米的库水令人恐怖地滚滚泄下。约8.1亿立方米洪水向四面八方奔突，扫荡，又在四面八方合流扩展，在直立如壁的惊涛骇浪前，田园、村落、集镇，须臾间化为乌有……

水库垮坝所致的大水与通常的洪水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这种人为蓄积的势能在瞬间的突然释放，具有无法抗御的巨大的毁灭力量。

板桥水库垮坝后，距水库最近的沙河店镇首先被大水吞噬。尽管泌阳县委书记朱永朝在事前布置了紧急撤离，但因洪水势头凶猛，全镇6000余人中仍有827人遇难。

撤离的通知，仅仅限于泌阳县内。由于驻马店方面没有也不可能向全区作出相应的紧急部署，与沙河县仅一河之隔的遂平县文城公社，群众完全没有得到洪水警报，因此文城成为“75·8”洪水中损失最巨的地区：全公社3.6万人口中，有1.8万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七家人绝户！

笔者曾访问当年的“三队”——如今的一个小行政村。“75·8”大水的幸存者说：大水下来前，我们咋知道水库会有危险呢？天黑时，村里人看见河南岸沙河店那边影影绰绰有人在比比划划大喊大叫，可风声雨声太大，根本听不清喊的啥！

村民魏长河，全家六口人中有四人丧生。他回忆：喂饱牛时（约下午4时），雨已下得很大，天黑时，全队人都往地势较高的大队部躲。三个妮儿，俺家里的抱一个，我抱俩，手里还拉着一个12岁的小子，刚进院子，眼看着大水就从高高的墙头扑进来，像盖被子似的把满院子人都闷在里面。

当时50岁的吴桂兰说：俺和11岁的妮子被水闷住后，倒塌的墙就砸在俺娘俩身上，险些被砸死，幸亏一个大浪把俺们托起，掀了出去，妮子眨眼间就不见了，俺只觉着昏天黑地，抓住一张秫秸箔就随水飘走了。

村民魏东山回忆：我让老奶奶躲进拖拉机驾驶室里，大水下来时，水

头将奶奶和拖拉机一起卷走了。

当时已74岁的老大娘赵二妮，全家八口四人丧生。她说：见大雨下得这个样，我就在屋里蒸馍，蒸了一屉子又一屉子，眼见着雨越来越大，我把衣服都翻出来，穿上了两条裤子，三件上衣，连袄都穿上了，就听儿子喊，快走快走，快上大队院！俺娘俩还没有走到大队部，就听见轰隆隆一片房倒的声音，还不及挪步，人就漂在水里了。

魏长河回忆：我抓着房上一只藤箩往下冲，一路冲到遂平城下，也不知喝了多少水。人说，县城南门、车站大桥和铁路是三道鬼门关，哪一道都是进去就出不来，我竟然都冲了过去，浑身的衣服撕得稀烂，一路上就听见大人哭孩子叫，一排排水鬼明晃晃地向你扑过来，后来才知道，那是露出水面的电线杆上的白瓷瓶。

魏世兴回忆：白花花的大水一眼望不到边，我在水里不知翻了多少个滚，憋得不行，一露头，见两个大“淤杂”（草垛、杂物形成的飘物堆）向我冲来，其中有一棵连根拔起的大桐树，上面攀着许多人，乱哭乱叫，有人喊：“抱好东西！抱好东西呀！”我记得水里到处都有电灯一样明晃晃的东西。

赵二妮老太太被卷到上百里外的阳丰大桥底下才被一棵树卡住，她挣扎着从树枝里爬出，临时穿上的几件衣服早就被洪水冲没，身上拉了许多口子，没剩下一块好肉。

从板桥水库倾泄而出的洪水，排山倒海般朝汝河两岸席卷而下，文城拖拉机站75马力的链轨拖拉机被冲到数百米外，许多合抱大树被连根抛起，巨大的石碾被举上浪峰。板桥水库底部高程为120米，文城魏湾的高程为100米，遂平县城的高程为65米，县城东部的高程为50米。洪水就这样借着高程的落差顺势而下，板桥水库8日凌晨1时垮坝后，仅一小时，洪水就冲进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遂平县40万人，此时有半数漂没水中，一些人被途中的电线、铁丝缠绕勒死，一些人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线铁路高坡时，坠入旋涡淹毙。洪水将京广铁路的钢轨拧成绞丝状，将石油公司50吨油罐卷进宿鸭湖中。

板桥水库垮坝五小时后，库水即泄尽。汝河沿岸，14个公社、133个

大队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见的冲击灾害。洪水过处，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尽，黑土荡然无存，遗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鲜黄色。

翻越了京广铁路的洪峰，从西平、遂平两县境内继续向下游冲击，驻马店地区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成泽国。

大量的洪水涌入著名的“险库”宿鸭湖水库，该库堤内堤外皆是白花花的大水，库堤只能容一辆卡车通过，苍茫中犹如一条飘飘欲断的细带。而就在这条细带上，拥挤着将近5万的灾民。

宿鸭湖水库技术人员赵搭拉回忆：当时只听“咚！咚！咚!”，堤外一座座泡在水里的房屋垮了。上游冲下来的“淤杂儿”、人，挤在水库的进水处，像旋涡一样打着转转。“救人呀！救人呀!”哭喊成片，眼看着一个个人栽在水里就没有了。

侥幸的是，大水下来的八天前，宿鸭湖水库刚刚完成了抢修工程，由于该库常年隐患未除，下游有阻水工程，又因周围群众屡屡哄抢护坡石料而遭损坏，赵搭拉在1975年初两次上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报警”，在中央干预下，有关部门终于批准了宿鸭湖水库抢修工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次抢修，这座“险库”也必然会在这次大水中垮坝。

这条“细带”和这5万灾民的生命就这样被幸运地保存下来。

数百万灾民泡在水里，发病率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病人有113.3万……

板桥、石漫滩诸水库失事当日，驻地距灾区最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某师及其他部队的近万名官兵便已奉令赶到驻马店地区抗洪救灾。自8月9日起，武汉军区的大批救援部队也昼夜兼程陆续抵达灾区。灾害之惨重远远超出预料。此时，数百万灾民被浸泡在久久不退的积水之中，而头上暴晒着三伏天火辣辣的骄阳。

笔者从驻马店地区的档案资料中查到一部分残缺不全的电话记录、情况通报，这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披露了驻马店各县群众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后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真实景况。

8月13日：

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1小时2公分，全区200万人在水中。

汝南：10万人被淹（指尚飘浮在水中），已救4万，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20万人脸肿腿肿，拉肚子，无药。

新蔡：30万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

上蔡：60万人尚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4000人已把树叶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300人六天七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

宿鸭湖水库：大坝上5万人四五天没吃东西了。

平舆：还有40万人在水里，肠炎、脑炎流行。医疗队下去了，但没药物，很多地方出现了灾民有病哭、医生看了病没药也哭的情况。

8月14日：

全地区尚有177.3万人泡在水里。其中上蔡64万，新蔡45万，汝南25万，平舆40万。

汝南提出口号：保证每人一天一斤红薯干。

8月15日：

全地区尚有140余万人浸泡在水中，其中上蔡55万，新蔡40万，汝南25万，平舆30万。

8月16日：

全地区120万人还在水里，其中上蔡52万，新蔡20万，汝南4万，平舆23万。

平舆县射桥大队有三个老头因没吃又无救而上吊自杀。

8月17日：

全地区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万。上蔡50万，党店公社堤上7000人，公路上4500人，树上、筏上3.1万人，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老百姓缺衣，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六个孩，三个孩仍光身，三个只有裤头。

新蔡：用大锅煮红芋片救济群众。

汝南：确保1人1天3两面、7两红芋干。

全地区发病率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病人113.3万，其中汝

南8万；平舆25万，其中王冢公社4.2万人，发病1.7万人，医务人员尽最大力量，一天仅治800人，死7人；西平病人11万；遂平15万；上蔡25万。

8月18日：

平舆、上蔡、新蔡尚有88万人被水围。

汝南：50万人发病32万。其中痢疾3.3万，伤寒892人，肝炎223人，感冒2.4万，疟疾3072人，肠炎8.1万，高烧1.8万，外伤5.5万，中毒160人，红眼病7.5万，其他2.7万。

上蔡：群众生活极困难，华陂公社5.6万人仍有2.16万人泡在水里。刘连玉村八户围1只破锅做饭，用南瓜挖空做碗，树枝当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虫吃树叶。已病死21人。刘庄大队11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11日死。和店王妮13岁生病无药，17日死。全社脑炎死3人。

8月19日：

全地区尚在水中的人数44.8万。

上蔡：水中仍有40万，病死15人。

新蔡：水中仍有4万，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

平舆：截至昨天，已病死113人。

遂平：县里粮食吃完了。

各县纷纷要求速送治疗脑炎的安宫牛黄丸。

8月20日：

全地区尚有42万人在水中，病死者274人。其中确山病死16人（乙脑10人），汝南病死5人，遂平病死50人，西平病死135人，上蔡病死28人，新蔡病死20人。

8月21日：

全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

汝南：得病32万人，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

新蔡：发病人数22.8万，占41%，20人死亡。

上蔡：73人病死。

平舆：和店公社14个大队187个生产队4.3万人已在水中12天，水

深处2米，浅处1米，老人和孩子都绑在树上。熟食不足，灾民11天没吃盐。孟庄大队东洼生产队，捞一死驴，灾民乱割食。公社党委书记问县委：几万人生命危险，你们还要不要我们？飞机空投食品50%到60%落在水里，大李大队灾民见水中漂的烂南瓜，乱抢食，37人中毒。

驻马店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就这样度过长达半个月的时间……洪水退去的地方，到处可见人畜的尸体。尸体在烈日下腐烂，在洪水曾经肆虐过的地方罩起一层可怕的雾，一位曾经参加救灾的军人后来回忆，在漯河至信阳的公路两旁，沿途所有的大树树枝，都被黑压压的苍蝇压弯了。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后，李先念下令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紧急出动，在中央慰问团的指挥下执行爆破任务。

如果说水库垮坝所引起的冲击性灾害给洪汝河流域的百姓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一击，那么河道宣泄不畅、洪水居高不下所造成的浸泡性灾害，则更加残酷地延续和加重了这场灾难本身的损失。

三、李先念："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们就同意炸开哪里。"

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后的第五天，1975年8月1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为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抵达驻马店灾区。中央慰问团的专机到达李新店军用机场后，纪登奎等即换乘两架米—8直升机作空中视察。

水利专家陈惺陪同纪登奎。直升机起飞后，先在空中视察京广铁路以东的灾区，看了平原上的汝河和小洪河。在所视察的汝南、平舆、新蔡、上蔡和西平县的范围内见到的几乎是一片汪洋，5座县城和条条块块分布的高地如同散布在海中的岛屿。直升机飞行的高度仅50米，能清楚地看到每座"岛"上都密集着灾民。一些"岛"人多面积小，大量灾民不得不站在水里和爬在树上。

直升机继而转向铁路以西，视察被冲垮的板桥、石漫滩水库。两座水库的大坝都在中段被冲开，形成深深的豁口。库水早已排完，露出干涸的库底。坝下沿河两岸，无论是村庄房屋还是道路树木，都被洗劫一空，留

下一片荒凉。

中央慰问团在视察后认为，为了解救还困在水中的百万灾民，必须尽快排除洪汝河平原的积水。

陈惺向慰问团成员说明，这次受灾严重的洪河和汝河，在新蔡县城以南汇合后，向下至班台又分为两支：西支称大洪河，向南入淮河；东支称分洪道，经蒙河分洪道再入淮河。现在，由于大洪河的上段是在高地上切岗开通的，河岸陡峭，因此上游水位升高而河道流量增加甚少；分洪道虽然地势低下，但在进口处修有班台闸节制流量，也不能有效地扩大下泄流量。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洼地称洪洼，历史上是大水时的自然行洪道，可这些年洪洼已被围垦，丧失行洪能力。这些因素都使得班台以上洪水壅积难下。当今之计，唯有使用爆破手段，炸开阻水部位加速行洪。

8 月 13 日晚 9 时，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紧急通知陈惺，陪同慰问团成员、农林部部长沙枫速回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刘建勋含着眼泪对陈惺说："你去，代表我，代表河南，只有一个请求，炸开阻水工程，解救河南人民。"

14 日零时 15 分，沙枫等抵达北京。

国务院会议室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已召集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军委负责人等候开会。

沙枫首先汇报中央慰问团和河南省委关于加快排水的意见。李先念说："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们就同意炸开哪里。"陈惺在地图上指出了需要爆破的位置，李先念在征求身旁水电部长钱正英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要钱正英起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

在钱正英起草命令时，李先念又问陈惺还有什么问题，陈说，宿鸭湖水库尚未脱险。李先念要陈惺立即和河南通电话，采取紧急措施，确保水库安全。深受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事件刺激的李先念，痛心地说："宿鸭湖水库再也不能出事，再出问题，它就是催命鬼！"

钱正英起草好联合命令，李先念看后即和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通话，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后，李先念下令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紧急出动，在中央慰问团的指挥下执行爆破任务。因为时间紧迫，李先

念要求部队先行出发，由他亲手签字的命令随后由空军空投到各部队所在位置。

14 日清晨，沙枫等返回驻马店。纪登奎决定由沙枫任组长、陈惺等为成员组成爆破指挥小组。陈惺向纪登奎转达李先念关于确保水库安全的指示，纪登奎说：“如果水库再出问题，我们就下地狱了，绝升不了天堂。”

指挥小组随即乘直升机去新蔡，转乘机船赶赴爆破点。上午 10 时，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令德指挥下，对最大的阻水工程班台闸施行爆破。巨响声中，班台闸所有的闸门、胸墙、桥面和部分闸墩都腾空而起，分洪口门由此打开。

全部爆破工作进行了整整两天。

扩大行洪后，为确保下游淮河大堤的安全，纪登奎指示陈惺等人乘船直达蚌埠，入安徽境内察看灾情。只见沿途各地都在鸣锣疏散百姓，由于班台闸被炸，大量河南境内的洪水向下游倾泄，致使淮河中、下游的形势紧张。淮河多年受重蓄轻排指导思想之害，行洪道上早已围堰丛生，如同处处设卡，本在 1956 年就已达到抗拒 1954 年大洪水标准的河道，此时的泄洪能力却已下降 30% ~40%，河道上星罗棋布的“关卡”造成淮河“肠道”的严重“梗阻”，陈惺亲眼见到沿途的淮河河道平堤流水，险象环生。

四、痛定思痛

在“大跃进”的推动下，驻马店地区的水库建设蜂拥而上，一发而不可收拾，1957 至 1969 年间，新建水库 200 多座，由于片面重视蓄水，忽视防洪，导致隐患四伏，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兴建于 1950 年代“治淮”初期。

淮河流域地处中国大陆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多变。在 12 世纪以前，淮河水系完整，独流入海，水流通畅。12 世纪以后，黄河连续夺淮改道达六七百年之久，带来的恶果是淤塞干、支流河道和入海出路，使中下游河道比降（即水力坡度）非常平缓，干、支流排水能力甚小，洪水流路不畅。

1950 年夏，淮河大水，灾害惨重。同年 10 月，政务院作出了《关于

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具体制定了“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和“低洼地区举办临时蓄洪工程，整理洪汝河河道”的战略部署。

1950年代的“治淮大战”中，在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在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据称，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标准很低。板桥水库在工程运用中发现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于是，1955至1956年间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工程扩建。洪水标准按照苏联水工建筑物国家标准进行设计。板桥水库采用1%频率设计，0.1%频率校核（即通常所说的百年一遇和千年一遇）。校核频率3天降雨量530毫米，洪峰流量每秒5083立方米，3天洪量3.3亿立方米。据此，决定大坝加高3米，坝顶高程为116.34米，防浪墙高程为117.64米；增辟辅助溢洪道，宽300米，底部高程为113.94米，连同原有的溢洪道、输水洞，最大泄洪能力为每秒1742立方米，最大库容4.92亿立方米，其中调洪库容3.75亿立方米。石漫滩水库按2%频率设计，0.2%频率校核（即50年一遇设计500年一遇校核），校核频率3天降雨486毫米，洪峰流量每秒1675立方米，3天洪量0.88亿立方米。据此，确定大坝加高3.5米，坝顶高程达到109.7米，防浪墙顶高程111.2米。经过加固，最大库容为9440万立方米，其中调洪库容为7040万立方米，最大泄量每秒390立方米。

这就是板桥、石漫滩两座水库垮坝前实际具备的工程标准。应当说经过改善、加固的两座水库，就工程质量而言，并无严重问题。

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加固扩建后的三年间，中原地区的水库建设蜂拥而上，一发而不可止。仅1957至1959年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水库100多座。

1958年“大跃进”期间，河南总结了漭河流域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河南视察时将其归纳为“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并说：“现在山区问题解决了，要把漭河经验向平原推广。”

陈惺当时即指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

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专家的忠告被忽视了，“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推及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条状水库”，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症。“以蓄为主”一度成为水利建设的“纲”。

陈惺是远东最大的平原水库——河南驻马店境内宿鸭湖水库的设计者。该水库施工时正值“大跃进”，省水利厅一位副厅长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

同此遭遇的是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该闸闸孔原按800秒立方米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水文数据被人为减小，只建造了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年又人为堵闭两孔。

“大跃进”之后，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河南亦如此。然而，现存的气象资料显示，1959至1961年间并无特大自然灾害出现，但事实上中原大地却灾象频生：涝、渍、碱三灾闹豫，黄淮间饿殍盈途。无疑，各地水利建设的失误增加了这次灾难的“人祸”比重。

1961年，刘建勋调任河南省委书记，他认为河南灾大，“是水利方面的问题造成的”。为纠偏，他到处寻找水利工程的“反对派”。在信阳，他找到了发配在那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惺。大跃进中，陈惺对有人捐献不锈钢表带炼钢表示不以为然，说：“用不锈钢表带炼钢主要是锻炼人，就是锻炼人代价也太高了!”这同他说“用放卫星的方式修建水库是劳民伤财”的话如出一辙。

在1961年开始的“纠偏”中，河南对全省水库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对一部分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较差、存有隐患的水库，包括一些大型水库，予以废弃。

但是指导思想的失误并没有真正被扭转。重蓄水灌溉，轻河道治理，

重兴利、轻除弊的倾向依然顽固存在。到20世纪60年代末，驻马店地区又新增水库100多座，与此相对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一年年递减。

1975年8月特大洪水到来之前的淮河上游地区，事实上已隐伏着严重危机：河道宣泄不畅，堤防不固，许多“病库”隐患未除。更为严重的是，对于板桥、石漫滩等大型水库的潜在危险，人们并无警觉。准确地说，“垮坝”二字在人们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

由于片面重视蓄水，忽视防洪，石漫滩水库在溢洪道上增加了1.9米的混凝土堰，板桥水库在大雨前超规定蓄水3200万立方米。

人们过于笃信“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等既定的洪水标准，自信石漫滩水库可驭控50年一遇的洪水，在500年一遇的洪水中也能自保；板桥水库可以驭控100年一遇的洪水，在1000年一遇的洪水中也可无恙。

谁也没有见过“千年一遇”的洪水，所有数据都是根据人们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推算而来。1975年8月，真正的大洪水来了。沛然而降的雨水使人们瞠目结舌：它的雨量，竟相当于人们所说“千年一遇”设计标准的两倍！由于板桥水库素被称作“铁壳坝”，加上通信断绝，板桥的险情被忽视了。

点评：

197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水电部在郑州召开全国防汛和水库安全会议，水电部长钱正英对于此次驻马店水灾的经验教训作了如下的总结：

对于发生板桥、石漫滩水库的垮坝，责任在水电部，首先我应负主要责任。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过去没有发生过大型水库垮坝，产生麻痹思想，认为大型水库问题不大，对大型水库的安全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二是水库安全标准和洪水计算方法存在问题。对水库安全标准和洪水计算方法，主要套用苏联的规程，虽然作过一些改进，但没有突破框框，没有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更没有及时地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作出符合我国情况的规定。三是对水库管理工作抓得不紧，对如何管

好用好水库，对管理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有关水库安全的紧急措施，在防汛中的指挥调度、通讯联络、备用电源、警报系统和必要的物资准备，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板桥、石漫滩水库，在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电信中断，失去联系，指挥不灵，造成极大被动。四是防汛指挥不力，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之前，没有及时分析、研究情况，提出问题，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减轻灾情，我们是有很大责任的。

板桥、石漫滩水库工程质量比较好，建成后发挥很大效益。但因兴建时水文资料很少，洪水设计成果很不可靠。板桥水库在1972年发生大暴雨后，管理部门和设计单位曾进行洪水复核，但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和相应的措施，所以防洪标准实际上很低。

由于重视蓄水，忽视防洪，石漫滩水库在溢洪道上增加了1.9米的混凝土堰，板桥水库在大雨前比规定超蓄水3200万立方米，运用中又为照顾下游错峰和保溢洪道而减泄400万立方米。这虽对垮坝不起决定作用，但减少了防洪库容，提前了漫坝时间。由于事前没有考虑特大洪水保坝的安全措施和必要的物资准备，在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电信中断，失去联系，不能掌握上下游汛情，不能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也没有及早向下游遂平县发出警报，组织群众安全转移。

钱正英的这番讲话，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像板桥、石漫滩这样的水库溃坝事件，再也不能重演了！

（正文：钱　钢　执笔　原文章名为《1975年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载《南方周末》2005年9月8日。收入本书时程美东对原文略作删节，原文顺序也略有调整，各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中国唐山市突然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仅仅几秒钟后，唐山夷成废墟，656100多间民用建筑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以上。地震罹难场面惨烈到极点，为世界罕见。人类不能忘记，地震的警钟还会在某一天敲响。人类永远不会忘记唐山大地震。

一、大地震前一系列的反常现象

7月下旬起，北戴河一向露出海面的礁石被海水吞没，海滩上过去能晒三张渔网的地方只能晒到一张渔网，海水还淹进了海滨浴场淋浴用的房子。而距唐山比较近的蔡家堡等海域，从前碧蓝蓝的海水变得浑浑黄黄。一位潜泳于秦皇岛海域的人在水下看见了一条明亮的光带，就像一条不安的火龙。

唐山滦县一口井平时用扁担就可以提起水，忽然有人用扁担无法提起水来，当他取来井绳时，井水又突然猛涨，超过了平时的水位。唐山丰润县一口50多米深的机井，从7月中旬起水泥盖板的小孔就上往外冒气，到了7月25日，喷气十分猛烈，几十米外能闻其响，气孔上面小石头都能悬起。

电磁也出现怪异现象，警醒人类！

距唐山200多公里的佛爷顶山空军雷达站，26、27日连续接收到来自京、津、唐上空的奇异的扇形指状回波，这说明在京、津、唐地区突然出

现了一个神秘的磁场，北京、唐山半夜不少人家已经关电的日光灯依然奇怪地亮着，北京通县有人甚至发现一只拆下的日光灯还在闪闪发亮。7 月 27 日，唐山一个军队驻营里，一堆钢筋竟然迸发出闪亮的火花。

唐山的一个矿区还飘来了一股散发着硫磺味的淡黄色的“臭雾”，使人迷惘不已。

与人类朝夕相处的动物更是奇行迭出，仿佛要唤醒人们，灾难即在眼前！

7 月 25 日上午，唐山附近农村一百余只黄鼠狼，大的背着小的蜂拥钻出一个个墙洞，有十多只跑到一棵核桃树下乱转不已，被村民打死几只后其余亦不离去，怪叫不止。随后这群黄鼠狼向村外转移。另一村庄棉花地里若干群老鼠仓皇乱窜，小老鼠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

7 月 24 日，唐山市陈玉成家中两只鱼缸中的金鱼不断跳出水面，当主人把跃出来的金鱼放回缸中时，它们竟然尖叫不止。25 日唐山一养鱼场草鱼成群跃起，有些草鱼竟头朝下尾朝上，倒立着陀螺般飞速打旋。



天津大沽口海面的“长湖”号油轮出现传说中史前大洪水时“诺亚方舟”般的景象：大群深绿色蜻蜓扑向船窗、桅杆和船舷，密密麻麻，赶之不去。接着，大群的五彩蝴蝶、蝗虫、蝉、蝼蛄、麻雀都飞来了。船员们还记得，最后飞来的是一只色彩迷人的虎皮鹦鹉。这是发生在 7 月 25 日的怪事。7 月 27 日白天，唐山一村庄蝙蝠在大白天满院子飞，有人很轻松地捉了十多只。同日，农民家中屋檐下的燕子衔着乳燕飞走不再回来，有只燕子还在最近几天连续将小燕扔出巢外，主人把小燕放回巢，又被它摔出来。27 日，村民看见密集的大群蜻蜓集成约 30 平方米的飞行方阵向北飞去。

7 月 27 日深夜，比人类早觉醒一步的自然界发出了最后的灾难呼告！

滦县深夜几个出夜工的年轻人惊叫着跳出洗澡池子，池子是从附近一口热水井里汲出的水，水突然烫得无法忍受。昌黎县看瓜的农民看到二百多米高的上空忽然明亮，地面照得发白，西瓜叶、蔓照得清晰可见，如同天亮一般。丰润县一个中学生被窗外的强烈光亮惊醒，他一看表，才凌晨 3 时多，这时天色又马上变得漆黑。

深夜12时回家的唐山人王财看见自己的四只鸭子竟还站在院子外，一见主人它们齐声叫唤，脖子伸长、翅膀张开，扑上来用嘴死死夹住主人的裤腿。抚宁县养貂场的400多只貂一起惨叫，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丰润县一养鸡场千余只鸡来回乱窜，嘎嘎怪叫。丰润县一马棚里喧响一夜，三点多钟，60辆马车的100多匹马全部挣断缰绳，嘶鸣着跃出马厩，在漆黑的夜里狂奔。这一夜，唐山地区许多人饲养的狗、猫都争相狂叫，恐怖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3时42分53.11秒，唐山上空出现强烈的几次蓝色闪光，地上狂风呼啸，惊雷轰响，大地发了疯似地摇撼，几秒钟后，唐山破碎了，一片死寂，灰色的尘雾浓浓地笼罩着唐山。

二、可惜的预报

既然有这么多的震前异常现象出现，为什么我们的地震工作者没有及时地利用之以为预报呢？是我们的地震工作者的水平不够吗？须知，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强烈地震前，国家地震局和各地地震工作者曾成功地发布了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全部撤离工作和住宅地点，虽然城镇房屋遭毁580万平方米，农村房屋遭毁86.7万间，但仅有1328人死亡，只占地震地区总人口的1.6%。

2005年唐山作家张庆洲在经过多年调查后向世人宣布：当年的地震工作者曾成功地预报了该次地震！

他说，曾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后来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

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震前准确预测漏报真相

当年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人员杨友宸告诉张庆洲，1968年，唐山市防震

工作上马时就他一个人。上任后他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个监测点每天向他报数据，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从不敢眨一下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

张庆洲分析指出，杨友宸是这个监测网的关键人物。他所采访的众多当事人都表示，杨友宸不仅极为负责，而且敢说话。如果当时杨友宸在唐山，面对如此众多的临震预报，一定会跑去找市长，找书记，地震预报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

据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回忆，1975年1月，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对我国东部1975年、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的权威们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两年，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则反对忽视东部的看法。1976年5月，云南发生了7.4级地震，结果使权威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原先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是正确的。从此，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①]

尽管如此，几位持华北地区今年将强震的观点的地震工作者坚持己见，并相继发现了八大异常：华祥文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和短期气象异常，李宣瑚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光忠和刘惠琳提出京郊大灰厂形变异常，以及有人提出该地区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他们分别向北京市地震队领导、北京市科技局领导、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和国家地震局领导作了汇报。

距唐山地震16天，中国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汪成民赶到会场，向代表们呼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并散发

---

① 楷体字部分引自李扬：《唐山：被捂住的地震预报》，载《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0月3日。

300多份调查表，希望一有临震突变异常立刻报告。汪成民回京后在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门口以大字报的形式呼吁紧急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北京市地震队在与国家地震局会商此事前于7月24日召开的准备会上，华详文、张闵厚、耿庆国、李宣瑚四人认定在7月底或8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大地震。当晚还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报来的意见：7月27日前，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以内，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

而这时的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在这半年里胡耀邦失去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位置，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被迫靠边，而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为应付政治运动就已经身心疲惫。

最后一次技术人员就监视、预报京津唐张地震要求领导召开的会议是在1976年7月27日上午10时——距唐山地震17小时。会上介绍震情的汪成民宣读了汇报稿，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而采取什么措施，似乎还是希望领导定夺。地震局领导最后拍板，要求他们拿出详细资料，用一周时间圈出危险区，并决定第二天派车去核实水氡异常现象。然后会议结束。

从此时算起15个小时之后，唐山特大地震发生了。由于惊恐慌乱和落后的通讯反馈，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之后，国家地震局仍不知道震中在哪里。而唐山的一切，早已无法挽回——地震预报彻底失败！

三、地震爆发的那一刻

3时42分53.11秒，唐山上空出现强烈的几次蓝色闪光，地上狂风呼啸，惊雷轰响，大地发了疯似地摇撼，几秒钟后，唐山破碎了，一片死寂，灰色的尘雾浓浓地笼罩着唐山。

整个唐山，没有一点声息。

就是这短短的几秒钟，唐山市区和农村682200多间民用建筑中，有656100多间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

除夜班人员和极少数早起者，绝大多数唐山人均在睡眠的情况下遭此浩劫。

地震震动情况如下：

极震区（烈度十一度）：唐山市区内，等震线约略呈北东走向的椭圆形状。东起开平区的越河，西至土产仓库、矿冶学院，往北到达煤研所、二十一中，往南到女织寨公社，短轴在5公里上下，长轴约10.5公里，整个极震区面积达47平方公里。

十度区：东起古冶、大庄蛇公社，北到付家屯公社和五犁庄公社，面积约为320平方公里。

九度区：东起滦县霍庄，西至宁河岳龙庄，南抵丰南县小集、西葛庄，北到丰润县李庄子一线，面积约为1430平方公里。

八度区：东起卢龙县石门，西至宝坻县林亭口，北起丰润县北部的火石营，南到渤海边，面积约5470平方公里。同时天津市的破坏已达八度。

七度区：东起抚宁县枣园，西到黄骅县歧口，往北则到三河、蓟县、遵化以北，往南则至渤海之中，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七度区虽远离唐山，但竟使蓟县辽代白塔塔身震裂、塔尖坠地；遵化县清东陵包括葬有慈禧的陵墓的石人石兽掀倒；往北万里长城的烽火台倒塌。）

六度区：大约以承德、怀柔、房山、沧州一线为界，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广大地区。

极震十一度区内，所有建筑一律被摧毁倒塌，荡然无存。质量较低的砖瓦被挤成粉砾，钢筋混凝土的梁柱被撕裂、挤酥、扭断。房屋砖墙倒塌、预制板的塌压，造成严重伤亡。

唐山市路南区建筑密度达70%，也在极震十一度区内，地震发生时，地裂缝穿过该区，其主要裂缝带沿东北方向延伸，宽30米，长16公里，一路穿过民房、围墙、路基和河渠，如同一道通向地狱的漆黑裂口，使农研所、东新街小学、地委党校、唐山十中、二十九中永远消失了踪影。极震十一度区内再没有任何人类建筑的立物。广大农村的砖石、土墙、房屋全部毁坏，难有幸免。

地震的破坏性，设置了一个个惊天动地的惨烈景观——唐山人民医院大楼十多米高的高楼竖直叠落，一落到底，所有的一切叠摞在一起，只形成了几米高的废墟。

矿冶学院图书馆藏书楼底层整体向西滑行平移，使上面三层落地，如



被地震扭曲的铁轨

同陷入地下一截。

唐山十中门前水泥马路被拦腰震断，一截向左，一截向右，彼此错开一米多。

火车站铁轨扭成蛇形，有些路段俯瞰像扁平的铁葫芦。有15节车厢的京齐40次特快列车七节脱轨，一节颠覆，钢混枕木被辗碎430根。载有10吨柴油的牵引机车在剧烈的晃动摇撼中燃起冲天大火。

雄伟宽阔的湾河公路大桥，几截桥面震落河水，剩下的斜搭桥墩成滑梯状，如同一长串凌乱无序的玩具积木。

开滦医院的七层大楼，变成三角形斜塔，阳台全部震塌，三楼阳台直直地砸叠在二楼阳台上，欲坠不坠。市委宿舍楼的一面墙被震倒，暴露出楼内各家各户的家用设备。外宾招待所餐厅只剩下一个空框架。

浓浓的灰雾将散之际，两只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狼四处奔窜，跃过断墙残壁、瓦砾堆和尸体，最后冲上凤凰山顶，发出令人毛骨惊然的悲嗥。

只有极少数人保留下那“破碎的几秒钟”的记忆：一个值班的护士在那几秒钟看见西北方的天空特别亮，好像失了火，又听不见人喊，到处如同死了一般。这时空气中传来“呜——呜”的巨响，像百八十台汽车在同

时发动。房子猛烈摇晃起来。这位护士奋力冲出屋，死死抱住一棵大树。只觉得大地晃悠，人和大树都往一个万丈深渊落下去……两位早起锻炼者突然听见“呜——呜”的如刮大风的声响，又见东北天边火红一片。大地紧跟着颠簸起来，两人死死抓住公园的铁栏杆，眼看着对面大楼眨眼工夫就倒下来。当他们跑回自己的家——哪里还有家，整个四周已是一片平地！

一位当时在火车站候车室的幸存者永远忘不了地震的那声巨响。3 点多钟，看见天色昏红好像在打电闪，她跑进候车厅。巨响瞬间她还以为是两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头对撞了。大厅摇晃起来，不断有东西落下来砸在人脑袋上的声音，被砸中的大人孩子一声接着一声惨叫。接着“轰隆隆”一声，整个候车厅落了架，几百人全被砸在里面，她听见很近的两声惨叫：“哎呀——”、“妈呀——”……睡梦中的人们，现在你们是废墟下的人们，你们在哪里?!

国家建委 101 工程指挥部第一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陈济民是这样回忆那场惨绝人寰、震撼人心的大地震的：窗外一道强烈的闪光，紧接着轰隆隆的巨响由远而近传来，睡意朦胧的我感到马上要下大暴雨了，准备下床关窗。刹那间，大地震动了，先是上下颠簸，后是左右震荡。“烨烨震电，不令不宁；百川沸腾，山冢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里描述的正是这种情景。

我下意识地感到这是大地震，本能地翻身伏在妻子和刚两个月的儿子身上，任凭大地震动。每摇一次，我都在心里默默地数一下：一、二、三……这样数了二十几下。离我们床不到三米的砖隔墙倒了；桌子上的东西摔在了地上；厨房里的瓶瓶罐罐也全摔碎了。

所幸我们住的是建筑工地临时搭的木板房，虽经震动，房子没有倒塌。大震动一停，我立即拉着妻子，抱起孩子跑到外面。我们逃出工地木板房后，外面一团漆黑。只听得有人在喊：“苏修扔原子弹啦！扔原子弹啦！”我拉住他说：“不是原子弹，是地震，别进屋，赶快找平地上呆着！”我跑到第一工程处，看到有的平房倒了，被砸着的人在喊救命，其他人正在施救，简直乱成一团。水电处也是如此。[1]

① 楷体字部分引自《记忆中的唐山大地震》，载《中国剪报》2006 年 7 月 28 日。

四、几秒钟的时间，整个唐山几乎化为灰烬

地震后的唐山，景象惨不忍睹。有的人头被砸裂耷拉着，双手被楼板压住；有的倒悬空中，双脚被坍塌的预制板死死扣住，他们是跳楼时被死神抓住的人。一位年轻的母亲，扯着孩子，从三楼的窗口探出大半截身子，但沉重的楼板无情地把她压死在窗台上。她还保留着死去瞬间护住孩子的姿式，随着余震的震摇，她的头发还在微微拂动。

地震发生在凌晨，人们在酣睡，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无数遇难者没有准备、没有反应、更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永远坠入了死亡的深谷。

跟历史上多次大震之后一样，唐山也下起了大雨，废墟中开始一片片地渗出血红的水，雨下着，汇成一条条血的小河，这是那些蒙难者残损的尸体流出的血。

而眼见着的、活生生的死更令人欲哭无泪。陆军二五五医院的护士丰承渤，地震发生时正在值班，不幸下半身被死死钳在一块楼板下，她的战友们用锹和镐都无法掀动那块楼板，而整个灾区还没有开进一台吊车。由于没有条件输血，又无法截肢。人们只能眼看着她一点点走向死亡，战友们轮流陪着她，有人送来半个西瓜，用勺子一口一口地让她吃点。她提出的最后要求，是让朋友给自己梳好头发。这位才20岁的姑娘就这样安静地死去了，像是睡在了废墟之中。

惨白的太阳照着废墟，侥幸活着的人们伫立在废墟旁发呆。有人手里捏着一只死鹅，不知撒手。更多的人赤身裸体，甚至忘了找件衣服遮身。人们的意识已被噩梦击碎，有人还以为是原子弹爆炸了，因为唐山历史还不曾有过破坏性的地震。一个叫陆实的幸存者，回忆了当时从废墟中爬出来的人们：因为大都是光着身子从废墟里爬出来的，所以用什么遮体的都有。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分男女）都穿着宽袍大袖、长及脚面的外国睡衣，我知道这是从服装厂弄出来的出口服装；几个小伙子穿灰制服，头戴新四军帽，有两个居然戴着日本战斗帽，还有一个光着膀子穿着日本马裤，这一定是京剧团的戏装，因为这都是《沙家浜》里的东西。有个拄棍子的白胡子老头，光着干瘦的身子，下边却围了一条姑娘穿的花布裙。一

个10多岁的小孩搀着一个中年人走过来，那人腿受伤，一拐一拐的。他右手搭在小孩肩膀上，左手却紧握着一把鱼皮鞘的宝剑，鲜艳的橘红色灯笼穗飘然地在他腿边荡来荡去。大概是祖传的吧……正是这种被击碎的心态，使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盲目地把机场看作是逃生之门，7月28日上午，在那条九公里长的虚妄的“生命线”上，人流如潮地开始大逃亡，赤身裸体的，拄着树棍的，相搀扶的，光着脚的，都在往这股混乱嘈杂、恐慌不安的人流中挤。一位中年妇女，怀抱中的孩子早已断气，仍然死不放手地走着。一个受伤的男子，在地上一寸一寸地爬着。沿途死尸路毙、血泪斑斑。

地震时，在震区共有列车28列，由于路基线的突然变形和巨大的地震力，使七列列车同时脱轨，其中客车两列、货车五列。

①济哈直快117次，在北塘→茶淀间下行至200到600米处，客车七辆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370根。

②京齐40次特快，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至248到550米处，内燃机车起火，一辆行李车颠覆，七辆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③1030次货物列车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至248到100米处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④041次油罐列车在卢台→田庄间下行至221到100米处脱轨，三辆颠覆。

⑤1020次货车在卢台站四首，两辆货车脱轨。

⑥1017次货车在唐坊→胥各庄间脱轨。

地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疯狂地撕裂了人类交通的大动脉。

五、全国大救援

唐山地震发生后，整个京津唐地区都有较大的地震反应，有关部门急切希望了解详细情况。凌晨4时30分，中国国家地震局收到南京、兰州、昆明等10个台的报震急电，其中六个台给出震级，但数据彼此悬殊甚大，有的定在八级以上，有的定在七级以下。但是对于震中位置的确定，却在短时间无法精确确定，只是粗略地估计在“北京附近”。唐山的灾情党中

央国务院不知情。最早向中央反映唐山灾情的是开滦煤矿的干部李玉林。

时年42岁的李玉林是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党委委员。1976年7月27日晚上11点多了，李玉林将近30个钟头没合眼，他打算在办公室里凑合着打个瞌睡。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党委书记打来的，有事请李玉林过去一趟。李玉林去了，书记语重心长地跟他谈了一次心，说他哪都好，就这张嘴巴是个问题："你现在是领导了，说话要有分寸……"李玉林明白书记是好心，可也没怎么往心里去。"这个我一辈子学不了。"谈话到了12点多，和书记分手后看离家不远，李玉林决定回家一趟。李玉林到家才想起来自己没吃饭，于是找了碗米汤喝了，刚往下一坐脑袋就一晕，两个小时后，地震来了。

梦中惊醒的李玉林首先看见了红色的地光，然后变白了，绿色的窗帘都被映白了。然后是地声，"回想起那个地声，现在还毛骨悚然"。开始什么也听不见，后来听到海潮般的声音传来，那是整个唐山倒塌的声音。李玉林他们家的房子所幸没有倒，小儿子被从炕头震到了炕尾，居然还没有醒，只是脸上满是墙灰，和非洲人差不多。李玉林光脚踹开房门一看，楼梯断了，外面什么都没有了，他的第一反应是："矿井下好几千人不知道怎么样了?"邻居家的小姑娘哭着跑过来喊救命，李玉林把两道门踹酥了，救出了里面的一家五口。另一家邻居过来喊帮忙救女儿，李玉林帮着救出了母女两个，但在废墟下护着女儿的母亲已经不行了，挖出来时身体还是热的。把爱人和三个孩子扔在了空地上，光脚只穿了条短裤的李玉林拔腿就往矿上跑。李玉林光脚踩在废墟上跑了三四里地，房子全倒了，没有路，周围没有任何亮光，一片死寂，安静得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唐山不存在了。又赶了一阵，往右拐400米就是李玉林父母的家了，弟兄姐妹都在那里，李玉林很想过去看一眼家人是否平安。可略一犹豫，李玉林继续往矿上跑："咱们向党举过手的。如果去家里，位置没摆正，对不起政治良心。"李玉林说出了他那个时代人的经典答案。

李玉林冲到了矿上，看见井架都被扭成了麻花，惊魂未定的年轻同志抱着肩膀出大气，就是不说话，那是被惊吓得开不了口了。矿上救护队的老队长和李玉林特别熟，可他现在根本认不出这个浑身是泥的汉子："你

是谁?”眼前的一切让李玉林更加清醒，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只有党中央、毛主席能救唐山了。

军人出身的李玉林确信，必须尽快向党中央汇报灾情，只有部队才能应付眼前的局面，而只有党中央能调动部队。他转身就往回跑，希望能找一辆车。恰巧矿上那辆红色的救护车这时开了过来，车上的司机是崔志亮。崔志亮也是在地震后开着车就往矿上冲，路过家门都没停，事后才知道爱人、孩子全部遇难。

随即赶来的曹国成和袁庆武听说要去北京报信，都说他们也去：“多一个是一个。”凌晨4点多，这辆救护车上了路。车在唐山的主干道上开出了几公里，路上一个活人都没有看到，车上的四个人沉默着，一出唐山，他们的眼泪下来了。

李玉林在部队当过驾驶员，他分析，地震后越是结实的钢筋水泥桥损毁越严重，因此出唐山最可靠的路线是走木头桥。正是李玉林的这个正确判断，使他们走上了当时能够出唐山的唯一道路。从唐山到玉田县的路上，救护车被沿途群众拦住了10多次，老百姓都想借车拉伤员去医治。李玉林就下来一一跟他们解释：这辆车是去中南海向党中央报信的。

到了玉田县他们直扑县委，但电话往哪里都打不出去，他们必须继续向前。在蓟县县委，电话仍然打不通，却意外遇到了国家地震局派出查找震中的人马。简单交流情况之后，由袁庆武陪同地震局的人原路返回唐山，地震局的一位同志上救护车和李玉林一起去北京报信。车上的几个人神经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救护车从红庙进入了北京城，救护车直奔新华门，在门口车停了下来。老远立刻跑过来两个民警，看见光着身子、头上是血、满身是泥的李玉林，都惊呆了。

明白怎么回事之后，经民警指引，早上8点多一点，李玉林他们到了国务院接待站。这个时候，几位从唐山乘飞机来北京报信的空军军人也赶到了。李玉林在雨水中洗了一下脸和手，穿上了途中借的一条半大孩子的裤子，披上一件修车时穿的满是油污的棉衣，准备向中央领导汇报。……

在中南海等着他们的是几位副总理。李玉林一行刚走入紫光阁，几位副总理小跑着迎了上来，一边问：“哪位是李玉林同志?”当听到领导问家

里情况怎么样，李玉林哭了：“不清楚。唐山平了，100多万人都压着……”李玉林他们一直紧绷的神经忽然一下放松了，几乎迈不动步子。李玉林差不多是被李先念和另一位领导搀到了会议桌旁。

他们到来之前，中央没有关于唐山地震的任何具体情报，李玉林他们为全国对唐山的救灾工作抢出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陈锡联问李玉林，能不能画一张唐山市草图，标出当时还可以进唐山的路口。李玉林迅速地画了一张地图，除了各个道路出入口，还大致标明了各机关、厂矿。陈锡联看见草图画得十分清楚，问：“你当过兵吧？是什么兵?”“汽车兵。”“太可惜了，应该当军事干部。”

在李玉林的建议下，解放军、全国各大煤矿救护队和各个省市医疗队立刻紧急奔赴唐山，中央救灾会议边进行边落实了这些具体措施。

上午11时，李先念让李玉林他们先吃饭。李玉林头晕恶心，吐出来的全是水，根本吃不下东西。军医看了之后，说是因为太紧张，一放松反差太大。临走的时候，中央领导坚持把他们送出大门，要他们转达唐山人民要坚强起来。

那次报完信从北京回来，李玉林才知道，他家里有14人在地震中遇难。作为长子，他的兄弟们有三四年不能原谅他先去报信而没有抢救亲人的举动。他自己每每回想起亲人就辗转难眠：“我对得起天地良心，但对不起14个亲人。”①

早晨6时。中国电信局报告，在与全国各地联络中，唯独唐山地区电话通信中断，呼叫若干次，均无回音。

震后第八天，解放军东北部队（包括海军）经唐古公路赶到唐山，距离唐山市还有三公里，军车因路陷不能前进，他们唯有弃车，手拿铁铲跑进城。

28日，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以下消息：新华社1976年7月28日讯：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

① 楷体字部分引自王青笠：《唐山大地震他第一个冲到中南海报信》，载《华夏时报》2006年7月26日。



急赴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官兵

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中国在几天后再次公布了经过核定的地震震级：里氏7.8级。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表示亲切慰问唐山地震的灾区人民，党中央号召灾区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同时，一场大救援开始了。

震后的唐山地委、革委会主要领导伤亡严重，地委13名常委死了七名，两名不在唐山，地委机关及所在地找不到了，市委大院房屋倒塌不见一人。第一书记牛勇夫妇、地委书记傅景瑞、第二书记李悦农、地委秘书长劳伦昌等七个地委常委震亡，余下的三名立即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一般干部被砸死的则更多，28日中午时分，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等领导同志乘飞机来到唐山，以军区肖选进副司令员和万海峰副政委为首组织了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驻扎在津冀一带的66军军长刘政向军区领导简要汇报了震情、问题和建议，领导上立即采纳。首先划分了各部队的抢救地区，由该军和一部分兄弟部队负责北市区；并决定由刘政军担任全市交通指挥，维持交通秩序；对于受灾人员的处理，

轻伤者由部队救治，重伤者和小孩送往机场外运；由空军派飞机空投食物；各部队特别是驻唐部队组织好运水车队解决群众的喝水问题；凡是辨认不清、没法标记的尸体，先挖坑掩埋，防止尸体腐烂传染疾病；市区社会治安统由66军负责。刘子厚还指示，对抢劫救灾物资的不法分子，要采取严厉措施，该抓就抓。他紧握着刘政的手深情的说："老刘啊！大灾当头，只有靠解放军了。"

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都先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唐山灾区救援。

下午2时，三架飞机载来辽宁省医疗队。下午4时，五架飞机分别载来大同、阳泉、抚顺、淄博、淮南各矿矿山救护队，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个医疗队，一万多名医护人员，在唐山的废墟上铺开。当天晚上，刚刚赶到的解放军总医院在唐山机场搭起最早的三个抢救手术台。

当时简易手术棚外的土坑里，堆满了截肢截下的残臂断腿，白森森、血淋淋一堆。没有冲洗的自来水，仅有一双手术手套，条件极其简陋。抢救者们踩在遍地的血泊中抢救伤员，在汽灯下做开颅、剖腹和截肢手术。由于没有血浆，许多伤员在手术台上死去。运送伤员的汽车上伤员一路惨叫，车下流不完的血洒满路面，汽车常常一路走，一路停，不时抬下具具死尸，又马上拉上伤员。

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将唐山伤员向全国11个省（市）紧急转送。一场全世界罕见的全国范围伤员大转移开始了。在这场大转移中，截至8月25日，共发出火车199列次，飞机470架次，一共将100623名伤员运往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和上海。

在唐山地震的罹难者中，一些人不是被砸死的，而是由于精神崩溃和莫大的恐惧"杀死"了自己，他们完整的尸体上指甲抓挠的血痕往往说明了这种情况。而另一类人在绝境中怀着求生的希望坚持到获救的一刻，如卢桂兰，地震时46岁，正在医院陪伴丈夫。她躲在病床下躲过了第一难。此后她渴了喝自己的尿，饿了就抓一把泥土咽下肚，一直坚持13天后获救。当时她大腿骨折，血压很低，全身已呈现酸中毒症状，但她的确活了

下来。

唐山市第一医院护士王子兰，震后被困于地下，她一直靠着一瓶葡萄糖盐水，每天喝下去一点维持生命。她清楚地听见周围地下的伤员和被困者一个个死去，而后尸体开始腐烂，发出阵阵恶臭。她不断给自己的手表上发条，坚信自己将像手表一样坚持，八天七夜后终于获救。

新婚夫妇陈俊华与郝永云被埋在废墟下整整两天三夜，丈夫陈俊华在黑暗中摸到一把菜刀，这把菜刀给这对蒙难的蜜月夫妻带来一线生机。陈俊华先后在黑暗中凿开了七个窟窿，但都遇上坚硬的水泥而无法突围。菜刀已经砍成一块三角形的硬铁，他们将“硬铁”在暖气片上不停地敲击报警，希望声音传出沉重的地下。敲击声越来越弱、越来越慢，几乎已经失去知觉的陈俊华仍然本能地手举着这块三角铁一下一下地敲着。30 日下午六点多钟，人们终于听到这不屈不挠的微弱的敲击声，获救的命运之门终于向他们敞开了。

唐山著名的开滦煤矿地震时井下有上万名工人。煤矿的地面建筑全部夷为平地，各矿井均断电、断风。矿工妻子们从废墟中钻出来，拼命赶到矿区在矿井上哭着、喊着、叫着。其实这时井下的情况比地面好得多。由于地震的强度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弱。矿井四周又有坚硬的岩石层约束，结成一个不易受地震破坏的整体。各矿的井下工人有的沿着狭窄、倾斜的紧急通道撤回地面，有的攀着百米长的金属梯爬出矿井，有的沿地面救护者们放下的保险梯脱离险境。结果，开滦煤矿井下万余名人员除 17 人因坚守岗位或路线迷失误入采空区死亡外，其余人员全部在 7 月 28 日下午以前平安撤到地面。其中赵各庄矿陈树海等五位矿工，在矿井里苦苦摸索了整整 15 天，终于全部得救。

唐山市监狱幸存的关押犯人在受伤的军人监视下加入了抢救队伍。在这之前，200 多名犯人和看守人员、警卫战士，几乎全被压在断壁残垣之间。重刑犯由于戴械具行动不便，大都已被砸死，不再有一点声息。

唐山市精神病院也夷为平地。幸存下来的精神病人在头几天显得异常沉默、镇定，没有哭声也没有喊叫。余震摇晃时，四周一片惊呼，他们也无动于衷，似乎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而许多健全人却精神崩溃以至失常，目光呆滞、语无伦次的患者一个接一个地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废墟上。这些精神失常的人由于过度的刺激，嘴里不停地念着惨死亲人的姓名，全身颤抖。有的不断往耳中塞泥，有的总想一头撞死。景象十分可怜。

震后第四天，原先精神病院的患者们开始恢复病情。由于地震刺激造成的反作用力消失，患者们原先的症状开始出现，他们唱的唱、跳的跳，又打又闹，狂躁不已，消失的围墙和铁栏使他们显得分外危险。救灾部队和唐山市精神病院药剂师李忠志、医生张志勇等人历尽千辛万苦，将这些幸存的病人转辗送到了外地。

在唐山的特大地震中，有三名日本人和一名法国人遇难，其中日本专家武腾博贞、田所良一当场死亡，身负重伤的须永其幸在送到机场后死去。当时的唐山宾馆共住着19位丹麦人、23位法国人和9位日本人，其中日本人住的四号楼倒塌，丹麦人、法国人住的新楼岌岌可危。中国翻译张广端不断用英语告诉外宾们千万不能跳楼，用窗帘、被单结成救生索从窗口往下滑。

中国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大楼，爬上断裂的楼梯，踩着摇摇欲坠的楼板，撞开被挤压变形的门窗，将一个个已经无法自救的外国人背出来。获救的法国人和丹麦人在法国访问团60岁的蒙热团长的带领下，不顾中国救援人员的劝阻紧跟着其他人奔向四号楼的废墟去抢救日本人，不同肤色的人们自动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行动小组。当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主力的十万救灾大军急速赶到时，士兵们饱受了毕生从未经历的强烈刺激。眼前即是他们不敢想象、不愿承认的残酷事实：一座人类城市横遭灭顶之灾，已经彻底地破碎。远处和近处，危楼上和废墟上，以及辨不清方向的废墟深处，呼救、惨叫、呻吟和幸存者的抱尸长恸，使士兵们沉默而哭泣起来。

在8月7日前，士兵们凭着一双手去推碎石、掀楼板、拽钢筋，以致许多士兵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他们不仅仅承担着劳累、危险，而且还承担着巨大的心灵重负。有的地方明明看得清清楚楚，在废墟以下一两丈深的地方还有人活着，然而没有工具，不能救援。有的士兵用小锯



震后的唐山，一片瓦砾

条锯钢筋，硬是把结实的钢筋水泥板一小块一小块地分解开。每发现还在地底下挣扎着的人，士兵们就想尽方法给他们送下水和食物。他们用早已嘶哑的声音一遍遍喊话，让那些幸存者一定要等待、坚持。然而许多困境中的生命随着时间的飞逝迅速地陨落了。强震后废墟重墙叠屋，砖砾上压着沉重的预制板，预制板上又压着更重的梁柱。死神攫住奄奄一息的生命不放，刁难和阻挠着抢夺生命的救援人员。

时间一天天过去，从废墟中救出的活人越来越少了。据救灾部队某部现场统计，第一天扒出来的人，救活率为80%左右，第二天救活率减少到30%至40%，再往后救活率就更低了。此时，扒出来的除了死尸还是死尸，尸山越堆越高。

地震消耗了空前的人力、物力。截至8月10日，包括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海军、铁道兵和工程兵共出动十万人参加救灾，冒着不断的余震危险，日夜苦苦挖救，共救出废墟下的灾民12245人。另据河北省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的资料记载：唐山特大地震发生后，军队和地方参加救灾的汽车就达二万多辆。自7月28日到8月12日的半个月间唐山机场起落各类飞机2885架次，最多的一天达354架次，平均两分钟起降一次，密

度最大的时刻，间隔仅26秒。

六、灾后的惶恐

唐山地震之时正临夏季，气温高、雨水多，难以胜数的死尸迅速腐烂、发臭。由于城市废污排放系统基本上被破坏，使得废墟上遍地是垃圾、粪便和污水。某救护所最高时一天就有1400多伤员死亡。从废墟中扒出来的尸体更是堆积如山。这些死尸、断肢大部分还来不及转移、掩埋，就已腐烂、发臭，以致城市废墟上到处绿蝇如蜂，昼夜蚊声若雷。

令人胆寒的瘟神游荡在劫后唐山的上空，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已经摆在人们面前！唐山废墟上各种传染病感染人数日渐上升，已经快到爆发的程度，必须立即挡住瘟神，刻不容缓。

8月3日，“河北省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成立防疫领导小组。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灾区防疫紧急通知。从上海、广东、黑龙江、甘肃等地调动21个防疫队共1300人火速赶赴灾区。调动疫苗100多万份，军用防化消洒车31台，喷雾器51000多具，杀虫药176吨，消毒药240吨，从各地往灾区急运。

8月5日，国务院抗震救灾办公室发出通知，调动飞机喷药消灭苍蝇、蚊子。“安—12”飞机飞临唐山上空，常规喷洒作业95架次，喷药面达25000亩；超低容量喷洒作业46架次，喷药面40万亩。总共喷药量达45吨，喷药面积累计424000亩，飞机出动141架次。85平方公里的整个唐山市区被药物覆盖。

同时，在地面上圆桶形压缩喷雾器、群英式背负喷雾器、防化喷洒车和东方红18型机动弥雾机投入地面喷药战。入夜，一堆堆火在废墟上燃着，“六六六”的烟雾飘向四处。

经过空中和地上的初步喷药战，唐山市区蚊子的密度下降90%多，苍蝇的密度下降50%。

空前的埋尸大战拉开了黑色幕布。

废墟中有24.2万具残损、溢出血水、腐烂发臭的死尸。假如将这个数字的尸体全部不留空隙地葬在一起，需挖一个占地130亩的大坑。假如要

将这个数字的尸体全部一次运载，需用解放牌卡车24200多辆。假如死尸与死尸接踵相连，将出现一条长达400公里的死亡之线。

震后第二天，7月29日大规模的尸体掩埋开始。军区救灾前线指挥部曾经发布命令：必须在7月31日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慰问之前，把所有地表的尸体掩埋完。

第一步清理并全部移出距水源、自来水管及主要居民点一百米内的尸体。

第二步清理离市区较近、集体掩埋于交通路线附近的尸体。

规定全部用石灰消毒，然后盖土一米，再用拖拉机反复碾压两次。

最后清理被压于高层建筑物下面、仍未清理出来的死尸，将其全部挖出并按规定予以掩埋。

“尸体再清理”工程紧张艰苦、规模浩大。清尸队、防疫队、医疗队，各队紧密配合，同时作业，连续运作。清尸一处，防护、消毒一处。工程基本上结束了第一次救灾大掩埋的隐患。

唐山灾后的第一个春天，也是全世界人士最担心爆发瘟疫、密切关注着唐山的时节。然而，这个春天不仅没有流行疫病，而且传染病的发病率低于常年。

点评：

作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人类无法阻挡的自然大灾难，唐山大地震事先留给人们应对的空间相对要小，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无所作为。至于事后的应对情况如何，则能充分体现一个政府和社会的总体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纵观整个事件，我国政府在应对这场事件前后的所作所为，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教训。

一、关于此次地震的预报问题。在前面的正文中已经讲过，在地震前京津唐地区有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出现，而且也有地方地震工作者及时地向上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这个事实来看，其教训是深刻的。当然，事后有的专家讲，当时各地预报地震的重点位置差异大，不知道将来的地震究竟在哪里，有的报了京西北，延庆、淮南、张家

口一直到内蒙古，也有报京西南，甚至报的保定，当然也报北京了，还有报唐山、滦县这一带。这么多的预报意见，向地震局领导汇报以后，他们觉得无法采取措施。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地震部门综合分析能力不够强。

另外，更重要的是，当时出现的很多严重的震前反常现象，并没有及时地被反映到地震工作部门那里，不少是事后才被披露出来的。这个事实应该说给人们、尤其是地震预报工作者以很大的启发，我们在地震监测系统方面应该如何建立更多的科学信息收集系统?

1975 年，我国地震工作者曾成功地预测了 7.3 级的海城地震，避免了一场大伤亡，其成绩足令世界瞩目。但一年后的唐山地震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我们的地震部门是否有轻敌的情绪？专家们说，海城地震前有系列小震，而唐山地震则不同，是突发式的。那么在世界地震史上是不是就没有类似唐山地震的模式呢？如果有的话，则只能说明我们的地震工作者的理论研究不够，只重视已有的经验；如果没有的话，则唐山地震作为一个特殊的典型而应对之好好地加以研究。

二、关于唐山地震的救援问题。唐山地震以后，我们的政府动用了大批的人力和物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救援活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在当时极“左”路线占主导位置的时期，我们却拒绝了一切国际援助，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7 月 28 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29 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称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以后，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

30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宫泽喜一外相的建议，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外务省已动手准备发出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宫泽外相还指示日本驻华大使孝川，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

30 日，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

《人民日报》的社论明确表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这意味着中国委婉地谢绝了联合国提出的援助建议。一位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

而由于当时的救援设备的落后，不少被困者被眼睁睁地看着死去，不少的时间由于手工操作的缓慢低效而被白白地浪费掉了。如果我们当时及时地接受了国际援助，不仅在经济上可以得到一定的暂时解困，也可以救出更多的受困者，且对于重建家园也会有相当的帮助。

我们这种拒绝外援的做法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一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信，一是出于国家安全警惕性的思考，还有是怕外援可能影响到人民对党的领导能力的信任，更主要的是我们长期以来养成的闭关锁国的思维方式和对独立自主的狭隘性的理解。

三、在此次唐山地震的救援过程中，各级政府、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不怕困难，互助互济，使得灾区人民对党和政府尤其是解放军充满了敬意，这些做法对于进一步提高中共在群众中的领导威信无疑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一场灾难可以使一个执政党垮台，也可以使一个执政党更加成熟、更加具有威信，关键要让群众看到这个执政党和政府的行为是否让人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力量。

（本文参考文献除已表明出处之外，其余均引自钱钢：《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编写、点评：程美东）

1998年抗洪抢险

1998年6月中旬以后，我国江南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北方的局部地区也连续下了大到暴雨，奔腾咆哮的大洪水呈南北遥相呼应之势翻卷着巨浪滚滚而来，长江告急！嫩江、松花江告急！西江、闽江告急！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顿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弘扬出伟大的抗洪精神，团结奋战，顽强拼搏，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抗御了一次又一次的洪水袭击，保住了重要堤防，保住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取得了抗洪抢险的重大胜利，在人类征服自然灾害的史册上又一次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一、洪魔肆掠

早在1998年初，一批气象学家就根据各种天文和水文资料预测，当年我国的气候将十分异常，突出表现为雨水过大。6～8月，长江流域降雨有可能比常年偏多五成以上，将达到900毫米。一般情况下，如果预测降雨量超过正常年份两成以上，即预示要出现洪涝灾害。超过五成，则肯定会有严重洪涝。

事实果然被他们言中。从6月份起，长江流域接连出现了三次持续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第一次是从6月12日到27日，江南大部分地区连续下了大到暴雨，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区的降雨量均比常年同期多一倍以上，江西北部甚至多了两倍以上。第二次是7月4日至25日，长江三峡地

区、江西中北部、湖南西北部和其他沿长江地区连降暴雨，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五成至两倍。第三次是7月末到8月初，长江上游、汉水流域，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都下了大到暴雨，降雨量较常年偏多二到三倍。

主要受强降雨影响，加上严重的水土流失、河道淤积、湖泊容积减少等因素的影响，长江流域发生了建国后继1954年以来的第二次全流域性大洪水。7月份，长江中下游主要水文站的洪水流量超过1954年，其中宜昌站1215亿立方米，比1954年多45亿立方米；汉口站1648亿立方米，比1954年多120亿立方米。1998年长江流域的大洪水主要表现出四个特点：第一，全流域性。除长江上游多次发生大洪水外，其主要水系也多次发生大洪水：鄱阳湖水系的信江、修河、饶河和抚河均超历史最高水位；洞庭湖水系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多次发生大洪水；汉江、清江等支流也多次发生较大洪水；第二，洪峰叠加。长江干流和支流同时发大水，致使洪水遭遇，洪峰叠加。在两湖先期发生特大洪水且水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长江上游又多次发生洪水，与中下游洪水不断遭遇。第三，水位高。长江干流宜昌以下河段全线超过警戒水位。沙市至螺山、武穴至九江360公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特别是沙市江段水位曾高达45.22米。第四，洪峰接连出现，水位长时间居高不下。长江上游在6、7月份连续发生七次洪峰，8月上旬到中旬，10天时间内又出现了三次洪峰。长江中游大部分江段超警戒水位的时间在两个月以上，超历史最高水位的时间就持续了一个多月。长江3600公里干堤和洞庭湖、鄱阳湖重点垸堤在警戒水位以上运行60多天，监利江堤、洪湖江堤等超过历史最高水位运行有30多天，长江干流依靠子堤挡水的堤段一度达300多公里，挡水高度0.5到1米左右。

东北地区在入夏以后也连降大雨暴雨，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了大洪水。洪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发生时间早，嫩江6月中下旬即发生大洪水，较正常年提前一个月。二是洪水次数多，嫩江支流发生多次洪水，干流连续发生了三次大洪水。三是暴雨洪水集中，主要发生在嫩江的右侧支流。四是洪水量级大，嫩江干流三次洪水，一次比一次大，第三次

洪峰主要控制站均超过历史记录。五是高水位持续时间长：哈尔滨洪峰水位长达31个小时，比一般洪水最高水位持续时间约多10个多小时。洪水期间，松花江哈尔滨段出现了三次洪峰：第一次，7月22日，水位117.89米，流量4910立方米/秒；第二次，水位119.00米，流量7390立方米/秒；第三次，水位121.14米，实测流量16600立方米/秒。

在东南地区，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等江河，也在6月下旬相继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由于洪水量级大、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因此，洪涝灾害非常严重。截至8月22日的统计，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死亡3004人（其中长江流域1320人），倒塌房屋497万间，各地估报直接经济损失1666亿元。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等省（区）受灾最重。

二、中共中央发出总动员令

滔滔洪水威胁着数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牵动着中南海里的每一根神经。在抗洪抢险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人们都能及时得到党中央的部署和指示；在抗洪抢险的每一个危险地段，人们几乎都能够发现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身影。

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8月13、14日，在长江第五次洪峰袭来的危急关头，冒着高温酷暑，下荆江、赴洪湖，亲抵武汉龙庙、月亮湾险段，指导抗洪抢险，慰问广大军民，并对长江抗洪抢险工作进行动员，极大地鼓舞了抗洪军民的士气。9月3至6日，他再次亲临湖南、江西、黑龙江考察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于8月15日起，先后到齐齐哈尔市的昂昂溪区堤防、哈尔滨松花江的老头湾和北岸察看水情，亲切慰问抗洪抢险军民，现场指导抗洪斗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7月4日至9月2日间，曾经三次亲临长江、嫩江、松花江抗洪前线，辗转九江、荆州、武汉、湖



199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临湖北抗洪抢险第一线

南、东北，到最危险的堤段察看汛情，指挥抗洪抢险战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8月21至23日间，先后到荆州、九江、岳阳察看防洪险要地段，关心慰问群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于8月25至26日间，到松花江险段大庆镇赉县等地指导抗洪，看望慰问灾区群众，鼓励军民背水一战，夺取抗洪斗争的最后胜利。

在抗洪抢险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干部党员，要积极投身抗洪抢险第一线。中纪委、监察部还先后发出了《严明纪律确保防汛抗洪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通知和《严肃查处防汛抗洪斗争中的违纪违法行为》的通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8月31日至9月3日，深入江西、湖南和湖北灾区，重点检查卫生防病防疫和中小学的秋季开学

工作。

作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指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抗洪抢险工作开展以后，先后五次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亲临长江、东北抗洪第一线，现场指挥和部署抗洪抢险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从维护全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集中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科学部署，果断决策，正确领导了抗洪抢险的伟大斗争。

“严防死守”、“三个确保”的方针。7月23日，当长江第二次洪峰即将到达武汉的时候，江泽民明确提出了要“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武汉等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正确方针。从此，“严防死守”、“三个确保”成为长江两岸、嫩江和松花江沿岸军民抗洪抢险的响亮口号，成为亿万军民与洪魔搏斗的一致行动。

“把抗洪抢险作为头等大事”。8月7日，长江九江大提决口。在汛情最危急的关头，江泽民于当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听取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工作汇报，并立即作出了著名的抗洪抢险八条决定，要求把抗洪抢险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这一决定成为全国抗洪抢险新的动员令。

决战关头发出总动员令。8月14日，江泽民亲赴武汉，作了《夺取长江抗洪抢险决战的最后胜利》的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总动员：要求全党、全军、全国继续全力支持，直到抗洪斗争的最后胜利。这一动员令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16日下午，超历史最高水位的长江第六次洪峰进入荆江险段，江泽民立即向参加抗洪抢险的解放军指战员发布命令：沿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

取得决定胜利，实现重点转移。9月4日，江泽民在江西视察时，作了《发扬抗洪精神重建家园发展经济》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从全局看，全国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当前，在继续做好抗洪抢险最后阶段工作的同时，全国受灾地区的工作重点要逐渐转到救灾工作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上来。这是在抗洪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所发出的新的

动员令。

在整个抗洪抢险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一调度抗洪抢险所需要的一切人、财、物，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实施统一的组织指挥。

三、广州军区指挥中心临时移到武汉[①]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这次抗洪抢险斗争中起到了生力军、突击队和中流砥柱的作用。从坚守荆江大堤到激战洞庭湖区，从会战武汉三镇到强堵九江缺口，哪里最危险，哪里任务最艰巨，哪里就有人民的子弟兵。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铸起了洪水冲不跨的坚强大堤。

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陶伯钧将军，在湖北抗洪前线整整待了40天。当时有很多海内外各种媒体记者要求采访他，他却对所有的来访者都说同一句话：我现在确实没什么可谈的，如果你们要采访，请你们到大堤，到一线去，采访我们的干部战士。

事隔九年之后陶伯钧上将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那场特殊的战斗：我们广州军区当年参与抗洪实际上从6月26日就开始了，第一个参与的部队是我们的一个舟桥旅，他们最先在湖北参与局部的抗洪。

8月7日晚上11时53分，张万年副主席从北京给我打电话，说传达一下江主席的指示。8月7日晚上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听取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当时长江防洪的形势分析。当时作出了中央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讲了八条，核心就是“严防死守，三个确保”。一是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大堤不能决口；二是确保重要城市的安全，当时主要指武汉；三是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也就是下了指示了。张副主席说完后，又问我到底清楚明白了没有，我说清楚，明白了。接了电话之后，基本上就没睡觉，感觉大事来了。后半夜我给史玉孝政委打了个电话，把张万年副主席的指示说了一遍，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召开常委会，立即传达中央指示。当时决定把军区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

---

① 该节参见 http：//gzdaily. dayoo. com/html/2007/08/01/content_ 52203229. htm.

抗洪上来。我跟史政委商量，咱们一前一后，我到湖北去，他留守广州。因为当时我考虑史政委已经到了任职年龄，即将退休了。

开始史政委答应了，可就过了一小时，他不愿意了，跟我说，这可不是件小事，中央作了这么大的决定，你是司令，上前线是应该的，我是政委，不去绝对不行，咱俩一块去。我说，那咱俩就一块去，就报告中央军委，广州军区的指挥中心临时转移到武汉。

这是1949年渡江战役后，我们在长江最大的战役，也是我们广州军区从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最大的战役。抗洪中用兵数量之大，军兵种之多，领导干部数量之多，都是很罕见的。60位将军中，有两位上将，七位中将。

前面五次洪峰过去了，这五次洪峰尽管很险，但大体都在1954年分洪时44.67米的水位之下，即便超过也只是一点点（国务院一直以来有个界限，超过1954年水位时就可以实行分洪）。

江主席8月13日、14日在湖北视察，14日下午在珞珈山宾馆给我们开完会后，大家甚至都觉得，抗洪最主要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有些单位甚至准备着收兵返程了。结果到了16日，突然间，上游连续降雨，形成了第六次洪峰，这次洪峰不得了。当时我和史政委都在武汉的指挥所，16日下午6时多，张万年副主席打来电话。他说，中央和国家防总判断又出现了险情，第六次洪峰已经形成了，很快就要到，现在江主席下了指示。这下我刚放松一点的心又高悬了起来。张副主席还告诉我，温家宝同志已经从北戴河赶往山海关机场，飞往湖北沙市，让我们到沙市准备接受任务。我们到了沙市宾馆后，温家宝同志刚下飞机。

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温家宝同志召集我们开会，研究是否需要分洪的问题，到晚上11时半左右，我们才从他那儿出来。最终决定还是不分洪，决定死抗硬保。虽然也有风险，但也是经过了缜密分析的，因为当时认为后面的几天上游继续下雨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风很小，不分洪是有可行性的。如果当时分洪的话，就把公安县、监利县全都淹掉了。而淹掉之后，到洪湖的地段，水位仍不会有明显的下降，等于是白淹了一大片，得不偿失。8月16日的晚上，中央电视台正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一场大型的赈

灾义演，当时场外聚集了大批的外国记者，他们等的就是我们分洪的消息，如果分洪的话，消息很快就会传遍世界各地。后来知道我们不分洪，就无声息了。

我和史政委回到指挥所后商量了一下，认为指挥需要调整，因为原先是各部队到达抗洪一线时，各自划分了区域，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相互之间的联系不多。特别是广州军区以外的部队，都听受各自单位的命令，在最后决战的时候，这样显然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决定划分了几个片区，监利那边是一片，不管哪里的部队，哪个单位的，由龚谷成挂帅，都听他指挥；石首那片，不管哪个部队，都由当时的济南军区副司令挂帅；洪湖那边，由空降15军负责人挂帅。然后就给他们下命令，很严肃地立军令状，“军中无戏言”，大家都高度紧张，只要负责的那一片出现问题，不管是哪里的部队，都要追究主帅的责任。

第六次洪峰整整顶了三天，三天三夜我们基本都没合眼。从16日夜里，到17日、18日、19日，才慢慢地缓过来。17日一早，温家宝同志亲自到大堤上去了，在堤上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正说马上赶过去，温家宝同志急忙说不用了，还兴奋地跟我说，你们的战士都明白得很，指示、命令都清清楚楚的。再就是现在水位好像在慢慢地下降，是个好消息。最后总算把第六次洪峰抗过去了，那么大的洪水，超过了1954年水位的0.5米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分洪，还保住了大堤，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确实太不容易了。当时有很多感人的事，但我们都只剩下一个心思，就像打仗打红了眼，只想着战胜洪灾了。真正上了大堤，一紧张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说实话，第六次洪峰要是上游继续再下几天的雨，结果还真是难以预料。

四、沧海横流显本色[①]

据统计，在1998年抗洪期间，一共调动了30多万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近1000万干部群众参加抗洪抢险。如果再加上按中央统一部署由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级政府分层次实施的组织工作，以及为抗洪斗争服务的交

---

① 该节参见李德华、邱久华著：《众志成城：98长江抗洪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通、通讯、医疗服务人员，这次抗洪抢险总动员的人数在一亿以上。

坚守荆江大提。“万里长江，险在荆江”。长300多公里的荆江上起湖北枝城，下至湖南城陵矶，历来是长江防洪最艰险的河段。在1998年连续不断的洪峰冲击下，荆江大堤险象环生。但在荆江大提上，数十万军民团结奋战，与洪魔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枝江、沙市、公安、监利等沿江大提上，到处悬挂着“誓与大堤共存亡”、“人在堤在”等标语；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许多党员干部立下军令状，誓保大堤安全。

8月14日，济南军区某部副军长杨凤海少将接到发现管涌群的险情报告，5分钟后就带队赶到出险地段。当他看到管涌群已经造成决口，填沙石包已经堵不住时，大声高喊：“这样不行。跟我来，用人挡水再填土。”随即便率先跳入激流之中。紧接着，一批大校、上校、中校等也纷纷跳入水中，30多位将校官兵以手挽手的方式筑起了一道拦阻洪魔的血肉之堤!

8月6日上午，沙市水位上涨到44.68米，超过分洪水位0.01米并呈继续上涨之势。湖北省防汛指挥部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为了舍小家保大家，决定动用荆江分洪区分洪，向荆州市、公安县下达了预备分洪的命令。33万分洪区的群众闻令而动，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家中的一切，仅仅只用了16个小时就全部转移完毕。到16日晚22时，长江第六洪峰到来时，沙市水位已经超过历史最高，达到44.99米，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下不下分洪的最后命令？22时30分，温家宝副总理飞临荆州。他一下飞机，立即召开各方面专家会议。会议经过科学的分析与精确的计算，认为不分洪也有把握抵挡过去。分洪的命令最终没有下达。次日上午，水位果然下落了！荆江大堤安全了，30多万人民群众的财产保住了!

激战洞庭湖。7月24日晚8时，洞庭湖区的安乡县安造垸突然遭受灭顶之灾：汹涌咆哮的松滋河水以4米高的水头、每秒6米的流速向垸里袭来。周运兰所在的“小天才”幼儿园正处在决口处！危急时刻，长沙警备区的官兵火速赶到，及时救走了孩子，但周老师却被困在激流中难以脱身。一个又一个的救援措施都相继失败了。27日，广州军区某舟桥团挑选出四名体格健壮、水性好的共产党员组成“敢死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生死搏斗，终于把被洪水围困三天三夜的周老师营救上来。



解放军在抗洪现场

从7月27日至8月20日，接连出现四次超历史最高水位的特大洪峰，湖区3471公里的一线防洪大堤全部超过设计水位，其中2164公里超过历史最高水位。8月20日这一天，城陵矶水位直线上涨，最高时达到35.94米！

7月29日凌晨，团洲。狂风裹挟着两米多高的巨浪反复冲击着单薄的子堤，子堤摇摇欲坠。情况万分紧急！见此情形，53岁的乡干部毛绍同率先跳入洪水之中，3000多村民紧跟着下水，手挽手、肩并肩站在洪水中阻挡风浪。妇女们也毫不犹豫地趴在子堤上，双脚深深插入泥土当中，紧紧拖住男人们的臂膀。就这样，三个多小时过去，终于渡过了险关。

会战武汉。从6月26日开始，武汉关水位就突破了25米的设防线。7月21日，长江第二次洪峰紧逼武汉，与此同时，武汉市区又连续突降特大暴雨40小时，降雨总量达到1.3亿立方米。武汉顿时变成水乡泽国。23日晚，江泽民打电话询问武汉水情，发出了“严防死守”与“三个确保”

的号召。此后，1800多市直机关干部奔赴抗洪第一线，1万多名解放军官兵和武警战士，死守在险要地段，20万抗洪大军全部上堤，最终战胜了滚滚洪魔。

强堵九江缺口。8月7日中午13时40分，江西九江市4、5号闸口之间的长江大堤突然溃口，滔滔江水咆哮着涌向西郊，直扑市区。南京军区陈炳德司令员和方祖歧政委立即坐阵军区作战值班室，向九江前线的抗洪官兵发出重要指示：一、不惜一切代价封堵决口，沉船，用推土机和载重卡车；二、进一步加快备料，保障抢险；三、水势小的时候，筑人墙打桩，尽量把水堵住。16时45分，在九江市市长刘积福的指挥下，一条长75米、载煤1650吨的大铁驳船被沉封在溃口迎水侧，但肆虐的洪水又从沉船的底部及上、下两侧经溃口冲入堤内。在江西省领导、南京军区领导等的亲自指挥下，共有2.4万余名军民参加了堵口战斗。次日，长达186米的抛石截流戗堤在拦石钢管栅支挡下全线出水，到11日下午，基本完成了在溃口处架设的长58米、宽4到4.5米的钢木构架石袋组合堤，12日下午6时30分完成后戗台临时断面，堵口成功！15日晨，水下抛土铺盖全面出水，闭气成功！在场的水利专家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激动地说：历史上，长江决口没有谁能堵住。九江城防大堤决口，仅用五天时间就封住，这是世界性的奇迹！

……

在抗洪抢险中，各级领导身先士卒。沈阳军区参谋长葛振峰亲临嫩江前线指挥抗洪。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李蘅徒步勘察松花江险段，组织人员分兵把守沿江18处险工险段，确保大堤万无一失。某集团军军长柳风举带领8000名官兵连续奋战，数次排除重大险情。大庆军分区司令员姚中富率领1.9万多名民兵每人一米江岸，责任到人，死看死守。

空军某高炮团一连指导员高建成，为了抢救群众和战友光荣牺牲，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签发命令，授予他“抗洪英雄”的光荣称号。

武警吉林省总队城市支队年仅18岁的卫生员李佳琪和战友一起帮助群众转移。在他第八次冲进群众家中时，被高大沉重的墙体砸倒，光荣牺牲。

……

洪水也牵动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人们纷纷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据统计，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各地民政部门至9月7日已收到各界捐款超过18亿元。仅8月15日中央电视台“万众一心”节目就募集到救灾款6亿元。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界人士和澳门同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侨和华人都积极为灾区提供援助。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驻华使馆，联合国有关组织和一些国际机构、外资企业以及国际友好人士也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支持和同情。

2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起来的巨大物质力量在这次抗洪救灾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示。到8月25日，有关部门已拨付防汛抗洪资金30.29亿元。到8月28日，国家防总已把价值4.7亿多元的抗洪物资调运到湖南、湖北、黑龙江、吉林等地。到9月8日，中国民航保证部队抗洪抢险救灾飞行1000多架次、400多航班和五架包机，运送救灾物资和设备560多吨。铁道部开行抗洪抢险军用专列278列，运送部队官兵12万余人，紧急运送救灾物资5.0943万车，计284万吨。全国一级光缆通信干线一直畅通无阻，通信部门还向灾区调集微波设备、海事卫星通信设备和移动电话等，确保抗洪通信畅通。各地向灾区先后派出13万人次医务人员，为灾区人民治病防病。

1998年9月28日，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宣布抗洪抢险斗争取得全国胜利。

点评:

1998年的大洪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长江流域的洪水为例。和1931年、1954年一样，1998年也是全流域的大洪水。但从所造成的损失来看，1998年要比1931年和1954年小得多：1931年长江干堤决口300多处，长江中下游几乎全部受淹；1954年长江干堤决口60多处，分流洪水1023亿立方米，江汉平原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等城市被淹，京广铁路中断100多天；1998年长江干堤只有九江一处决口，而且几天之内就堵口成功，沿江城市和交通干线基本没有受到重大影响。1931年

洪水共造成14.5万人死亡，1954年死亡3.3万人，1998年死亡1320人。1954年荆江分洪了，分流洪水1023亿立方米；1998年荆江没有分洪，分流洪水仅100亿立方米。

1998年抗洪抢险何以能够取得这样如此伟大的业绩？于永波将军对此曾经有很好的总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是我们夺取一切胜利最根本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的中国具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是我们经受住任何风浪考验的有力保障；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按照江主席“五句话”总要求全面建设部队，是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①]

从应对重特大突发自然灾害的视角来看，1998年抗洪抢险也有许多重要的经验值得吸取。

一、重特大突发自然灾害应对措施的制定，应当充分征询并采纳相关专家的意见，使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由于重特大突发自然灾害的特殊性，决策的科学性就显得极其重要。一旦决策失误，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因此，与一般性的决策不同，重特大突发自然灾害的决策必须充分征询并采纳相关专家的意见，力戒个别领导拍脑袋决策的发生。

1998年8月6日上午，沙市水位就已经超过分洪水位0.01米并呈继续上涨之势。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湖北省防总决定动用荆江分洪区分洪，并向荆州市、公安县下达了预备分洪的命令。16日晚22时，长江第六次洪峰到来时，沙市水位已经超过历史最高，达到44.99米，而且还在不断上涨！这时，是否下达最后的分洪命令已经迫在眉睫了。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一下飞机，就立即召开各方面专家会议。专家们经过科学分析与精确计算，认为不分洪也有把握保住大堤，最终没有下达分洪的指令。这一科学决策使国家和人民避免了更巨大的损失！

在九江大堤决口现场，长江水利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国家防总抢险专

---

① 于永波：《抗洪抢险伟大胜利的历史昭示》，载《求是》1998年第19期。

家组组长杨光旭与九江防指会商，决定采用沉船减缓水头流量，同时抢筑外侧挡水围堰，在溃口采用上下游钢栅构架，抛投钢笼石块堵口，果然很快就堵住了决口。朱镕基总理曾经当场握住杨光旭的手说：技术专家在这次堵口抢险中发挥了高超的技艺，立了大功，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二、合理地进行社会动员，一方面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抗洪抢险的成功，另一方面可以借机检验社会各种力量的应急能力，反映出他们面临困难的斗志，显示出民族向心力，同时也可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在1998年抗洪中，我们国家动员了军队，动员了广大党员、干部，动员了广大群众。之所以作这样的动员，当然主要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抗洪抢险的成功，同时通过这个过程也可反映出人民解放军、广大中共党员、广大民众的应急能力，反映出他们的精神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其实是个很好的锻炼。

从军队方面来看，中国承平日久，人们不免担忧：这样的军队还有没有战斗力？我们的战士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幸福生活中长大的，这些人还有没有吃得苦、舍得命的牺牲精神？我们的军队长期没有打仗，军队的指挥协调能力、纪律作风、战略战术、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状况如何？通过这样的抗洪战役也可得到较全面的了解。抗洪实践证明，我们的军队作风勇敢、纪律严明、调度有方、技术过硬，是一支能够让国家和民众放心的战斗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内一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比较过去有所松动，违法违纪事件不断增多，也使人产生一种深深的忧郁：我们的党员队伍还有没有战斗力、还有没有牺牲精神？通过抗洪，人们发现，哪里有困难，党员干部总是冲在前面，党员干部在险情面前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站在前面。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这支庞大的队伍总体上是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是合格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多元化、民主化的趋势，社会的利益分化也日益加重，党和政府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间接化，这也使人产生了疑问：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还有没有强大的号召力？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有没有过去那样高？实践已然证明，中国新时期的群众依然衷

心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然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依然具有服从全局利益和无私的牺牲精神，党群关系总体上依然是很密切的。

这次抗洪中，那些英雄模范们的事迹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中国人，使中国民众在对付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再一次突出地表现出团结一致的风貌，使我们民族的精神境界得到了一次新的升华。这次抗洪中形成一种新的民族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三、1998 年抗洪抢险的成功，也反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抗拒重大灾害、保障中华民族利益的必要性。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与抵御频繁发生的黄河水患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万里黄河水患的治理必须要集中很多人的力量，靠一个个部落、一个个小的单位群体来组织力量是无法有效完成大规模的治理工程的，唯有组织有力、高效运行、人数众多的、在中央集权式政府领导下的社会才能达到此目的。这个观点说明一种社会制度的选择与该生活区域中人们的特定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

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与社会主义的特殊优越性有关，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社会主义强调从社会整体的利益出发来考虑社会政策，因此注重政权的集中统一调度。而中国一直是人口众多、自然环境差异巨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明显、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要想使多数人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个最佳的选择。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内容，1998 年的抗洪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很难设想，如果我们不是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能那么迅速地调动 30 多万军队、1000 多万政府公务人员和群众，能形成那么大的一股力量？那么，能否取得抗洪的巨大胜利将是很成疑问的。

（正文：胡尚元　执笔　　点评：程美东　胡尚元　执笔）

第五篇

1959年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

华人背景介绍： 早在10世纪，为躲避东汉时期黄巾起义之乱，许多中国人来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巴邻邦从事耕植业。唐宋时期因政治原因流落到东南亚的人也不少。到了宋元交替时期，有一些宋朝遗臣流亡海外，如宋朝遗老郑思肖就逃居印度尼西亚爪哇。明清时代，明朝的福王子、唐王子则先后越海到爪哇。1683年，一些不愿降清的郑克爽政权将士也从台湾搭船转爪哇。明代以后，由于中国沿海资本主义的萌芽、海外贸易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出现严重的社会化现象，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纷纷渡海谋生。出现许多肩挑中国瓷器到海外叫卖的小商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因为那里的生活条件比中国内陆好而留了下来。之后，又有华人因各种原因，陆续从中国迁来。他们中主要成分为商人、渔民、留学印度尼西亚的学生，等等。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家。据最新的统计，在目前印度尼西亚的2亿总人口中，华人、华侨人口已近700万；其

中大多数已自愿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统称华人，有的华裔还改换姓名，融入当地社会。保留中国国籍、仍作为外国侨民的人数越来越少。然而，印度尼西亚是在战后发生排华运动（事件）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一、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始末

二战后，印度尼西亚走向独立，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然而，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反华浪潮并没有因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解放而得到遏制，相反却愈演愈烈，甚至演化成一场流血的大规模暴力活动。

1. 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排华背景分析。

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前，荷兰殖民统治者经常制造华人与印度尼西亚民族之间的矛盾，以转移印度尼西亚与荷兰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印度尼西亚国内的阶级矛盾。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小规模的排华事件仍时有发生，这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右派势力转移阶级矛盾，限制中国影响和打击国内进步势力的一种手段。1957 年以后，一个新的排华浪潮正在酝酿着。

中国政府有正确的华侨政策，一向劝勉居住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尊重当地的法令和习惯，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努力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1955 年 4 月 22 日，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6 月 3 日，双方进行了该条约的“实施办法”的换文。尽管如此，印度尼西亚社会发生排华的主客观因素仍然存在着。主观因素是，统治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以及利用排华取得好处的阶级和势力仍然存在着；客观因素是，过去殖民统治者和当地民族的剥削阶级为排华进行宣传鼓动的影响并未肃清。本来，几百年来华侨同土著居民同劳动，共同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深厚友谊；而且华侨中绝大多数是工农劳动者，从事商业活动的绝大多数是小商小贩，工商资本家是少数，因而华侨中同人民群众存在削剥反剥削的尖锐矛盾的终究只是极少数。可是，上述主客观因素在制造和形成排华活动方面常常是相当有力的。每当印度尼西亚统治阶级遇到经济困难、政治危机，其右派势力往往以制造排华运动来减轻其困难，这成为排华现象的主要原因。

印度尼西亚自1945年宣布独立以后，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未完成，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加上沉重的地租负担，一直遭受着饥饿和贫困的痛苦。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仍然控制着印度尼西亚95%的重要生产部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经济得不到发展。1957年至195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予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使工农业生产逐年下降。经济危机的加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促进了社会革命化。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某些势力企图用排挤华侨经济势力的办法，既捞取经济实惠，以解脱国内经济困难，并同美国搞好关系，又妄图利用反华排华事件，打击中国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中日益扩大的影响。

1957年五六月间，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就开始有计划地做排华的组织准备。在东南省（即努沙登加拉省）军事省长勒令华侨中小学大部分关闭，使华侨学生一半以上三四千人被迫停学。这一行动是全面排华的序幕。[①]

2. 排华政策和措施。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排华事件，源于1959年5月商业部长决定书和11月内容相同的第10号总统法令。它们规定县以下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1959年12月31日停止营业。他们的产业将按先后顺序，由以下部门和人士经营：合作社、印度尼西亚中等商、民族零售商和印度尼西亚籍民。[②]又规定，已搬迁的华侨的房屋由当地军部接管监督。

各地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又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如东爪哇军部于1959年12月月颁布条例，规定外侨企业禁止转让，商业工具（度量衡器械及桶类等）和运输工具不许迁移。最高检察署、中央外汇局和中央关税局规定：华侨离开印度尼西亚时可携带的东西有27种，但数量须受限制。有11种物品（电冰箱等）禁止带走。带离的物品须在14天前送检。[③] 三宝垄当局规定，除上述11种物品外，摩托车和摩托自行车也不准带走。

---

① 该处楷体字部分引自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281页。

② 雅加达《印华经济》，1959年7月3日。

③ 雅加达《印华经济》，1960年1月4日。

除迫迁外，各地还针对华侨陆续颁布以下法令，加剧了排华气氛。

禁止民众公开集会。如雅加达地方战时掌权者规定，公开的民众大会、集会和含有政治性活动的示威游行，均属被禁之列。同时禁止发行一切被认为能影响地方治安、公共秩序和危害民族团结的出版物，否则可判一年徒刑或罚款一万盾。苏加巫眉军部发出通告，禁止两人以上的外侨集会。

禁止使用汉字，关闭华侨学校。雅加达市议会在1959年5月21日禁止在首都的广告牌、店铺等使用汉字。1960年2月，苏北当局组织“文化监督委员会”，取缔棉兰等地的华文招牌，改用印度尼西亚文招牌，原来用华文名称的街道亦须改为印度尼西亚文。此外，泗水、井里汶、万隆、茂物、苏加巫眉、巨港等地亦有类似规定。玛琅、巴东等地于1959年6月禁止发行一批华语唱片。一些地方取缔了华侨学校，三宝垄等地政府征用华侨学校和社团。

禁止外侨居留。雅加达、东爪哇、万隆、棉兰等地被宣布为封锁区，禁止外侨暂时或永久居留。

限制外侨在国内旅行。一些地方规定，外侨旅游者必须随时向有关当局呈报并出示证件。有的地方（如苏北）还规定，外侨出国旅游必须先向当局申报。

外侨必须呈报外汇。1960年2月，最高检察署发布命令，所有被称为“外汇居民”的人（如曾经修改和增订过的1940年外汇法令和1940年外汇条例所指者），必须向最高检察署办事处呈报自己在国外拥有的外汇，包括黄金、金属的或纸张的外国货币、有价票据（支票、定期汇票及其他类似的有价票据）、证券（债券或股份登记票、公债票、当票、股票、红利票和其他类似票据以及股息券、固本券和外汇证券）、债券（不论可否立即提取的储蓄、存款账和其他类似的债券，包括可付值的固本券、外汇证券利证券）。凡违法者将查办并处最重的刑罚。[①][②]

---

① 雅加达《生活报》，1960年2月12日。

② 该处楷体字部分引自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史（1950—2004）》，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0页。

3. 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经过。

这次大规模排华运动是由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策动、在各地政府直接插手下发生的，因而其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历史上罕见的。受到第10号总统法令直接影响的华侨达50万人。[①] 单是爪哇和北苏门答腊即达2万余户。[②]

1959年5月至1960年8月，排华运动逐步席卷全国，其中尤以西爪哇最为激烈。

1959年下半年，西爪哇多数县乡组织了处理外侨善后委员会，负责贯彻实施商业部长的上述决定。当局组织人力，调派军警，除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外，还召集华侨开会，宣读政府的命令，要求华侨填写调查表格，内容包括准备迁往何处，等等。打横（Tasikmalaya）当局9月3日下令打横、尖美士（Ciamis）县属的几千名华侨必须在10月25日以前搬到指定地点，否则将从严惩处。华侨的商店、工厂必须就地转租给合作社或印度尼西亚族裔，否则予以接管。万悦（Banjar）地区当局限令103户的700余名华侨（全区有华侨300户，2000余人）在10月25日上午10时前搬迁。井里汶当局于9月18日下令华侨于12月1日前到5个地区集中。不许侨团、学校、企业悬挂外文招牌。华侨学校要交给文教局改办国民学校。苏加巫眉县当局警告禁区内的华侨必须在12月1日以前搬迁，否则将以武力没收他们的财产，[③] 12月初，尖美士县万悦地区的165名华侨家长以不执行迫迁令为由而被拘留。以相同罪名被拘留的尚有井里汶的29名华侨。[④]

在迫迁过程中，华侨遭殴打、妇女被调戏的屡见不鲜。12月1日，加拉横县芝拉马夜（Cilamaya）地区的四五十名军警冲进华侨家中，见人就打，有的华侨手腕骨被打断，有的被打晕。萧玉麟全家不仅被打，17岁的女儿还遭军官调戏。有些华侨被毒打后带走，有些被雨淋而病倒。12月8日，芝维利（Ciwidej）地区74岁的老华侨陈崇兴被强迫迁到连旺（Lem-

---

① Asia Week, Hong Kong, 3rdJune 1983, p. 36.
② 雅加达《印华经济》，1959年8月10日。
③ 马尼拉《华侨商报》，1959年11月10日。
④ 雅加达《生活报》，1959年12月5日。

bang）市收容所后病倒，第六天死去，导致妻子精神错乱。

最严重的是发生在苏加巫眉县属下芝巴德（Cibbadak）镇及万隆附近的芝马墟（Cimahi）镇的排华流血事件。

芝巴德离首都103公里，离茂物17公里，交通方便，有华侨170家，共计1036人。[①] 他们多为零售商，代售日用品，收购当地土特产。中等商人极少。他们向来奉公守法，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从未发生过种族冲突事件。

自从商业部部长决定下达后，许多华侨担心商店停业后的生活及出路问题，当局又未做妥善安排，终日惶惶不安。当地侨团曾向当局反映情况，但未获解决。西爪哇外侨居住条例禁止县以下外侨居住，并限他们必须在1959年12月1日以前搬迁，更使华侨坐立不安。许多人因受钞票贬值影响，家中已无多少存款，搬迁即意味着流离失所，于是再向当局反映困难，仍然没有结果。

1959年11月3日上午，一批武装军警10余人开着11辆贴有“外侨收容委员会”字样的卡车，准备强迫第一批被迫迁的12户华侨（125人）搬到苏加巫眉。华侨纷纷要求当局体察他们的困难，允计继续留住。但指挥官置之不理，命令军警用强制手段逼华侨上车。在逼方成山一家上车时，其67岁的老父亲及几个孩子被强拉上车，指挥官用棍棒打伤了方成山的头部，方成山旋即入院治疗。前来劝解的黄姓华侨脸部亦被打伤。许多华侨想前去探视并救助，被警察挡住，喝令离开。当天有六人被打伤，必须住进医院。最后，这12家华侨被迫搬到苏加巫眉，挤住在狭小的亲戚家或收容所。有的白天还要回到芝巴德上班。

事件发生后，中国大使馆即向印度尼西亚当局交涉并慰问华侨。7日，又有数名军人强迫10家华侨搬迁。

中国新闻社1959年12月1日的电讯指出：“目前整个西爪哇省都在县首府以下地区大规模地疯狂地进行武力迫迁。西爪哇当局还出动了大批军队、警察、宪兵，以鸣枪、毒打、凌辱的残暴手段对付华侨，强拖病人、孕妇上车，封闭华侨房屋，强搬华侨财产，征用华侨学校，逼迫无数华侨

---

① 雅加达《生活报》，1959年11月13日。

流离失所，失学失业，丧失生计。近两个月来，西爪哇当局还采取了恐怖手段大规模逮捕华侨。据悉被捕者已超过230多名，同时还逮捕了10余名侨团领导人。将被捕的华侨同印度尼西亚的叛乱分子扣押在一个集中营里；甚至对被捕的华侨加以‘抗拒迫迁’的罪名无理判刑。仅在尖美士县就已经有172名华侨被判徒刑。”

这篇电讯稿还揭露了发生在芝巴德、茂物县芝灵诗镇、雅加达州芝拉马夜镇、苏横县（Subang）、井里汶县及普瓦卡达县等地类似的武力迫迁的惨状。

尽管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领馆、侨团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纷纷抗议，印度尼西亚主持公道的人士也发表声明，报章发表社论，谴责上述种种违反人道主义的行径，印度尼西亚当局仍不予理会，一意孤行，于是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芝马墟两尸三命的惨剧。

芝马墟是万隆附近的一个小镇。1960年6月下旬，一批武装军警到达这里强迫华侨搬迁。他们切断电源和自来水供应，封锁了交通，肆意打人捕人。7月3日上午，数十名军人又来迫迁，面对不到10人的妇女儿童，他们竟悍然开枪，45岁的华侨妇女叶金娘和38岁已怀孕4个月的杨木妹当场倒地死亡，其余华侨前往抢救也被制止。经验尸证明，叶金娘身中八粒以上子弹，杨木妹也中弹多处。膝盖伤痕累累。这表明被枪杀前曾遭残酷毒打。此外还有数人受伤。

事后，当局发表颠倒是非的声明，并下令封锁消息。中国领事馆派人前往调查也受阻。棉兰等地华侨开追悼会也遭禁止。经过取证调查，证明叶、杨是被军人瞄准枪杀的。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报纸纷纷著文，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军人的暴行。死难者家乡福建福清县1800多人于7日举行群众大会。印度尼西亚华文报刊登大量调查文章，揭露排华罪行。治丧委员会收到来自各地的大批唁电、唁函。

1960年7月10日，在芝马墟中华礼堂举行有1.5万人参加的追悼大

会。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印度尼西亚工会及印度尼西亚妇女联合会也派代表出席。18 日，死难者骨灰被护送回中国安葬。雅加达《生活报》收到各界捐款 219680 盾，全部交给死难者家属。[①]

在中爪哇，受影响的 2000 多户华侨小商从 1960 年 1 月起停业。[②] 他们等待当局准予就地转业的安排，但至 2 月份仍无消息，而申请新工业准字的期限已过，不再发出新准字。许多小商已几个月毫无收入，坐吃山空，有的仅能维持一家大小几个星期的生活，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只好要求当局给予救济，或者遣送他们返中国。

在三马林达，华侨房屋经常遭人用石头袭击，甚至发生军人开枪打伤华侨的事件，而当局却不惩处肇事者。从巫劳炭山埠及海口迫迁到丹戎(Tanjung) 埠的 500 多华侨数月来一直未得到妥善收容。[③] 有的住在亲戚家，有的没有住处，只好住在高脚屋下。屋小人多，拥挤不堪，卫生环境很差。华侨杨俊因受刺激突然暴毙。一妇女因迫迁太过劳累及受打击而流产。当地华侨社团提请当局改善华侨恶劣的处境，或者让他们返回原住地，或者送他们回中国。

在廖内，排华活动也很猖獗。1959 年 6 月 2 日，军人打死打伤无辜华侨三人。8 月 29 日，军人借口搜查武器，挖掘十几座华侨坟墓。10 月 5 日，当局强行征用北干巴鲁 (Pekanbaru) 华侨中学和小学，使 700 多师生失业失学。当地还上演煽动歧视华侨的现代剧。[④]

一些地方 (如泗水) 发现有“赶走中国人”的传单。有的地方强迫华侨先缴清外侨税 (包括已故者) 才能搬迁。1960 年 8 月，一些华侨准备搭乘岳州轮返中国。在雅加达丹戎不碌 (Tanjung Priok) 码头，华侨所携带的并未列入禁止带走的牙膏等物品竟被当局扣留，理由是没有申请准字。[⑤]

---

① 邹访今:《印度尼西亚芝马墟华侨杨、叶惨案始末》，打印稿，1987 年，第 7 页。
② 雅加达《印华经济》，1960 年 2 月 12 日。
③ 雅加达《印华经济》，1960 年 2 月 5 日。
④ 仰光《人民报》，1960 年 5 月 7 日。
⑤ 该处楷体字部分引自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史 (1950—2004)》，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2—146 页。

1959年至1961年的排华事件中，直接死亡者有数十人，间接死亡的（自杀、病死等）也有数十人。在贯彻1959年第10号总统法令中，有13万华侨华人到新加坡、中国大陆和香港。其中返中国大陆者达9.6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因执行1959年第10号总统法令而受的损失超过6000万美元。

排华也使印度尼西亚自食其果，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困难。购销脱节，经济混乱；城乡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国库收入减少，赤字增加，资金外流。

1960年7月6日，印度尼西亚宣布派出久已缺任的驻中国大使，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反华排华活动也逐渐缓和下来。

二、中国政府应对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

针对印度尼西亚国内的有势力集团有计划地掀起的排华活动，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应对。

1. 辨明事理，不许歪曲印度尼西亚华侨问题的性质。

1957年在印度尼西亚就出现了有计划的排华活动。到1959年5月，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进一步策动了全面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活动，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报刊对中国进行诽谤和诬蔑，诬指中国政府"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进行侵略"，散布华侨大部分"反对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战争"，是"第五纵队"，华侨经济是"殖民主义经济的残余"等敌视中国的言论，为进行排华活动而诋毁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及其活动。为此，中国陈毅外长两次致函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阐明华侨问题的性质。陈毅外长指出："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他们世世代代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友好相处，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和民族独立事业出过一份力量。他们同以炮舰为后盾、以压迫和掠夺另一个国家为目的的殖民主义者是根本不同的。在华侨中，的确有极少数人的行为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仅仅根据这一点，就把全体华侨说成是妨碍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垄断集团，把他们当作是排挤和打击的主要目标，那是不公正的。"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承认，

应该寻找适当的方法使问题得到解决，这样有利于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发展和使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受到尊重。[①] 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行动完全违背自己所作的承诺。对这种行为作斗争，首先就要摆正印度尼西亚华侨问题的性质，不许诋毁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及其活动。

2. 进行外交交涉，寻找解决办法。

针对印度尼西亚排华活动，中国政府于 1959 年 9 月 8 日照会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停止反华排华活动。1959 年 12 月 9 日，中国外长陈毅致函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对全面解决华侨问题提出三点建议：（1）两国政府立即交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批准书，同时讨论和规定实施这个条约的办法；（2）切实保护自愿保留中国国籍或者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而未获批准的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3）对于流离失所或不愿继续留居的华侨，中国政府准备安排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希望印度尼西亚政府分期分批遣送他们回国，并保证他们归国途中的安全。同时，还建议两国政府指派代表进行商谈。这三点建议具体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维护中、印度尼西亚友好的诚意，并为全面解决华侨问题提供了正确的途径。



1960 年 1 月间，中、印度尼西亚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批准书在北京互换，中国大使黄镇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就有关华侨问题进行了商谈。1960 年 2 月 17 日，在雅加达集中的 1000 多名华侨登上中国主动派去的第一批船只，实现了归国的愿望。这些事实表明，由于中国做了许多努力，促使出现了全面解决华侨问题的良好开端。

但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仍横生枝节，对归国华侨故意制造困难，并对当地华侨继续武力逼迁。中国政府为此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六项要求：（1）停止对华侨的逼迁和其他迫害活动；（2）释放在逼迁过程中被拘捕的华侨；（3）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照顾受排华迫害的华侨的生活，赔偿他们的损失；（4）协助归国华侨前往指定集结地点和保证他们在途中的食宿安全；（5）允许归国华侨变卖自己的财产，带回自己的资金和物品；

---

① 中国外长陈毅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的联合公报（1959 年 10 月 11 日）。

(6) 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安排船只，分批分期遣送上述华侨回国。印度尼西亚政府曾经表示中国的要求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作为解决遣送华侨回国问题的基础。

1960年3月15日，中国外长陈毅再次写信给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重申上述要求，苏班德里约在复信中说，要给中国接运华侨回国的工作以协助。可是不久，就发生了印度尼西亚当局借口华侨出境手续未办完，用武力阻挠中国接运华侨的大宝康轮事件和印度尼西亚三马林达军事当局无理强行软禁中国驻马辰领事的事件。接着，在1960年5月下旬，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武力逼迁。1960年7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芝马墟甚至发生了枪杀两名华侨妇女的事件。中国政府对上述事件，分别表示遗憾和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抚恤死难家属，释放被捕华侨，立即停止对华侨的逼迁和各种迫害活动。

1960年12月15日，中国政府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实施办法达成协议。12月21日，在雅加达互换批准书；12月24日，双方同时公布生效。实施办法根据1955年4月22日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和1955年6月3日换文的规定，具体规定了选籍人的范围、受理选择国籍的机关、选择国籍的手续等条款。这为进一步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促进有关华侨的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

3. 派出船只迎接、安置归侨。

对于“那些流离失所、无法谋生或者不愿继续居留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政府派出船只去印度尼西亚接运其回国，维持生计。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侨情，国务院制定了接纳安置归侨的总方针，即集中安置、面向农村、面向山区、有特殊技能者量才录用的政策。1960年2月2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负责统筹归国华侨的接待和安置工作。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办理接待安置事务，并在广州、汕头、湛江、海口等主要口岸设立了接待归侨的临时机构。具体部署如下：

第一，认真做好对归国华侨和归国华侨学生的安置和接待工作。特别要首先做好第一、二批归侨的工作，以便推动更多的华侨从印度尼西亚回



乘船归国的华侨

国，并且为将来大规模安置归侨和归国华侨学生积累经验。安置采取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方针。将大多数归侨安置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新建和扩建的国营华侨农场和国营农场，种植橡胶等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部分技术人员和工人，可安置在各省市厂矿、企业。一部分愿意回原籍与亲属团聚的可送返原籍安置。归国华侨学生则分送各地归国华侨中等补习学校和华侨工、农业技术学校学习。

第二，中央决定以中侨委和广东省委为主，吸收中央其他有关部门参加，在广东成立“归国华侨接待委员会”，负责归侨（包括华侨学生）接待工作。各有关地区应该根据工作需要建立接待机构。广东、福建、云南、广西等省委应该立即研究和制订安置大量归侨的计划，包括确定安置归侨的适当地区和生产部门以及在归侨安置区中设立小学、初级中学，等等，这些工作要有一位书记亲自领导。接待和安置归侨所需经费，统一由中侨委向国务院报告。新建国营华侨农场，由中侨委、农垦部和各有关省委双重领导，以中侨委为主。

第三，为了在经济上加重打击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同时也为了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照顾华侨财产不致受到太大的损失，应该鼓励华侨尽量将国家建设需要的物资，如橡胶、橡胶种子、石油、机器等输入国内，运到口岸后按国际价格以人民币收购，并且免征关税。对橡胶、石油等重要物资，必要时国家还可以给以一定比例的结汇优待，以利于继续进口。

第四，各级有关党委应通过这次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的关于全面解决华侨问题的建议，对全体归侨、侨眷、归国华侨学生及有关工作单位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一次生动的、深刻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教育全体归侨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接待和安置新回国的华侨的工作，并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新归侨一道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①]

1960 年 2 月，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接侨船到印度尼西亚。

4. 结合反对反华排华斗争所阐明的一些政策思想。

在反对反华排华的整个过程中，中国还阐明了这样一些有关政策思想：

（1）华侨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在印度尼西亚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如何调整华侨的经济地位，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寻找适当办法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发展和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得到尊重”，“华侨的经济将仍然对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②]

（2）希望印度尼西亚双重国籍的华侨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许多华侨世世代代居留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同印度尼西亚人民融合在一起。中国政府愿意看到这些华侨能够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华侨加入侨居国的国籍，对于他们自己和对于侨居国来说，都是有利的。”[③]

（3）双重国籍取消后的应有权利和义务。“他们一旦取得印度尼西亚的国籍，当然效忠于印度尼西亚，同时当然也享受这个国家的公民权利，而不受任何歧视。”“会有一部分人自愿保留中国国籍，也会有一部分人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而未获批准。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尼西亚政府按照两国签订的关

①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大量接待归国华侨的指示》，1959 年 12 月 20 日。

② 中国外长陈毅 1959 年 12 月 24 日给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的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6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61—462 页。

③ 中国外长陈毅 1959 年 12 月 24 日给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的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6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57—458 页。

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11条和两国外交部长的联合公报，切实保护这些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制止对他们的一切歧视和迫害。中国政府将继续勉励这些华侨尊重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法令，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努力作出贡献，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友好相处。"①

（4）妥善解决印度尼西亚华侨问题的条件。"中国政府始终认为，只有使愿意留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能够在友好的气氛和有保障的条件下留下来，同时使愿意离开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在充分照顾他们的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离开，华侨问题才能得到全面的和合理的解决。"②③

点评：

二战结束以后，印度尼西亚的排华运动接连不断，在50多年间比较大的排华事件就有十几起，其发生规律一般都是国内矛盾突出、政局动荡之时，且华人并无直接的违法或非道德言行的刺激，多是印度尼西亚一些人无处发泄不满时的冲动之举。出于浓厚的血缘亲情的系念和根深蒂固的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海外华侨一般都真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哪怕在异国他乡繁衍生息了上百年的光景。因此无论从骨肉相连的情感出发，还是从维护民族尊严的角度考虑（印度尼西亚华侨在1959年很多人具有中国国籍），中国政府都必须给以认真的关注，采取相应的措施。全面审视1959年印度尼西亚排华和中国政府应对的这段历史过程，可以使我们联想很多的问题，有的对于现实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政府为什么严重关切1959年的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甚至直接介入?

1. 印度尼西亚华侨大都具有双重国籍。晚清制定的《大清国籍条例》，民国时期1912年国籍法和1929年国籍法均从血统主义的原则出发，规定

① 中国外长陈毅1959年12月24日给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的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64页。

② 中国外长陈毅1959年12月24日给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的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58页。

③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63页。

凡属华人血统，就自然拥有中国国籍，对于华侨来说，这意味着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加入居住地国家的国籍，均可拥有中国国籍，即可以具有双重国籍，这一规定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虽然1954年至1955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通过谈判，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中国宣布华侨放弃“双重国籍”，但多数华侨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因此，在印度尼西亚1959年发生严重排华事件时，中国政府必须从保护本国公民正当权益的角度来采取必要的措施。

2. 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原因、手段不合理。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大都从事商业活动，由于其勤奋、敬业、守信，其生活水平总体上要高于一般的本地居民，因而被当地一些人所嫉妒。再有，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都有一种强烈的维护感、自豪感，没有被当地的文化所同化，这也是一些人发动排华的借口。从根本上来说，印度尼西亚排华是其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在作怪。对于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展排华运动，凡具有现代政治文明意识的国家都是不能苟同的。更何况，印度尼西亚1959年的排华手段有点过分。中国政府从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主动放弃了华人的双重国籍，印度尼西亚政府当局非但没有对他们施以同等的公民权利待遇，反而予以打击，这很让人感到不平。而且，一些反华势力还突破了政府的有关法令精神，无所顾忌地排斥华侨。1959年颁布的第10号总统令，规定从1960年起禁止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县级以下地区经商，但一些地区的军事掌权者将这个规定延伸为不准华侨在县级以下地区居住，使得50多万华侨无立足之地。这就更加过分了。所以，中国政府在此时若不加以干涉的话，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的。

3. 华侨为祖国作出的贡献很大。在近代以前，由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还没有在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得到认同，留居海外的中国人事实上都被现代人视为华侨。他们的命运大都很不幸，基本上是在国内无法生存的背景下逃出去的。在国内被统治者视为“背弃祖宗庐墓”、“自弃化外”的“莠民”，在国外又饱受欺辱。尤其是近代以后，随着中国国力日趋衰微，他们在国外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有鉴于此，广大华侨在近代对祖国独立、富强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国内的多数一般民众，对于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变革都积极地支持，尤其是对辛亥革命倾力相助。为此，孙中山曾深情

地称华侨为“革命之母”。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人有感于祖国日益强大而自豪，更是热心支持，真情服务。1955年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期间，当地华侨异常热烈地举办欢迎活动，甚至自发地发起严密保护他在会议期间生命安全的活动。因此，对于当时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排华行动予以干涉，是中国政府应尽的义务。

二、中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对于改善印度尼西亚华侨的现实处境起了多大作用？

中国政府在此次应对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限于外交谈判和交涉的层面，最严厉的表态也只是“强硬的抗议”（因华侨妇女被杀害，由外交部在照会中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有力的实际步骤是派出船只去印度尼西亚接运“那些流离失所、无法谋生或者不愿继续居留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回国，而这个措施暂时对华侨来说虽然是最好的保护，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却是对广大华侨在印度尼西亚通过长期劳动所获得的很多权利的放弃，因而这个措施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广大侨胞的生命安全而不得已采取的让步政策，也满足了印度尼西亚排华势力的最高目的——赶走华人。

那么，在当时中国有无更好的办法来应对这个事件，以一方面阻止印度尼西亚的排华活动，一方面可以使华侨保留应得的权利呢？这一点就目前来看是几乎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如果态度太强硬，那就是断交，当时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需要程度并不高。这一点可以从1965年的“9·30”排华事件看得清清楚楚。这次事件据说华人被杀害的人数达30万，中、印度尼西亚为此而中断国家关系20多年，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待遇也没有因此而提高，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反而是变本加厉。

1998年的排华事件，华人1200多人被杀，170多名女性被强奸，5000多间商店、房屋被毁、被抢，其暴行令人发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民众更是义愤填膺。但是，依据不干涉内政的对外关系原则，我们的政府依然不能采取强硬的措施，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此后，接替苏哈托担任总统的哈比比亲自到雅加达华人聚居区视察民情，表示此次排华事件中的暴行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承诺

严加调查，将暴徒和凶手绳之以法，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印度尼西亚政府还表示对华人一视同仁，下令停止在华人身份证上加盖特别注明字样，取消对华人的特别行政管制和一些歧视性法规。1999 年 10 月瓦希德、2001 年 7 月 23 日梅加瓦蒂当选总统后，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华人境遇的措施。如参加联合国废除种族歧视的公约，取消歧视华人的措施，立法保护华人，允许华人享有同其他国民一样的信仰、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允许华人发展本族文化，使用华文华语，恢复华刊、华教和华校，将华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主流，将汉语与英语、日语同列为第二语言，指定大学开设高级汉语班，国家的行政、司法、检察、教育等机构全部职位向华人开放，承认孔教为合法宗教，准许华人自由举办宗教信仰或民俗活动等。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还多次参加了华人举办的春节庆典和元宵节联欢大会。

印度尼西亚华人地位从此开始结束多年的被歧视、受打击的状态，民族平等的曙光显现。那么为什么在 1998 年那样严重的排华事件发生后，华人的政治地位却那么快地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是苏哈托独裁政权的结束。凡独裁政权，多推行狭隘民族主义，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排华自然就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印度尼西亚在建立民主政府后，如果不实行民族平等、自由的话，其民主的实践就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效果，也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实行民族平等是民主化的必然发展。所以，如果没有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那么即使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也不可能改变现状。其二，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和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使得现代中国政府的态度被国际关注的程度远较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要深切。其三，与世界民主势力的舆论干涉也有关系。对于这次排华过程中的种种暴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都给予了舆论的谴责，提倡民族平等更是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国际公约的重要内容。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凡是搞民族歧视、民族暴行的国家大都遭到了西方国家不同程度的干涉。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反华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对于印度尼西亚排华基本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在冷战结束后，他们的政策自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对于印度尼西亚的排华政策予以直接的批评。

三、对于中国政府在 1959 年前后所实行的印度尼西亚华侨政策的思考。

1. 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有的人认为，为了与印度尼西亚建立友好关系、防止华侨成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为了使华侨更好地在印度尼西亚落地生根，中国主动放弃双重国籍的做法是合适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操之过急的问题，为了一揽子‘解决华侨问题’而急于把已在国外的华侨‘推’出去，华侨付出的代价太大”。

2. 在安置华侨的工作上存在不周全的地方。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侨情，国务院制定了接纳安置归侨的总方针，即集中安置，面向农村，面向山区，有特殊技能者量才录用的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的直接领导下，由接待安置委员会具体协调，在全国重点侨乡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等地，迅速新建、扩建了 25 个华侨农场。时至 1961 年 7 月，10 万归侨中已有大约 9 万人被集体安置在各华侨农场。但政府在安置华侨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由于原侨居地与现安置地在生活水平、经济形态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绝大多数在侨居地从事商业工作的华侨归国以后，都被安置到乡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种对农村生活的不适应性，让很多归侨无法安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当地政府也时常成为他们抱怨和不满的对象。同时，建国初期国家特殊的经济状况，也使归侨普遍感到物质生活较为匮乏。再加上侨居地与安置地在经济制度“私有”与“公有”上的不同，又使一些归侨不敢让海外的亲人邮寄侨汇，这更加剧了他们在生活上的物质匮乏。当时国家在教育政策上对考不上高一级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一般鼓励他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也让归侨感到失望。对无法考上高一级学校的子女，他们更多希望让他们参加补习班继续学习。总之，由于我国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归侨在就业、物质生活、子女前途等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

其次，归侨在海外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使他们成了祖籍地居民眼中的“另类”，成为当地居民嘲笑的对象。建国后国家政策上的偏“左”，则使他们也成了“资产阶级”，被亲人朋友

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尾巴。总之，在归侨和当地居民之间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心理界限。这一点，使归侨不仅在重建物质家园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与挑战，更严重的是给归侨最终认同、融入当地社会，找到自己精神的家园带来了重重阻力。

第三，关于中国华侨政策的主导思想。有人认为，由于中国对海外华侨的政策受到制约和服从于外交政策的需要，在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华侨保护不力。

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政策有六个主要目标：第一是国家安全，第二是领土完整（包括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第三是经济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第四是国力的强大，第五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方面的胜利，第六是保护华侨。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稳定周边，打破美国的孤立与遏制，改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中国开展了以亚非拉为中心的外交活动。在这样的背景和指导思想下，中国为争取印度尼西亚做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中国和美国在争取印度尼西亚方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①] “双重国籍”的放弃便是一个重要方面。它满足了印度尼西亚占外交优势的体面（印度尼西亚1946年的国籍法和1949年海牙圆桌会议规定，每个印度尼西亚公民不得拥有别国国籍），满足了部分印度尼西亚政治势力不希望大量外侨取得印度尼西亚国籍、排斥外侨的心理。至1951年12月，获得印度尼西亚国籍的华人约有30万人，但该条约撤销了1946至1948年，和1949至1951年已成为印度尼西亚公民的不少华人的法律地位，使数十万华人失去印度尼西亚国籍。以致到1962年，仍有华侨或无国籍者100万人。

（正文：虞花荣　执笔　点评：程美东　虞花荣　执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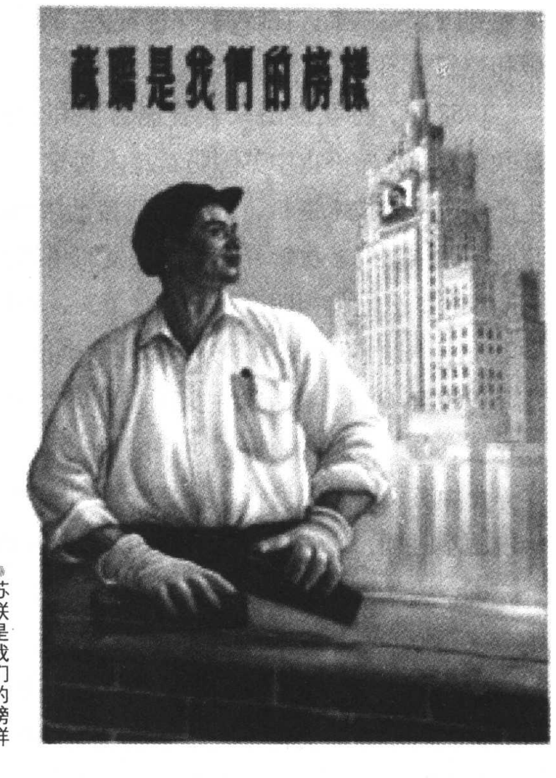
① 杨公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1949—2001）》，（香港）励志出版社2002年；参见《东南亚学刊》1997年第3期“东盟国家内外关系研究专辑”：《印度尼西亚同中国的关系》，第95—97页。

珍宝岛事件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之间在中国境内的珍宝岛地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双方各不相让，态度极其的强硬，使得中苏两党、两国之间从60年代初开始逐渐紧张的关系迅速间恶化到了顶点。苏联扬言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中国则号召全党全国准备应对核战争。当时的紧张局势是建国以后所遭遇到的最危险的时候。这个严重的危机事件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消解的呢？

一、从中苏两党的积怨谈起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共28年的民主革命斗争中，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了中国巨大的经济、组织、政治上的帮助，甚至可以说是无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革命能否在1949年获得成功都是有疑问的。中国共产党对此是感恩在心的，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我们都一直诚心诚意地以苏联为榜样，甘做小学生。建国后，我们更是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完全导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10月3日，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为了表示对新中国的支持，在毛泽东再三要求下，同意废弃同国民党政府所签订的条约，放弃了在这个条约中所享有的在中国的若干权益，并于1950年2月，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协定，新中国从苏联得到了大批的援助。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为了承担苏联本来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毅然决然地进



苏联是我们的榜样

行了抗美援朝，苏联则在物资和武器装备上给予帮助。中苏两国协同一致，共同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取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此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60个师的装备，1951年还为中国承建了6个飞机修理厂。从1949年到1960年，苏联仅向中国海军就派出顾问3390个。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苏联援建了156个重大项目，为这些项目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中国则给予苏联在工农业生产所需自然资源的支持。可以说，两国关系在当时的确亲密无间，是同志加兄弟似的友谊。

但从50年代后期两党两国关系开始渐渐恶化。中苏双方围绕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斯大林评价问题和“和平过渡”等问题产生分歧。为维护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中苏两国都尽量避免分歧公开化。

不久由于中苏两国在对美政策等方面发生分歧，赫鲁晓夫开始了一系列染指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并逐渐把中苏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压服和控制中国。

1958年，苏联提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次年6月，苏联单方面宣布终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并且拒绝援助中国研制核潜艇。9月9日，苏联政府不顾中国的多次解释和劝阻，发表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第一次武装冲突的声明，公然偏袒印度领土扩张主义，声称“对中印边境上发生的事件不能不表示遗憾”，把中苏分歧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1960年6月，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策划并领导了对中国代表的围攻。7月6日，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在中国经济极端困难时期，1960年7月16日，苏联片面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进一步破坏中苏两国的关系。”1961年，苏联采取逼债手段，要求中国政府连本带息偿还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支持中国军事物资的全部贷款（中国于1964年全部还清本息1400亿卢布）。1962年8月，中印再次发生边境争端，苏联公然采取支持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立场，在外交上为尼赫鲁政府辩护，并从军事装备上给印度以支持。

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中苏边境开始出现摩擦和冲突。1960年8月，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事端，中苏边境出现首次武装冲突。此后，苏方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包括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建军事设施、干涉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活和通行、甚至殴打、绑架中国边民，干扰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活动等等。

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在塔城和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引诱6.7万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中苏边境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中苏边境问题日益尖锐并恶化。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担任苏联领导人。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急剧增长，苏联逐步形成了以独霸世界为目标的全球战略，对

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苏联与美国在第三世界展开争夺的同时，提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等论调，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在对华政策上，新的苏联领导人表示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因此中苏关系未能因为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得到缓解。1966 年 3 月，毛泽东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也不发贺电，中苏两党关系至此中断。

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苏联开始针对中国进行军事演习。1968 年 8 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后，先后进行了十几次军事演习，其中“第聂伯河”、“涅曼”、“东方快车”都是针对中国的进攻性演习。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边界形势更加紧张。1964 年 10 月 15 日至 1969 年 3 月 15 日，苏方挑起边境事件达 4189 起，比 1960 年至 1964 年 10 月前的边境冲突增加了一倍半。

二、珍宝岛上的枪声

中苏之间有着 7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旧中国时的中国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无法考虑解决与邻国的详细的边界划分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苏关系的密切，虽有这方面的小纠纷，但双方从大局着眼，都没有加以认真的对待。但自 1960 年，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以后，双方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正式的谈判。1960 年 8 月和 9 月，中国政府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进行边界谈判。1963 年 8 月 23 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六项建议。从 1964 年 2 月至 8 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多次边界谈判，其中位于东段的珍宝岛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地区。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东部与苏联隔江相望，面积 0.74 平方公里，长 2300 米，宽 500 米，涨水时，此岛被水隔离，距我岸 100 米，距俄岸 300 米。枯水期，沙滩裸露，与我岸接壤。岛所在江段因形状两头尖、中间宽，与中国古代的元宝相似而得此名。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长期冲刷，1915 年才形成小岛。至今珍宝岛在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人们可以徒步上岛。1860 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以乌苏里江为



中国边防战士与入侵的苏军交涉

界，强占了江东的全部中国领土。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中国一侧，当地中国居民世世代代在岛上生产和渔猎。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岛屿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界东段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俄国人曾在一张比例尺小于1：100万的地图上粗略地画了一条分界线，看来贴近中国江岸，其实，这张地图非常粗糙，连江心岛几乎都没有标出，图上的红线并未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位置。可是苏联代表却根据这条红线，在其提出的地图中竟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600多个岛屿划归己有，珍宝岛包括在内。

我方提出：一、清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二、虽然是不平等条约，但因为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愿以那些



中国边防军坚守阵地

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任何一方违反那些条约而侵占的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可以根据平等协商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中国政府的这些合理建议未被苏方接受，双方争论不下，谈判无果而终。

此后，苏联在珍宝岛地区开始了愈来愈频繁的军事挑衅行动。1967年1月23日到1969年3月2日，苏边防军侵入珍宝岛地区16次；1967年11月底到1968年1月5日，苏边防军侵入珍宝岛以北七里沁岛18次。1967年11月22日到1968年1月5日，苏边防军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民122人。

1969年1月之后，苏联边防部队对珍宝岛的入侵和挑衅再次升级，甚至对我边防巡逻人员由拳打脚踢发展到棍棒相加。为了应对不测，上级紧急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进行专门培训和配备，到珍宝岛附近集结。

中苏珍宝岛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1969年3月2日和15日。

3月1日，珍宝岛地区的气温降到零下30摄氏度，江面结冰达两米以上，汽车、坦克均可通行。这一天，前来支援珍宝岛防务的我陆军133师侦察科长马宪则接到上级的电话：从2月6日至25日，苏军连续五次围攻、毒打我边防巡逻人员。为防止事态扩大，我方暂时停止巡逻。但苏联方面借此大做文章，说什么“中国退出了达曼斯基岛”，这就证明该岛本来就是苏联的领上，并公开扬言如若中国军队再敢上珍宝岛巡逻，他们将使用武力以解决问题。有鉴于此，上级命令，必须加强珍宝岛地区的巡逻。

根据上级的指示，珍宝岛边防部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巡逻等重大问题。马科长建议由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和班长周登国各带一支巡逻队上岛。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员在电话中肯定了这一巡逻方案，并再次强调无论如何不准先开第一枪。

夜半时分，我侦察分队在陈绍光副连长的带领下，开进珍宝岛西端。3月2日上午8时40分，黑龙江省军区公司边防站派出两个巡逻组执行珍宝岛巡逻任务。这时，从苏联米海洛夫卡方向驶来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靠近中国珍宝岛的南端。车上下来几名苏联军官，待他们乘车退回去后，按照预定计划，孙玉国带着巡逻队30人，登上了珍宝岛。其中，孙玉国亲自带领第一小组走在前边，排长武永高和班长周登国带领第二小组走在后面。

就在这时，对面又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声，只见苏联境内的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开出两辆装甲车、一辆军内卡车和一辆指挥车，急速向珍宝岛驶来。车上的70余名苏联士兵全部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下车后分四路对中方巡逻队进行包围。他们抢先赶到了珍宝岛东侧，挡住了中国边防军巡逻的去路。孙玉国见状，赶紧示意跟在后面的第二巡逻小组立即散开，自己带第一巡逻小组迅速向岛西撤退。但是，面对中国边防巡逻队的退让，苏军却紧追不舍，步步紧逼。我巡逻队已经退到了岛边，再无路可退了。孙玉国见情势危急，便高喊一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并同时发出了准备应战的暗号。9时17分，苏军突然开枪，打死



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的我边防官兵

打伤我方巡逻人员六人。我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迅速自卫还击，将伊力及其七人指挥小组消灭。苏军利用装甲车的火力压制中方巡逻分队，其中一辆侵入岛北端，企图从侧后攻击我军。我岸上掩护分队当即以猛烈火力击退了苏军装甲车，并登岛反击。



经过一小时激战，我军予苏军以歼灭性打击，共打死打伤苏边防军 60 余人（其中击毙 31 人），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 1 辆，击伤装甲车 1 辆。我边防部队牺牲 17 人、重伤 11 人、轻伤 24 人，另有 1 名通信员失踪。

3 月 2 日战斗结束后，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总结了作战经验教训，指出："根据情报，苏军又加强了兵力及装备。这些迹象表明，苏军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挽回上次失败的面子，肯定会发起更大规模的进犯。" 14 日晚，按照预定计划我军在江岸通道上的两个雷场和江岸上的一个雷场的布雷任务完成后，为了加强警戒，并掩护我边防分队次日的正常巡逻，前线指挥部命令 397 团侦察排长于洪东率侦察四班留在岛西无名高地上。

3 月 15 日凌晨 3 时，于洪东听到对岸有异样的响动，便马上向战士们发出了注意观察的暗号。这时候，有六辆苏军装甲运兵车开到江边，30 多个士兵跳下车，悄悄地向珍宝岛靠近。于洪东等人屏住呼吸，密切注视着敌人的行动。这支苏军小分队在岛中部登陆后，没有继续前进，而是迅速

在东北部丛林中隐蔽起来。原来，这是苏军的先头部队，他们企图在天亮后我巡逻队上岛时来个两面夹击。

肖全夫副司令员接到报告后，命令于洪东注意隐蔽，并命令边防站，天亮后巡逻时间推后一小时，巡逻路线由由北向南改为由南向北，如发现情况，则迅速登岛与我留守部队会合。

8时整，孙玉国带领12人的巡逻小分队，从南侧登岛，由南向北巡逻。孙玉国一行在走到岛中央，马上就要进入苏军设伏的火力区时，突然停了下来。孙站长明白敌人的企图，便停滞不前，与敌人保持着一定距离。直到看到江岸上的苏军大部队将要行动了，孙玉国命令巡逻队折头朝西南方向去了。

8时5分，苏军三辆装甲车与20多名步兵，向孙玉国所在部队冲过来。于洪东见正在前突的敌人将侧面全部暴露出来了，果断地下达了攻击令。某部营长冷鹏飞命令步兵分队消灭敌装甲车上的步兵，同时带领火箭筒组由阵地前出，待苏军装甲车进至70米处时突然开火，一举击毁两辆。战斗至9时16分，苏军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

第一次进攻受挫后，列昂诺夫重做部署：正面由坦克、装甲车各三辆导引冲击，牵制对方火力；侧面由杨辛中校率由四辆坦克组成的中队从岛南端侧后的江岸上穿过去，切断江岸与岛上的联系，以围歼岛上的中国部队。

9时46分，苏军的地面炮兵和坦克，对我军岸边阵地和岛上分队进行猛烈射击。10时10分，苏军又出动六辆坦克和五辆装甲车，向珍宝岛接近。其中四辆坦克由岛南端窜入中国江岸，迂回回到我侧后；另外两辆坦克和五辆装甲车由岛北端侵入，企图前后夹击。苏联江岸上的火炮和机枪火力同时封锁中国江岸，拦阻支援。我方根据苏军坦克从中国江岸登岛比较困难的情况，决定在珍宝岛西侧留置少数兵力监视和狙击，集中兵力和反坦克兵器，抗击正面之敌。同时命令岸上的无后座炮分队攻击迂回的苏军坦克。苏军坦克遭打击后，改变行动路线，其中一辆闯入雷区，履带被炸断，随后被我炮兵击毁。战至12时25分，苏军第二次进攻被击退。我军共击毁敌坦克一辆、装甲车两辆，击伤坦克、装甲车各一辆，并给其步兵以很大杀伤。13时35

分，苏军的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侦察校射飞机引导下，对我防御阵地和公开边防站进行大规模炮火覆盖。炮击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七公里，持续两小时。15时13分，苏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1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苏军部分坦克、装甲车在正面展开，担任火力掩护，其他部队分成两个梯队向我防御阵地轮番冲击，企图以优势兵力将我守岛分队挤走。我军采取以几个战斗小组围打一辆坦克或装甲车的战法，同时组织岸上步兵火力分割敌坦克与步兵，打乱其作战协同。15时30分许，我炮兵加入战斗，猛烈打击岛上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击毁击伤六辆。17时15分，苏军撤出珍宝岛。

15日战斗激战九个多小时，我军顶住了苏军的六次炮火袭击和三次进攻，击毙敌上校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以下60余人，打伤8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3辆，缴获军事装备1部。此次战斗，中国边防部队阵亡12人、伤27人。然而被炸断履带的一辆T—62型坦克留在中国江岸的冰面上，成为苏军入侵中国领土的铁证。因此，苏军千方百计想夺回这辆坦克，但是数次行动均告失败，仅将其弄沉。同年5月，中方将这辆坦克打捞上岸，并送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览。

珍宝岛战斗中，我边防部队共击毁击伤苏联边防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毁卡车、指挥车各1辆，毙伤200余人，缴获T—62型坦克1辆、各种枪31支（挺）、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

3月17日凌晨，苏军出动坦克5辆、步兵7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21日晚，苏军派遣爆破组，偷偷摸向被炸坏履带的T—62型坦克，企图将其炸毁。双方又发生战斗，但规模较前两次小得多。

在3月2日、15日、17日的珍宝岛战斗中，中苏双方互有较大的伤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为：苏联方面亡58人，伤94人。其中，边防军亡49人，伤61人；远东军区亡9人，伤33人。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为：中国边防部队亡29人，伤62人，失踪1人。①

---

① 另有人认为，此次珍宝岛军事冲突，苏方损失约60人（包括边界哨所的指挥官），中方损失800人，双方的数字可能都包括死者和伤者。参见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



面对苏军的侵略，我边防官兵严阵以待

点评：

此次珍宝岛军事冲突的严重程度是建国以后中国与周边强大邻国之间发生的最激烈的军事冲突，一时间中苏两国关系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即将拉开大幕。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加强军事建设，做好最坏的打算。1969 年 3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决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如果你们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4 月份召开的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中共九大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进入了突击性的战备高潮时期。为了加强战备，中国军工生产规模迅速扩大，1969 年下半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 34%。1969 年 6 月，中

央军委召集“三北”会议系统研究、制定反击苏联入侵的作战方案。1969年8月，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全国人民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8·28”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地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战备工作进入全面具体实施阶段，由主要是军队的工作变成全民的紧张行动，成为领导机关的主要工作之一。

1969年10月，中苏边境谈判开始后，全国全军的备战活动开始从高度戒备的临战状态向常备型状态恢复。从1969年10月到1969年底，各地战备工作的重点转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场建设、战备训练、储存战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建立健全战时后勤供应体制、人口疏散等方面。

从1970年初开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转入常备状态。虽然全国各地的战备活动还在广泛进行，但其声势和紧张程度已不如196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备活动虽然还保持着大规模、高速度的势头，但也逐渐向常备型发展。197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发指示，要求部队在狠抓“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训练的同时加强近战、夜战的训练。1970年11月，毛泽东要求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军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提高了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1971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要求军训部队每年野营拉练外，步兵军事训练90天，技术兵军事训练120天。

珍宝岛事件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把反坦克武器作为常规武器发展的重点之一，同时在改装一批摩托化步兵师的基础上改建若干个摩托化军，使部队的火力、机动力和突击力有了较大提高。为了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军委调整军事部署，大批部队调往“三北”地区。

8月份，中共中央发布文件，要求边疆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边疆各族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10月，又将北京的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紧急输送到外地，以防苏联偷袭。

当时的军事战略从总体上是取守势的，是防御性的，就是毛泽东所说

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因为苏联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几乎所有的核武器和导弹基地、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莫斯科在常规武器、火炮、装甲车和战场的机动性上占有绝对优势。

二、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积极调动全国民众的反苏情绪。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央就部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抗议示威活动。从3月3日到12日，全国城乡共有四亿余军民举行集会和游行，声讨苏军侵略我国领土的罪行，要求苏联当局立即停止一切挑衅活动。3月4日，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改定的题目为《打倒苏修新沙皇》的社论，出现在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代表的全国各大报纸的显著位置上。社论说“沙皇已经侵占的地方，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沙皇还没有侵占的地方，他们也要伸手”。揭露了苏修侵略扩张的野心，表达了中国人民誓死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毛泽东亲自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向人山人海的游行群众讲道：“我们要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霎时间，“打倒苏联修正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叫反华的恶棍们有来无回粉身碎骨”等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全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激涨到了空前的水准，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无数的人力资源就会化作坚强的反侵略力量。

三、外交上展开积极的攻势，有原则性地进行外交斡旋，策略性地做出让步，力争事态的发展不要激化。珍宝岛事件发生的当天，我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联边防军悍然入侵珍宝岛，提出了强烈抗议：“这次严重的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蓄意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严重罪行。”并强烈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此抗议所持态度之强硬、措辞之严厉，是我国外交史上所罕见，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苏联所挑起

的侵略行为的坚定的立场和决心。

但我国政府所持的这种抗议态势主要是从国家根本利益这个角度所作出的原则性表示，并没有真正地想把事态扩大，而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化解危机。3 月29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建议恢复已经中断了很长时间的中苏边界谈判。5 月24 日，中国政府对此作了答复，提出了在苏联必须承认目前中苏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等五项原则的前提下，双方可以进行谈判。虽然苏联政府不承认以这些条件为前提，但中国政府愿意谈判的态度使之感受到了和平的希望，一定程度上促使其保持了克制态度，对于不激化冲突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1969 年9 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苏联希望借中苏双方共同吊唁胡志明之际进行谈判。我方初始未予理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于11 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就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恩来指出，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也不会侵略别人。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经过长达3 小时40 分的会谈，周恩来和柯西金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和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协议。双方还就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成员、谈判地点、重派大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约定将双方达成的协议上报两国中央政府后，交换信件并予以确认。这次会谈，初步扭转了中苏两国空前对立的紧张局面。

1969 年10 月28 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谈判中，苏方否认了周恩来和柯西金达成的协议，只要求立即进行边界谈判。苏方不接受中国外交部在10 月8 日重申的1964 年中苏谈判中的我方立场，拒不承认中苏边界地区存在争议地区，既否认沙俄与中国所签订条约的不平等性，又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由于苏方毫无诚意，在谈判中设置重重障碍，致使中苏边界谈判陷于僵局。

从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6月，中苏双方进行了15轮边界谈判。由于苏联政府一直坚持原有立场，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合理主张，边界谈判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这些谈判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毕竟使双方能够冷静下来思考解决的办法，避免了将势态进一步地扩大。

四、实行联美战略，遏制苏联侵略扩张。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双方既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没有什么民间的交流，双方都视对方为直接的敌人，美国直接介入越南战争和中国实行抗美援越政策更加重了这种对立的态势。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中国面临着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同时为敌的状况，这种情况给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给中国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制约。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要尽快打破两面作战的局面，而中苏之间的冲突正处于激烈之际，且边界纠纷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双方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因此直接化解矛盾决不可能。相对于苏联来说，美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要间接得多，双方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分歧、社会制度的差异，而不是直接的国家利益的争夺。所以，联美就成了当时化解中苏危机的最佳选择。而恰在此时，美国新一届政府也有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愿望。1969年1月20日，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尼克松在讲话时强调：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全没有接触，对世界是不利的……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毛泽东及时地得到了此消息，并指示在《人民日报》加以转载。1969年7月，中国政府释放了前不久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公民，表示了友好的问候。经过多次的不同途径的试探性接触，中美两国于1970年1月20日在华沙开始了大使级会谈。1971年4月，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向希望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问的邀请，从而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与中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了认真的会谈。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表明了两国政府共同缓和两国关系的愿望。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并于28日在上海发表联合公告，两国关系正式实现了正常化。中美敌对的状态终于画上了句号。

五、珍宝岛危机出现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从总体上来看是很成功的，但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军事动员表明了我们最根本的态度，亮出了底牌，使苏联不敢轻举妄动；政治动员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表明了中国政府有着牢靠的基础；在坚持国格的前提下，与苏联当局进行谈判性接触，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政府争取和平的愿望，可以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的确在客观上有助于缓和危机，不至于激化已经非常尖锐的矛盾；联美战略的实施，既使我国少了一个强大的敌人，赢得了良好、广阔的外在发展环境，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外交格局，还对苏联起到了有效的制约，使之不敢摧毁中国的核武器，更不敢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值得反思的地方是，我们过分地强调反修的原则性，对于国际关系当中惯行的一些规则灵活运用的不够，有时表现出过左的迹象。最明显的就是当时的“电话风波”。1969年3月21日晚8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北京、莫斯科之间的热线电话给毛泽东打电话，中方话务员在得知对方身份后，在电话中大声骂道：“你是修正主义者，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你没有资格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话，我不会给你接电话。”柯西金又要求接通周恩来的电话，也遭到了同样的训斥：“苏修头子，你听着，我们两党已经没有关系了，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的总理很忙，没有时间听你的胡言乱语，就是有时间，也不会听你啰唆的！”随后挂断了电话。这件事情让苏联国内主和的柯西金非常的恼火，对中国政府也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这种做法虽是由下面的工作人员引起，但如不及时弥补，后果极其的严重。

当然，这个风波我们通过其他外交方式给予了解释。3月22日，我外交部负责人通知苏联驻华代办叶利扎维金来外交部，宣读了由毛泽东审批的备忘录：从目前的中苏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就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程美东　执笔）

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颁布

一、美国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历史过程

台湾自古就属于中国。早在12世纪中叶，宋朝政府即已派兵驻守澎湖，将澎湖地区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朝政府于16世纪中后期，恢复了一度废止的“巡检司”，并为防御外敌侵犯，增兵澎湖。1662年（清康熙元年），郑成功在台湾设“承天府”。清朝政府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加强了对台湾的治理。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设“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下设“台湾”（今台南）、“凤山”（今高雄）、“诸罗”（今嘉义）三县，隶属福建省管辖。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政府派员测绘台湾地图，勘丈全境里数。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增设“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改“分巡台厦兵备道”为“分巡台厦道”。而后又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1727年（清雍正五年），复改“分巡台厦道”为“分巡台湾道”（后又改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增“澎湖厅”，定“台湾”为官方统一的名称。1875年（清光绪元年），清政府为进一步经营和治理台湾，再增设“台北府”及“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划台湾为单一行省，任刘铭传为首任巡抚，行政区扩为三府一州，领11县5厅。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在日本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1937

年，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自属废止之列。这一布告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1945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收复了失土台湾。台湾同胞鸣放鞭炮，欢欣鼓舞，祭告祖先，庆祝回归祖国怀抱的伟大胜利。国际社会公认台湾属于中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结成同盟国。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省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继续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中国政府自50年代中期起，即开始与美国对话。1955年8月至1970年2

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但在缓和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新中国的壮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两国关系逐步出现解冻的形势。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1978年12月，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撤军。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12月16日公布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①]

二、《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

1979年1月26日，卡特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关于未来美台关系的“综合法案”。该法案以1978年国务院法律顾问汉塞尔和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研究报告为蓝本，目的是：与台湾人民在非官方基础上维持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主要内容有：成立“美台协会”，今后总统或其他美国政府机构与台湾的关系将通过“美台协会”行使，除美台防御条约终止外，其他美台之间的五十九项条约和协定继续有效。法案中没有关于台湾“安全”的条款，也未提给台湾未来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以任何外交特权。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于2月下旬分别就政府法案举行听证与辩论，在长达两个月的辩论中，两院对政府法案提出重大修正，

---

① 该节引自：《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http://www.gwytb.gov.cn/bps/bps_zgty.htm。

并于3月28日、29日分别通过了修正后的法案文本，4月10日送交卡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即《与台湾关系法》(以下简称《关系法》)。

中美建交公报与建交之日发表的美国政府声明都明确申明：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关系法》却多处背离建交公报精神。

首先，美国政府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国会也申明，《关系法》的目的是："在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外交关系正常化"，同时，在中美联合公报的范围内，为继续保持与台湾密切的"非官方的关系提供必要的立法基础"。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与国会都承认美台之间已无政府关系。按照国际法惯例，美国原来与台湾签订的各项条约均应失效。但是美国一方面在该法中避免称台湾为"政府"，代之以台湾统治当局，一方面却又明文规定，除非根据法律予以终止，美台之间的条约与协定一律有效。这等于仍然承认台湾为"政府"，承认美台之间仍有法律关系。

其次，建交之日，美国政府即声明：美台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据此，美台之间不应再存有"安全"关系。而《关系法》则公然增设关于台湾"安全"的条款。原"共同防御条约"承诺的"安全"范围，限定为抵御武装进攻，《关系法》不仅将承诺扩展到"包括抵制和禁运"，而且推及"台湾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明文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这就是以另一种形式，把台湾置于美国的安全范围之内。无怪《关系法》通过后，亲台派即称之为"一种有创见，适应新形势的，保证台湾安全的法律"。

再次，国会宣称：美国同台湾建立新的非官方关系的基石是"美台协会"，将"协会"界定为"私人的非营利社团"，强调"协会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其工作人员不是美国政府的雇员"。这些说法使《关系法》听起来似乎与建交公报中"美国人民将与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业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协议一致，但法案却规定"美台协会"为受权缔结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除外交关系之外所有政府性规定和商贸协议的执行机构，还规定这些协议都须提交国会审批，协会工作人员亦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甚

至规定“协会”人员再回到美国政府工作时，在工龄、退休等福利方面，不受损失，均按政府雇员对待。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协会”是有实无名的大使馆。在诸如移民、台湾在美财产所有权等问题上，都是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意在部分抵消美国所接受的建交三原则。正如亲台派所说，《关系法》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保证美台未来关系，除了名义之外，完全与过去有官方关系时一样。①

该法严重破坏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效力。后来克林顿政府正式宣布：包括本届政府在内的每一届政府，皆确认《与台湾关系法》在法律上优先于1982年公报，前者是美国法律，后者为政策声明。

三、中国政府强烈反对《与台湾关系法》

《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侵犯了中国主权，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实质是以美国国内立法形式变相为台提供“安全保障”，旨在阻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该法一出笼即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访华团时表示：“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

1980年1月9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



① 该节引自周忠菲：《〈与台湾关系法〉产生过程的论争及其实质》，载《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

满意的。"《与台湾关系法》的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28 日，中国外交部对美国驻华使馆提出抗议照会。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运作看，这项法案是美国国会企图制约卡特政府的产物。不过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行政当局企图在新的基础上维持和调整美台关系的意愿。从《与台湾关系法》的内容以及后来美台关系演变的情况看，卡特政府就是企图在该法案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和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所谓美台"实质性关系"，概括地说是建立起与台湾的特殊关系，即在"非官方"的框架内，保持双方的各种（被称为"半官方"或"准官方"）联系；以关心"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为理由，继续为台湾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当时的主要方式是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因此，阻止美国对台军售就成为解决《与台湾关系法》引发的危机的核心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以下对策。

（一）与美方展开谈判，以中美政府发表公报的形式约束美国对台军售行为。①

卡特政府遵照建交谈判中的承诺，在 1979 年没有与台湾进行新的武器交易。但到 1980 年，美国又开始了对台军售。在台湾提出的求购武器清单中包括了高性能的 FX 系列战斗机。7 月，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赵紫阳分别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表示了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关注和反对。直到任期结束，卡特政府除 1980 年 7 月批准对台销售 50 门 8 英寸自行榴弹炮外，没有批准大宗对台军售项目。

1980 年 11 月，里根在大选中获胜。1981 年 1 月 4 日，邓小平乘接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的机会表示："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作出相应的反应。"

1 月中旬，荷兰政府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政府决定将中荷

① 此标题所述问题根据陶文钊：《邓小平与中美关系，1977—1991》（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 年第 5 期）改编。



1979 年邓小平访美

关系降为代办级。此后，中国官员经常提及此事，美国官员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警告。3 月9 日，《华盛顿邮报》透露台湾当局希望从美国购买 F—16 战斗机，引起中国政府特别关注。6 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他认为如果美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向中国出售一些经过选择的军事装备，中国政府对美国对台军售就会比较容忍。这无疑是一种误判。中国外长黄华对黑格表示：中国同意美国在建交后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决不是一般商品贸易，也不是民间往来。他还用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反对英国向美国南方出售武器的例子，提醒美国不要把自己坚决反对过的一种国际行为强加到中国头上。[①] 6 月10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再次重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他说："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国继续干涉我内政，售武器给台湾。如美竟然不顾我一再坚决反对，继续卖武器给台

①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5—236 页。

湾，我势必作出强烈反应。”[1] 事实上，中国政府确实在做“强烈反应”的准备。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中美关系。邓小平在会上说：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14日至16日，黑格访问中国。16日，邓小平会见黑格，着重谈了售台武器问题。他说：“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阴影，干扰我们的战略意图，干扰我们的战略目标。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发展两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回避，不能不想到，假使这个干扰行动太厉害，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思想上要有这种准备。我讲的这些话不是外交辞令，是把我的真正心里的话都讲了。”黑格离开北京时，本应是中国外长亲自送行，但中方仅派了一位副部长，这是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个表示。

8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卡特时，强调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表示“真诚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停滞，要继续发展下去”。卡特在访问结束时表示中国领导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

8月20日至22日，美国众院外委会主席扎布洛基率领众议院访问团抵达台湾作了三天访问。他们与台湾当局讨论了售台武器、台湾防御能力以及《与台湾关系法》的执行情况等问题，还明目张胆地向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将在明年年初就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作出决定。中国作出了强烈反应。26日，新华社记者发表题为《休想以美国之法管中国之事》的述评，指名道姓地抨击扎布洛基在台湾鼓吹“两个中国”的言论。

为了表示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尤其是先进战斗机的立场，中国政府推迟了副总参谋长刘华清的访美。7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表示，虽然中国希望与美国发展战略合作，但如果美国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办事，中国已经做好了让中美关系倒退的准备。8月底，访华回国的参议院外委会成员格伦向报界表示，中国领导人向他指出，中美关系很可能因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而倒退。

---

① 《人民日报》，1981年6月11日。

中方一系列的警告使里根政府认识到了对台军售问题的严重性。黑格向里根建议，暂缓就售台新的武器问题作出决定。中美双方并决定，在即将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合作与发展会议期间，由中国总理和美国总统直接进行讨论。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与里根的会谈。邓小平指出：我们处理荷兰问题，就是给美国的警告。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霸权主义。因此，在同里根会谈时可以说，我们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美关系的，双方都不要玩打牌游戏。

10月，中国总理和外长在坎昆出席会议时，同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讨论了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中方要求美国明确承诺：第一，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飞机在性能和数量上不得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第二，在规定的同样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飞机将逐年减少，以至最后完全停止。但美方表示，在中国实现统一前，美仍将谨慎、克制、有选择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在售台武器数量和性能上答应中国的条件，并表示愿意就此问题同中国会谈。中国的立场十分明确，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必然作出强烈反应。23日，黄华向黑格提出，中美两国立即开始就美国截止武器售台的具体日期进行谈判。如果美国拒绝，那中美关系只好降格，中国政府将从美国召回大使。美方表示愿意继续与中方进行会谈，在此期间美方将谨慎行事。

在北京，12月4日起，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先后与中国副外长章文晋、韩叙进行谈判。美方同意此后售台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但拒绝承诺到一定期限完全停止售台武器，只表示将逐步减少，最终解决这一困难问题。他仍坚持要把美国减少售台武器及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直接联系起来。

1982年1月1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抵达北京。黑格给他的指示说，里根政府决定不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而只是与台湾继续联合生产F—5E，并同意与中国政府谈判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限制。霍尔德里奇离华后，章文晋与恒安石继续谈判，但进展缓慢。美国仍然竭力要把售台武器问题与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联系起来，遭到中国坚决反对。2月中旬，邓小平接受了《瞭望》周刊的采访，直率地表示，中国“没有回

旋的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他警告说：“现在我们等着瞧。我们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4月5日，里根致函邓小平和中国总理，建议布什副总统在预定的大洋洲和东亚之行中访问中国。5月3日，里根又在给胡耀邦总书记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政策将继续建立在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上。我们将不允许让美国人民与在台湾的中国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削弱。”此前4月13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报告，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6000万美元的“与军事有关的零配件”。中国对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①

5月5日，布什一行到达杭州。8日，邓小平与布什会见。他明确指出：“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布什访华时带来了一份新的公报稿。在邓小平会见布什两小时后，中方立即提出了对案。尽管中美之间已经原则同意达成协议，拟订公报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时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中方要求美方确定对台军售的最后期限，美国不答应；美方要求把减少对台军售与中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联系起来，中方不同意。美方谈判人员坚持认为，美国不能使用任何暗示终止售台武器的语言。

美国与台湾合作生产F—5E战斗机的合同即将期满，白宫必须在8月20日前向国会通报其继续与台湾联合生产的意图，在此之前，中美两国必须就美国对台军售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美两国也就可能永远达不成一项协议，而且中国政府势必对美台联合生产战机作出强烈反应，霍尔德里奇担心将会出现中国的“爆炸”。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7月13日，恒安石向邓小平递交了里根的一封信以及美方的公报草案。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不谋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新草案除将上述意向写入条文外，还表示：美国无意在数量和性能上超过美中两国建交后几年的供应水平。美国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直至最终导致问题的解

---

① 《人民日报》，1982年4月15日。

决。五天后，中国方面放弃了要求美国设定售台武器最后期限的条件，同意以逐步减少售台武器作为条件。

中美双方于8月15日达成了协议，并定于17日发布公报。公报共九条。在第五条中，美国重申了“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报的核心内容是第六条：“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在公报正式公布前，邓小平接见恒安石，就公报中的一些规定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请恒安石向里根转达：第一，中美“8·17”公报已达成正式协议，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含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也只能是停止最终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第二，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当然也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希望双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误解。第三，中方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美方一起努力。但无可讳言，在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即便未被修改，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也有很大的机动权限，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邓小平还说，逐步减少当然不是一年减少一美元。“8·17”公报使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①

美国在公报中承诺的具体含义就是：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不应超过1979年1月至1982年8月的水平；其数量应按每年20%的速度递减，

① 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2页。

到五年后的1988年，就应该彻底停止向台湾出售一切武器装备。然而，美国经常违背自己的诺言，或明或暗或通过租赁的方式增加对台湾的武器供应。

"8·17"公报的发表，缓解了美国共和党罗纳德·里根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因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引起的关系恶化的危机。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解决美国武器售台问题，只是把问题暂时掩盖起来。双方各自声明的不同侧重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中方在声明中解释说，"最后解决"的含义就是美国完全停止对台出售武器。中国不允许美国把中国和平统一的方针曲解为美国减少对台出售武器的前提，并强调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毫无关系"。中国在声明中所担心的，恰恰是里根声明所强调的。他声称，未来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将与《与台湾关系法》"保持充分的一致"。中国已经宣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有鉴于此，美国将减少对台出售武器。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进一步声称，"最后解决"并不意味着"最终停止出售武器"，而中方的"大政方针"则意味是"长期不变的"政策。美国武器售台与中国的和平方针直接相连。此外，在回应国会议员对公报的批评时，里根政府还声称公报仅仅涉及武器出售而不涉及防御技术设备的转让。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还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公报只是一项政策声明，不能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美方竭力削弱"8·17"公报对美方约束力的做法，还体现在里根发表公报前对台湾作出的六项保证：（1）美国不会确定停止其武器售台的时间表；（2）美国不会就武器售台问题事先与中国商量；（3）美国将不会在中国——台湾之间起调停的作用；（4）美国不会同意修改《与台湾关系法》；（5）美国没有改变它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立场；（6）美国不会向台湾施加压力，要其与中国谈判。

（二）"8·17"公报发表后，中国政府继续反对《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对台军售行为，反对美方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

"8·17"公报发表后，美国就采取了明暗结合的销售策略，一方面做出遵守公报的姿态，一方面设法绕过"公报"，采取武器租赁、技术支援、合作办厂、武器改进、软件支援等办法，继续增强台湾军事实力。比如说，在台湾购买美国先进战舰不成的情况下，美就于1992年、1994年、

1998年分三批租借了九艘诺克斯级导弹护卫舰给台湾，在租借期满后又借机将这些舰艇以低价卖出。公报发表后不久，美国就宣布同意与台湾合作生产30架F—5E战斗机。1983年，美国又向台湾出售了价值高达5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60架F—104战斗机。1983年军售额为8亿美元，1985年为7.6亿美元。1992年9月，美国政府竟公开突破“8·17”公报的限制，向台湾出售价值高达60亿美元的150架先进的F—16战斗机。自此，美国对台军售出现巨幅上升，售台武器平均每年超过20亿美元，而且都是比较先进的尖端武器。据伦敦战略研究所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基金会的统计，在台湾每一美元的进口额中，就有55美分用于购买军火及与军火相关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仅1979年中美建交至2000年底21年间，美国向台湾出售高性能武器装备的军备交易47宗，价值高达400多亿美元。台湾专门在美国设立了一个武器装备采购组，下设规划、军售、商购、履约、预财小组。而美国方面，自1998年起，每年4月都要在华盛顿举行一次美台军售会议，双方就武器装备购买的项目、售价等问题进行磋商。据台湾《中央日报》等媒体报道，从1996至2003年的八年间，台湾军购总额接近200亿美元，在全球军购的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台湾为美国全球第八大武器出口对象。2004年3月，美国国防部宣布把价值为17.76亿美元的两座远程预警雷达卖给台湾。6月2日，台湾的行政院再次通过6108亿新台币（约合177.5亿美元）的军购案。

美国的军售行为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还反对美方任何同《与台湾关系法》有关联的活动。

1994年4月，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修改后的默考斯基提案。这项附加在“1994年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上的修正案公然声称《与台湾关系法》第二节和第三节效力优于美国的政策声明，包括公报、规定、指令以及基于上述的政策。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在中方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声明基本履行公报。1999年以来，美国国会继续就台湾问题提出大量亲台反华议案。3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所谓“纪念《与台湾关系法》20周年”决议案。

2004年4月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4月21日举行“《与台湾关系法》：未来25年”听证会，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大陆如对台动武，无可避免地会将美国卷入。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中国对美国国会举行《与台湾关系法》听证会和美国官员有关言论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并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对美方制定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依据该法向台湾出售武器表示坚决反对。但美国众议院不顾中方的反对，7月15日通过了“重申《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两院共同决议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说，美国1979年单方面制定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公然侵犯中国主权，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我们一贯坚决反对。现美国众议院不顾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重申《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在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行为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强烈反对美国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

1999年3月和5月，美国国会参院和众院少数亲台反华议员先后提出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公然鼓吹加强台湾的军事能力，要求美国向台湾出售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潜艇等先进武器装备，甚至要求建立美台军队直接联系，扩大合作。这是继《与台湾关系法》之后美方企图在台湾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又一法案。中方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美国行政当局采取切实措施，阻止美国国会审议并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全国人大外委会负责人也分别发表谈话，表明了中方对《加强台湾安全法》及其他涉台议案和法案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的立场。10月26日，美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不顾中方的反对，通过了经修改的《加强台湾安全法》。中方再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2000年2月1日，美众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该法案是继《与台湾关系法》后的第二部规范美台关系的法律文件。它企图通过强化美国国内立法，为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扩大台湾与美军事联系和最终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法律依据，堪称20年来美众议院在

台湾问题上最重要的法案。法案主旨在于补充及进一步落实《与台湾关系法》，强化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承诺，其内容大大超越了美国现行的对台军售政策。它要求美国总统每年在台美军事会谈后60天内，向国会报告台湾要求购买的武器和需求理由，以及美国政府“拒绝、延迟、更改”台要求的决策过程；美国防部每年需向国会报告台海安全状况；美对台提供的防御性物品和服务的性质，应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而不是“8·17”公报或任何类似的行政协议、命令或政策；鼓吹“有必要”武装台湾，有义务为扩大与台湾的军事关系而提供全面合作，并罗列具体措施：该法通过180天之内，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要与台湾指挥体系之间开设直接通信渠道；该法通过的210天内，国防部长必须提出美台两军人员训练交流计划，其中包括台湾防卫所需的敌情分析、作战训练、战术战法，兵力部署、作战运筹；在美国国防大学、战争学院和其他军事教育机构中预留更多的名额给台湾学员等。迫于压力，虽然在法案中删去了售台武器等项目，但说到底，这种修改充其量是技术性和临时性修改，只不过是为了便于法案通过而已。

2月2日，杨洁篪副部长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杨洁篪说，2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通过了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企图为美国和台湾进行和扩大军事联系与往来、美向台出售各种先进武器装备及技术提供所谓法律依据。美国众议院的上述行径完全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方的有关承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图谋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杨洁篪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牵涉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政府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破坏中国统一大业的企图和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答应，也是根本不可能得逞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杨洁篪说，《加强台湾安全法》是继

《与台湾关系法》之后，美国与少数亲台反华议员炮制的又一起在台湾问题上蓄意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的法案。杨洁篪强调，中方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要求，充分认识到《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方有关承诺，按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总统本人所作出的承诺，立即阻止该法案成为法律。美方还应恪守中美“8·17”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售台先进武器装备及技术。普理赫说，他将立即向美国政府报告中国的上述立场。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相继发表讲话，强调该法“不符合台湾利益，反倒会让台湾受到伤害”，应信守原有的“运行十分有效”的《与台湾关系法》，而“东西没有坏，就不要修”，并表示美国政府将最终否决该法案。

点评：

自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里，中美两国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美国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台湾的统一。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中美结束了相互隔绝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七年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原则性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终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然而，此后不到四个月，美国就背弃中美联合公报的精神，制定了粗暴干涉中国统一大业的《与台湾关系法》，使得刚刚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的中美之间面临着倒退、甚至破裂的危险，这对于当时致力于改革开放、重视发展中美关系的中国政府来说，的确是个非常严重的突发事件。而且，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不同的是，其影响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一直影响着此后的中美关系，因此，这个问题决不仅仅是历史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政府在应对该问题中付出的辛劳和智慧是超常的，认真地了解这段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一、在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问题上绝不可以让步，要不惜一切代价。美国国内当时不少议员认为，中国为了对抗苏联，同时也为了实现四化，更多地有求于美国，因此美国可以借此打压中国，使中国多做一些妥协，尤其在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迫使中国“付出代价”。为此，他们

指责卡特政府在建交谈判中未要求中国保证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不必要的让步”，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美国国内的这些人士完全错误地判断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原则，没有转圜的余地。邓小平“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作出相应的反应”，“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的谈话，就在这个问题上向全世界鲜明地交了底。中国政府正式坚持了这个立场，才有了后来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有所让步的“8·17”公报的产生。

二、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认识到，围绕《与台湾关系法》和美方展开的斗争是长期、复杂、艰难的任务，只要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美国对台军售就一天不会停止。理由是：在一个可预见的时间内，国际战略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中美关系不会有大的突破，美国对华战略不会有大的调整，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棋子地位不会动摇，筹码作用也不会削弱。从长远看，除非中美关系出现大的改善，否则美国仍然会继续采取各种形式向台湾提供所谓“保持台湾必要的防卫能力需要的”武器装备，而且技术水平会越来越先进。因此，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要有长期斗争的心理准备。

三、在这场同美国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务实的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所谓务实的原则，就是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争取做那些在现阶段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不要把预期的目标定得过高，积小胜为大胜。这样做可以避免把事情做绝，留有余地，以待形势变化主动寻找更有利的时机。《与台湾关系法》颁布后，虽然我们同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但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8·17”公报在很大意义上是个中美双方妥协的产物，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台湾的态度是不可能作根本性的改变的。如果我们和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彻底地达到我们的目的的话，那么极大的可能性是回到建交前的状态。而这是无助于我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更无助于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发展。所以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除了坚

持有理、有利的原则外，也必须充分注意有节——有限度的妥协。

四、在同美国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对美国政府和国会有所区别。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关于台湾政策的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但政府受现实利益的驱使，制定政策更务实一些，像卡特政府可以接受中国提出的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兵三原则，就是出于现实的战略需要考虑。但国会中一些人就不同意，他们容易从理念出发考虑政策的制定。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政府是受国会监督的，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国会的态度。当然，在有些问题上，总统是有否决权的，政府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我们要善于把握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来思考对策，使可行性最大化，使利益最大化。

五、从根本上来说，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把发展中国的国力放在首位。未来美对台军售的发展，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的互动关系，即：中国的实力地位、两岸关系的状况、美对中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内政治进程。其中，美国内政治进程因素对美台安全关系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中国的实力地位因素起制约作用。中国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是制约美对台军售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台湾的归途上虽时有荆棘，但中国统一的大势是不可抗拒的。

（正文： 张北根 执笔 点评：程美东 张北根 执笔）

1985年靖国神社事件

1985年8月15日，是抗日战争结束40周年纪念日，对全世界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40年前，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可谓是举世同庆，和平的欢呼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响起。对日战争的结束让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希望从此以后天下太平。而对于日本来说，“8·15”也就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失败。就在40年后的同一天，日本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政府于日本武道馆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日”仪式完成后，率领内阁成员直接到靖国神社参拜。中曾根在靖国神社参拜堂深深鞠了一躬，献上用公费购置的鲜花，然后退出。在记者问及是否公式参拜时，中曾根说：“我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当然是公式参拜。”（所谓“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即以官方身份正式参拜，具体是指首相及内阁成员在参拜注册时注明职位，参拜按神道教传统方式进行，用公款购鲜花和上香，乘公车前往等。）[①] 这是自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在1978年甲级战犯供奉到靖国神社以后，日本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且是在8月15号。[②]

1985年本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40周年，日本和亚洲许多国

---

① 此段引自刘江永：《靖国神社问题实质与斗争焦点》，载 http://www.people.com.cn，2005年8月10日。

② 参见《1985年：中曾根首相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载 http://www.southcn.com，2002年9月27日。

家都发表了许多纪念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发表谈话，都警告日本领导人不要再参拜靖国神社，认为这会极其严重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中曾根康弘却不顾各方的反对，率领18名内阁大臣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强烈谴责，并引发了中日关系的轩然大波。[①]

一、解读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对于中国人而言已非常熟悉，但一般人除了知道这里供奉着二战结束后被审判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内“为天皇尽忠”的亡灵外，对靖国神社本身及其由来和实质、它在日本的历史作用以及现实地位和影响，都知之甚少。

日本的靖国神社建于明治二年，也就是1869年。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距日本皇宫不远，与北丸公园相邻。经过多年时间反复的重建扩

靖国神社



① 此段引用王俊彦：《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建，占地面积已扩大到约9.9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看，其轮廓像一把柄朝东、刃指北的菜刀，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浓重的军国主义气息。其修建之最初目的本是为了纪念在明治维新运动中为恢复皇权而死难的烈士。当时称为“东京招魂社”。明治维新之后，它就用来供奉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其中包括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的灵位。由于在日本独有的宗教“神道”中，相信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而神社就是死人灵魂的住所。明治十二年将“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并被授予别格官币社。(靖国神社，语出《春秋》“僖公二十三年秋”之“吾以靖国也”。在“东京招魂社”易名“靖国社”的奉告祭中曾云：“你们赤胆忠心，忘家献身，各自死去，正因有此伟大功勋，才使我大皇国得以安邦治国，故改称为靖国神社。”）从此，靖国神社成为日本为国家牺牲殉难者，即所谓“护国英灵”的灵魂聚集地，每年接受以天皇为首的政府官员的祭拜。日本的老百姓也视其为圣地，对它尊崇敬仰。以前日本人从军出征时总会说：“让我们到靖国神社再见吧。”此后日本历次战争的战死者，都要在靖国神社里面放一个牌位，接受后世的祭拜。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靖国神社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靖国神社在二战前属于国家的宗教设施，同时也与军事相连，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这也是它与其他神社属于内陆省管辖所不同的地方。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民族走着从封建武士社会向封建军国主义发展的道路，而靖国神社恰好成为军国主义分子煽动国民军国主义情绪的工具，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对外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二战后，靖国神社被保留了下来，但鉴于它的军国主义性质，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了日本“政教分离”的政令，此原则在日本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从而使其成为一般的民间宗教设施。[①]

二、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之来龙去脉

每年的4月21日至23日和10月17日至19日，靖国神社都要举行春

① 参考单琪：《靖国神社概况及首相参拜》，载 http：//past. people. com. cn，2001年8月8日。

秋两次盛大的祭奠活动。[1] 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每年的“8·15”战败纪念日那天，靖国神社更是迎来一批一批的右翼政客、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以及战争中阵亡士兵的遗族们前来祭典。不过由于二战结束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战后的日本宪法规定，任何宗教团体都无权接受国家特权，国家及其机关不得参与宗教活动。因此，政府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那些企图利用靖国神社来搞煽动活动的日本人在战后初期不能不有所顾忌，政府的主要官员也不敢轻举妄动。日本遗族会、军恩联盟、自民党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等团体打出了“非宗教论”，说靖国神社只是形式上的宗教法人，实际上不是宗教，首相参拜为国战死的军人不算宗教活动，不违宪法。

1951 年 9 月，在旧金山签署了对日和约后，日本恢复了独立自主权。日本政府的某些人认为时机已到，长期以来处心积虑的右翼势力想要冲破“政教分离”这一禁区，开始在国内掀起了靖国神社的祭祀活动，并对政府不断施压，要求国会把靖国神社重新转由国家护持。

由于靖国神社不同于普通的神社，而日本首相又是日本的最高行政长官，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为大家所瞩目。这也成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化的决定因素。

1951 年 10 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成为始作俑者，参拜了已变身为民间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此举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争议。自此开始，至 70 年代中期以前，除鸠山和石桥外，日本历届首相几乎都参拜过靖国神社。但在参拜时间的选择上，都极力回避“8·15”这个特殊的日子，而是选择在春秋两祭进行参拜，并且也未超出私人身份的范围。

1975 年 8 月 15 日，在日本战败投降后 30 周年之际，当时的首相三木武夫原想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前往参拜，但经探寻各方反应，权衡再三，决定以私人身份前往。1978 年 8 月 15 日，首相福田赳夫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2]

---

① 引用单琪：《靖国神社概况及首相参拜》，载 http：//past. people. com. cn，2001 年 8 月 8 日。

② 参考鲁义：《靖国神社与正式参拜》，载《现代日本经济》1987 年第 5 期。

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利用举行秋祭的机会，终于把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偷偷弄进靖国神社，在为实现既定目标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①] 这也是使中国及其他东亚邻国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感到愤怒的转折点。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同年，日本政府把每年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定为“追悼战亡者、祈祷和平之日”，这不仅引起日本在野党、群众团体及舆论界的不满和反对，而且也引起中国和朝鲜等国的严厉指责。

在之后的铃木内阁期间，首相参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他为首的内阁成员全部出动“大举参拜”。日本的舆论反应强烈，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个人参拜限度。

1982年11月中曾根新内阁诞生，中曾根首相开始挑战靖国神社公式参拜。1983年1月，中曾根首次到靖国神社参拜。但记者问他作为首相参拜还是作为私人参拜，中曾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向靖国神社的英灵感谢参拜。”中曾根虽然没有明言公式参拜，却向公式参拜迈出了一大步。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认为中曾根率日本阁僚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国《人民日报》刊载新华通讯社的述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年日本少数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人的活动和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超过了往年。”为了促成政府的公式参拜，日本战没者遗族会发起了绝食请愿活动。1984年8月15日，100余名日本战没者遗孤在靖国神社前绝食50小时，请求政府公式参拜靖国神社。[②]

由此可见，日本人对靖国神社抱着十分执著的态度，而战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就一直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

① 参见《环球时报》，2001年5月29日第5版。

② 此段引自林思云：《日本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追溯》，载 http：//www. qingbao. jp，2007年1月22日。

三、1985 年“8·15”参拜内幕

1985 年 8 月 15 日，中曾根在日本武道馆的“全国战没者追悼日”仪式完成后，直接到靖国神社参拜。此举的做出并不是想当然的，而是经过了周密的铺垫。

中曾根上台伊始，就提出了要冲破禁区，实施“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施政目标，力图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做“政治大国”。在他所谓新保守理论基础上构想政治改革，而且表示过要修改以前的政府见解。中曾根的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维护靖国神社的宗教性的同时，把它作为由国家护持的慰灵设施，实行国家管理。他认为，“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国家应该有个感谢的场所。这是天经地义的，否则还有谁来为国家奉献生命呢?”同时，日本政府内部的右翼分子也纷纷加紧活动起来，企图为靖国神社翻案。在参、众两院的自民党议员中，有三个活动能量较大的团体，即:“遗族议员协议会”、“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和“大家都去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简称“三协议会”。他们极力主张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①

其实自民党内的右翼势力一直在为修改现行体制做准备，早在 1957 年岸信介内阁时期，成立了“宪法调查会”，企图修改宪法，最后以失败告终。从 60 年代起，自民党又先后多次提出了“靖国神社法案”，主张恢复其特殊的地位，可由于在野党和国民的坚决反对，尽管在众议院内得到强行通过，但最后由于在参议院成为废案而失败。但自民党仍不甘心，1984 年 4 月以总务会名义发表该党正式见解：首相和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祭祀费用由国家负担符合宪法。这显然是自民党内右翼势力为实现正式参拜找的堂而皇之的借口。8 月，日本政府以内阁官房长官“私人咨询机构”的名义，设置“关于阁僚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恳谈会”。会后作出报告书，实则为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准备好了理论依据。②

---

① 参考魏全平:《靖国神社风波暂告平息》，载《国际展望》1986 年第 17 期。

② 参考鲁义:《靖国神社与正式参拜》，载《现代日本经济》1987 年第 5 期。

1985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40周年的日子，为了在这个日子实现公式参拜，日本的政界异常活跃起来。自民党中央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的小委员会，负责处理靖国神社的参拜诸问题。由于公式参拜的最大问题是宪法规定的“政府不得直接参与宗教活动”，为了不违宪，自民党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案：首相到靖国神社只是追悼纪念，只对英灵牌位行一鞠躬之礼，而不参加靖国神社传统的、宗教气味浓厚的参拜仪式。这样就避开了违宪的问题。[①]

在经过长时期的精心准备后，中曾根首相置国内外舆论于不顾，在参加完追悼仪式后，率18名内阁成员前往靖国神社。而中曾根之所以这样做，应该说并不是完全出于其所谓“右翼鹰派”的保守主义立场，或与华为敌的思维定式，而是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使然。

四、中国反应强烈，政府发表严正声明

在中曾根之前，也有过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从1978年甲级战犯和靖国神社合祀以来，曾先后有大平正方、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三任日本前首相先后参拜靖国神社21次，但远没有像这次参拜那么正式，那么的“声势浩大”。

中曾根选在“8·15”这个敏感的日子进行参拜，可以说是二战结束后影响最为严重的。首先，在日本国内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各反对党派对其行为作出了强烈批评。社民党石桥委员长声称中曾根作为法制国家的首相，却不顾宪法强行到靖国神社参拜，是非常可耻的行为；朝日新闻等左派报刊也连日批评中曾根到靖国神社公式参拜有违宪的嫌疑；日本国内的和平团体则要以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起诉中曾根。此次参拜更是激起了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压力。

中国政府及民众对此次参拜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先来看看中国民众是如何反应的。

---

① 参考林思云：《日本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追溯》，载http：//www.qingbao.jp，2007年1月22日。

媒体的作用在此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中曾根正式参拜当天，中国中央电视台就报道了该新闻，并且详细介绍了社会党、公民党等反对靖国神社参拜的言论。8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绝不允许混淆侵略战争的性质》，文章批评日本政府试图用追悼“为国家和社会奉献了生命的同胞”，来混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大大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①]

在媒体的作用下，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对日本的积怨可以说就像火山爆发时压抑已久的岩浆在顷刻间宣泄而出，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日浪潮。其中以学生的呼声最大。例如在1985年的9月13日，一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在“三角地”张贴了一张题为《我们该怎样纪念“9·18”》的大字报，文章列举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及日本国内少数右翼分子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事实，指出，“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不念旧恶，与日本人民友好往来。但是，对日本政界少数人掀起的美化侵略战争、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却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大字报贴出不久，即有同学在下面加注了一条情绪更为激烈的批注：“我们北大曾经友好地接待过中曾根和几百名日本青年，但友好的举动并未感动这个海盗民族。同学们，不要再沉默了。难道我们北大的学生只敢因晚上关灯这种事而示威游行吗?!”一场后来被称为“新9·18”，直接关涉并引发了1986年学潮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风潮由此滥觞。9月18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1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打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中曾根”的口号和标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内也贴满了批判中曾根的大字报。由此可见，此次参拜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之严重，使中国国内的稳定局势受到了较大的波动。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表现得异常激动的中国民众往往只能通过一些示威、游行来发泄自己的愤怒情绪，这一切可能并不会对日本构成什么直接影响，但群众的空前强烈反应却能使中国政府在对待靖国神社的问题上一

---

① 此段引用林思云：《日本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追溯》，载 http://www.qingbao.jp，2007年1月22日。

改以往的较为“低调”的做法。在对待此问题上，中国政府不可能像民众那样，而必须慎重，而且也必须采取最为合理的方式来表示反对。

在参拜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左翼社会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姚依林副总理主持了欢迎会。会上，姚副总理在赞扬日本社会党严正立场的同时，激烈批评了中曾根政权。8 月29 日，当时的顾委会主任邓小平会见了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双方就中日关系进行了会谈。邓小平在谈了维护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后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活动让人担心，要注意日本政界，特别是个人的所作所为。”此处的“个人”即指中曾根。

可以说，邓小平在对待中日的历史问题上把握得很全面，拿捏得也非常准。在对待此次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中，这种全面性得以充分体现。邓小平对于日本国内干扰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倾向，始终坚持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有效的斗争。中曾根原以为正式参拜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国内，没有预料到中国也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10 月10日，日本外相安培晋太郎访华，邓小平在会见安培时严正指出：“最近发生了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最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出于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我建议日本的政治家、日本政府的领导人和各位朋友关注这个问题。”“对日本方面来说，不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损失，不做这些事也可以很平静地、很稳定地、持续地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真正达成谅解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还说：“不希望看到出现伤害两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希望日方慎重处理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安培表示出日方准备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让步的意思，中方也表示出将不再继续追究中曾根内阁的责任。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邓小平表现出了娴熟的外交技巧。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其希望通过友好与真诚去打动和感染日本政府。①

9 月20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曾根内阁到靖国神社正

① 参见中广专访刘江永之一：《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载 http：//www. sina. com. cn，2004 年10 月28 日。

式参拜，以该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理由对日正式抗议，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公开对日本首相等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所作出的外交反应。此时，靖国神社的参拜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政府间的严重政治问题，中日关系一度陷入了困境。中国方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只有这样才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外交部的反应是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80年代的中日关系可说是友好和摩擦并间的，有过“蜜月期”，却因为日本国内的负面动向而不能持久。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严正声明不仅表达了对中曾根内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有损中国人民感情的抗议立场，而且在国内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舆论作用。此举首先招致亚洲各国的强烈批评，其次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可能获得支持。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常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也能完全体现出来。此外，中国方面还对日本各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翌年8月5日同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进行了会谈，再次敦促日方今后不要再发生修改教科书以及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那样的问题，希望其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两国友好关系。[①]

中曾根当时以为最多也就国内会有所反应，完全没想到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因此，在国内外的种种压力下，中曾根不得不重新地慎重考虑有关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所以在此次事件后，他派出了安培外相到中国探听情况。在听了安培访华的汇报后，决定中止参加10月举行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中曾根说：“中国的反应并不仅仅是威胁。如果我再去参拜，就会使中国学生的游行活动激化，胡耀邦总书记说不定会因此而下台。日中关系恶化，中国的亲日政府倒台是违反日本国家利益的事，这恐怕也是神社的英灵们不愿看到的事。因此我决定中止这次靖国神社参拜，在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上前进一步，后退两步。”

10月，日本各大报纸纷纷登出中曾根因为顾虑中国反应，停止到靖国神社参拜的新闻。此后中曾根在首相任职期间，再也没有去过靖国神社参拜，日本新闻界把中曾根的靖国神社参拜形容为“龙头蛇尾”。中曾根后

---

① 此处引用魏全平：《靖国神社风波暂告平息》，载《国际展望》1986年第17期。

来在回忆录《天地友情》中说："我中止到靖国神社参拜的理由，是担心胡耀邦先生会因为我的参拜而遭到弹劾。"① 中曾根作出此决定更多的是出于对日本国家利益的考虑。

此后，中曾根首相决定以后都中止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尊重邻国人民感情、重视日中关系的表现。1986 年 9 月 3 日，中曾根郑重表示："所谓甲级战犯的合祀问题，从对方国家来看，总理大臣公式参拜祭祀有对本国遭受侵略的大规模战争负有责任的领导人的场所，等于表扬这些人，刺激国民感情。我们是亚洲国家，所以还是要对大战反省，接受教训。这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宿命。"同年 8 月 14 日，中曾根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发表谈话表示："鉴于我国作为和平国家处于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承担更大责任的立场，也必须重视国际关系，适当照顾近邻各国的国民感情。"日本政府"经慎重和自主研究的结果，停止内阁总理大臣 8 月 15 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根据中日双方达成默契，现任日本首相、官房长官、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这已成为惯例和日本在国际上维护本国名誉和信任的政治道德。此后 10 多年间，日本首相未再参拜靖国神社。② 看来中国政府的抗议对于中曾根取消以后的靖国神社参拜是奏效的。



点评：

1985 年日本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开启了战后日本政府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先河，使得 1972 年以后开始缓缓解冻的中日关系又陡然间陷入僵局，所以这个事件对于二战中被日本侵略的国家来讲，是一起严重的破坏国际政治道德准则的突发性事件，尤其是对与日本刚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且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程度最为深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多年来，中国政府和民众围绕日本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制订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对策，其过程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仅谈个

---

① 引用林思云：《日本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追溯》，载 http://www.qingbao.jp，2007 年 1 月 22 日。

② 引用刘江永：《靖国神社问题实质与斗争焦点》，载 http://www.people.com.cn，2005 年 8 月 10 日。

人的一点感想。

一、靖国神社问题鲜明地反映了中日之间关系的症结所在——历史怨恨的深厚程度，也表明了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人民感情的漠视程度。日本自甲午战争起血屠旅顺城，毁我北洋海军，割占台湾岛，索赔所谓战争款2.3亿两白银；日俄战争中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动干戈，戕害中国人的生命，损毁中国人的财产；9·18事变，夺我东三省，继而进逼华北；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八年抗战中中国伤亡军民3500万，损失6000亿美元。在整个近代侵略中国的外来列强中，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程度最深，这是任何一个有着相似遭遇的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忘记的屈辱历史！有着浓郁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华民族，对待这样奇耻大辱的历史能够忘怀吗？

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无法释怀的另一个潜在原因，与日本没有履行国际法所同意的、近代世界史上普遍通行的战争发起国须向受害国进行经济赔偿的义务有关。德国在战后对所有受害国都给予了数额巨大的经济赔偿，日本在战后对于亚洲广大的受害国也给予了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只不过数额相对德国要小的多，但对于受害程度最重、受害时间最长的中国却没有给予赔偿！如果日本国贫穷，或者日本国对中国政府的放弃赔款表示出友好行动的话，中国民众也不会计较这个问题了。但日本政府官员偏偏屡屡祭祀战争贩子，也难免让人要重算老账了！

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无法释怀的第三个潜在原因，是日本本是中国的学生，中国古代长期辉煌灿烂的文明之光曾照亮了日本很长时间的历史征程，对于推动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的作用无法估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是自己的虔诚学生，并且传说还有子嗣血缘关系的蕞尔邻邦小国，却那么凶狠无情地蹂躏自己的恩师，这对特别讲究道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是最难以原谅的！

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无法释怀的根本原因则是日本在战败后从来没有痛心疾首的悔恨，对于那段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缺乏足够的反省和真诚的道歉。中国人的宽容心是博大的，然而面对日本一些人不断地篡改历史、逆视历史、屡屡伤害中华民族自尊心的行为，中国政

府和民众却再也无法原谅!

中国政府和民众反对日本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完全合法的。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甲级战犯是经过国际法庭以反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等国际公认的罪名被处死的，日本政府官员正式参拜他们的亡灵就意味着对国际法的藐视！这样的行为就得要坚决的抗议!

二、日本政府官员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和民众则随后频频发起反击，这是无可厚非的正当行为。问题是，在这种冲击——回应的中日关系模式中，中国总是处于被动，中国政府和民众总是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我们这样的应对模式对于最终解决问题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模式要持续到何时？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应该承认，1985 年靖国神社事件后，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激烈反应对于制约日本政府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起码此后 10 多年日本首相未敢重复此举。可是自 2001 年以后的六年时间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再以正式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虽然我国政府和民众每次都激烈地作出反应，却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这至少反映了这种反应模式效果的有限性。这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政府和民众在继续保留这样的反应方式的同时，能不能想一些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部分人士搞的对日索赔活动就是主动在日本本土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一种不错的形式。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想一些类似的方法来主动消解日本国内一些人歪曲、美化侵华战争的历史影响?

三、从表面看来，日本政府官员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为了弘扬大和的民族主义；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官员以正式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尊重中华民族的感情，但在本质上两者之间具有根本的不同。网络上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话：“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不知其言是否出自中国人之口，但却能从一个侧面道明了那些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的心里话。中曾根参拜的理由就是如此：“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国家应有个感谢的场所。这是天经地义的，否则还有谁来为国家奉献生命呢?”小泉纯一郎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以此来作

为参拜靖国神社战犯的理由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民族主义的合理性都是受法律和道德约束的。把民族主义无限膨胀到侵害其他国家，民族正当权益的程度就是不合理的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以目前人类的普世价值观来审视其合理性与否，以国际法的原则来考察其合法性与否，而不能搞民族相对主义。

四、中国一般民众对于日本的复杂情感是短时间无法消除的，而中国政府在全球化的世界大潮中理性地与日本这个经济最发达的近邻国家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也必然是长期的。前面已经说过，日本在近代给予中国的伤害实在太严重，中国人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的。中国民众对于日本在主客观上美化与那段侵略历史有关的人物和事件的行为的愤慨情绪完全可以理解，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很快消除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2年秋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仅为5.9%，而感到“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达43.3%；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形象，排在第一位的是“侵华日军”；60.4%的中国民众担心“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早年的何智丽事件，后来的赵薇太阳旗演出服事件、姜文的参观靖国神社事件，以及马立诚关于中国在对日关系中不要再纠缠历史、需要新思维的文章而引发的大讨论等等，在这些事件中，国人多数也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本军国主义情绪。对于这样的客观存在的舆情，政府既不可强行打压，但也决不能因此就以为此种情绪可以无限膨胀。比如，有的人在网上认为，如果中国人完全排斥日货，那么日本的经济就会一落千丈，殊不知在1978年以前中国与日本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往来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为日本离开中国就不能发展的观点实在是很不理智的。中国政府要想坚持改革开放的大业，就必须长期理性地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不能受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如何较好地处理高涨的民族情感与现实的国家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是中国政府长期面临的难题。

五、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处理靖国神社问题的最高原则。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由于中国的激烈反应（当然也包括韩国），日本官方一般是会做出一定程度的收敛的，

但这样的方式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吗？日本政府的官员不以正式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就改用私人身份；不能在“8·15”参拜，就改在其他的日期参拜。而这样的方式当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的行为，但我们却无力改变这个事实。所以，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态度，都不可能寄希望于短时间内从日本方面得到满意的结果。一个国家了解历史问题、处理历史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更好地谋划未来，以实现其现实和未来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简单地算历史旧账。我国现实的根本利益是发展经济，提升国力，因此必须尽可能地与日本保持正常的国际往来；至于国家长远的根本利益，重要的一点就是主权、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凡对于我国被侵略的历史加以否认或歪曲的做法，我们决不可以默认，这是我们对于日本政府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持激烈反对态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文：吴倩　执笔　点评：程美东　执笔）

1993年“银河号”事件

一、无中生有掀恶浪

“银河号”原本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所属的全集装箱货轮，1993年7月7日，该船按计划在天津新港上货后起航，途经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驶向中东，预计8月3日抵达位于波斯湾的迪拜港卸货，然后去沙特达曼港和科威特港。①

然而，从7月23日起，美国以获得情报为由，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在7月15日从大连港出发，装载着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而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银河号”是从天津新港出发，最后是去沙特的达曼港和科威特港，而且伊朗的阿巴斯港也压根儿没有集装箱货运码头，“银河号”所载的主要货物是文具、五金、机械等，均为集装箱货柜。由此可见，美国方面的情报连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搞清楚。即便如此，美国官员还振振有词地宣称：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并威胁说，如不然，要对中国进行制裁。8月3日，美国在与中国外交部的又一次交涉中，竟然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货轮或返回出发地，或由美国人登船检查货物，或者索性停留在某个地点，听候发落。美国还向该货轮计划停靠

① 参见陈文如：《碧海丹心扬国威》，载陆郝庆主编：《突发事件目击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的港口所在国散布其错误情报，并据此要求这些国家阻止该货轮按计划进港卸货，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①

8月3日上午8时，“银河号”到达阿曼湾后，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在“银河号”货轮上空盘旋跟踪，查问“银河号”名称、航向、航速、货运情况，以及出发港、目的港等。美直升机舱门敞开，不时对“银河号”摄像拍照。当天中午12时30分，美军舰61号驶近“银河号”，一直尾随其后。对于美方的多次无端指控和霸道行径，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为避免事态恶化，中方于8月3日指示“银河号”暂停前进。当日19时30分，“银河号”货轮按公司指示在阿曼湾距霍尔木兹海峡约11海里处抛锚待命。这期间，美国军舰61号、975号、996号轮番在它前后左右保持二至五海里的距离驶来驶去，掀起层层恶浪；美军战斗机、直升机、侦察机不断在它周围低空盘旋，卷起阵阵狂风，似乎要把整个“银河号”吞没似的。②

中方对美方的质疑经过认真、全面调查后，于8月4日明确告诉美方：“银河号”货轮上根本没有装载美方所说的两项化学品，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积极建议，包括在中东第一站迪拜港由当地海关与中方一同核查美国所怀疑的“银河号”货箱。8月7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发表讲话严正指出，美方所称中国“银河号”起程日期、起始港和抵达港完全失实，所谓该货轮载有化学武器前体纯属造谣，并强烈抗议美方对中方的澄清置之不理的霸道行为。但是，直至8月12日，美方一名高级官员还宣称：“我们有可靠的情报，证明船上载有化学武器前体，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

盛夏酷暑的波斯湾，阳光下气温高达摄氏50多度。漂泊在公海上的“银河号”船体晒得滚烫，如果手碰在甲板上或铁护栏上，便会立即烫起水泡。机舱里像个大蒸笼。但是，船员们却不能像平常那样洗澡，也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补给。因为“银河号”长时间漂泊在公海上，按正常航次

---

① 引用陈文如：《碧海丹心扬国威》，载陆郝庆主编：《突发事件目击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引用陈文如：《碧海丹心扬国威》，载陆郝庆主编：《突发事件目击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携带的淡水和食物开始短缺。船长张如德不得不要求大家节水缩食。抛锚当天他们就开始降低伙食标准，由平时的三菜一汤改为两菜一汤，而且数量也比平常明显减少。为了节约用水，有的人甚至一个星期没洗澡。人消瘦了，体质下降了，病号增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被眼前的一切所吓倒，当美国人从军舰上给船长打电话说："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油料、用水以及食品"时，张如德船长断然拒绝说："我们不需要！"船员们表示：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宁可节俭用食，也决不要美国的一滴油、一滴水。①

二、骑虎难下，弄巧成拙

就这样，"银河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抛锚了10多天。后经过政府间交涉，又向西南方向移了38海里，停泊在阿联酋东北部富查伊拉港外约50海里处的阿曼海公海上。后经多方努力，"银河号"货轮终于进入达曼港，由中国政府代表与沙特政府代表一起进行检查，美国派专家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

8月28日上午，美、沙人员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对船上货物进行清点和浏览检查。美方技术人员身着沙漠迷彩服，手提开箱工具、检查仪器、手电筒，早已跃跃欲试，大有不查出美国情报局所称的两类化学品誓不罢休之势，据当时中方负责官员沙祖康回忆说：当时的美国技术人员在进行检查时戴着防毒面罩，而且还匍匐前进，闹了不少笑话；中方一再声明"银河号"上未载有美方所称的两类化学品，自然胸有成竹；至于沙方，它提供了一个美方要抓证据、中方要澄清事实的场所，与双方友好。

8月29日上午10时10分，开箱检查开始了。首先检查运往伊朗的货箱。第一箱打开，全是一些铅封黑色铁桶。外行人一看确实大吃一惊。在场的美国人惊喜，沙特人惊奇，只有中国人沉住气。美国技术专家们疾步向前，小心翼翼地琢磨这些黑铁桶，以为这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两类液体化学品。当被告知里面是固体染料时，他们不信，仍要求从中间掏出两箱

① 引用陈文如：《碧海丹心扬国威》，载陆郝庆主编：《突发事件目击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打开看个究竟，即便是运往伊朗的装鞋纸箱他们也不放过，怀疑里面有液体化学品。这天上午，美国人接连打开了25个运往伊朗的集装箱。晚上，又检查了其余几箱。至晚上11时左右，自中国（包括经香港转）运往伊朗的集装箱已经全部开箱检查完毕，根本没有美国所称的化学武器前体物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

美方在运往伊朗的货箱中未查到他们要找的两类化学品后，又提出次日要查自天津新港和上海港上船的他们怀疑的所有货箱。为了澄清事实，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要求。但是，结果又使他们失望。美国人的心开始慌了。于是，他们把矛头转向了所谓的“情报”。据他们透露，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箱号是CSAQ3101和CSAQ3102。当他们发现“银河号”货轮上根本就没有这两个货箱及其提单号时，便开始怀疑情报部门把“号码”记错了，因此提出要查相近、易混的CSAQ3010号集装箱。中方欣然同意。但开箱一看，却是运往巴基斯坦的扑克牌。美国人的愚蠢做法成了现场众人的笑柄。直到晚上11时左右，自中国运往伊朗的以及所有美方怀疑并认为要检查的从中国运出的共49个货箱全部开箱查完，结果美国人仍一无所获。于是他们便把赌注押在31日化验结果上。而化验结果表明，上述化学品都不是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美国人处境十分尴尬，但并没有就此罢休。[①]

就在化验结果出来当天，中、美、沙三方再次举行了会谈。在谈判桌上，美方代表、美驻沙特使馆参赞马克尤姆称：华盛顿认为，美方只检查了“银河号”部分货物，“不能公开承认船上未载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他说：“要么船上的中国货全部开箱检查，要么根据单子一部分一部分查，直到华盛顿认为可以了为止。”对于美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撕毁原先达成的协议，出尔反尔，不守信义，中方代表非常愤怒。美方代表虽自觉理亏，却百般狡辩，甚至一直以“奉华盛顿之命”作为搪塞的借口。而此时，沙特方面没有作出直接表态，而是建议三方对于以后达成的协议应以文字的形式由三方签字后见之于世。以巧妙的方式表达了对美方

---

① 引用陈文如：《碧海丹心扬国威》，载陆郝庆主编：《突发事件目击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谈判小组与驻沙特使馆人员在“银河号”货轮前合影

做法的不满。美方觉得有点儿突然，表示要请示华盛顿。为了向全世界澄清事实真相，中方于9月1日下午的三方会谈中，郑重宣布：“为更顺利地进行下一步检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了结此事，中方在对美上述要求持反对立场的情况下，同意扩大检查。”①

随后，“银河号”所载货柜被全部开箱检查。直到所载的782个集装箱全部开箱检查完毕，仍旧没有发现美国指控的化学武器前体物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人只好狼狈认输了。为了避免美国再次反悔，确认“银河号”货轮上未载有美国提出的两类化学武器原料，中、美、沙三方代表于9月4日下午1时正式签署了有关“银河号”的《调查报告》。

三、中方稳中求胜

“银河号”事件的发生绝不偶然的，很显然，它是美国蓄意而为的。从1993年开始，中美在武器扩散问题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93年1月，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上台初期，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实行“以压促变”的高压政策。这个政策的重点有二：一是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

① 参考陈文如：《碧海丹心扬国威》，载陆郝庆主编：《突发事件目击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遇问题挂钩，迫使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政治让步；另一个是指控中国对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内部成立了以助理国务卿洛德为主持人的各部门联席会议，专门负责人权和贸易问题。另外，还成立了以戈登·科勒为首的防扩散中心，其成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军方、国务院等部门人员，专门对付所谓中国对外扩散武器问题。[①] 而“银河号”事件是美国对中国的又一次无理挑衅，想借此事件来打击中国。

7 月底，美国无端指控“银河号”，并要求对“银河号”进行全面检查，中方首先是坚决拒绝的。因为美国没有理由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这完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凌辱。美国不以为然，从 8 月 1 日开始就派出了军舰对“银河号”进行“消极”监视，并搬出了某一国际条约，向世人证明其要求、行为的合理性，以此逼迫中国。中国外交部长助理秦华孙在 8 月 7 日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提出强烈抗议称：“由于美军军舰的干扰，中国‘银河号’货轮不能按计划停靠有关港口，被迫在公海漂泊。”新华社在 8 月 14 日则报道称，该货轮当时急需加油、添水。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 8 月上旬表示，美国当局一直希望与中国方面达成如何检查“银河号”载运货物的协议。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在 8 月 10 日告诉美国国会：“美国决心检查那艘船只，以确保化学品不会落入坏人手中。”[②]



8 月 13 日，江泽民主席接见美国众议员阿克曼，谈到“银河号”问题，江泽民说，船上没有危险化学品。但这一消息没有被传达出去。8 月 18 日，芮效俭陪同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江泽民在接见中直接向芮效俭提到了“银河号”事件，江泽民向他说：“我亲自过问了此事，我肯定船上没有你们指控的化学品。”这个讲话表明，事件已经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注意。芮效俭本能地相信江泽民的表态，心里明白，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已经说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肯定有误，事态的发展将以美国的难堪而告终。他立即向华盛顿申述自己的看法，认为船上不会有化学武器原料，美方最好以低调了结此事。但他的意见再次为中央情报

---

① 引用王立：《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载《1973—2005 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四部分，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引用阮次山：《冷和：中美世纪之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局所否决。狂妄自大的中央情报局只相信自己，不信任任何人。[①]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也都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意见，同意与中方斗到底。于是美国政府又指示芮效俭向中方提出要求：必须制止该船驶往目的地，否则美方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美方还提出要搜查该船。为向中方施压，美方还于8月25日宣布，由于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导弹，美方在两年内禁止向中国出口敏感的高级技术产品。实际上美方这一指控是克林顿总统上台前已经提出的，一直拿不出可靠证据，此时却突然宣布制裁中国，纯属进行恐吓，企图来个下马威，使中方在“银河号”问题上让步。[②]

8月13日以后，情况急转直下，为了打开双方僵持局面，也为了澄清事实，中国外交部向美国建议，让“银河号”停靠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港口，要由第三国进行登船验货。据最近一期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中方要求的条件是：美国一定要公布检查结果。在此之前，中国曾表示过经过全面的调查，于8月4日明确告诉过美方：“银河号”货轮上根本没有装载美方所说的两项化学品，可美国方面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中方的任何“否认”声明，并且认为中方发表的检查“银河号”货单结果是虚张声势。于是，当中方愈来愈坚持要求第三者登船检查，并坚持美方必须公布检查结果后，美方有点儿开始心虚，担心万一登船检查结果与自己的“情报证据”不符，那美国政府和情报当局的洋相就出大了。[③]

此后，美国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向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施加压力，要求这些国家拒绝“银河号”入港。因此，原本在17日答应出面检查“银河号”货物的阿联酋突然在18日改变态度称：他们不愿意介入中美之间这场纠纷，因此拒绝让“银河号”入港。很明显，美国政府认为此事件最妙的解决办法是让“银河号”停靠无门，因此打道回府，借此使“银河号”所载的货物内容成谜，也使美国所谓的“情报证据”死无对证。因为一旦“银河号”被第三国人员登船检

---

① 引用阮次山：《冷和：中美世纪之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 参考王立：《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载《1973—2005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四部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参考阮次山：《冷和：中美世纪之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查，发现该船并未装载化学物品，不但美国情报当局会出一次大洋相，今后，美国再称自己获得了什么情报，非但不再为国际社会所相信，连美国国内的议员或民间人士都不会相信。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不能冒险让“银河号”在第三国停靠受检的理由。因此，对美国而言，最佳的结果当然是让“银河号”返航回国。果然不出所料，在8月19日，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方竟然无理到要求中方召回‘银河号’货轮。”①

美国人要求“银河号”返航就已经说明了他们心虚。最初它只是提出要检查货物，这时它又向有关国家施压，不让它们让“银河号”入港，其不可告人的企图显然是躲避公开检查。然而，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若“银河号”真的是“无辜”，那么最“坏”的结果是“打道回府”。因为，若未经证实“无辜”而回到新港，那么该船是否真的载运了化学物品的嫌疑就算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对“银河号”货轮进行检查是当时唯一能洗脱“罪名”的方法。但是由于美国的威逼，暂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港口停靠，而船上的供给也基本上到达底线了。



经过中方努力，8月底沙特阿拉伯政府同意允许“银河号”驶入达曼港，并愿由中、美、沙三方人员共同检查货物。当时中国政府同意检查时坚持一个条件：美方必须公布检查结果。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和化学武器专家飞往达曼港督察。经过一个星期对船上的所有782个集装箱和船体本身的仔细检查，经过化验，证明“银河号”确实没有运载美国所指控的化学品。9月4日，中、美和沙特三方官员共同签署一项证明文件，证实船上没有与化学武器有关的物品。同日，美国国务院官员确认，对中国“银河号”货轮的检查没有发现载有化学武器原料。中国外交部也于当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凭借无中生有的情报向别国施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指出，“银河号”事件给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要求美国立即消除其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求美方向中国公开道歉，赔偿中国所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但美国政府既不道歉，也不赔偿。②

---

① 此段引用阮次山：《冷和：中美世纪之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 此段参考 Robert L. 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第177页；《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5页。

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政府内部因此发生争吵。克里斯托弗、莱克和国防部长阿斯平都把怒火指向中央情报局和防扩散中心，而后者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又无中生有地说，"银河号"的化学武器材料是在检查货物前停靠的时候被卸下，或者已被倾倒进海洋。这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这种谣言只能唬住一般百姓，是瞒不过内行人的。因为：

一、"银河号"是全货柜货轮，此类货轮本身并未有吊柜设备，要在有货柜装卸设备的码头才能卸下货柜。

二、货柜轮船在吊装货柜时，通常把终点目的地的货柜装在最底层，而且为安全起见，每个货柜都是"门口"对"门口"堆放，靠货柜外的四个角落的卡栓卡住。因此，一旦吊装完毕，不到靠岸，用吊车吊卸，船上人员既无法吊起货柜，也打不开底层货柜。[①]

三、"银河号"航至中东水域时，即在大批美国军舰和飞机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下，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将大批数以吨计的化学原料倒入海中而不为其获知。

而且，即使"银河号"真的倾空所载运的化学原料，那船上必有为数极多的空货柜，这些空货柜在靠岸接受检查时，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无法逃脱指控。

还有的官员甚至说，整个事件就是中国设计的一个圈套，中国向美国提供假情报，美国上了这些假情报的当，从而使美国难堪。[②] 这种蛮不讲理，而且还倒打一耙的做法在国际关系中实在是罕见的。

1993年9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上述谬论批判说："在'银河号'事件真相已经大白的情况下，美国还在继续造谣，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这样做只能是欲盖弥彰。"[③]

"银河号"事件使由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而受影响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热潮被一再点燃，国人被一而再地激怒

---

① 此段引用阮次山：《冷和：中美世纪之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 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③ 引用王立：《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载《1973—2005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四部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了，甚至有不惜一战的欲望。面对国内高涨的抗议呼声，中国政府没有鼓励民众采取更激烈的对抗措施，而是务实地把危机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没有导致中美的全面对抗，说什么也不能背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路，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因为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以综合国力和势力范围为主导，而我们还不具备与美国全面对抗的国际政治环境和政治条件。

不仅在中国，此事在华盛顿也引起反响。莱克、克里斯托弗和国防部长阿斯平对中央情报局因为错误的情报使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出丑极为恼怒。正在北京访问的前国务卿黑格公开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他说：“我们怎么能告诉全世界必须实行美国的人权标准？我认为该是实行另外一种方针的时候了。”

美国在“银河号”事件中彻底输了理。针对中美关系不断滑坡的情况，美国决策者开始意识到一味对中国施压的强硬政策是行不通的。情报机构提供的报告说，如果这种势头继续下去，中国军方将得出结论，美国是中国的敌人。中美两国关系要想得到缓和就是难上加难了。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美方越来越认识到和中国合作的必要性。

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关系的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在人权与贸易挂钩问题上面临美国企业界的反对，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在防止武器扩散上，借“银河号”事件攻击中国的企图落空，政府内部出现争吵。美国的霸权行径和高压政策不但使中美关系不断下滑，而且在亚洲普遍不得人心，美国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处境。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政府终于进行了一次政策评估，开始认识到，再一意孤行下去对美国自己是不利的，并决定进行政策调整。在“银河号”问题上，克林顿接受了芮效俭大使早已提出的“低调处理”意见，派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森访华，向中方承认美方的情报有误，做了口头道歉，并表示美方今后乐于改善对华关系。汤姆森20世纪80年代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当时是洛德大使的主要助手（副馆长），后来调任驻阿富汗大使（常驻在巴基斯坦），过去同中国交往较多，一直主张加强中美关系。这时选中由他来缓和关系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选择：一是他同中方关系较好；二是地位不高不低，来华认错

和道歉，不致引人注目，也不会引起媒体宣扬。接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于9月25日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表示克林顿总统愿扭转两国关系的下降趋势，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不但国务院和军方要恢复与中方有关对口单位的交往，而且克林顿本人将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当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将与江主席举行单独会晤。[①] 1993年11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会晤，在分析家看来，与克林顿的会晤并不像双方期望的那么热情友好，但江泽民还是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并建议自己用二胡与美国总统来一段二重奏。这个提议是由翻译造成的一个小误会引起的，令克林顿感到迷惑。但是，正像邓小平在1976年做过的那样，如今的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头号强国的示意是明确无误的：轻松一下，来点儿音乐。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说："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中美关系又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此后，两国政府高层都认识到合作对话才是解决分歧的重要手段，在地区安全对话和经济贸易争端上，都在做出努力。

点评：

"银河号"事件是中美建交以后复杂关系史中的又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使中国蒙受了很大的屈辱：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土地广阔的大国的运输船竟然在公海上被另一个大国根据莫须有的情报的指控而遭包围、监控，并被迫接受检查，既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也没有国际法的依据。然而美国就是敢干，而我们硬是忍气吞声地认了。这个事件实在是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空间。

一、美国何以如此霸道？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太强大了，无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全面抗衡，中国的国力更无法与之相比。1994年美国GDP为61200亿美元，而中国只

---

① 此段引用自王立：《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载《1973—2005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四部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有5125亿美元。中国的军费1991年为325亿元，1992年为370亿元，1993年为427亿元，1994年为550亿元，1995年为630亿元，折算成美元，在57亿至75亿美元之间。按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计算，1994年中国国防费仅为63.9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2.3%。若按人口计算，1994年中国人均国防费只有5.36美元。1994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3%，而美国为4.2%，英国为3.6%，法国为3.18%；中国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9.5%，而美国为18.9%。即使在14年后的2007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3509.21亿元，约合449.4亿美元，而美国则超过了5000亿美元。在这个数字后面隐藏的事实是中美军事实力的悬殊。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空军飞机基本上还是以歼7、歼8为代表的二代机，而美国已经是三代机了。海湾战争中显示出美国军队的高科技水准是中国无法企及的。正因为有如此的实力，美国才敢于在世界称霸，才敢于对中国态度蛮横，所以，尽快发展中国的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防能力，是维护国家尊严的最根本途径。

二、中国为什么忍辱负重地接受检查？从根本上来说，允许检查是中国政府从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而作的妥协。“银河号”事件发生后，对于美国的无端指控，中国感到非常愤怒。当时，美国给“银河号”设定的出路只有两条，其一是掉头回国，其二是接受检查。中国的回应方式可以有三个：拒绝美国的要求。但鉴于美国已派军舰跟踪、围堵“银河号”，要想继续航行，须有中国军队保护，那么就意味着中美之间将会爆发正式的军事战争；如果掉头返航，那就意味着承认我们的船上载有违禁化学品，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接受检查，的确使中国受到了侮辱，但至少可以粉碎美国的谣言，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中国的清白。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的沙祖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17次用了“窝囊”这个词来表达当时的感受。他说：“同意上船检查当然是中央的决策。在当时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如果你拒绝，他（美国）就说，果然给我说中了吧，船上肯定有吧，那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沙祖康以此来形容当时的决定。“拒绝，窝囊，我们就要背黑锅；让他们去查，某种程度上我们受到了侮辱，也窝囊。但是两个窝囊中选择了第二个。等这个事情的真相查

明了，没有（违禁化学品），那窝囊就是他们的。”①

三、美国何以动不动就扬起制裁的大棒来威吓中国？美国对中国打制裁牌是经常性的，一会儿借口人权问题制裁中国，一会儿借口倾销问题制裁中国，过一会儿以盗版问题制裁中国，再过一会儿又以出售武器为名制裁中国，总之，好像中国的血脉掌控在美国人手里似的，以为他们一制裁，中国就会垮塌。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中国曾封闭了那么多年，不照样挺过来了吗？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世界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可是，不怕制裁是一回事，不能接受制裁是另一回事。不怕着眼的是底线——生存，告诉对方你休想用制裁来达到对我国根本利益的损害；不能接受制裁着眼的是未来的大局——发展，尽量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以赢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据海关统计，2005 年 1 至 11 月，中美贸易额达 1915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 1476 亿美元，进口 439 亿美元，中方顺差达 1037 亿美元，截至 2005 年 10 月统计，美国仍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现阶段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发展，而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自是不言而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动不动就制裁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有人会说，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没有中国，他会丧失很大的市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就需要的程度来看，中国更需要美国，因为我们的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更多的要借鉴美国（包括西方所有发达国家）。“银河号”事件不过是美国变换了花样的一种制裁中国的方式而已，有识于此，我们也就不感到奇怪了，也就用不着动肝火了。我们允许美国检查“银河号”，就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四、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着眼大局。“银河号”事件使当时的中美两国关系非常紧张。国人义愤填膺，国际上有很多人担心中美两国会出现武装冲突。但中国从中国的大局和世界的大局出发，没有诉诸武力维护国家的尊严。此后面对美国一手制造的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与“银河号”事件基本

① 引自《面对面》：“中国派”沙祖康，载 http://news.cctv.com，2007 年 2 月 11 日。

上如出一辙，我们在坚持斗争的同时，并没有同美国彻底地决裂，都是出于上述的处理原则而作出的。

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应当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一方面不要图一时之快，与美国搞全面对抗；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经济发展，而在大的问题上迁就美国。总之，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对全世界是有利的。当然，要保持这个稳定的局面，最终还是取决于美国的，因为美国一直是中美关系中麻烦问题的制造者。

（正文：吴倩　执笔　点评：程美东　吴倩　执笔）

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

一、北约轰炸南联盟

1991 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原南斯拉夫联邦分裂为五个独立国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组成）。由于南斯拉夫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就很复杂，突遇此大事变，一时间纷争四起，战火纷飞，其中以科索沃地区的阿、塞两族矛盾尤为激烈。

科索沃位于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西南部，面积 10887 平方千米，与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相邻，人口 200 余万，其中 90% 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在南斯拉夫联邦时期，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内的自治省，但这个地区始终要求更高程度的民族自治。1980 年铁托逝世后，以独立为目标的科索沃民族主义运动逐步兴起，阿族与塞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冲突不断。1992 年 5 月该地区阿族自行组成议会和行政机构，选举民主联盟领导人鲁戈瓦为“科索沃共和国”总统。1996 年，阿族激进分子成立武装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开始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分离运动。面对阿族人的反抗，以米洛舍维奇为首的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当局采取强硬镇压措施，派遣大批塞族军队和警察部队进驻科索沃，试图消灭“科索沃解放军”。1998 年 2 月 28 日，科索沃分裂主义武装袭击塞尔维亚警察，科索沃危机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如果科索沃局势失去控制，将在巴尔干

地区引发一场可怕的战争，会直接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因此，他们决定介入科索沃危机。

3 月 31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南联盟实行武器禁运，同时重申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敦促政治解决危机。4 月 23 日，南联盟举行全民公决，95% 的塞尔维亚投票者支持米洛舍维奇拒绝国际调解的主张。7 月 5 日，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与科索沃阿族政治领导人鲁戈瓦会谈，表明美国政府坚持科索沃在不独立的前提下恢复自治权的主张，然而，南联盟在北约军事威胁面前并未罢手，反而加强了武装打击和围剿。9 月 1 日，米洛舍维奇向科索沃领导人提出为期三到五年的自治方案，给予科索沃一定程度的自治权。10 月 7 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表示，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开始倒计时。1999 年 1 月 16 日，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员在科索沃南部拉察克村附近山谷发现 45 具阿族人的尸体，并借机指控塞族警察屠杀平民。南联盟塞尔维亚政府予以否认。1 月 20 日，北约开始针对科索沃危机进行军事调动。2 月 24 日，科索沃阿族代表团决定成立“科索沃临时政府”。1999 年 2 月 6 日，在美国和北约的压力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举行和平谈判，谈判的基础是美国特使希尔草拟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尊重南联盟的领土完整，科索沃享有高度自治，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科索沃解放军”解除武装，按当地居民人口比例组成新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北约向科索沃派遣多国部队保障协议实施。这个方案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阿族坚持要最终走向独立，并且不愿解除武装，南联盟则不同意科索沃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亦反对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但是，主持谈判的美国和北约表示，这个方案的 80% 内容不许改变，必须接受，否则拒绝的一方将受到惩罚，其中对南联盟而言将遭到北约的军事打击。在谈判陷入僵局后曾一度休会，3 月 15 日复会，阿族代表于 18 日签署了协议，但塞尔维亚方面仍然拒绝签字。3 月 19 日，北约向南联盟发出最后通牒，3 月 20 日，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 1400 名成员全部撤离科索沃。3 月 23 日，美国参议院投票支持克林顿对南盟实施轰炸的决定，南联盟宣布全国处于“直接战争危险状态”。3 月 24 日，北约开始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空袭。

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

中国政府是反对北约用武力来解决科索沃危机的。3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29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口信给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并复信美国总统克林顿，信中强调，中国反对凭借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科索沃问题应该在尊重南斯拉夫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科索沃地区各民族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通过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中方强烈要求北约立即停止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干涉，使科索沃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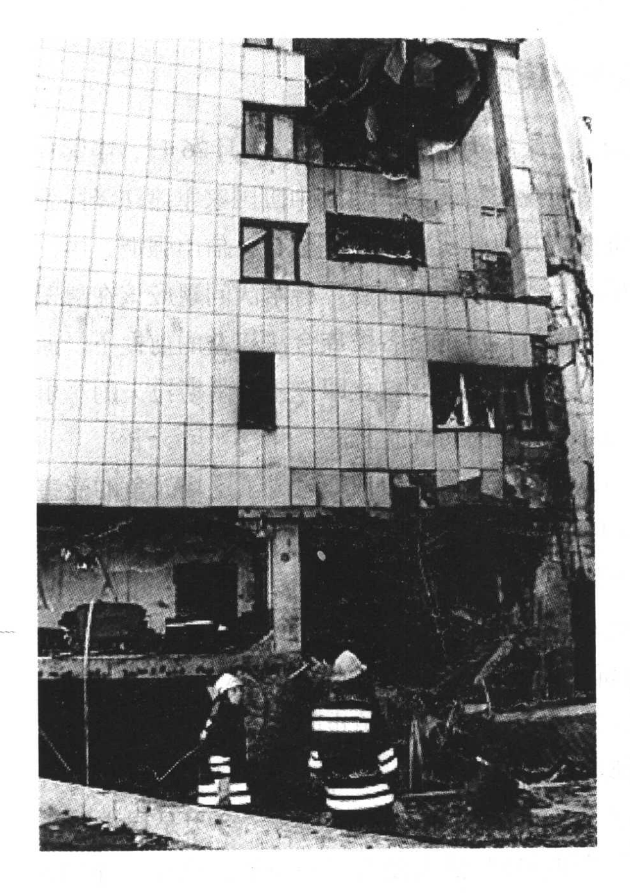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真心热爱和平的中国却也成了这场战争的受害者。5 月 7 日，这一天是星期五。断电后的贝尔格莱德一片黑暗。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设在半地下的俱乐部由于有使馆备用发电机提供电力，成为馆里唯一有电灯照明的地方，自然吸引了很多人的到来，里面聚集了约 20 人，有的打台球，有的玩牌，有的下棋，有的玩麻将。大约 11 时 15 分，有关部门为节省柴油，关掉了发电机，使馆也陷入了一片黑暗。大家用手电照亮，陆续从俱乐部走出来。



研究室主任王辅国在院子里找到大使潘占林，说：“今天是周末，让大家多玩一会儿，干吗关掉发电机?”潘大使看了一下表，已经 11 时 15 分，考虑到北约轰炸以来，大家一直缺觉，感到身心疲惫，他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白天工作又很紧张，都感到很累，今天索性早点休息，免得晨昏颠倒。”他说完，大家又聊了几句，纷纷散去。有的同志回到宿舍准备休息，有的在走廊里聊天。

大约 11 时 45 分，北约的导弹袭击了我们的大使馆！关于袭击时的情景，大使潘占林在他事后的回忆里有着生动的记载：

“忽然一声巨响。响声有多大，多少分贝，我不知道。总之，这么大的动静，我从没听见过。究竟是几声巨响，有人说两声，有人说三声，而我听到的几乎就是一声巨响。这响动，似天崩地裂，地动山摇，就好像发生了强烈地震，整个二层楼的官邸都摇晃起来。固定的玻璃窗都被推到房子里来，里里外外的门都被甩到外面，天花板下坠，墙皮脱落，屋子里的灯具破碎，



被炸的我驻南使馆

玻璃横飞。碎玻璃、混凝土块，稀里哗啦地打到床上、沙发上，我在床上被颠起来。住在楼下的厨师老王从床上颠到床下，慌忙中他没有什么感觉，后来他总觉得不舒服，回到北京后一检查，发现摔断了三根肋骨。

"当时，闪过我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北约轰炸了我馆旁边的南斯拉夫电力设计院，轰炸的冲击波殃及了大使馆，这可能是对使馆的'间接轰炸'。同使馆毗邻的电力设计院，是南联盟在发展中国家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很可能成了北约的轰炸目标。"

"我立即穿好衣服，拿了手电，拔脚向外走。这时，我回头一看，蜡烛尚未熄灭。我回身吹灭了蜡烛。门框两边的墙已经塌了下来，我只得从缝隙中钻出来。到了外边一看，坏了，被炸的不是邻居，而是我们的使馆！这是'直接轰炸'！"

"使馆大楼已经浓烟四起，烈火熊熊。大块的水泥构件从使馆大楼的墙壁摔到院子里，大楼南面的外墙已经完全坍塌，整个草坪已经堆满了废墟，小小的水泥道埋没在残砖碎瓦里。使馆刚刚运来的供食堂使用的五个大煤气罐也随之爆炸，外壳散落在使馆的院子里，有的挂在使馆周围的栅栏上，有的竟飞到了围墙外。我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北约竟然轰炸了我们的使馆!"

"这时，有些同志已经从大楼里跑出来。大楼里四处起火，浓烟弥漫，楼梯遭到破坏。天花板，墙壁上，钢筋、铁丝、各种建筑材料密密麻麻地垂挂下来。这些从楼里出来的人都没睡下。他们在烟火腾起之际，靠平时对大楼的熟悉，攀着铁索，沿着破损的楼梯下来。有的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借着火光，从窗口跳出来。这是在浓烟烈火中突围的第一批，大约七八个人。"

消息传出，中国震惊了！世界震惊了![①]

三、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激烈反应

1. 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道歉、惩凶、赔偿，承担全部责任。

我大使馆被炸后，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法，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道歉、惩凶、赔偿，承担全部责任。

5 月 8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 40 多天的狂轰滥炸，已经造成无辜平民大量伤亡，现在又居然轰炸中国大使馆。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也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当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紧急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奉命就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遭北约导弹袭击一事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抗议。当日，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在华盛顿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行径。李肇星指出，以美

① 该节材料节选自潘占林：《战火中的外交官：亲历北约炸馆和南联盟战火》，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版。

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当晚，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美其他高级官员前往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此事件向中国政府表示道歉。她说，克林顿总统、她本人和美国政府对发生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遗憾。同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表示，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是一个悲剧性错误，他向中国政府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北约国家领导人也分别向中国领导人致函或致口信，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表示深切的遗憾，对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中国政府再次向美国郑重提出要求。10 日，外交部长唐家璇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情况的发展。他代表中国政府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以下严正要求：第一，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第二，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第三，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第四，严惩肇事者。为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当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的精神，考虑到目前的情况，中方决定：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的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翌日，朱邦造指出，北约的当务之急是采取切实的行动，对中方的各项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他强调，中国已经注意到美国方面的道歉，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针对北约将袭击责任推卸为“个人错误”，朱邦造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包括：北约应承担袭击暴行的政治、道义、法律责任和相关刑事、民事责任，有关肇事者还应该承担国际法规定的个人刑事责任。在回答有关外国驻华人员人身安全的提问时，朱邦造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合法的抗议活动。同时，正如胡锦涛副主席的电视讲话指出的，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依据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依据中国的有关法律，保护外国驻华的外交机构和人员，保护外国侨民和来华从事经贸、教育、文化等活动的人员。



中方有理、有节的斗争产生了影响。9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致信江泽

民主席。克林顿在信中说："我就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所带来的痛苦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同日，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发表声明，就这一事件向中国人民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无辜死难者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10日，克林顿在白宫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向记者公开表示："我已经向江泽民主席和中国人民表示了道歉。我要再次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说，我对此表示道歉和遗憾。同时，我要重申，我们致力于加强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随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国务院向记者表示："我重申我们对由于北约错误轰炸导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人员伤亡表示深切悲痛。中国人民想必了解，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的北约领导人已经就这一悲剧性错误作出了道歉。北约将就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向中方作出全面解释。与此同时，我们继续与中国寻求一个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关系。"12日，德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北约成员国驻华使领馆纷纷降下本国国旗，为遇难的三位中国记者降半旗志哀。北京时间5月14日凌晨，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悼念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遇难者吊唁簿上留言："对死难者表示深切悲痛，并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哀悼。"当晚，应克林顿的要求，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克林顿说："我愿对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悲剧表示由衷的道歉，尤其是向受伤人员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我个人的哀悼。"他保证查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尽快让中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他强调美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他将尽最大努力处理好这场"悲剧"，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发展。江泽民说，我收到了你近日的来信，也已获悉今天早些时候你同李肇星大使谈话的内容。我注意到总统先生刚才再次作出的道歉。如你所知，中国政府在声明中和有关交涉中，严正地表明了立场，明确地提出了要求。江泽民强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进行导弹袭击，是一起震惊世界的严重事件，造成了我人员重大伤亡和馆舍毁坏，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也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当务之急，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彻底、公正的调查，并迅速公布调查结果，满足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提出的全部要求。

2000 年 4 月 8 日，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通报了美方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的责任调查结果。声称美国要打击的目标是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美方使用了不合适的目标定位方法，而且每一级审查都未能发现其中的错误。美方已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八名人员进行惩处，其中一名已被解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有明显标志，美国的地图也明确标出其确切位置，美方所谓不了解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确切位置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并非秘密机构，该局大楼距中国使馆有半公里之遥，两者外观区别明显，美方不可能将两者混淆。美方解释，由于几个人的失误，美方整套审查程序的每个环节都在同一个问题上出现“失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政府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切实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严惩肇事者，给中国政府和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在赔偿问题上，中美双方进行了多轮谈判。7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一轮谈判。第二轮谈判取得了进展。双方于 7 月 30 日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所造成的中方人员伤亡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中方代表强调，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美方必须对此承担一切责任，对中方一切损失作出迅速、充分和有效的赔偿。美方重申愿意解决中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问题。双方就中方伤亡人员的赔偿问题达成共识，美方将尽快向中国政府支付 450 万美元的赔偿金。中国政府将把这一款项分付给三位烈士的家属及受伤人员。中美双方将继续就解决中方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进行谈判。12 月 16 日，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支付 2800 万美元，作为中方财产损失的赔偿。

2.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和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行径。

应中国方面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5 月 7 日午夜开始就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举行非正式紧急磋商和公开辩论。安理会从

7 日午夜到 8 日清晨连续召开了五个多小时的非正式磋商和公开辩论。非正式磋商结束后，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北约袭击中国驻南使馆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震惊与关注，并向中国政府和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和慰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在公开辩论中首先发言。他指出，北约的野蛮行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准则，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北约必须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他说，根据国际公约，北约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属于战争罪行为，应当受到惩治。

北京时间 11 日凌晨 5 时 30 分，联合国安理会应中国方面要求再次开会，讨论中国起草的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主席声明。在举行了近两小时的非正式磋商后宣布休会。安理会主席、加蓬大使德尼·雷瓦卡宣布，安理会成员国将继续就中国起草的主席声明进行磋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向安理会提交了中国起草的安理会主席声明。这份主席声明的要点包括安理会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大使馆，造成严重伤亡和财产损失；安理会向中国政府、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声明草案说，安理会强调指出，北约的这一行为是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声明草案的内容还包括：安理会要求北约和直接有关各方对其所造成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把需对此事负责的所有人绳之以法；安理会请秘书长立即调查此事，并在 1999 年 5 月 14 日前提出报告；安理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等。安理会休会后，秦华孙大使对记者说，北约对中国使馆的空袭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安理会应该对此悲剧作出迅速和正式反应，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赞成这样做。安理会主席表示，他将继续加紧同有关各方磋商，以尽快确定复会日期。14 日晚，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正式会议，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通过了主席声明。在通过主席声明之前，安理会全体成员以及参加会议的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起立，为在北约导弹袭击中遇难的三位中国新闻工作者默哀。安理会主席声明对中国驻南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深表震惊，对袭击造成的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深表悲痛和关

注。安理会谨对中国政府和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哀悼。安理会重申了《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重申了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尊重外交人员和馆舍不容侵犯的原则。安理会强调必须对北约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调查，而且等待收到调查结果。安理会的主席声明虽然表现了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但没有全部满足中国的合理、正当要求，态度是软弱的。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会后对记者重申，北约必须对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的野蛮行径负全部责任。

3. 采取一切措施抢救伤员，立即派专机前往贝尔格莱德，接回我有关人员。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袭后，中国政府成立了处理我驻南使馆遭北约袭击事件专门小组。

北京时间5月9日下午，专门小组前往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医疗急救中心看望了在那里接受治疗的五名中国大使馆受伤人员。当地时间9日上午，南斯拉夫联盟外长约万诺维奇会见了中国政府处理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的专门小组。约万诺维奇对我使馆所有人员表示关切，对受伤人员表示慰问，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他说，南联盟方面愿意为专门小组的工作提供一切帮助，并给予全力合作。专门小组负责人、外交部领导成员王国章说，南联盟政府在袭击事件发生后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抢救，避免了我使馆人员的更大伤亡，并对专门小组的工作给予了大力协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南联盟政府和人民所做的这一切深表谢意。10日下午，专门小组向米洛舍维奇总统通报了几位遇难者的善后处理情况，对南联盟方面为及时营救中国使馆人员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米洛舍维奇谴责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的暴行，并向死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他还向死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了慰问。

当地时间10日中午、北京时间10日下午，三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朱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在贝尔格莱德新公墓举行。中国政府处理中国驻南使馆遭北约袭击事件专门小组、中国驻南使馆全体人员、南联盟塞尔维亚副总理博伊奇等南政府官员、在南联盟的外国记者、旅南

华人等数百人出席了追悼会。中国专门小组负责人王国章、中国驻南大使潘占林分别致悼词。

12 日上午，邵云环、许杏虎、朱颖的骨灰由专机接运回到北京。同机返回的六位重伤员曹荣飞、郑海峰、刘鑫泉、刘锦荣、任宝凯和杨永丰受到精心照顾。专机上临时增设了病床，医护人员紧紧地守护在他们身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主席到机场迎接。

为沉痛悼念三位烈士，国务院决定，12 日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在地、新华社澳门分社降半旗志哀。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埃及等国家的驻华使馆 12 日也降半旗志哀。

12 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分别前往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社，沉痛悼念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联盟使馆中光荣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烈士，亲切看望并慰问烈士的亲属。江泽民等称赞三位烈士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和骄傲，勉励烈士的亲属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正在国外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以其他方式向三位烈士表示哀悼，向他们的亲属表示慰问。同时，新华社、光明日报社分别举行悼念仪式送别三位为国捐躯的优秀记者。

在此次事件中牺牲的朱颖、许杏虎、邵云环烈士







4. 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北约导弹袭击后，中国政府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5月8日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表示强烈愤慨。他指出，这一袭击是“野蛮的、丧失人性的行径”。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叶利钦通过正在北京的俄总统办公厅主任普里霍季科，就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造成人员伤亡一事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深切慰问。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决定取消原定于8日开始的对英国的工作访问，并将访问时间无限期推迟。俄罗斯总统解决南斯拉夫危机特使切尔诺梅尔金8日在前往波恩前在机场对新闻界表示，北约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袭击将使和平谈判进程恶化。10日中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给国家主席江泽民打来热线电话，对北约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野蛮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叶利钦说，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他立即就此事发表声明，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俄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与中方完全一致。江主席在谈话中谴责北约袭击我大使馆这件事是一种极其野蛮的行为，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次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他说，中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主持正义、维护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在当前形势下，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前提是北约停止轰炸，在导弹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安理会无法讨论任何解决方案，而且任何方案都应该得到当事国南联盟的同意。中俄在科索沃等重大国际问题上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希望双方保持密切磋商，加强协作。

1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俄罗斯总统特使切尔诺梅尔金。切尔诺梅尔金通报了俄罗斯及有关国家在科索沃危机问题上的立场。他谴责几天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袭击是野蛮的侵略行为，并对死难者家属表示沉痛哀悼。他强调，科索沃危机只能在安理会范围内通过政治谈判得以解决。北约必须首先停止轰炸，南斯拉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朱镕基感谢切尔诺梅尔金的通报。他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这一暴行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侮辱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指出，中俄两国在科

索沃问题上有着广泛的一致，两国从一开始就反对使用武力，要求北约停止轰炸，以政治手段解决科索沃危机。中俄双方继续加强沟通和磋商，这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13日，在欢迎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工作人员大会上，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也纷纷对北约的暴行进行谴责，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代表中国政府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14日晚，应克林顿的要求，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江泽民指出，袭击中国使馆的严重事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自发地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义愤，举国上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一正义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理解和支持。

事件发生后，一些国家的元首、外交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分别向我致函、致电、递交外交照会或发表声明，对我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表示深切慰问，并对这一暴行表示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统魏茨曼13日在耶路撒冷接见来访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张振华及其一行时说，他在惊悉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于上周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后已致信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这一不幸事件深表遗憾。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10日就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向江泽民主席发来慰问电说，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馆舍被炸，我深感悲痛。我谨代表波兰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转达诚挚的悼念，并对受害者和死难者家属深表同情。波黑主席团主席拉迪希奇、主席团委员伊泽特贝戈维奇致函我驻波黑大使馆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并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使馆的袭击，正如对南联盟的侵略一样，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侵犯，热爱自由的世界必须予以谴责和阻止。慰问函强调，北约这一做法暴露了其推行世界霸权主义的最终意图。南联盟外长约万诺维奇致函我外交部长唐家璇，强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是史无前例的罪恶行径，不仅是对一个有影响力、热爱和平、同南联盟有着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国家的攻击，也是对文明社会外交使团的野蛮进攻，向整个文明世界敲响了警钟。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11

日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袭击是厚颜无耻的侵略行径。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朝鲜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以无比愤怒的心情严厉谴责美国和北约严重破坏当今自主、和平的国际关系的野蛮行径，同时全面声援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行动。古巴外长罗瓦伊纳11日在哈瓦那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暴行，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公然侵犯。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大臣贺南洪11日致函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野蛮行径，对中国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和同情。此外，拉脱维亚、罗马尼亚、缅甸、巴西、马耳他、印度尼西亚、苏里南、法国以及塞拉利昂等国家的外交部长和其他政府部门领导人纷纷致电我外交部长唐家璇和我驻外使馆，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表示强烈谴责，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意大利、英国等国政府和群众也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表示震惊和抗议。

5. 肯定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引导人民群众将爱国的情绪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努力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9日下午发表了电视讲话，指出：从昨天开始，全国各地的广大群众，纷纷举行座谈、集会、发抗议信或抗议电等各种活动，拥护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

●中国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的暴行



的北约的野蛮行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一些城市的学生和群众，还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暴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使这些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全国各界各族群众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重要讲话顺民意安民心。首都知识界坚决拥护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大家认为：讲话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声，要把内心的极大义愤转化成建设祖国的动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强大。上海、广州、南昌、合肥等地的理论界人士认为，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大使馆事件，党中央和我国政府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和严正的态度，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坚强意志，他们表示坚决拥护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表示极大愤慨。他们认为，我们的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在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的同时，要坚决维护社会安定，把力量用在增强国力上，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产业工人纷纷表示：要把内心的极大义愤转化成发展生产的动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强大。

为进一步顺民意安民心，13日下午，党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欢迎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工作人员大会，江泽民对死难烈士表示怀念，对驻南使馆工作人员和坚守岗位的新闻工作者表示敬意。他说，中国政府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继续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他说，几天来，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广大同胞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义愤填膺，用各种形式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和严厉的谴责。这些正义活动，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强意志。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这是我们完成各项改革和建设任务的基本保证。江泽民讲话引起了各地青年学生的强烈共鸣，起到了积极良好的作用。

点评: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是建国以来中国驻外使馆第一次遭到其他国家正式武装力量攻击的影响极其恶劣的事件。按照国际惯例,一个主权国家使馆区遭到其他正式的政府武装力量的军事攻击,就可以视为对该国家主权的侵略。面对这样严重的外交事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处理该事件的措施得当与否,关系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若干重大方针政策能否继续,关系到中国今后在国际上的地位,还会影响到国际格局的变化,而最直接的问题是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实践已经证明,该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是积极有效的,中国民众更加团结了、更加成熟了,与美国的关系斗而不破,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维护了改革开放的大局。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有着卓越的执政能力。

一、激烈反应与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并举。一个国家的主权遭受到严重的侵犯,该国政府必须要有激烈的反应,历史上一个国家由于本国领土被侵犯而立即向施武方宣战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得知我大使馆被炸的当天夜里,中国政府就迅速作出强烈的反应。比如,当天午夜即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该事件进行正式磋商和公开辩论,使得安理会迅速发表有利于中国的主席声明。同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借公开辩论之际,严厉谴责了北约的轰炸行为,要求国际社会对之进行惩治。随即中国政府又迅速发表了强烈抗议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但中国政府没有立即与美国断交,也没有立即召回驻美大使,这样做显然是为在进一步了解事件真相基础上采取进一步措施留有余地。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是误炸还是故意轰炸?是谁下的轰炸命令?如果是美国政府的决定,那么这个事件的性质就极其的严重了。但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总体上是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中美关系的,为此还在美国国内受到一定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这种直接轰炸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此面临这个重大的危机事件,中国政府必须要冷静思考,不能莽撞,以给自己的进一步主动采取行动留有余地。在美国政府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较快到中国驻美使馆

登门道歉、哀悼死难者和总统克林顿口头、书面的道歉声明发表后，事件的性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至少不是美国政府公开对中国的战争行为。剩下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在这个框架下同美国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合民心，顺民意，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事件发生后，中国的民众义愤填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广大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的暴行。中国政府对于广大民众自发的爱国行动予以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除了增加警力以维护秩序外，没有阻碍民众合法的行动。对于广大学生纷纷到美国驻华使馆示威游行也予以了理解，只是加大了维护使馆的安全的力度，不许人做出过分、非法的举动。这种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做法，既满足了民众释放愤怒情绪、展示爱国情怀的要求，又体现了一个现代文明大国应有的法治精神，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个压制民众爱国的政府是一定要被民众所抛弃的，北洋政府、蒋介石政府不就是如此吗？

三、及时有效地救治使馆受伤人员，高规格地安抚死难者。中国的大使馆遭轰炸，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事件中的死难者和受伤者都是国内派出去执行正常任务的，他们身上的痛代表的是民族之痛，他们的行为展现的是不屈不挠、无所畏惧的民族品格。因此，对于他们，政府要给予高度的关心和荣誉，否则，国内的民众不会答应，我们的政府就会失去民心。在此次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立即派专机去南斯拉夫救治伤员，安置死难者，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为死难者举行国葬，并授予其烈士称号。这种对死者的尊重、对伤者的关怀之高、之深，激励的是爱国之心、报国之行，最终促进的是民族、国家团结，展现的是凝聚力的增强。

四、决不轻易地接受美国的道歉。对于事后美国官方的道歉，中国政府没有轻易地接受，究其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关于误炸原因的解释不合理。他们一开始说是军方在瞄准使馆附近的目标时，偏离了方向，因为中国使馆离北约要打的目标很近，北约这种误击已经有多次了。但是当事实证明，五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中国使馆时，国防部长科恩又改口称，北约用了1992年的地图，中国大使馆没有标进去。可是，事实上任何

贝尔格莱德的旅游图都清楚地标明了中国大使馆的位置，美国在战前对南斯拉夫的地图研究得那么透，连贝尔格莱德市的最新地图不可能不研究。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却使用1992年的地图，要么是草菅人命，要么信息实在太闭塞。可是美国对上述两点都不承认，因此它的道歉不是诚心诚意的，我们自然无法接受。第二，中国民众不答应。美国的轰炸严重侵犯了我国的主权，而且还炸死炸伤多名同胞，他们轻描淡写地几声道歉怎能了却这件严重伤害中国民众感情的大事件？第三，我们不轻易接受道歉，可以使我们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保留更多的主动权。

五、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争取有益的国际环境，以获得应对的主动权。该事件爆发后，我们积极主动地利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切国际讲台来揭露美国为首的北约的罪行，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表明了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下，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多次道歉；美国赔偿了中国死难烈士和中国的财产损失；惩办了一些责任官员。

六、该事件暴露了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一些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心目中树立的虚幻的美好印象开始了逆转。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中美在经济交往中联系的越来越频繁，由于美国强大经济实力的吸引，更由于多数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肤浅，不少人对美国的印象不错，尤其是以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很崇拜，甚至视其为正义的代表。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发生之后，这个事件以血的事实教育了国人，更加深了他们对美国的全面认识。

（张北根　程美东　执笔）

后 记

2005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有幸被批准立项，此后我开始对该课题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

随着调研的深入，我对该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同时也感觉到仅仅从理论层面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的局限性。于是，我决定搞出一本史实性、理论性兼有，可读性、学术性俱强的雅俗共赏的著作来，这样的成果的现实意义比单纯的理论文章也许要大得多，因为材料鲜活，它的读者群应更为广泛。

从2006年9月起，我和课题组的几位同仁就开始了本书的编写，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仅仅研究新时期以来的突发事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把时限前移到1949年。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成果能否达到我的初衷，实在不敢枉下结论，但我还是谈谈自己对这个成果的一点看法：

第一，较全面、集中地介绍了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的过程，分析了其前因后果，这在目前的公开出版物中，尚为鲜见；

第二，采取的一事一评的体例，为通俗可读性与学术严谨性的结合提供了文体上的保障；

第三，学者点评部分的内容尽力从批判性和建设性入手，力图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对于本书编写，本人也有若干遗憾之处：

第一，没有将一些有价值的重大突发事件收进来。有的虽在调查中掌握了很多的新资料，但因为被调查方事先的约定而主动取消，有的是因为资料尚未完全公开被有关专家建议取消掉了；

第二，有的事件因涉及的专业性太强而影响了点评的深入、全面、客观。

另外，本书对个别的事件的介绍完全收录了学界的文章（在标题、内容上略作调整），对此，我要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因为我没有这些文章作者的联系方式，故而在未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就将文章收录本书，对于这一点，本人实在觉得歉意。也请作者与出版社联系，我们将向你们支付必要的稿酬。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在这里，我也向原文献的创作者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在这里，我谨向支持本书出版的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张琦社长、郭宏女士表示谢意，向参与本书写作的各位作者表示谢意！

当然，限于本人的才识，本书的不足之处肯定不少，只能请读者批评指正了。

程美东

2007 年 7 月 20 日于北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　1949-2005　（下册）
作者=程美东主编　胡尚元　黄锦春副主编
页数=622
SS号=11929911
DX号=
出版日期=2008年01月第1版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